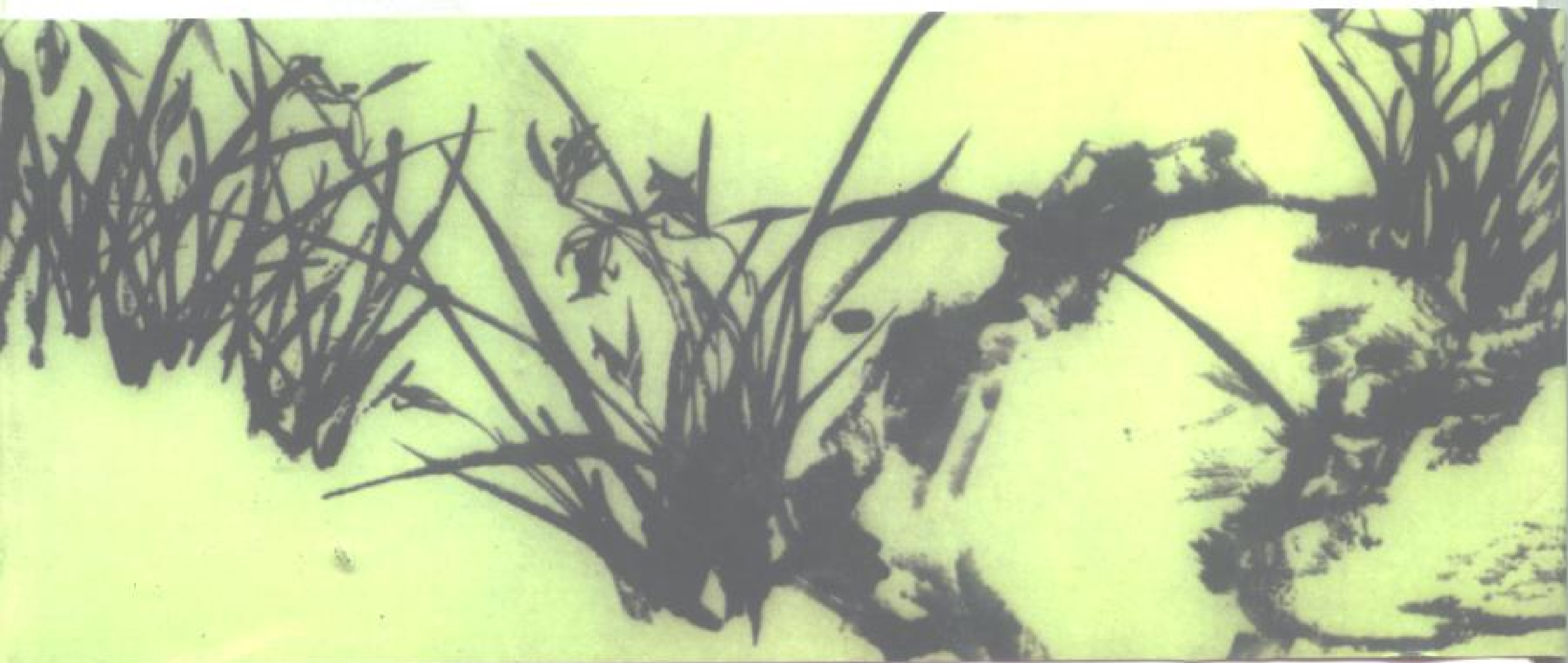


邓力群文集

第一卷



当代中国出版社

DH105/11

目 录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1)
(一九七五年十月七日)	
学习与创造	(29)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五日)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和运动的基本总结	(40)
(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	
理直气壮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商品流通	(50)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	(55)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正确处理科研队伍内部的各种关系	(82)
(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大胆地、全面地、准确地反映情况	(85)
(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 百家争鸣，办好刊物 (87)
(一九七八年二月三日)
- 社会主义时期还要批判封建主义思想 (90)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三日)
- 公检法工作也要解放思想 (101)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三日)
- 甄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 (107)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日)
- 城乡经济发展的两种新趋势 (114)
(一九七八年六月六日)
- 真理标准的讨论需向经济领域延伸 (119)
(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七日)
- 阶级斗争同物质利益的关系 (126)
(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
- 严分敌我，加强团结，发展科研事业 (150)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三日)
- 访日归来谈经济 (172)
(一九七九年二月)
- 商品经济的规律和计划 (189)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
- 社会科学院恢复学术职称评定制度 (225)
(一九七九年四月七日)
- 开展对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调查研究 (230)
(一九七九年八月八日)
- 要使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全面地发展起来 (241)

-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 同两个“凡是”的论争…………… (251)
-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二日)
- 指导拨乱反正的文件…………… (269)
-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 祝愿新一代专家健康成长…………… (290)
-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悼念田家英同志…………… (305)
-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八日)
- 共产党员要学习党的纲领…………… (310)
- (一九八〇年四月八日)
- 做新时期合格的共产党员…………… (325)
- (一九八〇年四月八日)
- 做党中央和国务院忠实的得力的助手…………… (336)
-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 真理的声音是窒息不了的…………… (357)
- 驳《〈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 (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 推广先进典型需要注意的问题…………… (395)
-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 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 (398)
-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下旬)
- 在安排好生产的基础上安排基本建设…………… (424)
-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下旬)
- 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 (434)

-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上旬)
- 计划工作与综合平衡…………… (445)
-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上旬)
- 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 (453)
-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上旬)
- 开展新时期农村发展问题的调查研究…………… (469)
-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五日)
- 妇联要把儿童的事情管起来…………… (483)
- (一九八一年三月八日)
- 漫谈后勤服务工作…………… (492)
-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日)
- 职工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 (510)
-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 青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希望…………… (515)
- (一九八一年五月四日)
- 中央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指导思想…………… (538)
-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555)
-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 问题和回答 (六则) …………… (566)
- (一九八一年七、八月)
- 中国经济的改革和调整…………… (599)
-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日)
- 正确对待大庆的基本经验…………… (615)
-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
- 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 (619)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 逝者和生者的欣慰…………… (647)
——记《刘少奇选集》（上卷）的编辑出版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五日）
- 关于加速开发利用云南磷矿资源的建议…………… (658)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论全党全国各项 工作的总纲*

(一九七五年十月七日)

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遵照毛主席的建议,提出了我国今后十五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宏伟任务。第一步,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与此同时,毛主席发出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促进安定团结的指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毛主席的这三项重要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

* 这是邓力群同志遵照邓小平同志关于各方面的工作都要整顿的精神,针对“四人帮”的严重破坏所写的一篇文章初稿,被“四人帮”获得,连同胡耀邦、胡乔木同志主持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草稿和国家计委根据国务院指示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作为“三株大毒草”公开印发进行批判,从而把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推向全国。

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二十五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执行毛主席的这三项重要指示，就是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执行党的团结胜利路线，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多年以来，在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日益提高，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大大增长，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实现今后二十五年的宏伟目标，增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毛主席在关于学习理论的指示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1】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在三项重要指示中占首要地位。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学习理论，首先要认真看书学习，仔细领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精神实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2】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成绩，是好是坏，是大是小，检验的唯一标志，就看我们是否应用这种理论，就

看我们在应用中是否有利于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是否有利于促进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否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更快地发展。

毛主席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经验,为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制定了一条基本路线。毛主席在这次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又进一步阐述了这条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

这次学习理论的活动中,一些地方、一些单位里,有不少同志由于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特点认识不足,常常被一些错误的口号所迷惑。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3】

林彪打着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幌子,叫嚷“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也是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的,而且表现得更为突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打着红旗造反,不易被人看穿”。人民群众对他的揭露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毛主席亲自领导了反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剥开

了他们的反革命两面派的面目。革命的人民和革命的干部在这个斗争中,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认识了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另一方面,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也从他们的失败中间吸取教训,设法把自己伪装得更巧妙,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总是把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塞进私货,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把我们一些同志、一些群众的思想搞乱,把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的党组织搞乱,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分裂群众队伍。他们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的阶级基础,有的本来就是地、富、反、坏、老资产阶级分子,有的是从小生产者中、工人一部分中、干部一部分中、党员一部分中蜕变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内外勾结,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违法乱纪,搞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受到破坏,甚至使那里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变质。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斗争,就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如果不把这些阶级敌人斗垮,不把他们篡夺了的领导权夺回来,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

每个基层的任务就不能完成，无产阶级专政就只是一句空话。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中，那些顽固地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撇在一边，而对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阶级敌人没有仇恨，对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受到损失毫不痛心，对社会主义制度遭到破坏无动于衷。他们热衷于拉山头，打派仗，长期纠缠于所谓这一派和那一派的斗争，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所谓新干部和老干部的斗争，所谓“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有的甚至为了达到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目的，不惜与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同流合污，串通一气。在他们的脑子里，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不见了，社会主义不见了，甚至爱国主义也不见了。现在是到了向这些同志（我们现在还叫他们同志）大喝一声的时候了，应该悬崖勒马，立即回头！他们应该懂得，在他们面前只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4】

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的上述问题，在省市、地县的领导下，遵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指示，有的已经得到解决，有的正在解决。由此我们应当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这就是在阶级社会里，对一切社会现象都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例如，对“造反”，就要看他是造哪一个阶级的反，

是代表哪一个阶级在造反。又例如，对“反潮流”，就要看他反什么性质的潮流，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潮流还是反修正主义的潮流，是反正确的潮流还是反错误的潮流。再例如，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它们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这些武器来反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来反对无产阶级。总之，要像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5】

我们的同志还应当得到另一个深刻的教训，这就是要识破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绝不能只看他们的宣传，而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正如列宁所说的：“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判断哲学家，不应当根据他们本人所挂的招牌……，而应当根据他们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论问题、他们同什么人携手并进、他们过去和现在用什么教导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6】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根据林彪的实际行动，看穿了他在“高举”、“顶峰”、“天才”、“一句顶一万句”等极左词句掩盖下的反马克思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实质。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毛主席又把林彪这个反面教员的反面教材公之于众，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进行批判，使大家看清了林彪是同国内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地富反坏

分子和国外的帝修反携手并进的，是用“五七一工程纪要”这类反动透顶的东西教导他的死党和追随者的。这样，就进一步暴露了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的丑恶面目。

鲁迅说过：“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7】林彪垮台了，现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中，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又在袭用林彪的老谱。但是，正如毛主席说过的：“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8】只要我们牢记同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斗争的经验教训，牢记列宁和毛主席的教导，就不难识破林彪一类的鬼蜮伎俩。他们的垮台，同林彪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二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我们学理论，抓路线，就是要促进安定团结。“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9】

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作用，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卖国贼，压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压迫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第二个作用，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就是

为了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这个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

人民内部也有各种各样的矛盾，这些矛盾只有通过毛主席所说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毛主席说：“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10】

党的基本路线明确规定：“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必须遵照党的基本路线规定的这个总政策，去划分敌我界线和是非界线。要采取毛主席早就指出的两条方针：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分化瓦解敌人，对敌人实行专政。

林彪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最恶毒的一手，就是混淆两类矛盾，颠倒敌我，把敌人当同志，把同志当敌人。林彪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从歪曲党的基本路线、歪曲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入手，胡说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革原来革过命的命”，把斗争的矛头针对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

利用群众一个时期内在某些问题上观点不一致，挑动群众斗群众，支持和纵容武斗，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都当作敌我矛盾，并且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甚至对敌斗争也不容许的方法，对革命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组成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实现反革命政变，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必须继续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特别是在那些被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和单位，更要广泛地、充分地发动群众，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腐化堕落分子、违法乱纪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彻底揭露他们袭用林彪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把那些经过揭露、批判、斗争、教育仍然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和死不悔改的分子，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压倒他们，打垮他们，“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就是我们对敌斗争的政策，我们必须坚决落实这个政策。只有这样，这些地方和单位才能出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我们必须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全党的团结，爱护全军的团结，爱护全国人民的团结。毛主席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1】

这里最重要的是加强党的团结。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讲过：“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

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12】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以后，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又一次强调加强党的团结，提醒全党同志警惕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分裂党的危险。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和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都一再号召全党同志“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全体党员，无论老党员、新党员，全体干部，无论老干部、新干部，都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加强无产阶级的党性，把团结看作党的生命，有利于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就不做。一切犯了或轻或重的资产阶级派性错误的同志，都要痛下决心，认真检查，切实改正。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要坚决遵循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13】的基本原则。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和政治纪律性，服从中央领导，服从上级领导，服从党组织的决议，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不容许任何党员和任何干部拉山头、搞宗派，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把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和单位搞成独立王国。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都要光明正大，对党忠诚老实，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谈。反对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的两面派行为。全体党员都要以大局为重，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忠诚履行自己入党时的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努力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抵制资产阶级思想

侵蚀，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

毛主席教导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14】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同这条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完全对立，林彪实行反革命政变的纲领是：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危险性就在于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把他的反动纲领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说成是理论，使那些“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之徒获得精神武器，而我们的很多好同志却受到蒙蔽，对于他们篡党篡权的丑恶行径丧失警惕。我们必须把这个反动纲领批深、批透，彻底消灭它的市场。

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全体党员、全体干部都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加强整个工人阶级的团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15】又指出：“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16】绝大多数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早已遵照毛主席这些指示，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实现了工人阶级的大团结。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九年了，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却有人还在分裂工人阶级，闹资产阶级派性。他们不是依靠整个工人阶级，而是依靠他们自己垒起来的这个

山头、那个山头。他们还在工人阶级内部搞什么“以我划线”，把那些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说成是“站对了队”，封为“最革命的”；把那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说成是“站错了队”，戴上“不革命”的帽子，甚至把老工人和模范人物都说成是“保守派”、“复辟势力”。他们公然反对毛主席关于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的指示，大搞形而上学，对自己全盘肯定，不做自我批评，对别人全盘否定，一意压倒，谁要是不赞成，就说谁是“和稀泥”，是“中庸之道”。他们这种破坏工人阶级团结的做法，其目的是为了争权夺利，一派霸权。这一切都是完全错误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17】在工人阶级内部，也同样存在着这种区别。我们在工作中要以先进分子为骨干，带动中间的，帮助和教育落后的，团结起来，共同前进。工人阶级内部三部分人的区别，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我们“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18】这样做的目的，是适应革命斗争和生产斗争发展的需要，不断提高整个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破坏工人阶级团结的做法是根本对立的。

为了实现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必须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包括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科学技术人员政策、民族政策、经济政策，以及

有关解决工人阶级内部矛盾的政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促进安定团结，在全国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三

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国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是属于调整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任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属于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革命和生产的关係，就是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就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实践和理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种矛盾，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但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作用。也就是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同时，又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

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处在国内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历史阶段。在这样的条件下，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放在重要地位。“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19】如果我们忽视了理论学习、忽视了政治的作用，我们的一切工作就一定要走到邪路上去。正像列宁所说的那样：“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20】

林彪一类政治骗子，把政治和经济完全割裂开来，把政治的作用歪曲成为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他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的词句掩盖下，用资产阶级政治冲击无产阶级政治，冲击无产阶级专政，冲击社会主义经济，冲击国家计划，冲击企业管理，冲击生产秩序，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必须狠狠地批判林彪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反动谬论，彻底肃清它的流毒。

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辩证地理解政治和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可是，我们一些同志至今还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对待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係，总是把政治和经济互相割裂开来，把革命和生产互相割裂开来，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

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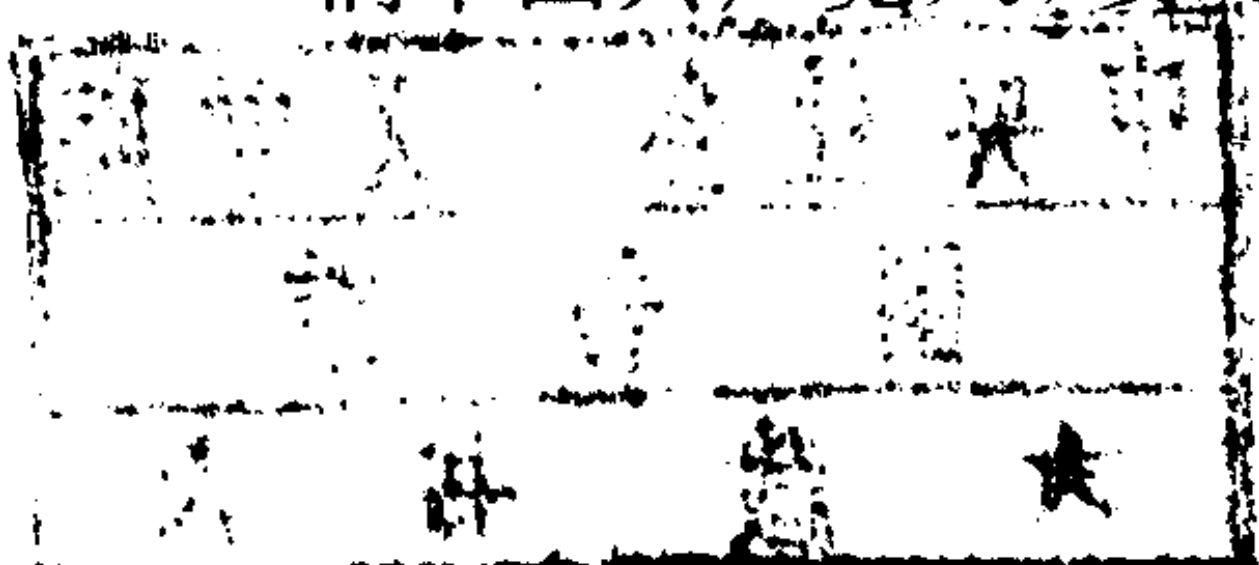
事实上，这种观点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就有人宣扬过。毛主席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严肃地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他指出：“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有这种意见的人，也常说一切应服从战争，他们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21】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都这样重视经济建设工作，这样重视增强革命战争的物质基础。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了进行和平建设的国内条件，而我们又面临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颠覆和侵略的威胁，难道我们还不应当争取时间，加倍努力，尽快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增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吗？

在抗日战争末期，毛主席在总结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的经验时指出：“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

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22】

当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正在展开的时候,毛主席就批判了那种把整风和生产两个环子分割开来,忽视生产,轻视经济工作的错误倾向。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错误倾向的思想根源是:或则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得干净;或则以为政治党务军事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经济工作虽然也重要,但不会重要到那种程度,觉得自己不必分心或不必多分心去管它。【23】毛主席还指出,整风和生产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24】毛主席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啊!说得多么准确、鲜明、生动啊!我们那些至今还轻视生产建设的同志,难道不应当对照毛主席的指示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言行吗?如果看了这些话还无动于衷,不是正好证明他们中孔孟之道的“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很深吗!难道不应当把这种腐话之毒去掉得干干净净吗?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对革命负责,也要对生产负责。要从自



己的头脑中清除那些“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革命非常重要，生产无关紧要”、“抓革命吃得开，抓生产活倒霉”的糊涂观念。要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决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自己所在地区、所在单位的革命真正抓好，把生产真正抓好。不信邪，不怕鬼，树雄心，立壮志，挺起腰板干。大庆人说得好：“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同错误思想斗。”大寨人也说得好：“既要大讲革命，又要大干革命，只讲不干不是真革命。既要大讲社会主义，又要大干社会主义，只讲不干也不是真搞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从二十多年斗争实践中学懂了的一条真理。”我们要把大庆、大寨抓革命、促生产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干劲真正学到手。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25】真正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使本地区、本单位的革命形势越来越好，生产建设蒸蒸日上。

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26】毛主席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27】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



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好是坏、是大是小，归根结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好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着花气力去抓生产的看法，只有沉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童话中的人才会相信。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28】这三大革命运动是互相联系的，在革命时期，我们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开展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但是，这三大运动又各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各有自己的特殊矛盾需要我们去解决。即使我们真正掌握了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解决了阶级斗争中的特殊矛盾，也不等于掌握了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特点和规律，不等于解决了这两大革命运动中的特殊矛盾，也还需要我们进行艰苦的努力，进行一系列的工作，来研究和解决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特殊矛盾。

因此，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们的干部既要学会搞阶级斗争，也要学会搞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做到又懂政治又懂业务。毛主席说：“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

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29】所有的干部，都要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以身作则，带领广大群众和科学技术人员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必须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用心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安排好各个经济部门的比例关系，进行综合平衡，做出统一的国家计划，付之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年年月月都会出现新的矛盾、新的不平衡，都需要我们不断地进行调整，解决这些新的矛盾，求得新的平衡。矛盾不断出现不断解决，这是我们做经济工作的同志必须认识的辩证规律。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各行业、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严格的规章制度。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所需要的规章制度，是劳动人民、科学技术人员和革命干部多年的实践经验凝结成的，其中有许多是付出血的代价才取得的。决不能把它看成可有可无的东西，更不能不加分析地把一切规章制度看成是“管、卡、压”。遵守生产斗争日益发展所需要的规章制度，才能使人们在生产斗争中取得越来越多的自由；违反这种规章制度，必然会在生产斗争中碰得头破血流。

责任制，是企业规章制度的核心。要把建立责任制作为整顿企业管理的重要一环，每件工作每个岗位都要有人负责；每个干部、工人、技术人员都要有明确的职责。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责任心，使遵守规章制度

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指出：“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30】}他的意思就是说，生产愈发展，科学技术愈发展，反映这种发展所需要的规章制度就会愈来愈严密，愈来愈要求人们严格地遵守这种规章制度；不符合这种发展需要的规章制度，则要求人们及时地加以改革。否则，就会妨碍生产的发展，妨碍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这样。建立新的规章制度也好，改革旧的规章制度也好，都必须依靠群众，集中集体智慧，按照生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来做出决定。如果主观随意地乱来一气，就会在生产管理中造成无人负责的状况，造成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必然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各级领导要做到生产、生活同时抓。不仅要关心群众的政治生活，也要关心群众的物质生活，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群众的生活。要把群众生活上的问题，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凡是能够解决的，都要发动群众，自己动手，积极去解决。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

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31】工业愈发展，工业比重愈增加，就愈要重视农业的发展。这些话，毛主席不知说过多少次了。可是，至今一些城市、一些工矿区的副食品供应仍然困难。这些地方的领导，既不向大庆那样的先进单位学习，也不亲自动手，取得经验，发动群众，抓好农业。对这个关系群众生活的大事，长期不设法解决，一拖再拖，这同毛主席“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指示，究竟相距多远，请认真想一想吧！

四

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项，也不能孤立地只抓其中任何一项。我们必须以这三项重要指示为纲，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制定各项工作的具体政策，用这个工作总纲和各项政策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要整顿，财贸要整顿，科技要整顿，文教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

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

毛主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的整顿中，党的组织的整顿、党的工作的整顿是重点。【32】“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33】各个地方、各个单位的一切工作，一切政治运动，都要由党委遵照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和各项具体政策进行统一领导。革委会、工会、青年团和民兵，都要在同级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工作。决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凌驾于党委之上，决不允许任何党员、任何党的干部违反“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

要落实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和各项具体政策，关键在于加强各级党委的领导，加强各级党委的领导班子。这些领导班子，必须按照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34】和老中青相结合的原则，由能够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党性强、作风好、能团结人的同志组成。这些领导班子，要敢字当头，敢于领导，敢于斗争，敢于向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作斗争，敢于向顽固地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作斗争，敢于向一切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要善于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要坚持不懈地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的同志为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为真理而斗争，为人民的利

益而斗争，一定会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支持，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不应该怕被打倒，也不可能被打倒。我们应该有这样坚强的信念。工矿企业、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成员和党小组组长，在政治上应当是最先进的分子，在劳动中又应当是最积极的分子。对于某些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软、懒、散”的领导班子，应当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适当的调整。长期闹资产阶级派性、屡教不改的，要坚决调离，甚至给予党纪处分；混进来的个别坏人，要坚决清除。

要落实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和各项政策，还必须在全党范围内整顿党的作风。

要批判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各级党委要经常地进行调查研究，如实地了解情况，具体地加以分析。要实事求是，反对报喜不报忧，提倡说真话，不要说假话。深入一点，取得经验，推动全盘，真正做到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我们应当懂得，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任何领导干部，如果浮在上面，脱离实际，就决不可能取得干社会主义的知识和才能。经验对于干部是必须的，经验是要经过多年的实践才能积累起来的，只要不把自己的局部经验当成普遍真理，能够经常注意总结提高，这种经验是很宝贵的。我们要牢记毛主席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的教导：“任何一个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

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35】

要批判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当官作老爷、搞特殊化的坏作风，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同群众共甘苦的作风，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毛主席说：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同志应当时刻警惕这种危险，按照党和国家的规定，自觉地参加集体劳动，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广泛、最密切、最经常的联系。

要批判自高自大、自以为是、骄横跋扈、动辄训人的坏毛病，坚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优良作风。人贵有自知之明。要严于解剖自己，任何时候对自己的工作都要一分为二，勇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不要只喜欢听奉承话，不喜欢听批评话。不要一听到批评就发火，更不应该对批评者打击报复。我们的同志都要懂得，只要做工作，就不能不犯错误；犯了错误，自己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自我批评，诚恳地而不是虚伪地接受人家的批评，这决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决不会损害同志们和人民群众对自己的信任，而只会增强这种信任，无论对自己对革命事业都是有益无害的。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一切有党性的同志，都应该按照这个规矩办事。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优良的工作作风。叛徒、卖国贼林彪曾经肆意破坏我们党的这种优良作风，有一些同志也确实受到了这种破坏的影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遵循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肃清林彪的影响，继续保持和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同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已经度过了光荣的二十六年。尽管帝国主义曾经长期封锁我们，社会帝国主义曾经多次妄图颠覆我们，尽管受到几次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但是全国人民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没有在他们所制造的困难面前后退，始终沿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只要我们以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为纲，做好各方面的整顿工作，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够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注 释

- 【1】 《人民日报》1975年2月9日，第1版。
- 【2】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第773页。
- 【3】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版，第583页。
- 【4】 毛泽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版，第165页。
- 【5】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第785页。
- 【6】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226—227页。
- 【7】 鲁迅：《〈伪自由书〉后记》。《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181页。
- 【8】 毛泽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版，第161页。
- 【9】 《人民日报》1975年2月12日，第1版。
- 【10】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版，第369页。
- 【11】 同上书，第363页。
- 【12】 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第256页。
- 【13】 《人民日报》1974年5月3日第1版。
- 【14】 《人民日报》1971年12月3日第1版。
- 【15】 《人民日报》1967年9月15日第1版。
- 【16】 《人民日报》1967年12月22日第1版。
- 【17】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第853页。

- 【18】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第853页。
- 【19】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版，第243页。
- 【20】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72页。
- 【21】 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第105、106页。
- 【22】 毛泽东：《论军队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第1007—1008页。
- 【23】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465页。
- 【24】 同上书，第465页。
- 【25】 毛泽东：《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版，第420页。
- 【26】 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60页。
- 【27】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第980页。
- 【28】 毛泽东：《对浙江省干部参加劳动的七个材料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293页。
- 【29】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版，第471页。
- 【30】 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版，第342—343页。
- 【31】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第124—125页。
- 【32】 毛泽东：《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而奋斗》。《毛泽东选集》第

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版，第133页。

- 【33】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832页。
- 【34】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必须具备的五项条件：（一）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二）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为世界人民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三）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四）有事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取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五）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
- 【35】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60—61页。

学习与创造*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五日)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论述的“中国和外国
的关系”，主要是阐明中国和外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
各方面的关系中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坚持了革命辩证法的两点
论，反对形而上学的一点论。认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各
有自己的长处，都各有自己的短处。社会主义国家有自己的
长处，也有自己的短处。认为社会主义中国有两条缺点，同
时又是两条优点。向全党全国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
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
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
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
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
学。”【1】无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向外国学习的时候，都
要遵循这个方针。

* 这是邓力群同志撰写的一篇批判“四人帮”谬论的文章，未公开发表。

学习外国的东西,是为了研究和发展中国的东西。这就是说,学习是为了创造。无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都应当如此。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学习外国的一切好的东西,学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并且运用这些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学好了,运用好了,就会有所发明,有所前进,有所创造。因此,对外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反动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叫做慈禧太后,原来她实行闭关自守、盲目排外政策。当着义和团运动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的时候,这个慈禧太后立即实行了“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政策,做了向帝国主义列强屈膝投降的大卖国贼。后来有一个资产阶级的文人学者胡适,他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曾投入过“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主张“全盘西化”,盲目崇外。当着无产阶级自觉地走上政治舞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的时候,这个胡适立即提出了“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口号,钻回到书斋中去“整理国故”,把买办文化和封建文化结合起来,终于成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拼命向前”的“过河卒子”。

在以江青为头子的“四人帮”身上,我们看到了慈禧太后的幽灵同胡适的幽灵的微妙结合,看到了末代皇朝的昏聩自大同蒋家王朝统治的崇洋媚外的奇特结合。

什么是“四人帮”的排外主义呢?就是他们借口独立自

主、自力更生，反对我们学习外国的好东西，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他们对出口一部分石油、煤炭来换回对外贸易所必需的外汇，斥之为“出卖资源”；对用外汇进口一些必需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斥之为“崇洋媚外”。他们明明知道这些出口和进口都是经过毛主席和周总理批准的，而他们的反调还是一次比一次更高，甚至肆无忌惮地比之为李鸿章、张之洞的“洋务运动”，真是无以复加！落后的工业国家所以能够赶上以至超过发达的工业国家，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前者可以采用当时最先进最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德国超过英国，美国超过德国，是这样；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超过西欧国家，是这样；社会主义中国要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要这样做。这本来是无需争辩的事实和道理，可是在“四人帮”的嘴里，却被说成“洋奴哲学”、“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这些自称“最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老爷们多么可笑！

真正“崇洋媚外”、具有“洋奴哲学”的正是“四人帮”自己，而不是别人。那末，什么是“四人帮”的媚外主义呢？请看：用大量的外汇买进反动、黄色的影片的，是他们；沉湎于西方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满足最腐朽、最糜烂、最奢侈的需求，认为什么都是外国的好的，是他们；为了树碑立传，名扬中外，同外国资产阶级记者歇斯底里地谈话六七个小时，不惜出卖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的，是他们；低首下心，大搞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的，还是他们。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

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2】“四人帮”就是这种在帝国主义面前“伸不直腰”的、由中国地主资产阶级豢养出来的贾桂式的奴才。

“四人帮”的立场同人民的立场是如此鲜明对立。人民是要学习外国的长处，不学习外国的短处；他们恰恰相反，对外国的长处一概排斥，对外国的短处全部照搬。毛主席说：“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3】当我们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有选择地努力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时，他们出于不可告人的反动目的，就给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恨不得一棍子打死。毛主席又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4】他们却把毛主席这个教导抛到九霄云外，对于西方国家的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顶礼膜拜，啧啧钦羨，馋涎欲滴，非全部吞下不可。如果谁要对他们提点批评意见，他们就要把谁打成反革命。

这是一种什么立场？是一种最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立场！这是一种什么哲学？是一种最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是贝克莱的唯我主义和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杂拌！

在他们这种哲学思想里，真理是没有客观标准的，是非是完全颠倒的。对他们有利的就是对的，对他们不利的就是错的；对他们有用的就是真理，对他们没用的就是谬误。

列宁说：“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人类实践的‘成功’证明着我们的表象和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的符合。

在唯我论者看来，‘成功’是我在实践中所需要的一切，而实践是可以同认识论分开来考察的。”【5】这就是说，在唯物论者看来，社会的实践是检验人们的思想是否符合事物实际的唯一客观标准。在唯我论者看来，他们的思想是否正确，只需要用成功与否来衡量，他们的事情干成功了，不管是如何倒行逆施，是如何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都被他们认为是“真理”。

列宁又说：“无论唯我论者（即主观唯心主义者）或唯物主义者，都可以承认感觉是我们知识的泉源。”“从感觉出发，可以遵循着主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我论（‘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或组合’），也可以遵循着客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物主义（感觉是物体、外部世界的映象）。在第一种观点（不可知论，或者更进一步说，主观唯心主义）看来，客观真理是不会有的。在第二种观点（唯物主义）看来，对客观真理的承认是最要紧的。”【6】

“四人帮”就是一伙“遵循着主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我论”的反革命者。他们也承认人们的认识或理论是来自于感觉。但是，不承认客观实在是人的感觉的源泉，不承认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感觉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其结果，一定要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正像狄德罗所讽刺的那样，他们是发了疯的钢琴，“以为它是世界上仅有的一架钢琴”，以为“宇宙的全部和谐都发生在它身上”。【7】

他们既然一切都依照他们这架“发了疯的钢琴”的主观

感觉如何而定，因此也就必然导致他们否定一切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

毛主席说：“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8】

在国内，“四人帮”大反“经验主义”，还要以此“为纲”，解决他们认为各方面要解决的问题。从政治上说，他们是要以此为幌子，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扫除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从思想上说，就是要丑化、抛弃宝贵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包括我们的前人和先烈给我们遗留下来的经验，包括全部新老干部和工农兵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他们不是说老干部“只有民主革命的经验、有走资派的经验”吗？他们的用意，就是要打倒这些老干部，同时把老干部的经验一块批臭。他们不是说模范人物是“保守势力”吗？他们的用意，就是要把这些模范人物连同其经验一起抛弃。他们不是说十七年培育的学生都是“挖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墙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他们的用意，就是要对这些知

识分子连同其学到的知识实行“全面专政”。有多少学术著作和刊物被他们压制、拖延不能出版，其中包括毛主席早已指示要复刊的刊物！有多少文学艺术作品被他们禁闭、扼杀，不能同读者观众见面！谁要研究一下科学，钻研一下技术，就被说成“白专”；谁要写和他们不同意见的文章，讲不同意见的话语，就被说成“放毒”。在“四人帮”的统治下，学术界还有什么百家争鸣？文艺界还有什么百花齐放？摇羽毛扇的张春桥甚至还说“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岂不是要把我们的后代统统变成文盲，使他们无法取得前人经过实践检验得到的知识吗？他们企图造成一种空气，有经验的人不敢传授经验，有知识的人不敢传授知识；缺少经验的人不敢学习别人的经验，缺少知识的人不敢向别人学习知识。这是一种最野蛮的蒙昧政策！最反动的愚民政策！如果“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推行这样的政策，大家想想看，我国将出现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一九三三年十月，鲁迅从报纸上看到希特勒德国海京伯马戏团经理讲如何训练动物的一点笔记后，写了一篇《训练野兽法》的杂文。文中写道：

“训兽之法，通于牧民，所以我们的古之人，也称治民的大人物曰‘牧’。然而所‘牧’者，牛羊也，比野兽怯弱，因此也就无须乎专靠‘信任’，不妨兼用着拳头，这就是冠冕堂皇的‘威信’。

“由‘威信’治成的动物，‘跳浜，站起来’，是不够的，结果非贡献毛角血肉不可，至少是天天挤出奶汁来，——

如牛奶，羊奶之流。

“然而这是古法，我不觉得也可以包括现代。”【9】

“四人帮”所实行的政策，不正是我国历史上的奴隶主、地主实行的“牧民政策”吗？他们所需要的“威信”，不正是现代法西斯把人训练成动物的“威信”吗？

在对外关系上，“四人帮”恶毒攻击我们的外贸政策，恶毒攻击我们从国外进口先进技术、先进设备的政策。昏庸自大的“四人帮”之辈，你们可知道各国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是各国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科学技术人员用劳动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是他们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取得的经验结晶？我们向自己的国际兄弟和国际朋友学习，究竟有什么不对？你们可知道科学无国界？社会科学如此，自然科学也是如此？我国人民曾经用自己的科学成果帮助别国人民，同时也取得各国人民在科学技术上对我们的帮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究竟有什么不好？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我国的科学技术一样，是人民经过反复探索、反复实践才取得的成果。我们立足于自力更生，并且为了增强自力更生的基础，从国外进口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最急需的科学技术设备，可以减少时间，避免他们走过的弯路，在他们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尽快地赶上他们以至超过他们。你们说这是“爬行主义”，这不是荒谬绝伦吗？你们要我们不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自己关起门来，一切从头做起，重走人家走过的弯路，重新付出人家探索的时间，使我国的科学技术总是跟在人家的后面爬行。这才是十足的

不折不扣的爬行主义哩！把这顶帽子戴在你们头上，岂不正好不大不小吗？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十八世纪的法国对英国（而英国哲学是法国人引为依据的）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10】

经济落后的国家的社会科学能够超过经济发达的国家，“演奏第一提琴”。自然科学也是这样。这是在外国和中国都已经反复证实了的真理，让“四人帮”去反对这个真理吧！

打倒“四人帮”，思想大解放。打倒“四人帮”，国家有希望。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1】又说：“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12】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这些教导，来发展我们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对于进口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我们要按照敬爱的周总理所总结的“一学，二用，三批，四改”的原则去做。要彻

底批判“四人帮”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四人帮”那样的人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的检查。唯物论和辩证法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学习与创造是辩证的统一。学习是为了创造，要创造必须首先学习。自己要积累经验，也要学习别人的经验，包括前人的和国外的经验都要学。学习要花气力，创造也要花气力。没有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没有一种革命的拼命精神，要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不可能的。

注 释

- 【1】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版，第285页。
- 【2】 同上书，第287页。
- 【3】 同上书，第286页。
- 【4】 同上书，第287页。
- 【5】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139页。
- 【6】 同上书，第124页。
- 【7】 同上书，第26页。
- 【8】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第288页。
- 【9】 鲁迅：《准风月谈》。《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第1版，第294页。

- 【10】 恩格斯：《恩格斯致·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版，第489—490页。
- 【11】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版，第286页。
- 【12】 同上书，第286—287页。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和运动的基本总结

(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一九七五年七月经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成立的。当时，正是我们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同“四人帮”进行尖锐斗争的时刻。政研室成立后，在邓小平同志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的直接领导下，立即参加了这场斗争。

政研室刚筹建时，包括行政、图书资料和业务工作人员总共只有三十余人，但在七、八、九、十这四个多月中，还是齐心协力地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是：参加起草和修改国务院的一些文件，收集和上报有关思想文化工作方面的一些材料，向毛主席、党中央转呈一些信件，写了两篇政治理论性的文章，代管哲学社会科学部，帮助学部筹办《思想战线》杂志。

具体说来，在协助有关部门修改《科学院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和

其他文件中,根据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毛主席关于发展科技和发展工业等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批判了“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批判了“四人帮”煽动起来的资产阶级派性。在上送的材料和信件中,根据毛主席当时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精神,揭露了“四人帮”扼杀电影《创业》、《海霞》,阻挠出版鲁迅著作,在报刊宣传中砍掉“百花齐放”口号、鼓吹“三突出”等问题,抓住了他们破坏文艺革命的重要罪证。这些材料和信件,受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重视。毛主席对其中一些信件和材料所作的批示,特别是毛主席对《创业》作者的信所作的批示,极大地鼓舞了革命文艺界,沉重地打击了“四人帮”在文艺界的黑暗统治,迫使他们在上述问题上不得不暂时转入退却和防御的地位。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鲁迅书信集》得以出版,鲁迅著作和鲁迅生平的研究工作得以开始进行,聂耳、冼星海音乐会得以举办,长篇小说《李自成》得以继续写作和出版。由于国务院负责同志对出版局一位同志的建议信的支持,“四人帮”通过文化部进一步控制出版阵地的企图没有得逞。政研室同志撰写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和《宋江的投降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两篇文稿,前者宣传了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重要指示,从政治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批判了“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后者根据毛主席关于《水浒》的批示,比较充分地论述了我党历史上和国际共运中的投降主义反投降主义的斗争问

题。这两篇文稿的论点，都同当时“四人帮”的反革命宣传针锋相对。代管学部和协助筹办《思想战线》的工作，在党内外引起广泛的注意，使“四人帮”感到他们在思想文化阵地的反革命垄断受到威胁。

政研室的四个多月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主要是：个别负责同志的讲话和我们起草的文稿中，在批判“四人帮”歪曲和割裂毛主席三项指示的反动宣传时，存在一些错误。当时，我们虽然对“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帮派活动无比愤慨，并且进行了抵制，但是还没有认识到他们是一伙反革命帮派，对我们党同“四人帮”斗争的复杂性认识得很不够。

由于政研室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所做的工作，揭露和打击了“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因而为他们所深恶痛绝。江青恶狠狠地叫嚷：《创业》作者告了她的“刁状”，毛主席的批示是“抄了文化部的家”。对于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周海婴的信，张春桥、姚文元一伙不但肆意污辱、攻击，而且追查它的所谓“黑后台”。就连经毛主席批准举行的聂耳、冼星海纪念音乐会和毛主席批准出版的《李自成》一书，也受到“四人帮”一伙的重重刁难。“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认为《思想战线》如果出版，将使他们的御用刊物《学习与批判》“第一次遇到劲敌”。“四人帮”在清华的黑干将则扬言，《思想战线》出版后，他们将“有一篇批一篇”。总之，他们把政研室看作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

在一九七六年的运动中，“四人帮”完全违背毛主席、党

中央指示的精神，另搞一套，更是把政研室作为他们打击的重点。他们一面指挥亲信爪牙和舆论工具从外部围剿，对政研室极尽诬蔑陷害之能事；一面通过他们支持的人从内部发难，插手政研室的运动，企图搞垮政研室，并由此打开一个搜集攻击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黑材料的缺口，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服务。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江青在一次会上，公然诬蔑政研室“是一个相当大的谣言店”，胡说邓小平同志“把胡乔木这样的人也凌驾在政治局之上了”。同一天，姚文元控制的《人民日报》，印了一份编造谎言、攻击政研室的《情况汇编清样》，诬指“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继旧中宣部后又一个阎王殿”。在这前后，“四人帮”的亲信、爪牙大肆制造和散布陷害政研室的谣言，什么“黑班底”、“黑高参”、“黑秀才”、“筹安会”、“资本主义复辟处”等帽子满天飞。他们通过报刊，不厌其烦地反复攻击“邓记班子中的‘理论家’”、“邓小平的谋臣”。他们还在文化部、出版局等单位追查所谓“邓小平通过政研室搞策反活动”等问题，打击、迫害与政研室有过联系的干部。他们把《论总纲》、《汇报提纲》、工业《二十条》打成所谓“三株大毒草”，罗织罪名，百般诋毁。他们明明知道《论总纲》是胡乔木同志布置、邓力群同志主持起草的一篇文章的初稿，从未拿出来过，在一九七五年十月中旬的第二稿中即已删去了“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却恶意攻击《论总纲》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翻

版”。姚文元亲自在一份《论总纲》印件上加了四十七条批语，横加种种罪名，并指令他们的写作班子程越、梁效等炮制了大批攻击《论总纲》的毒草文章。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政研室中有那么一个人秘密地写信给姚文元，请姚把他一封捏造事实、诬陷政研室的信转送毛主席。姚附上自己的信，点出工业《二十条》和科学院《汇报提纲》“都与这个‘研究室’有关”。二月十九日，这个写告状信的人接到通知参加中央打招呼会，散会时，江青、姚文元同他亲切握手，连声称赞他的信写得好，要他“把政研室的运动搞起来”。这个人会后私下对他的密切合作者说：“今后运动主要靠我们搞。”姚文元还在新华社竭力夸奖这个人是“人才”，“到政研室后发挥了很大作用”。“四人帮”从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四日起，先后指派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四名记者到政研室，对政研室的运动进行监视，收集情报，随时向他们汇报。在“四人帮”的直接指挥和大力支持下，那个写信人不但夺取了政研室的运动领导权，而且一步一步地把党和行政的领导权也全部夺到手里，自称他“在国务院一个单位负责全面工作”，并在一九七六年第一、第二季度政研室人员编制表报的部委负责人这一栏内，两次签上自己的名字。他和另一个人一起，拒不执行中央一九七六年四号、五号文件的精神，硬把政研室的运动纳入“四人帮”的轨道。

这个告状人秉承“四人帮”的旨意，肆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胡乔木、邓力群等同志紧紧揪住不放，无限上纲，

滥施打击，硬要在政治上置之死地。他们一连制造了七次大的所谓“揭批高潮”，把政研室几个负责同志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工作关系诬蔑为阴谋关系，把政研室所作的工作都诬指为“重大的右倾翻案活动”，没完没了地进行追查。他同另一人操纵《运动情况简报》，强奸民意，上报了许多假情况。最为险恶的是，他明明知道《汇报提纲》、《二十条》是在中央和国务院几位领导同志领导下起草的，明明知道《论总纲》中引用了不少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要点，但却别有用心地一再追查这些文件、文章起草的“内情”。他们二人甚至把政研室负责同志传达的毛主席批判“四人帮”的指示，也当作政治谣言加以追查。他们狂叫“邓小平在党内拼凑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公然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指向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对于“四人帮”在运动中另搞一套以及这两个投机分子的兴风作浪，政研室绝大多数同志极为不满，采取种种方法进行抵制。当时，政研室的几位负责同志，已同上级领导失去联系，在室内也难以相互联系，不能同群众接触，并面临着“四人帮”与这个人里应外合、内外夹攻的政治高压。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同志仍然坚持做到了以下几点：

一、坚决抵制了“四人帮”和政研室中的这个告状人妄图从政研室负责同志身上压出攻击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材料的罪恶企图，严格遵循党中央指示的精神，在“揭发批判”中，丝毫没有涉及邓小平同志以外的党中央和国务院任何领导同志。

二、坚决抵制了“四人帮”所谓政研室是“邓记谣言公司”、邓小平同志“通过政研室制造和散布了大量政治谣言”的诬陷。

三、在他们的“交代揭发”中，除记忆差错外，事实本身没有出入，没有涉及到邓小平同志跟他们谈到的有关同王、张、江、姚斗争的事情。

四、在他们的“交代揭发”中，保护了政研室内外同“四人帮”作过斗争的许多同志。

五、七位负责同志在一九七五年工作中议论的有关“四人帮”的事情，都没有互相揭发。

六、有六位负责同志对胡乔木同志作了“揭发批判”，但是胡乔木同志对他们没有作任何“揭发批判”。

这些情况说明，政研室的负责同志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坚持了党中央四号、五号文件的精神，抵制了“四人帮”的另搞一套；在十分复杂尖锐的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没有被“四人帮”压垮；“四人帮”竭力要从他们那里压出最需要的材料，用来打倒党中央和国务院一大批领导同志的反革命阴谋，没有得逞。

但是，也要指出，七位负责同志在“揭发批判”中，不同程度上都说了过头话。有些超出了必要的范围，有些上纲出了格。在这一方面，个别同志的“揭发批判”材料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这是很不应该的，需要从中吸取教训，引为鉴戒。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之后；政研

室的革命同志无比欢欣鼓舞。政研室的负责同志和革命群众一起，及时夺回了被投机分子篡夺的室的领导权。

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由于政研室原来的七位负责同志中有四位全力从事其他重要工作，留在政研室工作的只有胡乔木、邓力群和于光远三位同志。为了把揭批“四人帮”的运动领导好，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初成立了运动办公室，领导全室革命同志积极投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始终抓住“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这个要害，从思想、政治、组织各个方面进行深揭狠批。并且联系政研室的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通过投机分子插手、破坏政研室运动的罪行。对于“四人帮”及其党羽陷害政研室、攻击邓小平同志的罪行，经过深入的揭发、批判，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已全部推倒，被他们歪曲了的事实、颠倒了的是非已经纠正过来，恢复了事实的本来面貌。

遵照党中央关于查清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指示，我们对那个投机分子与“四人帮”的关系进行了认真审查。现已查明的事实，说明他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感情上都同“四人帮”有紧密的联系。他就是“四人帮”所网罗的那种告黑状、打黑报告、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效劳的投机分子。在事实面前，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是“投机造反”。几个月来，虽然同志们对他进行了仁至义尽的帮助，但他始终对运动采取顽固抗拒的恶劣态度，对自己投靠“四人帮”的重要问题没有作出如实交代。另一个人，在

“四人帮”揭出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态度很不好。由于没有发现他同“四人帮”有直接联系，同志们从一开始就将他和前一个人作了区别。经过领导和群众耐心的批评教育，最近他对自己的错误的检查有所进步，但是还没有把自己的问题全部交代清楚。我们建议有关单位根据他们两人的不同表现，按照党的政策，作出不同的处理。

几个月来，政研室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运动发展是健康的。同志们普遍地感到，经过党内路线斗争的锻炼，特别是在政研室这样一个斗争十分激烈复杂的单位，又经受了战胜“四人帮”的这次路线斗争的锻炼，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收获是显著的。在搞运动的同时，我们写了《一个大阴谋的真相》、《“四人帮”为什么要砍掉“百花齐放”的口号》、《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刁小三的逻辑与资产阶级法权》、《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打着反复辟旗号搞复辟》等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并基本上坚持了每周参加半天集体劳动。

现在政研室结束在即【1】，同志们决心在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继续积极地参加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努力做好工作，把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注 释

- 【1】 粉碎“四人帮”后，由于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继续实行批判“右倾翻案风”运动，阻挠邓小平同志及早出来工作，竟要解散为邓小平同志所支持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直到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这个研究室才得以保存，改名为国务院研究室。

理直气壮地发展社会主义 商品生产、商品流通*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城乡商业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重要战线，是联结工业同农业、城市同农村、生产同消费的桥梁和纽带。在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中，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商业工作占有重要的地位，担负着重要的任务。

发展经济，既要发展工农业生产，同时也要发展商业。只有全面地发展工农商业，才能保障供给。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决定商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又可以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商业工作在促进工农业生产方面是大有作为的。商业部门真正做到面向生产、支援生产、参与生产、促进生产，就能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

* 这是邓力群同志代国务院起草的《关于召开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的通知》的部分内容。

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同时存在的条件下，通过买卖，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用工业品交换农产品，是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经济形式，是巩固工农联盟的可靠保证，是密切城乡联系的重要环节。搞好社会主义的商品流通，是工人阶级团结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几亿农民的大问题，是关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败的大问题，是全体商业职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承担的光荣伟大的历史责任。

马克思说：“在商品生产中，流通和生产本身一样必要，从而流通当事人也和生产当事人一样必要。”【1】我国的商业是社会主义的商业，它同工人、农民从事的社会主义生产一样，是崇高的革命事业。商业职工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商业职工的劳动，是社会生产总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劳动，没有他们的劳动，生产就不能转化为消费，包括生产的消费和生活的消费。他们的劳动，应当受到大家的尊重。

社会主义的原则，是不劳动者不得食。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当劳动，不允许无偿地占有别人的劳动。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从不同的岗位，用不同的方式，为着一个共同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各行各业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贵贱之分，缺少任何一种都不行。广大商业职工要充分认识自己平凡工作的重要意义。

我国的社会主义商业，是在新中国建立前革命根据地商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十八年来，一直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伟大的

成就。

现在的社会主义商业，已在流通领域里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建立和壮大了社会主义的商业队伍，形成了遍布城乡的社会主义商业网，巩固和扩大了城乡社会主义市场阵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活跃了城乡内外的物资交流；长期保持了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一九七六年比一九五〇年增长了六点七倍，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

在取得上述成就的过程中，广大商业职工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抵制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坚守工作岗位，保证市场供应，在职工总数增加不多（有的地方没有增加，有的地方甚至减少）的情况下，商品购销总额都增加将近一倍，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许多职工不计时间，不辞劳累，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长期以来，商业战线受到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他们诬蔑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和党的各项经济政策是“抓目丢纲”、“维护旧的生产关系”，篡改社会主义商业的根本方向。他们破坏粮食的统购统销，反对城乡兼顾的商品分配原则，挑拨工农关系。他们攻击“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商品管理体制是“资产阶级专政”，搞乱国家计划。“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商业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抹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本质区别，把两者等同起来，恶毒攻击我们现在实

行的商品制度是“既保护着老的资产阶级，又孕育着新的资产阶级”，诬蔑商业部门是“垄断资产阶级”，商业职工“服务得好会出修正主义”。他们妄图毁灭我国的社会主义商业，破坏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瓦解工农联盟，达到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在他们破坏严重的地区，工农业生产下降，商品供应紧张，市场管理混乱，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资本主义活动泛滥。他们的反动谬论和罪恶活动，造成了理论上和政策上的混乱。影响所及，使一些同志不敢大胆抓商品生产、抓商品流通，致使服务质量下降，商业亏损增加，不正之风盛行。

必须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在继续抓紧清查工作、摧毁“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同时，深入揭发和彻底批判他们的这些谬论和罪行，分清是非，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广大商业职工应当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领会毛主席关于商品生产的一系列指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有本质的差别。我国现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同时存在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要大大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壮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力量，才能排除城乡资本主义的活动，才能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我们要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流通。

注 释

- 【1】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144页。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从今年十月份起,我们几个同志编了两份材料,一份是《“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关于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方面的谬论》,一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部分论述》。在此基础上,又写了一篇文章,叫作《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在编“四人帮”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谬论的材料之前,感到“四人帮”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虽然制造了不少混乱,但是很零碎,没有体系。编了这个材料以后,发现他们在经济学方面确实有一套系统的反动理论,集中表现就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攻击、诋毁。这种经济上的系统的反动理论,可以看作他们的反动的经济纲领。他们正是在这个反动的经济纲领的基础上,提出了反动的政治纲领。“四人帮”一伙反革命是搞实用主义的,而他们的实用主义是服从于他们反动的经济纲领和政治纲领这一总目的的。所以,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央党校作的报告。

对“四人帮”的反动谬论必须加以深刻批判，肃清其流毒。我们写的这篇批判文章，讲了四个问题：（一）马克思主义分析商品生产的方法和“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手法；（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三）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必然产生资本主义吗；（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文章提出的看法和意见，不管从理论上和政策上来讲，都还需要进行探讨，提出来供同志们讨论，也希望听到同志们的批评。经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可以使我们对问题认识得更深入。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策问题。能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个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

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经历过两次重大的斗争。一次是一九五八年陈伯达鼓吹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产品调拨。毛主席严厉地斥责他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这样做，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在这一次斗争中，毛主席捍卫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商品生产的理论，对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二次斗争是“四人帮”挑起的。“四人帮”和林彪、陈伯达一伙，在新的条件下，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商品货币理论，丑化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的现实，妄图毁灭

我国包括商品生产在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他们散布的谬论，在思想上造成了极大混乱，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了严重后果。在这两次斗争中，陈伯达采取的手法是，打着迷人的幌子，说什么我们要向共产主义过渡啦，我们要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啦，形势很好啦，商品生产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啦，我们应该往前看呀，不应该留恋那些旧的东西呀，等等。“四人帮”的目的和陈伯达一样，但采取的手法更恶毒，就是败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名誉，使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丧失信心。他们把一切罪恶都归之于我们现在存在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说一切坏东西都是从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来的。在他们看来，要革命，就要把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革掉。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专门地而且突出地讲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是很有道理的。商品生产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过去，我们对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理解不深。现在，结合对“四人帮”谬论的批判，使我们理解到这个问题是社会主义制度中涉及到全局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很多工作、很多政策就能够正确制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很多工作、很多政策就很难得到正确的制定和正确的贯彻。也正因为这样，“四人帮”才抓住这个问题肆意地进行攻击和诬蔑。

现在分别讲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分析商品生产的方法和“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手法。

商品生产有悠久的历史。商品生产在原始社会末期就产生了，中间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到社会主义社会，在不同的社会形态里都有过商品生产。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要看到这些不同社会形态下面的商品生产的共同性，更要看到不同社会形态下面的商品生产的特殊性。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商品生产有它的共同性。这个共同性，按照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说法，就是：“商品是这样的一种产品，它可以出售给任何买主，商品所有者在出售商品之后，便失去对商品的所有权，而买主则变成商品的所有者，他可以把商品转售、抵押或让它霉烂。”^{【1】}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所有者之间进行交换的产品的生产是商品生产。至于不同所有者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这不是共同性。拿社会主义社会来讲，一种是集体所有制生产的产品，一种是全民所有制生产的产品，还有社员的家庭副业生产的产品，尽管生产者的所有制的性质不同，但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买卖，可以转让所有权，这一点在不同的社会形态里面都是一样，只要有商品生产存在就有这样一个共同点。既然是商品，不管哪一个社会形态，它的价值都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所决定的，交换必须是等价交换。不同社会形态里面的商品有共同点，马克思主义是承认的，称它为商品生产一般。

经济学研究不同社会商品生产的共同性是必要的，但

同时要看到不同商品生产的不同点,或者叫特殊性,或者说特殊本质。找到共同点,又不忘记它们的不同点,这才叫科学。只看到共同点,而忘记了它们相互之间的差别,或者忽视它们之间的差别,这不是科学。只靠那些共同的东西,是不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的商品生产的。例如,商品生产是能够转让所有权的,这是共同性,但认识停止在这一点上,你能够理解不同社会里面不同性质的商品生产吗?不能理解。所以,单靠商品生产的共同性,就没法理解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殊性,没法理解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殊本质。要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就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历史上的商品生产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科学,如果要成为科学的话,必须看出这个不同的地方。毛主席在《矛盾论》里说:“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2】毛主席这一段话,对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必须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小商品生产、原始社会末期的商品生产区别开来,看到它们不同的地方。看清了这种特殊性,才能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四人帮”反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所采取的方法,是把

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以前小商品生产的特点，说成是所有的商品生产的共同点。实际上，他们是把一种或者两种商品生产的特点说成是所有的商品生产的共同点，或者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说成是和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一样的东西。我们编辑的“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材料里面，选了不少他们用这种方法来攻击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论点，其中有这样的话：“商品内在矛盾的发展，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社会主义社会的产品，仍然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相统一的商品，……就商品的内在矛盾来说，就商品生产的基本经济规律即价值规律的作用来说，它总是要求摆脱无产阶级专政的限制，自发地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四人帮”的这种论断，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所说的商品生产内部的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价值规律的作用使商品生产自发地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这并不是所有的商品生产的共同点，而只是小商品生产在一定条件下的特征。他们所说的商品内部的矛盾，指的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单是靠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能不能得出必然向资本主义发展的结论呢？不能。马克思主义分析商品，首先分析使用价值和价值，然后进一步分析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还要进一步分析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这个矛盾是以什么性质的劳动为基础。在小商品生产的条件下，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矛盾是以私人劳动为基础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也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但已经不是私人劳动而是集体劳动、公

共劳动。两种制度的劳动性质不同，一个是私人的，一个是公共的，或者叫集体的。我们说“四人帮”更狡猾更阴险，就在这些地方。他们根本回避劳动的性质，只讲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并由此得出结论说，既然有这个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我们说，只是分析价值与使用价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是不够的，还要分析这个劳动是什么性质的劳动，是私人劳动还是公共劳动。只有私人劳动为基础所产生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才会在一定的条件下导致资本主义，正像历史上的小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时期导致资本主义一样。如果是公有劳动，是集体劳动，就不能得出这个结论。

“四人帮”还有这样的说法，只要存在商品制度，就必然存在资产阶级。这也不是一切社会生产的共同点，而只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商品生产才具有这样的性质。这种特殊形态的商品生产是什么呢？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只有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商品制度，才必然存在着资产阶级。商品制度在原始公社末期就有，那时存在资产阶级吗？奴隶社会有商品制度，但在小商品生产没有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以前，有资产阶级吗？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按照斯大林的说法，叫作“特种的商品生产”，这能够说社会主义也必然存在资产阶级吗？显然不能。“四人帮”把小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殊形态，硬说成是商品生产的共同性，说成是包括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内的一切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所共有的东西。这是一种什么方法呢？这是一种资产阶级学

者的方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曾经把资本和生产资料混为一谈。他们根本抹煞或者有意掩盖这样一个真理,就是生产资料只有被用来支配雇佣劳动、榨取剩余价值的时候,才变成资本。如果像自耕农民种地,搞自给自足的经济,他也有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是不是资本呢?不是资本。原始社会的人用木头和石斧来进行物质生产,这也是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能不能叫资本呢?不能叫资本。资产阶级经济学者说,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叫资本,因此一切社会里面的生产资料都叫资本。他们想证明什么呢?想证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从古就有,而且将来要永远存在。把资本主义社会特殊性的东西,说成历史上永远存在的、永恒的东西,这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方法。他们对其他领域的问题也采取这样的论证,例如把资产阶级所崇尚的人性说成是人类有史以来的共同的人性,把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说成是永远存在的人类最高理想。“四人帮”用的方法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用的方法一样,说资本主义的商品制度必然存在资产阶级,因此社会主义的商品制度也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如果我们不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分析,很容易被迷惑,很容易被欺骗。

按照毛主席的说法,我们的认识过程都是从特殊到一般,然后在一般的指导下对新的特殊的问题进行认识。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教条主义者满足于一般性,而不根据一般的原理对新事物的特殊性进行分析、研究、批

判。“四人帮”把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当作一般性，他们是不是和教条主义者一样呢？不是的。他们所谓的一般，是不是真正的一般呢？不是的。他们只抓住某一个事物的一个方面、某些现象的方面，并且把这些现象的东西、非本质的东西当成一般的东西。“四人帮”的文章，大多数都是用的这样一种方法。

第二个问题：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本质上是根本不同的。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既不同于小商品生产，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全部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所有的时候，商品和货币将不再存在。现在，我们有全民所有制，也有集体所有制，在两种所有制存在的情况下，商品生产必然存在。既然有两种所有制，尽管都是公有制，但集体所有制取得全民所有制产品也好，全民所有制得到集体所有制产品也好，都不能无偿地调拨，都必须进行等价交换。因为不这样做，就否认了不同的所有制，使全民所有制受到损害，集体所有制也受到损害。一九五八年毛主席说过，在要不要商品生产的问题上我们要搬斯大林，而斯大林是搬列宁的。毛主席后来还讲过，我们要搬死人压活人。死人就是斯大林、列宁，活人就是陈伯达。毛主席这些话，是针对当时陈伯达取消商品交换、取消货币的谬论说的。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到列宁关于要在社会主义的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的观点时指出：“为了保证

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3】毛主席说,斯大林这个意见是对的。只能贸易,不能剥夺。毛主席还说,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还要利用这样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来团结五亿农民。在我国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劳动、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集体农民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集体所有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公社的集体农民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商品来换取他们所需要的商品。所有权还在他们那里,你不给他东西、不给他货币,不用买卖的形式同他们进行交换,他们就不愿意把生产的东​​西让给你。当时,毛主席讲话的时候还说,陕西有很多核桃,你不给他钱,你不通过买卖的形式就把它调来,农民干吗?不干。你硬要他干,他就要打破你的头皮。或者,你实在要干,今年我生产的东​​西你拿去了,明年我就不生产了。

因为两种所有制中间还存在着商品交换,也就不能不影响到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内部。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经济联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经过商品交换的,包括全部日用工业品、轻工业品,现在也包括全部农业生产资料。在我们国家里,这些都是商品。还有一种就是由国家进行调拨的,按一般的说法,这不叫商品。斯大林的说法是,它带有商品的外壳。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同斯大林的观点不同。斯大林主张拖拉机等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够同集体

农庄进行交换,而要建立国营的拖拉机站。毛主席不同意这个观点。毛主席说,我们的拖拉机等主要农业生产资料可以卖给人民公社。所以,农业生产资料在我们这里同斯大林的办法不一样,我们的商品范围比斯大林那个时候宽。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都是这样认识的。【4】这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认识上的一大进步。

在这个问题上,理论界对我们的消费资料是不是都叫做商品,有一些争论。我们是同意毛主席的观点的,都是商品。可有些同志认为要分析,说:全民所有制的职工领到了工资去买商品,这种商品交换已经不是一般的商品交换了。职工拿到了工资,到市场上买布,这个不叫商品交换。只有纯粹的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交换,才是完全形态的商品交换。这种说法,我们不能同意。职工用工资去买的东西不叫商品,集体农民用分到了的钱去买的东西才叫商品。同样一个东西,卖给国家职工不叫商品,卖给农民就叫商品,这是什么逻辑?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本质上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毛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提到我国现在还存在商品交换的时候指出,这个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这里所说的“没有多少差别”是什么意思?我们的理解,就是指我们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同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形态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有它的共同点。就是指商品都能够转让所有权,价值都是由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交换都要等价交换。这些

都是共同的。毛主席在讲了这些共同点“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之后，又指出：总而言之，我们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这就是说，既有共同点，又有本质的差别。所有制变更了，我们社会主义所有制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所有制条件下的商品生产是有本质区别的。如果只看到共同点，忘记了这个根本的区别，我们就不能够说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所有制的变更，说明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的性质改变了。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者和所有者已经不是私人，而是代表全体劳动者的国家和由部分劳动者组成的集体。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时曾说：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人民公社，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差别的。在这样的经济关系里，作为商品所有者和生产者的国家与集体经济组织所进行的劳动，是向社会、向集体提供他们的劳动量，而不是把个人的劳动力卖给国家、卖给集体。在全民所有制中，在集体所有制中，劳动力都不是商品，货币也不是资本，劳动力的买卖关系已经完全排除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指出，劳动力买卖关系是在流通领域里进行的，在这个领域里面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由和平等。愿买就买，愿卖就卖，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等价交换，这就是平等。在劳动力的市场上，劳动者和资本家是

平等的双方。我愿意卖就卖，你愿意买就买。所以，马克思讲，在流通领域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但是，资本家把工人的劳动力买去以后，一进入生产领域，情况马上就发生了变化了。“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5】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的买卖和劳动力的使用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关系。这样一种关系，在我们的集体所有制的经济中间，在我们的全民所有制的经济中间，是不存在的，已经被排除了。这种关系的被排除，是商品性质的根本改变。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中，劳动力是商品。在公有制经济中，劳动力不是商品。因为从事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已经不是私人，而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和集体经济组织，从而可以自觉地利用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可以用国民经济计划来调节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私人商品生产中那种无政府状态和盲目受价值规律支配的现象，已经被自觉的有计划的生产所代替。私人商品生产中价值规律所起的作用引起的两极分化，有的发财、有的破产，大鱼吃小鱼的现象，也不存在了。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价值规律还是起作用的，但它的作用同私人生产者的商品生产里的那种无政府状态和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完全不同了。

“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肆意歪曲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

生产的性质。他们说：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在本质上就不可能有多大差别”。他们甚至胡说：“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者”都在那里“攫取大量的商品和货币，爬到资产阶级的地位上去”。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从事商品生产的广大工人、农民、企业管理人员，从事商品流通的商业人员，从事货币信贷的金融工作人员，岂不是都成了资产阶级？我们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和人民公社岂不是都成了资本主义的企业？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岂不是都成了资本主义的制度？

第三个问题：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必然产生资本主义吗？

“四人帮”根本抹杀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同小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抹杀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其目的是为了论证这样一个极端反动的观点，说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必然产生资本主义。抹杀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小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目的是为了得出一个结论，说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必然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抹杀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目的是为了得出一个结论，说社会主义的再生产会再生产出资本主义来。我们读了政治经济学，知道资本主义再生产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四人帮”他们把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抹杀了，而且得出一个结论：既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差不多，因此社会主义也会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们这样一种

观点是完全站不住的，是反动的。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是小商品生产。因此，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样一个观点，是完全不对的。我们学习了政治经济学，都懂得这么一个道理，即使是小商品生产，也不是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会导致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存在的时间很长，只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具备了一定条件，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它才导致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原始社会末期就有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有小商品生产。可是，那个时候没有导致转化为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导致转化为资本主义的时间，是封建社会的末期。至于转化的条件，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一是货币财富或者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大量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二是有了大量的摆脱了封建的人身附属关系、具有人身自由同时又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不出卖劳动力就无法生存的劳动者。只有在这样的条件底下，劳动力才转化为商品，货币才转化为资本，小商品生产才能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没有这样两个条件，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小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那么，这样两个条件在我们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里有没有呢？没有。毛主席引证斯大林的话说，决定性的条件我们具备了，和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不同了，就是我们实行了公有制，劳动力不再是商品了。有了这样的条件，还有什么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回到资本主义呢？其次，既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因此也不能够说，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会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生产

关系来。说社会主义再生产会再生产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像说资本主义再生产出原始公社一样荒唐。

有的同志提出，如果说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产生资本主义，那么我们社会中的一些资本主义现象是从哪来的？

我们的看法，就是我们现阶段的社会中，它原来就还存在着并且产生着资本主义。因为就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来说，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以外，还存在着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例如地下工厂、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还有一些挂着社会主义招牌但是性质完全变了的企业，以及全民经济、集体经济中间的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活动。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不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或者说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还残存着的，还发展着的。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这些东西没有消灭，它们还存在着，而且这些资本主义活动在一个时候、一些地方还能够泛滥。大家都看见了，被“四人帮”破坏严重的地方，这种资本主义的活动是非常猖獗的。在我们的国家机关中间，我们的经济组织中间，确实有一些变质分子，他们利用社会主义的招牌干了资本主义的坏事，这能够说是社会主义制度固有的吗？不能。恰恰相反，这是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容的，一旦发现了就要打击的。

还有的同志认为，实行按劳分配，有的人工资多了，就可以去套购物资，从而得出结论说，按劳分配会产生资本主义。我认为，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我们的工资是有差别的，

有些人工资多一点，收入多一点，这种情况是有的。有少数人用积攒下来的工资去投机倒把，去套购物资，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呢？也有。但是，绝对不能由此得出按劳分配产生资本主义的结论。这正如在过去战争环境里，我们的干部和战士都有枪支，那是用来同敌人作斗争，或者用来自卫；如果有极个别的人利用手中的枪去干坏事，这能说是有枪的必然产物吗？显然不能。总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存在的资本主义活动，都不能够像“四人帮”所说的“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必然产物”。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是私人的商品生产，按其本质来讲，它不能够使私人从这里面来积累货币。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货币流通有一套制度，从事经济工作的人员按照制度去办事，他有什么可能来积累大量的货币、大量的商品呢？有贪污盗窃分子，有的贪污盗窃和索贿受贿非法所得的数量还很大，但有这样的事情就能说是我们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流通的制度产生的吗？而且就是积累了较多的货币，我们的制度也不容许他们随意去购买劳动力，随意去购买生产资料。他们可以搞地下工厂，可以搞地下包工队，这个时候，他就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的工作人员了。他一干这个事情，就离开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离开了我们社会主义的轨道了。怎么还能够把这样的坏事揽到我们社会主义的制度头上来呢？

那么，当前我国社会中资本主义活动和新资产阶级分子是怎么产生的呢？

第一，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

成,但是还存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残余并没有消灭。原来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在某些人身上仍然顽强地表现出来。他们中间有些人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还闹得很厉害。新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各种坏分子数量还不少,如打砸抢分子。总之,这些就是资本主义活动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土壤。在社会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底下,他们要发展,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要同我们的国家机关、企业组织里面的一些人互相勾结起来,拉出去,打进来,通过盗窃、套购以及盗用社会主义经济机关的名义等等手段,来进行资本主义活动,使一些人变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样的人,发现一批搞掉一批,还会新产生一批。因此,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真正土壤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残余势力及其影响的存在,而绝不是“四人帮”所说的是什么“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商品生产”。

第二,资产阶级分子所以能够同社会主义经济机构、国家机关中的某些人勾结起来,进行资本主义活动,是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很不成熟,社会主义制度在生产、流通和分配等方面都还很不完善,在经济计划和管理等方面都还有不少缺陷。这样,就在社会主义的生产领域,特别是流通领域,存在着资产阶级分子可以进行资本主义活动的许多空子。我们制度本身不完善,我们的很多缺陷,给资产阶级分子活动以可乘之机。这些年来,走后门的风极为严重,物物交换到处流行。城市副食品的供应比较困难,这个单位、那个单位就拿自己的物资,超越商业部门到农村换进副

食品，确实出现了很多贪污分子，“万字号”在各个地区都不在少数。这同“四人帮”的破坏密切相关。搞社会主义的人都被他们打成走资派，想管也不敢管了；我们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制度都被他们说成什么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制度了，想维持也不敢维持。本来就有缺陷，这些东西被他们一打乱，被他们一破坏，资本主义活动的空隙、可乘之机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加深认识很重要。究竟资本主义从哪来？找准了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源，就可以使我们坚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而更加激起我们对“四人帮”的仇恨，更加激起我们对这些资本主义活动的仇恨。如果随随便便地把资本主义的产生归到社会主义制度上面，那就正中“四人帮”的计，结果就模糊了我们对敌人的认识。

第三，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生产还很不足，远远不能够满足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劳动力也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如果物质比较丰富，商品比较充足，生产单位能够按计划及时地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物资，消费者手中的货币能够买到他们所需要的商品，那么地下工厂、投机倒把的活动就大大减少。许多事实证明，当我们的社会生产发展得比较快、供应比较充分的时候，资本主义的活动就大为减少。相反，生产停滞、甚至下降，供应比较紧张的时候，资本主义势力就活跃起来。

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五年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曾经

讲到,我们解放快三十年了,可是有些地区的农业生产还维持在一九四九年的水平,没有增加多少,甚至个别的地方还下降了。这引起到会同志的充分注意。而“四人帮”却认为这是“唯生产力论”。当时估计农业生产下降的县有一百多个。在这样的县里,生产一直停滞不前,商品的供应比从前差不了多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动力没有得到充分地利用,他不想找出路呀?集体所有制不管他,全民所有制也不管他,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他就自找出路。讲起这些事情,我们心里确实很难过。解放快三十年了,那里的生产还停滞不前,那里人民的生活没有改善,那里的劳动力想干社会主义,可是不能够充分调动起来去干社会主义。“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我们这些老同志想解决这些问题,但也无法干和不能干。今天,把“四人帮”打倒了,把他们的思想流毒清算了。如果我们还对这样的情况不引起注意,那我们实在对不起人民。

拿城里来讲,现在还有好几百万要就业的人。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经济发展现在还容纳不下这么多人。出路是什么?就是加快我们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速度,发展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加上我们劳动制度的改进,才能够使这些人就业。在没有就业之前,大多数人很守规矩,学习呀,帮助家务劳动呀。可是,我们都知道,城市里头有青少年犯罪。这种现象,在“四人帮”的煽动下,比过去增加了。为了维持社会治安,对那些罪恶严重的分子要实行严惩,这是必要的。可是,我们看看,那些犯罪的大都是二十几岁的人,

难道他们命定要干这些坏事吗？从这里面，我们每个同志不应该得出教训吗？不应该增加我们的责任感吗？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应该怀疑社会主义制度吗？不能。而坚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把我们的事业搞好，加快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的出路。

总起来说，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是新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直接原因。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完善和缺陷所造成的空子，给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分子活动的可乘之机，这是资本主义活动和新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条件。生产发展水平的低下，生产的不足，是资本主义活动和新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最后根源。“四人帮”掩盖资本主义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真正原因，而把这个原因归之于包括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关系在内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他们把按劳分配中间的等量劳动交换的原则，把商品交换中间等价交换的原则，说成是内容完全一样的。他们又进一步提出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是资本主义因素，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并由此得出一个反动的结论，说“资产阶级法权既保护着老的资产阶级，又孕育着新的资产阶级”。这句话，把“四人帮”对社会主义制度诬蔑的面貌充分暴露出来了。这是“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概括、最典型的带有纲领性的语言。按着他们这种说法，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命定地要回到资本主义制度里去；我国人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唯一的结果就是复辟资

本主义。不仅如此，他们还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了。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了。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并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的中国共产党，被他们说成党内已经有一个资产阶级。整个地说来，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所起的作用，就是保护老资产阶级和培植新资产阶级。因此，他们要统统打倒中国共产党内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老干部，这就是他们反动的政治纲领；彻底消灭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他们反动的经济纲领。他们的反动的政治纲领，是以他们反动的经济纲领为基础的。

第四个问题：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

在我们现阶段的社会里，还存在着不同性质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占着绝对统治地位的。供销社原来是集体商业，现在已经成为全民所有制的商业了。如果算上供销社，城乡国营商业的资金已经占到全国商业资金的百分之九十九了。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虽然还有集市贸易，大概国营商业也占到将近百分之九十。

当然，也还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它同旧社会相比，尽管没有一种完整的体系了，并且经常地、不断地受到排挤，但它总是力图生存和发展，有的时候甚至活动得很猖狂。特别是在“四人帮”破坏严重的地区，更是这样。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此外，我们在农村还有公社社员的家庭副业，还有农村集市贸易。按照毛主席的分析，这种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已经不同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的小商品经济。现在个体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庸和必要的补充，但是它仍然带有小商品经济的性质。这种带有小商品经济性质的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从事这样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人中间，某些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很严重的人，总是要力图摆脱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地位；摆脱了这种从属地位，它就必然同资本主义经济相联系。

上面这三种东西性质是不同的。一个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一个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一个是带有小商品经济性质的。在我们的社会里，这三种东西同时存在。资本主义的东西是原来就有的，现在还残存着，甚至发展着。带有小商品经济性质的家庭副业，它虽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庸和必要的补充，但仍然有两重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毛主席曾经告诫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中国还有两个前途。多次讲了这个问题。他在一九七五年同外宾谈话时说，中国还是有两个前途，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社会主义。

既然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还将长期存在，我们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才能有力地限制城乡的资本主义活动，排挤以至取代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我们在农村工作的同志都有这样一个

共同的经验，就是要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和资本主义的活动，必须有社会主义的东西代替它。你没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过去代替它，光靠行政的办法去禁止资本主义，是禁止不住的。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同志高度注意。

从全国来讲，我们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已经占了绝对统治的地位。但是，同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来比，我们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还发展得很不够。就拿粮食来讲，我们的商品粮只占粮食总产量的五分之一，征的、购的总共一千亿斤左右，这是很少的，远远不能够适应国家建设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要求。姚依林同志曾经做过一个估算，根据今后工业的发展规模和城镇人口的增加，至少需要二千亿斤商品粮，比现在增加一倍。从一千亿斤商品粮增加到二千亿斤商品粮，这可不是小的数字。其他工业原料和轻工业产品不相应地增长，我们二十五年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一个伟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不容易的。国民经济作为商品提供给农村的农业机械和其他产品，还远远不能适应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要求。日用工业品也远远不能够满足人民的需要。我们对外贸易的进出口总额，在全世界贸易中间占的比重是很小的。面对现实，承认事实，就不能够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国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还必须大大发展。

毛主席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的时候，讲过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人民公社应该尽可能广泛地

发展为国家、为其他公社所需要的商品性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既可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资，满足公社生产上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如果公社只搞自给性生产，不搞商品生产，不进行商品交换，农民不把粮食等农产品同工人生产的工业品交换，那么工人怎么能有饭吃，农民怎么能够得到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和日用工业品？如果公社不把自己多余的产品卖给国家，卖给其他公社，怎么能够得到货币收入，哪里有钱分给社员？京、津、沪郊区农村所以比较富裕，是因为这些地方商品生产比较发展，商品交换比较发达。社会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社员的需要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公社的生产不可太单调，不能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要多搞商品生产，要尽可能多地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当然，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应当有计划地进行，要把国家和公社的商品交换纳入计划的轨道，要逐步推广合同制度。

毛主席这段话，是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说的，同时也讲到了商品生产的远景。人民公社化以后，有一种很广泛的意见，要把人民公社搞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一个小单位一个小单位自给自足，鸡犬相闻，互不往来。如果真那样干，就会有一个经济上的大倒退，而且实际上也行不通。毛主席这段话看起来很平易，实际上解决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商品经济比自然经济是一个进步。我们不能够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退回到自然经济去。我

们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不只是在公社范围之内、省的范围之内、全国的范围之内，而且应该向全世界发展。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流通，要面向全世界。要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出口，换进我们所需要的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设备。农村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大大发展，可以提供更多的商品粮和副食品，提供更多的经济作物和其他的工业原料。这就要求轻工业部门生产出更多的日用工业品来同农民进行交换，要求重工业部门生产更多的农业生产资料来供应农业，以加速农业的现代化。同时，如果国营工业的商品生产大大发展了，也要求人民公社提供更多的商品粮食、副食品和其他原料。

总的说来，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发展了，我们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就具备了更为有利的物质条件。努力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也是广大工人、农民和财贸职工的光荣任务。搞商品生产，搞商品流通，是崇高的社会主义事业，而绝不像“四人帮”所诬蔑的那样是在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土壤和条件。我们要从各个方面来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我们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不同成份的商品生产，这是客观的，不承认不行。既然存在，就要对它进行分析，就要认识它、区别它。把这个界限分清楚了，就可以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促进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

注 释

- 【1】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578页。
- 【2】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第283页。
- 【3】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548页。
- 【4】 六十年代初，刘少奇同志提出全部生产资料都是商品，物资部是第二商业部。他主张用经济办法管经济，主持创建专业的托拉斯。
- 【5】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200页。

正确处理科研队伍内部的各种关系*

(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要把科学事业办好，需要正确处理我们内部的各种关系，包括持各种不同观点的人们之间、老干部之间、党内党外之间、内行外行之间、老专家与新徒弟（年轻人）之间的关系。

老专家要招研究生，急切希望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下一代，这个心情是非常好的，是值得欢迎的。这里就有个师徒关系。处好师徒关系，应该双方面努力。要相信后来居上，努力实现后来居上。人类社会能发展，就是靠老一辈全心全意帮助下一代发展，使事业后继有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教师应该诚心诚意地希望自己的徒弟比自己强，并为此作出牺牲，不要计较徒弟是否尊重自己。年轻人对上一代人，应该是诚心诚意地学习，然后超过他们，而不是打倒他们。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一九七八年科研计划座谈会上的讲话。

唯一正确的是向前辈学习，在掌握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超过前人。以后对新来的研究生，要把这个道理告诉他们。刚来不几天，就天天惦记着打倒学术权威，这不是幼稚病？不走学习前人、然后再超过前人的这条路，一点希望没有。据说我们这里有的年轻人有点成绩就瞧不起老专家。这是不对的。有了成绩就更应该尊重老专家。不说恩典，至少应当想到人家带你走过一段路，是你的引路人嘛！没有指点，不知要走多少弯路，要走多少重复的路，花费多少时间在从头再来过的摸索之中。一定要搞好师徒关系。

还有一个关系，就是党员与非党员的关系。

这几年共产党员的形象被“四人帮”糟蹋得不像样子，有些党员自己也不注意、不检点，使党在群众中的信誉大为降低。所有党员都应觉悟起来，为提高党的信誉、改善党的形象，从各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你处处不起模范作用，怎么能团结和带动群众呢？听到群众不满，首先应检查自己，下决心改正，才能成为群众的先进分子。搞科研，共产党员要带头。向老专家学习，共产党员也要带头。师徒关系，共产党员要起模范作用，真正做到尊师爱徒。各方面关系搞好了，队伍整齐，团结一致，科研规划才有可能完满实现。确实干得不错，大家心里才能感到安慰。

胡乔木同志出了一百个题目，主要内容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年来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很多题目是毛主席早就提出了的。希望若干年内写出一百本书。和民族研究所有关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民族》一

本，三种社会形态（原始、奴隶、农奴）下的民族各写一本，三个重要自治区（内蒙、新疆、西藏）各写一本，一共七种。

总之，你们大有希望。希望你们成为无产阶级的学问家。中华民族没有几十万学问家，在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中少数民族没有几万学问家，说不过去，不好向我们这个历史时代交账！

大胆地、全面地、准确地 反映情况*

(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情报工作是先行的工作。打仗要靠情报准确，我们分析和研究问题也要靠情报准确。

情报的准确，是建立在详尽地搜集材料的基础上的。要全面，不能片面，各种各样的材料都要搜集，多多益善。不只是搜集那些赞扬我们、歌颂我们的友好的材料，也搜集那些“批驳”、敌视我们的材料。既然叫情报，就不能只听好话，不听坏话。只收集好听的，情报就不全面，就有极大的片面性。毛主席历来提倡好话坏话都要听。兼听则明。情报工作是为了作战用，不仅知道朋友，也知道敌人，了解敌情。朋友对我们关心，提出许多建议、批评、意见，有的固然使人听了脸红，但听我友声，其鸣也真。敌人的攻击、敌视我们的材料，虽然面目可憎，但也正是其原形毕露的地方。作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规划汇报会上的讲话。

战需要了解敌人，反对我们的就回避，那怎么作战？

任务要完成，反映的方式要讲究，要区别。骂我们的，当然不能当他的宣传员，材料的印发可缩小范围。

各种情况都向上反映，是情报所的责任，但不要扩散。要进行纪律教育，不需知道的就不要知道。要让同志们在这方面放开手脚，大胆地、全面地、准确地反映情况。全面才能准确。骂我们的材料，过去往往不敢反映，而这方面的材料有时更为重要。怕反映，同这些年不正常的情况有关。相信今后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

百家争鸣，办好刊物^{*}

(一九七八年二月三日)

我说几点意见：

一、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部各所办的刊物都停止了。现在院党组决定，各所都要恢复刊物，每所至少一个，有的所二三个。各所刊物的文章，院部不审（个别文章除外），都由各所的负责人承担起来。因此，各所都要配备好业务领导干部。

二、对刊物的要求是，反映科研成果，指导科研工作，组织科研活动。建议各所、各刊物组织有关学科问题的讨论，逐步提高刊物质量。

当前，全国正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的罪行。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来揭批“四人帮”对马列主义的篡改，是我们社会科学院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我们相当长一个时期里的中心任务，也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刊物出版会议上的讲话。

是各个刊物理论宣传的重点。

三、百家争鸣，要划清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长期以来，很多同志感到，在一切事情上把这种界限划得一清二楚，确有困难。对于一些明显的问题划得清，对于一些复杂的问题就划不清。以后，不要再抽象地纠缠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了，要按照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的六条，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划清敌我之间的政治问题和人民内部的政治问题。按照这样的标准，把政治问题分为不同性质的两类。属于人民内部的政治问题，可以而且应当进行充分的讨论，享有高度的民主和自由。刊物发表了错误的意见，只能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读者有批评的自由，作者、编者也有反批评的自由。因为这大量的是人民内部问题。要允许人家犯错误，社会科学的研究也不例外。

目前，在清查工作中，属于“四人帮”的问题，那是很清楚的；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也是很清楚的。我们要清查的，是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写了错文章，说了错话的，中央有政策嘛！邓小平同志叫一位同志当半导体所所长，这是有意识地把他作为一个标兵，把“批邓”时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和那些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区分开来。

要注意，不能搞着搞着就把人民内部问题变成敌我问题了。这是妨碍百家争鸣最重要的一条。

刊物要尊重作者。只要和“四人帮”无牵连，作者要坚

持己见，其文章就不一定非要按编辑部意见改了才登。但是，对那些不加分析、无限上纲、互相谩骂的语言，编辑部应该删改。这种文风对开展百家争鸣只有坏处，不会有好处。编辑部只修改文字，不改变他的观点，这样做有利于造成一种互相探讨的气氛，防止有些人由于自己的观点遭到反驳而恼羞成怒，互相攻击，互打棍子，互扣帽子，造成学术界很不好的风气。如形象思维问题，本来是有不同意见的，可以讨论。可是有一篇文章出来后，谁也不敢说话了。我们一定要注意这种情况。

四、编辑部可用各种方式组织自己的队伍。刊物上各种文章都登，也不改人家的观点，但编辑部一定要有自己的话。当一个问题讨论到一定程度时，编辑部就应出来说话，可以用个人名义，也可以用编辑部名义。为了把讨论引向正确轨道，编辑部要发表有倾向性的讲话，否则刊物就变成“公共汽车”了。要说话，就需要有研究，各个刊物要有一个固定的队伍来做这件工作。

社会主义时期还要批判 封建主义思想*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三日)

一九七〇年毛主席接见斯诺时,斯诺问:中国共产党怎么样?主席说,我们这个党多灾多难。现在我们再来回顾主席这段话,体会是更深了。我们党确实多灾多难,而“四人帮”给我们造成的危害,在党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四人帮”全面攻击毛泽东思想,全面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全面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攻击我们党,全面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迫害党的广大干部。关于“四人帮”的性质,叶剑英同志讲得非常概括、非常准确。他说,“四人帮”的性质,一句话,就是反革命性质。一切革命的事,一切革命的人,他们都反对。在座的每个同志,都可以拿出自己经历过的、听到过的、看到过的大量材料,证明这个概括完全合乎事实。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科研规划座谈会上的讲话。

今天来参加法学科研规划座谈会的许多同志，属于“公检法”，也属于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一个重要方面。林彪、“四人帮”宣布砸烂公检法，砸烂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这个苦头大家都尝够了。同时，我们作为搞社会科学的同志，还遭受到“四人帮”在精神上的一种特殊的迫害。前些日子，在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六个半天的座谈会上，大家反映出这么一个问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竟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了一种不合法的事情，只能采取地下工作的方法来进行。我可以讲一点个人的经历。陈伯达控制《红旗》的时候，我被隔离起来。我想在写完交代以后，好好利用一下这个不会太短的隔离时间读点书，请看守的同志借部《资本论》来好好学习。那位同志很好，果然借来了。第一卷读了三分之二，被另一位青年同志发现了，这也是个好同志，可是他把书抢走，不准读了。我确实很伤心。我被隔离、批判、斗争，都没有意见，可是为什么读一读无产阶级的“圣经”都不行呢？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对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实在没有比这更难忍受的了。一些老同志，经过斗争，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获得读书权，读完了《资本论》，我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被剥夺了读《资本论》的权利！那时我手头还有几本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可以反复读、反复记。一九六八年，军宣队和工宣队来了。有一天，工宣队长发现我在读列宁的《哲学笔记》，他翻一翻，说：“你现在还读这样的书啊？”这个同志不错，当场没有把书收走。可是，“现在”

读“这样的书”有什么不好呢？一个共产党员受审查，读列宁的《哲学笔记》，居然成了使他奇怪的问题。不久，由于一位同志违反了当时的纪律，还是把我的几本马列哲学书全部收去了。这不怪他，但是说明他思想上中了一种什么毒，受了一种什么影响。另外一位同我在一起的同志，原来被拘留了一年，放回来以后，又在机关被隔离起来。我问他，拘留期间究竟干些什么。他说，没有审问，也没有让写交代，就是关起来，谁也不接触，《人民日报》、《红旗》、《毛泽东选集》都不给看。社会科学学院的同志说，他们被迫停止业务，不准写文章，业余时间偷偷干也不行。反正是学生不让读书，科研人员不让搞研究，你要不听他们的，就给你扣这个帽子、那个帽子，打你这个棍子、那个棍子。

可以讲，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就是尖锐的阶级斗争。党的路线要使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世界上文明、民主和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四人帮”却要把我们拉回到中世纪式的那种充满黑暗和愚昧的时代，要毁灭我国人民革命的文明成果和劳动成果，毁灭一切进步的、科学的东西，造成历史的大倒退。

通过一年多来的揭发批判，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四人帮”罪行的严重。如果不同他们决裂，不把他们的流毒肃清，我们党所提出的新的任务就无法完成，我们也难保今后不重新遭受这样的灾难。但是，这同时又在我们面前提出一个问题：他们明目张胆地干坏事，在党的历史上从未见过，可是他们一干就是那么多年，涉及的面又如此之宽，这能够说

是一种偶然的現象嗎？究竟应当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显然，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它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不去研究中国历史的特点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不去研究中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状况，不去考虑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些问题就说不清楚。

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科学解释，有待于我们从各个方面来做工作。我只想就封建主义思想传统的反动影响提出一点意见。

社会主义革命，一般地说，是革资本主义的命，革资产阶级的命，革他们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命，最终使资本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绝种。既然要干这件事，那就有必要了解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它是产生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里。鸦片战争以后，它不仅受到封建主义的压迫，更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买办资产阶级，完全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并且和封建势力实行联盟来反对革命。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一方面同封建地租剥削有联系，另一方面同帝国主义有联系，既害怕把反帝的革命进行到底，也不可能把反封建的革命进行到底。封建的经济、政治、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很深。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因此，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一般特点来解释“四人帮”的出现和他们的活动，还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

在中国，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落在了无产阶级的肩上。资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无产阶级应当、

也可以完成得更好。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必将导致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一刀切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时期，有一个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的问题。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这个问题尤其值得注意。列宁谈到过，一个文化水平较高、全国都是大农业的国家，和旧俄那样的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形是不同的。他认为，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愈困难。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他还明确提出，当时革命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是战胜地主。旧中国和旧俄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毛主席多次论述过中国历史的这种特点，不仅用来指导夺取全国政权的人民革命，而且用来指导建国以后的革命与建设。

一九五〇年，毛主席就提出，不要四面出击。首先还是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推翻地主阶级。我们在没收了官僚资本之后，花了两三年的时间，进行全国规模的土地改革，根本改变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经济上，我们的民主革命是很彻底的。经过土地改革，富农经济实际上也消灭了。我们实际上执行的是平分土地的政策，这是彻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的政策。在政治上，我们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包括地主阶级在农村的统治，在农村树立了贫下中农的优势。这个也搞得比较彻底。但是，从思想上认识和肃清地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统治的恶果，或者说，思想战线上的民主革命同经济、政治方面的民主革命相比，就不那么彻底

了。土改运动中工作队对农民进行思想发动，农民诉苦，搞减租反霸、平分土地的时候，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当时都是起了作用的。不过，正如列宁说的，旧的社会制度消灭了，但它在人们的意识中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在我国，几千年来封建主义的统治，使得封建的观念形态、封建的伦理道德和传统风习发展得这么完备，这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罕见的。加上我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人口众多的国家，封建思想的影响实在不能低估。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封建主义的残余，可以说集中地在“四人帮”身上表现出来。“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违法乱纪，私设刑堂，以从肉体上和精神上折磨和虐待我们的革命同志为享乐，简直是骇人听闻的，最现代化的技术和最野蛮、最原始的办法，都被他们采用了。杨奇清同志说，监狱是他盖的，没有想到自己进了自己盖的监狱，在里面受到了自己一贯反对施用的刑罚。我认识的一位同志，出狱以后，讲了自己的遭遇。几天不让睡觉，脱光衣服，用各种怪声音刺激你，用各种常人想不出的办法虐待你，使你遍身是伤，又看不出痕迹。从“四人帮”倒台以后揭发的许多材料看来，这种事情，在当时并不是个别的。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挨整的同志，愤愤不平的同志，各家报纸谁敢出来给他们讲话？“四人帮”这一套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看，绝大多数是封建主义的、甚至简直是奴隶主的东西。

最近看美国影片《巴顿将军》，感触很深。据说那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的。一个军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名将，

发现一个怕死的士兵，打了他一个耳光。这件事在美国国会引起轩然大波，艾森豪威尔不得不直接下令，要这个军长在全军面前承认错误。影片为了宣扬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内容会有虚构和夸张。但是，在当时的美国报纸上，据说这确是轰动一时的事。这里头有个党派斗争问题，反对派在利用这件事攻击艾森豪威尔。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比较一下，“四人帮”残酷迫害我们的干部和人民，总比军长打一个怕死的士兵这种事情，要严重一万倍也不止吧。

刚才说的是“四人帮”。在我们自己同志身上，封建思想的影响，也是程度不同地存在的。我只举一个例子：家长制。现在，就全国范围来说，家长制的影响是渗透到各个角落的。我们党内就没有这种影响吗？“四人帮”把我们的老干部打成“走资派”、“反革命”。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才获得重新为党工作的机会。许多老干部振奋精神，继续革命，的确鼓舞人心。这些老干部，同“四人帮”比较，一个革命，一个反革命，简直是天上地下。有些老干部也有缺点错误。正像鲁迅说的，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革命干部是天上的鹰，而“四人帮”却终究不过是苍蝇。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一些老干部的缺点错误，就不要改正。一些在领导岗位上工作的老干部（也包括一些较年轻的干部），对于家长制的领导方法有没有认识？很多同志是有认识、有觉悟的。但并不都是这样。搞着搞着，他就成了他这个单位、这个地区的家长了，听不得不同意见，只许赞成，不许反对；只许说好，不许说

不好，动不动就给人家穿小鞋。即便帽子工厂没有了，棍子工厂没有了，鞋子工厂还存在。从思想根源来说，我看就是家长制的东西作怪。党和人民把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交给你去领导，你却去摆家长的威风。在党内，我们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书记是班长，但是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不能搞一言堂。你错了，要服从多数。你正确，如果多数不同意，也还要说服、教育、等待，不能只靠命令。家长制作风的影响不肃清，要造成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不可能的。

研究“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不能不考虑中国封建社会长、封建主义影响深这些特点。“四人帮”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一定社会势力的代表进行活动的。在他们的卵翼下为非作歹的，就是地富反坏、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野心家、叛徒、流氓以及打砸抢分子这些人。在全国人民中，在他们所在的地区和单位，他们都是一小撮。哈尔滨一位工业书记对我讲，在一个工厂里，这种人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二，一个一万人的工厂，最多也不过百把人。哈尔滨有上百个大工厂。他们一串连，一结帮，物以类聚，就可以有好几千人。这几千人今天冲到这里，明天冲到那里，因为有“四人帮”撑腰，你还不敢管他。每个省、地、县、公社都有这样的人。他们结帮之后，就成为一股势力，可以闹若干年，把一个公社、一个县、一个地、一个省，直到全国，闹得不可开交。其中有些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生的。说得广

泛一点，包括我们的孩子，“文化大革命”初期还是小学生、中学生，造老师的反，不是有的人也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刑罚吗？他们从哪里学会这套本事的？父母教的？开过专门训练班吗？不是。“四人帮”是最大的教唆犯。可是，总不能否认封建主义的影响！

“四人帮”下面的这些人，有相当部分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或带有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要大量剥夺小农的。《资本论》讲到英国的圈地运动，所谓“羊吃人”，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来，变成一无所有，只有靠出卖劳动力才能维持生活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快的国家，农民破产以后，可以被工厂吸收。开始的时候，他们不习惯，慢慢也就成为受到大工业训练的、有纪律、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成员了。也有失业队伍。但是一般说来，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厂是可以容纳破产农民的。在中国，三大敌人造成了农村的大量破产，但是资本主义又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很不发展，容纳不了广大的破产农民。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专门分析过这个问题：“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确途径，不得不寻找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1】}在政治上，这是一个动摇的阶层。其中的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马克思在谈到流氓的时候，曾经称他们是随着时势浮沉流荡的由所有各个阶级

中间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这些人和现代大工业没有联系，恐惧和仇视生产力的进步，有一种疯狂的报复性和破坏性。他们在进行斗争时，找不到别的思想武器，只有抓住现成的封建主义的武器，在组织上就是结成一帮。在旧中国，上海就是他们集聚和活动的乐园。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依靠了这些人。“四人帮”也是依靠他们。解放了，老流氓死了，老流氓的影响还在，王洪文和他那伙小兄弟，就是在这种影响下生长出来的。“四人帮”还编造了一种理论，说历代开国皇帝都是流氓，流氓起家，打架最勇敢。可以说，“四人帮”和他们的帮派骨干的产生，是同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直接有关的。他们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就是封建主义。他们结成一帮，集中了流氓这种人身上的最坏的东西，利用中国小资产阶级群众中的封建思想的影响，干了数不清的坏事。

因此，我觉得，毛主席一九七四年提出批林批孔，针对林彪集团的反动的封建性质进行批判，这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考虑。林彪那套东西，和“四人帮”一样，都同中国的封建主义有密切关系。由于“四人帮”转移目标，另搞一套，那次运动没有搞下去。现在，“四人帮”倒台了，就有必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把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作为我们在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项重大任务。

我想的还很不成熟，希望同志们能够继续研究。

注 释

- 【1】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横排版，第608页。

3

公检法工作也要解放思想^{*}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三日)

我们的公安部、检察院、法院，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派实行专政的国家机器。我们拘留、逮捕、审讯、判刑的人，大体上分两类，一类是反革命，阶级敌人；另一类不是反革命，不是阶级敌人，这样的人还是大量的。我们的社会上，包括搞政法工作的同志，有一种看法、一种说法，就是认为凡是被拘留、逮捕、判刑、坐牢的人，都是专政对象。我看，这种观念不对。应当说，被拘留、逮捕、判刑和坐牢的人，相当一部分是人民内部的犯罪分子。就拿刑事犯罪来说，像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的，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对他们实行专政。但是，并不是所有犯了刑事罪的人都是阶级敌人。因此，我们的法律，要考虑怎样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严格加以区别，以使法律能够适应这些不同的性质，作出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科研规划座谈会上的讲话。

不同的规定，在思想上则要改变那种认为凡是被拘留、逮捕、判刑、坐牢的人都是反革命，都是专政对象的观念。

我举点例子。好比一般的责任事故，一个司机，不是有意，而是由于责任心不强或是什么别的原因，撞了车，伤害了人。按照法律规定，他是应该被抓起来坐牢的。但是，不能把这样的人当作阶级敌人，不能剥夺他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能在一个时期内剥夺他一部分公民权。他坐在监牢里，也还应当有通讯自由。甚至可以设想，选举的时候，他可以在监狱里投票。工厂的厂长、党委书记，有些人造成几百万、几千万的浪费，多少有点党性的还做几句检查，没有党性的连检查都不做。我看，从立法的观点来讲，其中那些情节特别严重的，不受法律的制裁是不能允许的。不过，只要不是搞贪污盗窃，而是因为缺乏知识、没有经验、管理水平低、责任心不强，甚至犯了官僚主义等等，也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过去我们的惯例，坐了牢的人，就要开除党籍。可不可以考虑，尽管他们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应当受到法律制裁，但是如果不是从党的路线、纪律上构成开除党籍的条件，不是蓄意破坏的话，党籍问题就应该另行处理。当然，党的路线、党的纪律也是不允许他们那样搞的，有必要给予他们纪律处分，比如停止他一个时期的党的生活。不把这个界限划清楚，许多问题就很难解决，今后也还会继续发生一些新的问题。

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们大家去做，加强立法，并且在干部群众中普遍地树立法律观念就

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可是我们都知道，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相当长时间来存在着一种片面的认识，似乎群众运动同我们的法律是对立的。群众运动一来，我们的法律很容易被置之脑后。这方面，经过“四人帮”那套打砸抢东西的理论加工和实际推行，就显得空前混乱了。这里涉及的问题很多。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讲，从党的工作路线来讲，我们的领导机关都是一个加工厂。我们要总结群众的经验，来制订、改进和健全我们的法律。法律制订以后，又要靠群众来坚决执行，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补充、修正。

社会主义法律，特别是宪法，我们必须坚决地确立它的严肃性。有一些人喜欢歪曲地引用列宁的一句话。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应该怎样理解列宁的话呢？是不是说，我们的无产阶级领导的群众运动，就不必受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宪法的限制呢？我是不同意这种理解的。我们的法律，就是用来对反动派实行专政的。从一个巩固的国家政权来说，宪法、法律始终是对付敌人的基本武器，只有依靠宪法、法律才能使整个国家机器按照自己的阶级意志系统地强有力地运动起来。这对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如此，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更是如此。

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法律必须保护人民，这是它最基本的职责，只有保护人民才能镇压敌人，而镇压敌人也是为了保护人民。对于犯了错误的人，要依靠真理去说服教育，即使必须法律制裁也是一种教育。因此，绝不要用拳打脚踢、侮辱谩骂的办法，而是用准

确的材料，无可辩驳的事实，来揭发和批判他的问题。为了使我国国家不再发生那种随意打人、造成伤害和死亡的事情，是不是要规定一条，对违法乱纪的人，要给以法纪处分。我在通县搞“四清”的时候，曾经和一个人发生过一场争论。有一次，我到北京开会，他领导的那个队，把一个“四清”对象打了一通。我回来以后，首先承担责任，说我事先没有交代好，但是你们煽动群众打人，无论如何是个错误。他说，八路军不打好人，坏人为什么不可以打？这个道理，听起来很动听。但是，如果这也成为一种道理的话，那么坏人就可以利用你这个话来打好人，他也说他打的是坏人。前几年，我们许多好同志，不就是被说成是“走资派”、“反革命”而挨了打吗？我在社会科学院讲了几次，我们不能按照“四人帮”那套办法来搞运动。在审查期间，问题是敌我性质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还不清楚，是不是还是按照党的老章程，就低不就高，依靠群众进行实事求是的揭发批判和严肃的思想斗争，弄清事情真相，弄清问题的性质。什么喷气式、下跪、戴高帽和非刑拷打之类，一律禁止。“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就说，现在的斗争水平很低，贴标语，喊口号，尽是砸烂这个人的狗头，砸烂那个人的狗头。哪里那么多狗头，都是人头嘛！进行斗争的时候，不是讲究科学，而是想骂倒对方，用拳头打倒对方，甚至私设公堂刑讯对方。这是严重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

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

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这是毛主席对于革命时期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规律的总结。不用暴力革命推翻三大敌人，就没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建国后，不对一小撮反动分子进行坚决的镇压，就谈不上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可以发动群众来推翻自己国家的法律，听任一部分人（不管以多么革命的名义）随便打人、污辱人，直到把人搞死。我们党在群众中应当肩负领导责任。如果群众出现违反法律、违反政策的现象，就应当尽力纠正。至于审查对象确实犯了罪，甚至是罪行严重的阶级敌人，是不是需要逮捕、判刑、坐牢、枪毙，那都应当由政法部门根据犯罪事实、根据国家法律、听取广大群众意见做出决定。只有这样，才是维护人民群众的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才有可能减少冤案，真正判明是非、分清敌我。

一句话，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作为法学工作者，我们应当总结二十八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为制定各种法律、条例，逐步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做出贡献，坚决杜绝林彪“四人帮”那种封建法西斯主义又卷土重来。要认真研究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深入宣传社会主义法制的优越性和重要性，用来武装人民，向各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倾向进行斗争，包括对我上面说过的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和影响进行斗争。

注 释

- 【1】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横排版，第17页。

甄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日)

我们有一个审干复查小组,几个月来做了不少工作。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全院范围内,采取各种不同方式对五百四十七名干部进行了审查(不包括过去当作“五·一六”清查的同志)。根据中央的方针,这些同志的问题要全部进行复查。这件事已经布置了多次,有的研究所对这个工作抓得紧一点,有的所抓晚了。要由专门人负责这个工作,不采取搞运动的方式。各个所有专门的小组,叫复查小组,不是清查小组。过去讲了,对这个工作采取先易后难的步骤来进行。经过院复查小组多次了解,初步估计,全院范围内比较复杂、比较难搞的疑难问题,大约四十几个人,他们的问题放在后边搞,不然其他近五百人的问题就会拖久了。

什么叫容易解决的问题?今天讲一下:

一种是“四人帮”还没垮台的时候反对过“四人帮”,被当作反革命批了的,甚至戴了帽子的。现在给他们平反,恢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揭批“四人帮”运动时的讲话。

复名誉，把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全部推倒。这个工作已经做了。这是一种容易解决的问题。

第二种，就是有些同志“文化大革命”前在历史上受过审查，留了一点尾巴。原因是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区被敌人包围着，或者是其他原因，该找到的证明没有找到。以后经过内查外调，这些同志过去留下来的问题查清楚了，不需要留尾巴了。

第三种，就是由于林彪、“四人帮”那条路线的干扰、破坏，把我们很多同志过去工作中犯的这样那样一点错误，结论上写了什么他积极推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或者说他犯了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或者说他犯了走资派错误，他本人也作了这样的检查，填表也这样填上了。这个问题，中央现在已经明确地讲清楚了，说二十八年来各条战线都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绝大多数的同志都是执行了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只是在一定情况下犯过一点这样那样的错误。中央已经作了结论，全党的工作、各条战线的工作都作了结论。对这些同志再写上什么积极推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什么犯了修正主义路线错误，什么犯了走资派错误，这就不对了。这样的结论要去掉，这样的检查本人可以收回。给本人说清楚，给大家说清楚，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事，不要这样写了，去掉它。

第四种，就是由于“四人帮”打棍子、戴帽子，把很多学术问题和很多理论问题当成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在“四人帮”那里就等于敌我问题，这是同他们的“两个估计”【1】

紧紧相连的。在“四人帮”的控制下，大部分知识分子都被他们说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有成就的同志就被叫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甚至叫反动权威。这样批了，这样斗了，也这样检查了，这样作了结论。对“两个估计”的批判文章出来以后，这个问题也解决了。过去这样作了结论的同志，这样作了检查的同志，结论取消，检查收回。至于在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的探讨中间，有点这样那样的不同观点，以后继续探讨，如果是错的，自己改过来；如果是正确的，就坚持。

第五种，就是有的本人成份过去填的不对，家庭出身填的不太准确，社会关系里头有点什么事，还有的历史上曾经走过曲折的道路。这些问题，也是属于容易解决的，按照事情原来的面貌是什么就是什么。对我们一个同志、对我们的整个队伍，要有一个总的估计，处理这些问题要从总的估计出发。既然这个同志从全部历史来看是个好同志，既然社会科学院的这个队伍中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个总的估计的前提下，成份问题呀，年龄问题呀，历史问题呀，社会关系问题呀，我们的基本态度是相信本人。即使有个别同志现在还有点爱面子呀，也不必再纠缠了。比如有人过去填的表前后相互矛盾，一会这样填，一会那样填，成份一会填中农，一会填贫农，究竟怎么回事？让他想清楚了以后，按想清楚的填，自己声明一下，以这次填写的为准。采取这样的办法进行处理，不要再去内查外调了。

第六种，迟群进驻学部以后，曾经进行过整党，每个党

员都填过登记表，斗私批修呀，作结论呀，党员登记呀。有些同志希望不把这些东西装入档案。我们调查了一下，过去都没有装入本人的档案。院党组的意见，原则上退回本人，包括本人的检查。这件事不只是社会科学院一个单位的事情，全国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向中央组织部请示报告，胡耀邦同志最近讲话说送造纸厂，送给造纸厂还可以当原料，烧掉就浪费了。

第七种，当时当作“五·一六”审查了的，四百来人。这个问题已经清楚了、解脱了，可是他们的档案还留着。当作重点来审查的，除少数人作了结论以外，其他的也都解脱了，他们的档案也在各所封存。这个问题讲了几次，适当的时候对封存的档案进行处理。

这第六、第七两种问题，不属于前面所说的审干复查，又都是容易解决的问题，应该同时解决。

另外一种是有疑难问题比较难解决的。有这种问题的不过四十多人。

容易解决的人中间，有的本人要求写个结论。组织上要对他负责，作个结论。多数是可以不作结论的。所以，除了疑难问题以外，近五百人的问题，院党组的意见，全部由各所总支（支部）负责解决，同本人谈，同群众见面。解决的过程中，组织上的意见、群众的意见和本人的意见有争论的时候，提交院政治部。凡是没有争论的，本人满意了，群众满意了，组织也满意了，三满意了，问题就算解决了，给党组写个报告，备案的性质，不必批准。这样一来，我们就

可以加快对五百多位同志的问题的解决。争取在六月底以前全部解决，实在不行，可延期个把月。

总而言之，不管是清查也好，是复查也好，对每个同志的问题，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信。

我们多次强调上面的道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斗争中间往往容易动火，容易动感情，容易不照科学办事。我们许多老同志有过这个经验，整过人，也挨过整。回想一下自己的经验，斗到火热的时候，要求每个人就那么讲道理是很困难的；在那种压力下，被斗的人不说一两句违心的话，是不容易的。我们这次不要搞这样的事了，实事求是地揭，实事求是地批，有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没有什么材料就不去硬造、硬找，不去推测。

恩格斯讲，什么叫作唯物主义？就是按照事实的本来面貌去说明事实，不作任何的附加。不作任何的附加，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过去批判人，或者自己做检查，常常在这点上出问题。本来事情就是那么个样子，斗人的时候，说不行，一定要上纲，一定要上线，结果就附加上去了。有些事情，材料可能是一段一段的，事实本身也是一段一段的，可是从当时看起来，说不通。这样的推测，那样的估计就来了，好像这样一串才能说得通，其实这都是属于臆想的联系。一定不要用臆想的联系来代替事实的联系，如果确实事实有三件，查清了两件，还有一件没有查清楚，那就老老实实地给本人讲清楚，你有两件事情查清了，还有一件没有查清。给

群众也讲清楚。这样老老实实的态度，我们一定要做到。

这次复查也好，清查也好，不要留后遗症。经过这次清查和复查的工作，把过去的问题，包括这次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的问题，都如实地把材料摆在那里，搞清楚，不要过了两年三年以后，又来复查一遍，那样耗费的时间太多，本人精神负担也太大。我们希望这次复查以后，五百多个同志也好，曾经被当作“五·一六”审查的同志也好，这次被清查的对象也好，不搞另外的附加，他的事情是个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目前这个阶段就是把每一件材料搞确实，实实在在，几十年以后不需要重新搞复查。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对那些需要进行批判的人，他愿意检查什么就检查什么，不强迫他们说违心的话。通过这次复查工作，在同志之间一定要造成一种空气，造成一种环境，尽管是重大的原则斗争，尽管是对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其他同志都应该用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来严肃地批评他、帮助他。不强迫任何同志说违心的话，认识到什么程度就讲到什么程度，没认识到就等待，等一年也可以，两年也可以，等他一辈子也可以。共产党员老是说违心的话，说明党的生活不正常，同志关系不正常，以后再也不要这样搞了。

我们这次复查工作要做的事情很多，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不同观点的同志要团结起来，排除任何派性干扰，从党性出发，从大局出发。这是搞好复查工作的基本环节。

注 释

- 【1】 所谓“两个估计”出自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这个《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纪要》里讲了“两个估计”，即认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在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中否定和批判了这“两个估计”。

城乡经济发展的两种新趋势^{*}

(一九七八年六月六日)

随着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的逐步现代化,可以预料到,我国城乡在经济互助方面将会有两个新的变化,也可以说是两种新的发展趋势。

第一个变化是,农副产品的加工将逐步由城市转向农村。

由于我国生产力落后,特别是农村生产力落后,目前农副产品的加工工业主要集中在城市。为了满足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还必须充分发挥城市现有加工工业的能力,乃至继续发展城市加工工业的能力,继续做好农副产品的收购工作,以保证城市加工业的原料供应。忽视或放松这方面的工作,是不对的。但是,必须看到,随着农业生产现代化的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产量的大大增加,以及社队企业的兴起,农村就地加工农副产品的现代化加工工业必然愈来愈得到发展,城市加工业的比重将愈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组的谈话。

来愈小。这样，农村剩余的劳动力可以就地消化，不必再涌向城市，同时也可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逐步实现农村城市化。

这种变化趋势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着手规划，并逐步实施。国家在计划建设商品粮生产基地、国营农牧场、各种经济作物生产基地的时候，应当同时安排这些基地的现代化加工工业，使这些基地真正成为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互相配合并协调发展的农业工业基地。同时，要有步骤地在不同农副产品集中产区的县社一级，建立不同产品的现代化加工工业；对农村社队的加工业，在不同大厂争原料的前提下，要为它们提供先进的设备、培育技术人员和工人，改变它们生产技术落后、原材料浪费大、产品质量不高的状况，使其向现代化生产发展。

第二个变化是，轻工业所需的原料，将逐步由农业原料为主转向以工业原料为主。

我国轻工业生产落后，目前所需的原料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来自农副产品。今后，随着工业现代化的发展，有些轻工业的原料还必须靠农副产品，如棉、毛、丝、茶、皮张等。对这些产品，还必须有计划地发展，忽视或放松这方面的努力是不对的。但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轻工业发展所需的原料，来自重工业部门的比重将愈来愈大。特别是化纤、塑料、电子工业的发展，将给轻工业提供更多的原料，开辟许多新的轻工业部门，生产更多的、丰富多彩的、价廉物美的轻工业产品。这样，国家可以有更多的产品同农民进行交

换、供应城市，更好地满足城乡的需要，丰富城乡的生活。

我们要适应这种变化，并采取积极步骤促进这种变化。国家在十年规划中对轻工业的发展已做了适当安排，在着重抓好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以重工业提供原料的轻工业品的生产，重点是大幅度增产化纤、塑料、其他化工原料和电子产品。到一九八五年，重工业向轻工业提供的原料，将由现在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增加到一半以上。

随着这两个变化的发展，还将出现一种趋势，就是在人民消费品构成中，吃的东西占很大比重的现状将有所改变，有可能由吃、穿、用的次序逐步改变为用、穿、吃的次序。

应当说，我们已经面临着这样两种变化趋势。当然，这种变化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而是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现的历史过程。有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可能早实现，一些经济落后的地区可能晚实现。但是，实现这两个变化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财贸部门要会同工业部门一道，积极创造条件，做好工作，促进这两个变化的逐步实现。

适应这两个变化，重工业以现代化的设备和技术来改造农业和轻工业，就增加了新的内容。对农业和农村来说，不仅要为它们提供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资料，而且要提供现代化的农副产品加工工业的机器设备。对轻工业来说，不仅要为它们提供现代化的技术装备，而且要提供大量的原料。这样的城乡互助搞好了，这样的工农结合搞好了，才能使我

们的工农联盟在经过了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化之后，进入实现农业机械化、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阶段。

适应这两个变化，我国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将比现在大大发展。农业内部专业化和协作发展了，它们之间的交换也需要发展。工业内部生产各种商品的专业化和协作发展了，它们之间的交换也需要发展。在我国，不仅消费品是商品，而且供应给集体经济组织的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加工工业的生产资料也是商品。这些商品的生产发展了，交换也需要发展。总之，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各个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之间，商品交换需要大大发展，供应给城乡人民的消费品数量也要大大增加。

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我们必须克服很多同志头脑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的小生产者的思想。有这种思想的人，满足于自给自足，看不到分工和交换的进步作用，看不到分工和交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表现。这种思想同社会主义大农业，同四个现代化是互相抵触的，是互不相容的。

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我们要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在工农业品的交换中逐步缩小剪刀差，贯彻执行等价交换的原则。商业部门应当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协同物价管理机关，合理规定工农产品的比价，逐步降低向农村提供的各种生产资料的价格，合理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应当看到，价

格问题是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的问题。调整价格,就是调整工人和农民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这是一个必须严肃谨慎地对待的问题。这项工作做好了,既有利于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又有利于发挥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工人高兴,农民高兴,大家喜气洋洋搞建设,各项事业就会高速度地向前发展。

“四人帮”猖狂反对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把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混同起来,把社会主义商品交换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换混同起来,胡说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会产生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他们把我国工人、农民和财贸工作人员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说成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土壤和条件”,甚至骂我们的商业部是“垄断资产阶级”,骂我们的外贸部是“买办资产阶级”。按照“四人帮”的反动主张,我们就只有退回到极端落后的宗法的自然经济中去。这样一来,还谈得上什么生产力的发展,还谈得上什么现代化,还谈得上什么社会主义!反对商品生产,必然否定价值规律。“四人帮”公然鼓吹限制等价交换原则,这就是说可以实行不等价交换的原则。不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实行等价交换,意味着什么呢?那就必然破坏工农联盟,导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瓦解。

真理标准的讨论需向 经济领域延伸*

(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七日)

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按照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办事的。这是很好的。第二种人，尽管口头上也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却往往忘记、背弃甚至反对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第三种人，他们不但自己背弃和反对实事求是，而且反对别人实事求是。他们认为，只要不是照抄照转照搬，当收发室，就是犯了弥天大罪。我们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同志，应该支持、遵循哪一种态度呢？我想，大家都会赞成实事求是。我们的一切研究工作，都应该遵照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在这个问题上有动摇，我们很多事情就无法前进。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讨论会上的讲话。

《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后，引起了一些议论。后来《解放军报》又发表了长篇文章，对前一篇文章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对不赞成这篇文章的看法进行了商讨和批评。我个人是完全同意这两篇文章的。反对这篇文章的同志责问说：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说法，党的十一大路线岂不是还不能当作真理，而要等到四个现代化实现了才是真理？！这种意见很值得讨论。列宁说：“真理是过程。人从主观的观念，经过‘实践’（和技术），走向客观真理。”【1】毛主席也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2】经过“文化大革命”，对于这些人所共知的道理，应当是比过去理解的更深刻一些了。如果认为我们可以停止在十一大已有的决议上，它的真理性不再需要实践的检验，不再需要补充和发展，那么真理岂不是就一次穷尽了吗？事实上，十一大以后就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五届人大会议，作了许多重大的决定。而五届人大以后才几个月的时间，在中央的工作日程上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重大问题。如果我们不接触这些问题，不去分析并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而是仅仅满足和停止在已有的文件、结论上，那就不能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新任务。

说到这里，我想提一点建议。不少哲学研究工作的同志，比较习惯于就哲学问题来讨论哲学，进行一般的理论上的阐述、宣传。现在的问题是，形势要求我们，把哲学问题

的研究和探讨，同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中各种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更密切地结合起来，特别是要求哲学工作者同实际工作战线上的同志们合作，把真理标准的讨论推广开来，把其中体现的关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贯彻到我们的经济建设以及其他紧迫的工作中去。

最近，我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全国财贸双学大会，有机会接触一些经济工作的思想理论问题。这些问题，搞经济学的要研究，搞哲学的同志也需要去研究。例如，物质利益原则问题，就是一个被“四人帮”搞混乱了的问题。他们这伙人，拼命追求自身的物质利益，但是口头上或文字上却拿一套不食人间烟火的道理来教训别人，好像共产党人都应当是清教徒、苦行僧，说什么八亿人民生活苦一点没关系。“利益”二字成了忌讳，一提到它，就好像很卑贱。这个问题，很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阐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3】}我们共产党人坚持为工农劳动人民谋利益的革命功利主义，反对为一小撮人谋利益的反动的功利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建立在经济利益的基础上，离开经济利益去谈阶级斗争，是无法设想的。

我们要遵循历史唯物论，来区别不同阶级的功利主义。对各种物质利益要采取分析的态度，而绝不能谁讲物质利益就给谁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革命者是不回避物质利益

问题的。我们要调动、组织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当然要提高政治觉悟，但必须把提高思想觉悟和物质利益结合起来，而不是分隔开来。

邢台钢厂有五千工人，前几年厂里没认真实行按劳分配，干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甚至于多干不如少干，少干不如不干，不干不如捣蛋。结果，不得不雇三千多个临时工，干一天给一天工资。而有的正式工磨洋工，在工厂多少干一点，拿工厂的东西做小家具，或者到亲戚、朋友那里干私活。由此出现了怪现象：临时工干了正式工的活，而正式工却干临时工的活。

上海捕捞局多年亏损，前些日子还在亏损。最近实行了一种奖励办法，国家支出一万二千元，赚回来四十八万元。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都证明这样做，增加的收入比支出的奖金多得多。由此可见，政治工作要做，但是政治工作如果不同物质利益结合起来，很难收到显著的成效。许多问题摆在我们搞理论工作的同志面前，应该给予回答。

毛主席讲，哲学工作者要走出书斋，走出课堂，到现实生活中去接触实际问题，分析实际问题。这样做，我们的研究工作就生动、活泼了，写的文章就能为广大群众所欢迎和接受了。这次财贸会议重申了一条，实现政治领导和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是统一的。究竟什么是经济规律？政治如何集中反映无产阶级的根本经济利益，如何体现经济发展的要求，这里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在经济规律中，有个价值规律的问题。价值规律如何在客观上起作用，如何加以利

用，以便加强我们的经济核算、改善管理等等，这些都需要很好研究。我们的财政管理制度还是沿用过去的，企业需要的投资和流动资金由国家拨给，企业的收入统统交给国家，企业的支出和收入是不挂钩的，企业亏损的包袱是由国家去背的。这种情况所造成的普遍现象，就是企业向国家要的愈多愈好，至于如何运用就不用心多管了。我们今年的财政情况很好。但是，在很好的情况下，也还有一部分企业亏损，甚至有一部分企业增加亏损，这就涉及到了经济规律问题。本来，工人工资一定要按劳分配，而实际分配上搞的是平均主义。经营管理好的企业和经营管理不好的一个样，企业亏损的和盈利的一个样。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改变。要按经济效益实行奖惩制度。企业经营得好的、有盈利的，可以得到企业基金；亏损的、经营得不好的，就得不到企业基金，而且还要承担财政上、经济上的责任。对管理干部也要进行考核，实行奖惩。这些，都是关系到今后能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最近，我们也讨论到引用国际先进技术、先进设备的问题。国内生产潜力很大，引进国际先进技术的规模，比原来的设想要大得多。跟着提出了一个问题，利用外资。最近有一批同志出国考察，跟外国的一些企业负责人、资本家接触，他们都向我们提出，不但愿意给我们提供先进设备、先进技术，还愿意提供一部分资金，就是把钱存在我们的银行里，由我们支付利息。据到国外考察的同志讲，日本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工业生产水平同我们差不多。他们用十几年

时间达到了现代化水平。我们如果方针对了，工作对了，能够适应新的情况，能不能也用不太长的时间实现一个较大的发展呢？现在，中央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我们搞得不好，就很有希望；搞得不好，安于现状，不敢解放思想，不研究新的问题，不采取新的步骤，很可能到本世纪末仍然在落后的位置上打转。

过去二十八年的历史证明，只要路线对头、方针对头、办法对头，就可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们有不少好的经验，也有反面教训，现在和今后还会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理论工作者积极研究和探索。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的。这也表明，我们在理论上已经达到的东西，已经为过去的实践检验过的东西，还需要在新的实践中继续进行检验、修正、补充和发展。落后的国家赶上发达的国家，必须学习别人的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都讲过这个道理。可是，具体政策、具体方针还要结合新的国际国内环境去补充、发展乃至重新制定。上面讲的引进外国的资金和先进技术问题就是一个例子。一九七二年以前，帝国主义和苏联封锁我们，给我们造成很大困难。一九七二年我们进入联合国以后，和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的关系打开了，国际环境不同了。毛主席在一九七三年作出决定，引进一些外国先进设备。可是，那时没有利用外资的条件。随着情况的变化，在实践中新问题会层出不穷。我们必须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研究新的问题，解决新的问题。这无论对实际工作的同

志和对理论工作的同志都是极为重要的。

注 释

- 【1】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版，第215页。
- 【2】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第273页。
- 【3】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第821页。

阶级斗争同 物质利益的关系*

(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

阶级斗争同物质利益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和“四人帮”歪曲了、搞乱了。林彪的所谓“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是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指示相对立的。那么多念念不忘，惟独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共产党员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忘得干干净净。“四人帮”全面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特别是歪曲和篡改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他们是一不讲“要安定团结”，二不讲“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九七五年，李先念同志建议《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社论。社论稿送到姚文元那里，被压了下来。“四人帮”讲的所谓无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铁道部党校所作的报告。

产阶级专政理论,根本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们编的《毛主席语录》,凡是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是要发展生产、不断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地方,就一律删掉,剩下的就是一个阶级斗争。张春桥说,他只管上层建筑,对物质是没有兴趣的,八亿人民都要搞上层建筑,生活苦一点也没有关系。这种理论,把阶级斗争同物质利益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就是所谓只要阶级斗争搞得好,颗粒无收也没有关系,真是荒唐到了顶点。全国如果按照他们这套理论办,只能搞到人民没有饭吃。你要发展生产,他就说是“唯生产力论”;你要搞必要的规章制度,他就说是“管、卡、压”;你要给职工提级、提工资,他就说是培养工人贵族,分裂、腐蚀工人阶级队伍。总之,凡是涉及到物质利益的问题,他们都认为是“修正主义”就是了。他们自己怎么样呢?盗窃国库、巧取豪夺,骄奢淫逸到了极点。许多地方揭露的材料证明,“四人帮”的骨干多数都同时是盗窃犯、贪污犯、投机倒把犯,即所谓“双料货”。他们搞的“阶级斗争”,就是为了维护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利益,向全国人民的利益进攻。

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下,那些抓生产、关心人民生活的干部,被打成“走资派”。有些同志对此进行了斗争,有些同志也多少被弄糊涂了。现在,这个阶级斗争同物质利益关系的问题,还很有进一步澄清的必要。

今年五月,《人民日报》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一篇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根据五届人大报告

的精神写的。其中提出的具体措施，也是中央多次讨论决定的。李先念同志看过。小平同志看过多次，几次提出修改意见。文章提出，为了鼓励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可以发放奖金；对某些部门可以实行计件工资。文章发表以后，有的同志认为文章的观点是错误的，而且提得相当尖锐。所以，相当多的部门和单位，至今不敢实行奖金和计件工资。

这里，我想按照中央的方针，把我们过去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重新讲一讲。

讲五个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什么

《共产党宣言》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无产阶级、共产党所领导的运动，不是为少数人、而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这是同以前的一切运动的根本区别。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也论述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还指出：党和革命军队的成员，“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3】

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特别是在文艺座谈会期间，对

这个问题是曾经有过争论的。一些文化人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好像一讲利益，就是庸俗的，就玷污了艺术的高超。他们说，文艺为人民服务，是功利主义。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说：“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4】

共产党人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夺取政权以后，这个“最高标准”或“唯一宗旨”也没有改变。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提出“苏维埃加电气化”的口号。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的社会生产力获得重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5】要求我们继续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倦地工作。在我们的时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极大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这正如列宁说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根据科学的见解来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

配,也就是如何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应该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个真理。”【6】

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7】可以说,没有一个阶级不是为了争取自身的利益而生存、而斗争的。每个社会,包括没有阶级的社会和阶级社会,包括阶级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各种各样的剥削形式,它的一切经济关系总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经济关系,就是物质利益的关系。不能设想有什么离开物质利益的经济关系、离开物质利益的社会。列宁说:“根据俄国两次革命的经验特别深刻地知道,我国的内外政策归根结底是由我国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所决定的。这一原理是马克思主义者整个世界观的基础”【8】请注意,列宁这里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整个世界观的基础”。这就是说,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原则,不是可有可无,也不是时断时续、零零碎碎的,或是只表现在个别的、局部的问题上。共产党人的一切活动、一切斗争,实际上都是在根据不同的客观条件,采取一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争取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全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全部《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都像红线一样贯穿着这样的观点。

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所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说:“我们的第一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的东西。”还说: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还有许多同志的头脑没有变成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的头脑，他们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即只是向人民要这样那样的东西，粮呀，草呀，税呀，这样那样的动员工作呀；而不知道做另一方面的工作，即是用尽力量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提高文化。”【9】拿这个标准衡量我们的工作，应该说是做得很不够的。

剥削阶级善于伪装，善于制造一些谬论来骗人。他们把自己的所作所为说成是合理的、道德的、高尚的，似乎他们没有私利，他们是不要物质利益的“君子”、“雅人”，只有“小人”、“俗人”才谈利益。从孔子开始，剥削阶级及其思想家们，都有这样一套手法。列宁指出：“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10】可见，必须撕破剥削阶级的假面具，揭穿他们的阶级实质。

我国历史上的思想家中，就有人只讲“仁”不讲“利”，反对功利主义的。毛主席曾经通过对他们的批判，教育我们大家。毛主席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说，我们的许多同志“还没有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其所以还不懂得，或则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毛主席指出：“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

‘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不会被你伤着的。”【11】毛主席这段话，至今仍然对于我们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一九七五年，我们写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那篇文章中，引了毛主席的上述讲话。姚文元看后加了个批语，说是什么“恶毒攻击政治挂帅”。这就十分清楚“四人帮”心目中的“政治挂帅”，恰好是毛主席批判的离开经济工作而侈谈“革命”，实质就是“革”广大人民群众“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2】“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出了很大的丑。周总理走遍全国，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利益。他的心和人民群众连在一起。周总理逝世以后，亿万人民的悼念活动，就是对“四人帮”不顾人民死活的罪行而进行的一次群众性的、大规模的控诉和声讨。一九七五年，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要把生产搞上去，四个现代化的问题提上日程，开始制定十年规划，还准备给职工提级、提工资。国务院务虚会、铁路会议、钢铁会议以后，全国生产面貌改观，四、五、六月出现了很好的形势。到六月底，统计表上红字满篇。九、十月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次会后，全国农业生产出现高潮。一些在农村工作的同志说，有希望了，因为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反映了人民的利益。但是，“四人帮”出来猖狂反

扑，说这是“回潮”、“复辟”、“右倾翻案”，都是“正在走的走资派”的罪行，大搞“批判”，一批就是十来个月。人民对于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什么是前进，什么是倒退，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四人帮”用自己的言行，从反面教育和动员了人民起来打倒他们。

历史唯物论和历史唯心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作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最基本的关系。人类必须首先能够生存，能够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然后才谈得上从事其他各项活动。在任何社会形态下，人们都是为了实际的经济利益，结成一定的关系。恩格斯讲到马克思的两大贡献，一是唯物史观，一是剩余价值理论学说，都是用辩证唯物主义来分析不同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物质利益关系的。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教导人们，“为了‘阐明’历史，不要在思想的社会关系中而要在物质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基础”。【13】如果把意识形态当作历史发展的基础，就是历史唯心论。恩格斯说：“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14】

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在于表述并且从理论上说明我们眼前进行着的各社会阶级的斗争和经济利益的斗争，就在于具体地分析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和利益，看出阶级斗争是怎样围绕着一一定的物质利益发生并进行的，就是要坚定地站在人民群众一边，阐明维护和发展最广大的人民群

众的利益的有效途径。

“四人帮”在口头上标榜自己代表无产阶级，实际上是十足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他们把自己和自己的反动观念当作历史的动力和中心，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论者。

二、阶级斗争和物质利益

阶级斗争是由阶级间的互相对立引起的。但是，所谓阶级对立，其本来含义就是阶级利益的对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15】一部《资本论》，中心问题是分析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怎样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它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全部秘密所在。无产阶级要挣脱剥削，成为生产资料和自己劳动成果的主人，就必须进行革命。

恩格斯说：“迄今所发生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16】他还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及其斗争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的经济原因，“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行的，政治权利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17】

当然，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无产阶级斗争和经济主义者所领导的斗争不同。列宁认为，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经济主义者只在资产阶级统治允许的范围内搞政治斗争，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但是不去进行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

斗争；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无产阶级斗争，则超出资产阶级统治允许的范围，直接提出和实现夺取政权的任务。

那末，为什么要夺取政权呢？这是因为，只有夺取政权，才能使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得到保证。列宁说：“一般说来，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利益只能用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18】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正是要以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才能说得上解放一切被压迫的人们，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说，不是为了夺取政权而夺取政权；夺取政权的目的是为了摧毁旧的所有制，确立新的所有制，以保护和发展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夺取政权以后，用列宁的话来说，无产阶级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19】，它的“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利益，就是恢复大工业和大工业的巩固的经济基础，有了这些，无产阶级才能巩固自己的专政，才能不顾一切政治的和战争的困难，彻底实行专政。”【20】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必须镇压国内剥削阶级的反抗，击败侵略者的干涉。但是这些活动的目的，也还是为了使国民经济能够得到健康的、迅速的发展。

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任何革命都是围绕着一一定的物质利益和所有制关系而进行的观点完全正确。中国人民为什么要革命？还不是因为在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的压迫下活不下去，连衣食住行这样的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能保证？还不是为了用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代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所有制？老一代革命家和革命先烈含辛茹苦，英勇奋斗，直到牺牲生命，正是因为把自己的斗争，看作是为使劳动人民成为国家主人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的斗争。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土地革命时期，我们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搞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搞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并在一九四七年制定了“在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原则下，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中国土地法大纲》。通过这些政策，广大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紧密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毛主席说：“中国的苏维埃与红军，是从土地革命中生长与发展起来的。”“土地问题的解决，是支持长期战争的重大关节。”【21】如果不是给予各革命阶级、特别是给予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以实际的物质利益，不是为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斗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设想的。

“四人帮”鼓吹一种似乎与任何经济利益都没有联系的、“超然物外”的“阶级斗争”。但是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不是为了破坏广大人民的经济利益。例如，我们进口一些成套化肥设备，他们明明知道这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硬是一股劲地反对，攻击这是“洋奴哲学”。毛主席批准在大庆建一个化肥厂，他们说非拆掉不可。我们出口一点

石油，他们说是转嫁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其实，出口不过一千万吨，在国际贸易中占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一，怎么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转嫁到中国身上了？一九七五年，石化部搞成了任丘油田，他们又说这是为邓小平同志打退却战。还有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奇谈怪论。总之，挖无产阶级专政的墙脚，搞垮社会主义，这就是他们的“阶级斗争”的实质。

列宁说，面对某种政治口号，必须看它“对谁有利”。这在实际上是哪一阶级的物质利益的反映。对“四人帮”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干着反对马克思主义、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勾当，我们要坚决揭露。我们必须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自觉地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联系起来，使它真正成为为人民谋利益的手段。

三、领导的阶级和政党怎样才能实现领导

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这样，就发生了无产阶级怎样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来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问题。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2】列宁也说：“随着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须增多起来。”【23】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革命，可以像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这样，团结如此众多的人民群众。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阶级斗争和物质利益的关系的一个侧面。

毛主席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说：“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24】}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论在夺取政权以前和夺取政权以后，都是完全适用的。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东北工作。一九四六年五月，我到吉林省榆树县，恰好我军从长春撤下来，吕正操同志准备在松花江北岸设防，成立一个战地委员会，动员群众支援战争。我代表县委参加这个委员会。在去参加会的路上，发现老百姓对我们的队伍表示冷淡。看到这些情况，心里很难过。我们总还是一心一意帮助东北人民做好事的，为什么他们采取这个态度呢？后来看到毛主席关于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就清楚了。我们刚到东北，群众不了解我们。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十四年，人民是渴望解放的。国民党进去了，共产党也进去了。究竟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群众只能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来判断。毛主席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中指出，在一段时间里，“我党在东北工作的重心是群众工作”，“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

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那末，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反之，如果我们紧紧地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25】不久，中央又发出“五四”指示，要求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首先没收汉奸、大地主、大恶霸的土地。榆树县六十五万人，关里去的干部只有二十多个，有一个只有十七八岁，都叫老干部。我们这二十多个人，吸收当地的先进分子，组成工作队，动员群众，斗汉奸、大地主、大恶霸，分他们的土地，大刀阔斧地干了三个月。尽管工作很粗，还不能说达到了中央的要求，情况却是完全改变了。叫参军，动员多少人就来多少人；抬担架、出大车，要多少来多少；部队到哪里，那里的群众就拿出最好的黄豆大酱和酸菜，有的还拿出肉来热情招待。群众很快组织起来，好像一股伟大的力量，从地底下迸发出来一样。

还有个对待国民党军队的俘虏兵的问题。这些俘虏，只要一诉苦，一两天功夫，或几天时间，马上掉转枪口，成为解放军战士。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大多数是穷苦人，被国民党抓去强迫当兵的。经过我们的教育，而且实际地看到解放区地主阶级受到打击，贫下中农、中农的利益得到保护和发展的，他们很容易理解谁是正义的，谁是非正义的，枪口应当对准谁。

如果当时我们像“四人帮”鼓吹的那样，不顾人民死活，搞什么脱离人民的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可以肯定，解放战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正是因为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毛主席原来预计五年打倒蒋介石，结果三年半就把蒋家王朝推翻了。

战争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更是这样。战争时期还要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不打仗、搞建设了，倒要人民吃苦，什么“生活苦一点没有关系”，人民怎么能够通得过？

有同志算账，说从五十年代后期以来二十年中工人每月增加几角钱，农民每年增加几角钱，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多少提高。农民由于各种不合理的负担，再加上工农产品比价不合理，农业机械质量低等原因，吃亏不少，增产不增收。这样，农民还有什么积极性？所以，小平同志说，我们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很好，现在担心两个问题，一个农业拖后腿，一个工业管理水平低、技术水平低。要农业不拖后腿，最根本的是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中央已经把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改善农民生活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例如，准备提高以粮食为中心的农产品价格，明年实行。怎么降低工业品、特别是支农工业品的价格，提高质量，问题很大。这些问题解决了，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农业生产停滞的状况就能够改变。所有这些，归根到底都是物质利益问题。

我们要根据无产阶级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使人们各得其所。空话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我们共产党人要面对事实。应当承认,若干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由于我们工作中的问题,不少党员、干部在群从中的威望降低了。一般地说,人民群众是根据事实来判断周围的事物,决定自己的态度的。我们只有彻底揭批“四人帮”,恢复好的传统,树立好的作风,勤勤恳恳地为人民谋利益,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四、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关系

这个问题是讲人民内部几个方面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26】共同利益一旦形成,又同个人利益相区别。阶级的共同利益和阶级成员的个人利益之间,有时会发生矛盾。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四人帮”把人民内部的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说成是绝对不相容的东西,似乎要阶级的共同利益,就一定要全面否定个人利益;要个人利益,就一定要全面否定共同利益。这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和反人民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的共同利益,是个人利益的集

中，是高于个人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坚决反对那种放弃阶级的长远利益，只顾个人的或小集团的眼前利益的经济主义的立场。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时候，我们总是引导他们正确地处理个人利益和阶级的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在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自觉地使个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甚至牺牲个人利益。在某种情况下牺牲个人利益，是为了维护和发展共同利益，这样做，也还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个人利益。既然共同利益是由个人利益造成的，那么离开共同利益固然谈不上个人利益，离开个人利益也就无所谓共同利益了。阶级的共同利益，最后总是不能不体现为阶级成员的个人利益。无产阶级的解放，是无产者个人解放的前提。阶级不解放，个人怎么解放？但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又只能具体地表现为它的阶级成员的个人的解放。离开这种个人的解放，所谓阶级的解放，就成了空话。社会主义用于满足共同需要的产品，比如扩大再生产的产品，最后还要转化为满足劳动者个人需要的产品。否则，扩大再生产就没有意义了。拿积累和消费来讲，消费是个人利益，积累是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有了积累，才能盖工厂、办国营农场，发展国民经济。但是，产品产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整个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也还是为了满足人民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这就是说，否定了劳动者的个人利益，也就否定了劳动者的共同利益。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只能是维护少数人的个人利益，维护剥削阶级的共同利益。

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早期，资产者已经惊慌失措，纷

纷责难共产党人要消灭私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回答他们说：“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社会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可见，你们责备我们，原来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利，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利。”【27】他们明确地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生活的一种手段。”【28】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说：“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关心上面。共同讨论，专人负责。由于不会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每一步都吃到苦头。”【29】斯大林在《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时说：“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是不能撇开个人利益的。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给这种个人利益以最充分的满足”，“社会主义社会是保护个人利益的唯一可靠的保证。”【30】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也说：“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31】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说：我们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32】

违背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把国家的和集体的

利益,变成同劳动者个人利益相对抗的东西,必然会使劳动者失去发展社会生产、增加共同财富的积极性,使社会主义经济受到破坏。只有遵照这些原则,才能保证劳动者个人的利益和国家的、集体的利益都得到发展。

李先念同志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说,他当过多年财政部长。每次遇到增加工资,财政部门的干部就顾虑很多,说增加支出,会不会影响财政收支的平衡呀?据他的经验,实际上哪年增加工资哪年财政部就发大财。类似的材料很多。鞍钢有的生产部门,设备能力不能充分发挥。“四人帮”倒台以后,实行奖金制度,生产提高了,工人收入增加了,国家更大大增加了收入。上海多年来鲜鱼供应紧张,今年开始实行奖金制,市上活鱼多起来了,国家收入也增加了。一般说,工人得到的奖金毕竟是增产节约所得的小头,而国家得到的却是大头。当然,目前在具体工作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奖金的办法限制太死,只有综合奖没有单项奖,奖金的幅度不尽合理,有些老工人取消附加工资后,收入反而降低了,等等。看来需要及时研究解决。

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阶段,如果不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不充分考虑劳动者的个人利益,那末集体的、国家的共同利益就会落空。在这方面,我们有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四人帮”倒台以后,党中央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使得整个经济工作的面貌迅速改观。我们力量的源泉在人民群众中间。只要真正使国家、集体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使人民群众实际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

就无往而不胜。

五、政治挂帅和经济核算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治挂帅至少应当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发展社会主义。挂帅是否挂得起来，应当看实际上损害了社会主义还是巩固了社会主义。“四人帮”那种“政治挂帅”，使社会主义遭到破坏，同我们无产阶级政治是根本对立的。另一个是保证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结合。这里涉及到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问题。我们反对把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绝对化起来。我们的总的原则，是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全局，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在每一个问题、每一项工作上，要处理好这些关系，需要认真研究具体情况，真正使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所以，政治问题，归根到底也是个物质利益问题。

毛主席说，价值规律也好，经济核算也好，就是要学会算账。一九五九年，李先念同志在一篇文章中说：“经济核算是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方法，不注意经济核算就不能最合理最有效地管理经济，以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33】}所谓算账，就是计算物质利益，计算不同阶级的利益，计算人民内部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工业、农业各种措施实施的结果，产品的产量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质量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成本是高了还是低了？赢利是多了还是少了？劳动者的福利是改善了还是降低了？你给农民讲基本经济规律，他听不懂。但是你问他，你们公社今

年修水利花了多少工？当年能不能见效？合算不合算？工分值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社员家庭的收支情况怎么样？他们是很清楚的。只要认真地向周围群众做些调查，是可以找出确实可靠、用于决定政策的材料来的。

多年以来，流传着一种说法：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或者认为政治账是重要的，经济账不那么重要。我看需要把这种错误的观念彻底地纠正过来。我们搞经济建设，要算政治账，也要算经济账，而且要把算经济账作为算政治账的基础。从根本上说来，首先要算经济账。天天陶醉于你政治挂帅挂得好，就是不去考虑经济是上去了还是下来了，不去考虑国家、集体和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问题，不去考虑怎样使它们很好地结合起来，不断地增长，怎么实现四个现代化呢？

我们应该树立一个观念，就是一切路线、方针、政策、措施、方案、计划，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归根到底应当用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来进行检验，看看它实施的结果，国民经济是发展了还是停滞甚至倒退了，人民生活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今天，围绕阶级斗争和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同大家一道重温了一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若干基本观点。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在思想教育上大力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在经济政策上则要坚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并且逐步扩大集体福利。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只

要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这些基本观点和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我们的工作就一定可以搞好。

注 释

- 【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版，第250页。
- 【2】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第997页。
- 【3】 同上书，第990页。
- 【4】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第821页。
- 【5】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第1369页。
- 【6】 列宁：《在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385页。
- 【7】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版，第82页。
- 【8】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关于对外政策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339页。
- 【9】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467页。
- 【10】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446页。
- 【11】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465页。

- 【12】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103页。
- 【13】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130页。
- 【14】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423页。
- 【15】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120页。
- 【16】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110—111页。
- 【17】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246页。
- 【18】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262页注①。
- 【19】 列宁：《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 and 任务》。《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159页。
- 【20】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402页。
- 【21】 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版，第498页。
- 【22】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104页。
- 【23】 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146页。
- 【24】 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第1168页。
- 【25】 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第1076页。

-
- 【26】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275—276页。
- 【27】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267页。
- 【28】 同上书，第266页。
- 【29】 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51页。
- 【30】 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355页。
- 【31】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版，第272页。
- 【32】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版，第244页。
- 【33】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财政的伟大成就》，见《辉煌的十年》第357页。

严分敌我，加强团结， 发展科研事业^{*}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三日）

社会科学院是深受林彪、“四人帮”严重摧残和迫害的单位。姚文元等人都曾直接插手，进行过干扰和破坏活动，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粉碎“四人帮”后，社会科学院获得新生。广大党员和群众，在原临时党组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运动也发生过一些曲折。从去年年底开始，在新党组的领导下，遵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遵照邓小平同志、李先念同志对我院工作的重要指示，总结了前一段的经验教训，重新作了布置，使我院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和各项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院党组在今年二月提出了治院方针，要求做到加强团结，一致对敌，整顿作风，搞好科研。半年多来，我们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贯彻执行这个方针，主要做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揭批“四人帮”运动总结会上的报告。

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在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反革命罪行的基础上，集中地对他们炮制的“两个估计”进行了批判。摘掉了过去强加在学部头上的“封、资、修盘根错节”，“大、洋、古根深蒂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等大帽子；砸开了多年套在知识分子身上的精神枷锁，统一了党内外的思想认识，为开展清查和科研工作打下了较好的思想基础，同时也为审干复查工作的顺利进行扫除了思想障碍。

第二，在认真做好内查外调的基础上，对那些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了清查和批判。全院九个重点清查对象的问题，截至七月底已基本查清。此外，还有七位同志虽然不同程度地说过错话，做过错事，但经过调查没有发现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有什么牵连，因此除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帮助教育外，没有立案进行审查。

第三，抓了审干复查工作。通过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清理了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各种冤假错案。

通过复查落实政策，许多同志丢掉了思想包袱，纷纷表示，要拿出全部的革命热情，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第四，采取各种措施，初步调整、充实、加强了所一级的领导班子，为建立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的领导体制制作了一定的准备。同时，经中央批准，我们还筹建了新闻、南亚、世界政治、工业经济、农业经济、财贸物资等六

个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了充分发挥所的积极性，有利于科研工作的开展，我们还改进了领导体制，下放了一部分权力，以便于各研究所能够更主动地开展工作。

第五，以揭批“四人帮”为纲，推动了我院各项工作的全面开展。今年以来，我院各研究所都制订了本学科的科研工作规划，九月份召开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预备会议，动员和组织制订全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现在，我院恢复和创办了公开或内部发行的各种学术刊物十五种，举办了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等各种学术讨论会十一次，出版了社会科学著作十五种。随着各种学术活动的开展，在广大科研人员中钻研科学、探求真理的良好学术风气正在形成之中。为了培养新生力量，还筹办了研究生院，在全国各地招收了四百零四名研究生。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停止了十余年以后，现也正在逐步地恢复和开展起来。今年以来，除接待了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代表团等六个代表团以外，还派出了中国学术代表团等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为了更好地为科研服务，我院的后勤工作也得到了加强和改进。

经过以上工作，现在我院广大干部和群众，振奋了革命精神、解放了思想、鼓起了干劲，科研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都有较大的进展，形势很好。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开始出现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新局面。这是揭批“四人帮”运动的一个重大成果。

毛主席早在一九七四年就提出：还是以安定团结为好。几年来，几经曲折，现在终于在我们社会科学院出现了安定

团结的局面。我们曾经说过，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来看，安定团结同阶级斗争是完全一致的，决不要把安定团结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阶级斗争需要安定团结。有了安定团结，人民内部团结得愈好，团结的人愈多，愈有利于向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同时，安定团结搞好了，也就为深入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创造了条件。

一个单位安定团结的关键在于领导班子。院临时党组一九七七年在一些问题上曾发生过原则性的分歧，一度妨碍了全院的运动，在一段时间内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处于停顿的状态。这一分歧，根据中央的指示早已解决了。现在院党组成员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是团结一致的。这是对全院的团结带关键性的一件事。从各个研究所来看，领导班子的思想作风都有所改进。不少研究所的领导班子原来是不够团结的，经过这一段运动和初步调整充实，大多数研究所的领导班子已经出现了比较好的安定团结的局面。还有几个研究所情况也比过去好，但问题还比较多，正在逐步解决之中。这些单位的安定团结局面之所以还不够好，主要是因为领导班子中有些同志对过去的问题还认识不一致，还需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决不允许因为对过去问题的看法不一致而妨碍当前和今后的工作。在领导班子的会议上，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提倡进行深入的酝酿和讨论。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也允许保留。在下次会议上，还可以重新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请求讨论。但是，必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按少数服

从多数的原则办事。如果多数的意见与上级的决定有矛盾，应及时报告，经上级研究后，按上级的决定执行。不管是老干部、新干部，在行动上都必须执行集体的决议和上级的指示，不容许存在不服从组织决议的特殊人物。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是自愿入党的，都是自愿接受党的纪律约束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每个党员应尽的义务。党组织有权要求每个党员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有的同志在行动上不执行党的决议，不遵守党的纪律，轻则要进行批评，情节严重的要给予纪律处分。假如不是这样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我们的党就不能形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带领群众去完成我们面临的各项艰巨的任务，我们的工作就无法前进。

再从全院的广大同志来看，团结也增强了。热衷于搞资产阶级派性的人愈来愈少，市场愈来愈小，绝大多数同志强烈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以便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肃清他们的流毒，尽快把科研搞上去，多出成果，早出人才。

经过前个时期的清查运动，阶级阵线分清楚了，对于社会科学院的队伍状况，今天已经可以做出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估计了。这是我院揭批运动的另一个重大成果。

现在查明，社会科学院范围内的阶级敌人和坏人，约占全院总人数的百分之一。这是根据事实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非常重要。一方面，表明我们社会科学院确有坏人，有阶

级敌人，不仅有老的，而且有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他们人数虽然很少，然而危害很大。另一方面，清查的结果也表明，我院绝大多数人都是自己人，都是自己的同志。多年来的事实，特别是经过一九七六年严峻的阶级斗争的考验，证明我院绝大多数同志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

这个清查结果，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对林彪、“四人帮”肆意颠倒敌我关系、混淆阶级阵线的罪行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林彪、“四人帮”必然灭亡，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他们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为敌。我们有些同志在运动中犯错误，很重要的一条原因，还不是因为他们说话做事的时候，忽视了甚至完全忘记了我院这个基本状况吗？！

今年二月的时候，我们说这里的坏人、敌人不过百分之一二。这是因为，当时社会科学院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有待于进一步查清。经过半年来的清查工作，除了在押的五人和几个历史上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人以外，没有发现新的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人。在这次重大的斗争中，有些同志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有某些牵连，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或严重的错误，但是清查结果表明，他们的错误属于人民内部性质，他们不是“四人帮”的帮派体系骨干分子。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党组织和同志们的热忱帮助下都有了进步。这证明，党中央关于犯错误的同志大多数都是可以挽救的估计，是正确的。同时，这也是由于我们大家在清查工作中，坚决执行了中央规定的方针：“对于一切可以争取的犯了错误的人，要认真做好思想转化工

作，不要把他们推开。只有这样，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集中打击‘四人帮’及其一小撮罪行严重而又不肯悔改的死党。”我们这次对犯错误的同志，凡是经过帮助可以挽救的，可以拉过来的，决不把他们推过去。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讲，搞阶级斗争，最后是要消灭阶级斗争。革命的对象总是愈革愈少，总不能愈革愈多。林彪、“四人帮”肆意扩大打击面，疯狂地打击一大片，结果以害人开始，害己告终，自己受到了人民的审判，被历史所唾弃。

我们社会科学院今天实现了分清敌我、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确实很不容易，经过了一个痛苦的、反复的、曲折的斗争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十余年来我院广大同志逐步认清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面目的过程。为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达到分清大是大非、提高觉悟的目的，很有必要以揭批林彪、“四人帮”为纲，联系这一段的运动，回顾十多年来的经历，认真地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推动我们的揭批运动和科研工作。这件事，要依靠全院同志在下一个阶段的运动中共同来做，才能做好。下面，我们先提出五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首先要严分敌我。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毛主席还一再告诫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对敌人实行专政，不能对人民实行专

政。“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2】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使用了一个极其阴险、恶毒的反革命诡计，蓄意破坏和挑拨广大群众之间的团结，煽动资产阶级派性，制造分裂，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阶级阵线搅乱。我们社会科学院十多年来一个大教训，就是在分清敌我、对谁专政这个根本问题上受了林彪、“四人帮”的骗，上了当。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原哲学社会科学部，林彪、“四人帮”通过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把“封资修盘根错节”、“大、洋、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叛、特、反”、“保皇党”等大帽子一顶顶地压下来，每压一顶就打击了一大片，许多好人被当作敌人来反对。在林彪、“四人帮”、陈伯达煽动的极左思潮下面，不少同志受了影响，特别是有些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同志受了比较深的影响。林彪、“四人帮”、陈伯达这样干的目的，最终就是他们自己所说的“打着 B52 旗号打击 B52 力量”，主要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便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当时，林彪、“四人帮”、陈伯达及其一小撮死党，在原学部恶毒散布所谓“现在的矛盾是旧政府同新文革的矛盾”、“无产阶级司令部只有五个人，炮打其他人不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等。这一切充分说明，林彪、“四人帮”是一小撮以极左面目欺骗群众，打着“左”的旗号妄图篡夺党和国

家最高权力的最凶恶的敌人。

毛主席及时察觉了这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的罪恶行径，一再指出我们的干部当中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错误的，并于一九六七年提出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现在很清楚，林彪、“四人帮”、陈伯达及其一小撮死党才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才是反革命集团的组织者、操纵者。可是，当他们看到自己的阴谋将要被揭露了，立即摇身一变，贼喊捉贼地大搞清查所谓“五·一六”。陈伯达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所兜售的“组织是正品、罪行是副品”的谬论，在全国许多地方和单位包括原学部发生了很坏的影响。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把他们自己保护起来，转移斗争大方向，把罪责推到受蒙蔽、受欺骗甚至完全无辜的群众身上。其用心可谓毒矣！

对原学部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周总理曾作过一系列重要指示。周总理指出，清查工作“要两派都参加搞，要一分为二嘛，头子不好，群众是好的。青年是好的。”“你们都说‘五·一六’填的有表，而且还有证件，但是没有看到，我们有怀疑。……时间那么短，组织上能发展那么多，我们有点怀疑。”周总理的这些指示非常正确。但是，由于原军宣队负责同志没有认真领会和贯彻执行，在原学部出现了严重错误。现在看得很清楚，根子和原因完全在于林彪、“四人帮”、陈伯达的干扰和破坏。

毛主席早在一九六七年就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

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3】可是，由于林彪、“四人帮”、陈伯达一小撮进行挑动，本来是亲密的同志关系，本来是同志间的一些不同意见的分歧，竟变为水火不相容、势不两立的对抗关系，甚至敌我关系。在原学部两千人这样一个单位里，互相当做敌人来怀疑和对待的，做为反革命嫌疑分子进行审查的，加在一起何止几百人！回过头来看看，两类矛盾混淆到了如此严重地步，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这还不是痛苦的教训吗？我们同志平日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候，是拥护毛主席关于分清敌我的教导的，可是一接触实际就糊涂了。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而且相互都把对方当做敌人来整，整来整去，大都是整了自己同志。出现这样的状况，罪魁祸首是林彪、“四人帮”、陈伯达。同时，也说明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教导在我们头脑中还没有牢固生根，说明我们自身还有许多弱点，这也是应当正视和引以为戒的。

但是，我们还应该充分看到，我院绝大多数同志经过反反复复的教训，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在一九七六年“四人帮”猖獗的时候，大家对这伙反革命阴谋家、野心家的丑恶表演，无比愤慨。大敌当前，同志们毅然决然地抛弃了过去的成见和隔阂，坚定地走到一条战线上来了，大家团结一致地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团结一致地抵制“四人帮”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的行径。这种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发扬光大。

经过十多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在分清敌我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要牢记自己人总是大多数，阶级敌人总是极少数这么个道理，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共产党处在执政党的地位。阶级敌人要进行敌对的活动，往往总是在党内寻找代理人，利用合法的面目和地位，打着红旗反红旗，进行阴谋活动。这样，不可避免地会有一部分人因为种种原因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跟着跑，上当受骗，而形成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的错综复杂的局面。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当暗藏在党内的阶级敌人的头子被揪出来以后，原来一度跟着他跑的就是一批人。对待这些人应当怎么办？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必须慎重对待。首先要弄清是阴谋关系，还是工作关系；要分清是决策的，还是执行的。当问题的性质一时难以分清时，应当先当作人民内部问题来对待。不然的话，头脑一热，凡是沾了边的，都怀疑成敌我矛盾，当做敌人来打，那就势必把事情搞乱。“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多的革命老干部，他们几十年出生入死，流血流汗，可是在林彪、“四人帮”的煽动、破坏下，竟被当做敌人来对待和打倒，这是多么沉痛的教训呀！今后，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分别极少数坏人和大多数好人，既不要放掉敌人，又千万不能把自己的同志当做敌人去对待。即使是对待敌我性质的矛盾，也要讲究政策和策略，区别对待，决

不能痛快一时，乱打一气。

（二）决不允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问题。毛主席说，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消灭它；对人民、对同志要和，要团结。林彪、“四人帮”蓄意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和解决不同矛盾的方法，使用了对敌斗争的方法来对待我们的同志。更为严重的是，他们使用了对待敌人也不允许的方法，来对待我们的同志。

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4】这里极为严肃地告诫我们，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对待同志的缺点、错误时，有一个立场问题：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还是站在敌人的立场上？我们绝对不能站在敌人的立场上来对待自己的同志，把同志当敌人看待。

人民内部的斗争，党内斗争，历来是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留有余地。毛主席早就讲过：“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5】毛主席还说过，对于犯错误的人，“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首先要保护他，因为他不是反革命。”【6】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方针和态度，对同志全盘否定，残酷斗争，甚至敌我颠倒、落井下石，使他永世不得翻身，

那么我们自己就离开共产主义者的立场了。

林彪、“四人帮”及其党羽大肆散布所谓“只要路线对头，政策可以过头”、“大方向正确，方法错了也没有关系”等谬论，鼓吹“打人有理”，猖狂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煽动胡作非为，大搞打砸抢，随便抓人关人，大搞逼供信，大搞法西斯式的审讯，在精神上、肉体上折磨和虐待受审人员，制造许多错案、假案，后果极为严重。

林彪、“四人帮”这一套做法，在我们原学部是产生了严重影响的。回顾过去的十多年，当我们这里一部分群众反对另一部分群众、或者另一部分群众反对这一部分群众的时候，在林彪、“四人帮”的挑动下，有一些同志采用过对敌斗争也不允许的、完全违反党的政策的方法，把人往死里整。比如打人、体罚、肉刑、抄家、禁闭，搞折磨、虐待，搞逼、供、信，搞了许多假案错案。这样，不仅不能真正搞清问题，而且把问题搞乱了，造成了严重“内伤”。我们院里有些群众之间至今思想隔阂还那么大，结怨那么深，重要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人民的根本大法。我们一定要实行法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决不允许把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看成是一纸空文。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必须坚决维护人民法定的民主权利，必须是严格遵守宪法的模范。任意侵犯和破坏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是犯罪行为。党的政策就是党的生命。经验证明，我们在任何时候只要做出违反党的政策的事，就

必然要脱离群众，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林彪、“四人帮”搞的那一套整人手段，是封建法西斯的货色，给我们国家、民族造成的恶果极为深重。我们今后世世代代都一定要同这套货色彻底划清界限，决不能受他们的影响再那样干了。

（三）说话、办事一定要实事求是。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说话要有证据，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管开展党内斗争或进行对敌斗争，都要搞唯物论，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了我们党的理论基础和传统作风，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随心所欲地说假话、造谣言，攻其一点，无限夸大，大搞实用主义。林彪、“四人帮”的这套货色，在原学部是产生了很坏的影响的。

我们这次开展清查运动，既弄清了问题，又使被审查的多数人感到受到教育，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把清查工作建立在确实可靠的材料基础上。经过几个月的反复内查外调，对于被审查对象的问题，取得大量的人证、物证，而且反复核对，没有把握的材料去掉，决不随意作为根据。我们的态度是，有多少材料，就说多少话，有什么材料，就说什么话；说话要有分寸，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一切按事实的本来面貌来说话、办事。开会进行揭发批判时，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要凭空捏造的材料，不要道听途说的材料。我们认为，这种态度，对犯错误的同志，对反革命分子，都应该如此。

我们认为这样过细地做工作，严格的实事求是，搞出的

材料，做出的结论，才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能避免许许多多后遗症。我们现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首先就要在实事求是这个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问题上，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实事求是，就是唯物主义，它是我们做一切事情的根本态度和理论基础。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离开了实事求是，就一定会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我们一定要认真吸取教训，任何时候都要搞唯物论，搞调查研究，尊重事实；决不要搞虚假、搞浮夸、搞唯心主义。

（四）在判断一部著作、一篇作品是不是毒草的时候，一定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严格按照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衡量。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经过党的多年教育，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努力同工农兵相结合的。他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真理是拥护的，积极想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里更好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人们在探讨真理的过程中，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从认识论来讲，这是由于各人的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和认识规律所决定的。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了解，不是一眼就能看清楚的。认识真理的道路不是笔直的，而是曲折的。特别是对新事物、新问题、新规律的了解和掌握，从不知到知，从少到多，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更要有一个过程。同时，客观事物是不

断发展变化的，人们的思想认识往往要落后于事物的发展。因此，在实际生活中，对某个问题有的同志可能认识得早些，有的同志可能认识得晚些；同一个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看对了，在那个问题上看错了；有的人写了许多思想深刻、观点正确、论证精辟的好文章，有时又写了某些有错误甚至很错误的文章，这都是正常的现象，并不奇怪的。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探索过程中，不许失败，不许犯错误，这不是马列主义的态度。那种对待有某些缺点错误的著作和作品，撇开历史条件，不看主流和支流，不论问题性质，不分析原因，就把人家的东西上纲为毒草，一笔否定，一棍子打死，这是完全错误的，是扼杀科学事业的发展的。

毛主席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历来主张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毛主席早就指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又说：“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7】

林彪、“四人帮”搞文化专制主义，对于人们在精神领域的宝贵财富，对于许多著作和作品，乱戴帽子，乱打棍子，

动不动就宣判为“毒草”，有的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有的则完全是颠倒黑白，莫须有的诬陷。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这里有一例子，就是原学部委员翦伯赞同志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为《历史哲学教程》写了篇再版序言，文中热情地颂扬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但考虑到当时的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条件，有一句也提到了蒋介石。于是，戚本禹就抓住上纲为“吹捧蒋介石”。既是“吹捧蒋介石”，也就必然“反共”，翦伯赞同志在戚本禹等人笔下，一下子就被诬陷成“反共老手”了。翦伯赞同志当时完全被“四人帮”的党羽剥夺了申辩的权利，结果我党这样一个很有成就很有贡献的历史学家，就在“四人帮”的残酷打击下，含恨死去！

历史的经验告诫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凡属人民内部性质的问题，都应采取民主讨论的方法，有批评自由，也允许有反批评的自由。真理总是愈辩愈明的。在科学、艺术上我们更需要坚定地执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促进科学艺术的健康发展。我们社会科学院现在办的刊物、杂志不少，搞学术批评的同志不少，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如果搞得不恰当，它直接影响和破坏政治生活的民主和科学、文化、艺术的繁荣。

（五）我们看任何一项工作，做得好还是做得坏，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根本的判断标准、衡量标准，就看它最终对社会的物质生产是促进还是促退，是有利还是有害？毛主席早在《论联合政府》中就讲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

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8】毛主席提出的这个标准，对于我们所从事的每一项工作，原则上都是适用的。我们社会科学院这样的科学研究单位，搞政治运动，搞任何工作，搞的是好是坏，最根本的一个检验标准，也就是看科研搞得怎么样？能不能出又多又好的科学研究成果，出又红又专的科学研究人才。

科研人员要搞出又多又好的马列主义的科研成果，正如同工人要多出工业产品，农民要多打粮食一样，是自己最基本的任务。只有很好地完成这个基本的任务，才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真正尽了自己的责任。否则，什么阶级斗争，什么政治挂帅，都是空话。

周总理在一九七二年针对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就曾尖锐地指出，那种空洞、极端、形式主义地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他明确指出，运动和业务是连在一起的，不能分割，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也指示，政治要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要落实到业务上。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为了搞乱全国，根本不许谈政治落实到业务上。工人讽刺他们说：“政治挂帅，只好提在手里，因为哪里也放不下；只好挂在嘴上，因为到处都不能落实。”

林彪、“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把人们的思想搞得很乱，把生产和科学研究破坏得极其严重，在我们原学部造成的

损失是有目共睹的。这十几年单打一的所谓搞运动，被迫停止了科学研究，几乎什么科研成果也没有搞出来。一些不满意这种状况、有志于搞科研的同志，只能瞒着别人，偷偷地采取地下方式来进行。许许多多科研人员的宝贵时间浪费掉了，年龄越来越大，学业不仅没有多大长进，有些甚至荒疏了，这个教训还不深刻吗？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无产阶级的一个部分，和工人、农民共同担负着创造物质、精神财富的重大责任。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全国工人、农民都同我们一样，十年不做工、不种田，那将是怎样一种情景呢？马克思讲过：“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9】我们这一段搞清查运动，大家比较满意的一条就是运动、科研一起抓，坚持在六分之一的时间内搞运动，注重效果，不追求形式，结果运动进行了，科研也初步抓起来了。今后要继续注意这一条。

以上讲了五条经验教训，最根本的就是如何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在上面所说的阶级阵线分清楚了，敌我力量的对比是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九十九这件事，决不是什么简单的数字概念，也不只是单纯的清查工作总结。它对我们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是决定全局性的大事。我们常常讲要分清路线是非，什么是路线？最根本的就是对于社会的一切阶级力量的估计和配置。分清路线是非，首先要看阶级力量的估计和配置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就是说，要看看究竟依

靠谁，团结谁，争取谁，打击谁。毛主席的路线，就是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打击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我们揭批“四人帮”、总结工作，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是我们应该突出地抓住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分清敌我这个根本问题。把分清敌我这个根本问题搞清楚了，我们全院就有了加强团结、搞好科研和一切工作的最牢靠的基础。既然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自己人、自己同志，那么大家就应该紧密团结在一起，同仇敌忾地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就应该同心协力地向科学研究的高峰进军；“双百方针”也应该进一步得到切实贯彻。对于人民内部存在的意见和缺点、错误，就应该采取与对敌斗争全然不同的方法、步骤，坚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顾全大局，大家坐到一起来正确地加以解决。

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社会主义阶段的敌我关系，在各个方面都造成了许多恶果，首先是党受其害。由于他们的破坏所造成的党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这在我们院里也都是大家所深切感受到的。当前，增强党性，增强党的观念，增强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是搞好党的整顿和建设的重大问题。我们全院每个党员要自觉地在这些问题上严格要求自己。我们将认真进行酝酿和准备，以便在适当时候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进行整党整风。

我们院揭批林彪、“四人帮”的运动总的发展是健康的，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运动发展得不平衡，对林彪、“四人帮”反动谬论的批判还很不够，特别是怎么联系“四人帮”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几个方面的歪曲篡改，系统地进行批判不够，这些都要继续进行。

关于如何大力发展我院科研事业的问题，是大家都很关心的事情。最近，胡乔木同志在全国社会科学规划预备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希望全院各个单位认真学习和贯彻乔木同志的讲话精神，搞好各个学科和各所的科研规划，把科研工作抓紧抓好，为大力发展我国的社会科学事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注 释

- 【1】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第3页。
- 【2】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版，第366页。
- 【3】 《人民日报》1967年9月15日第1版。
- 【4】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第829页。
- 【5】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第309—310页。
- 【6】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版，第328页。
- 【7】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版，第388、391页。

-
- 【8】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第980页。
- 【9】 马克思：《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版，第541页。

访日归来谈经济*

(一九七九年二月)

一九七八年十月到十一月，我们到日本去考察了一个月。把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我们的经济现状作比较，感慨很深。集中起来讲，我们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干了一些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事，加上“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的破坏，经济发展延误了二十年。有的同志说，日本的经济也就是在这二十多年中发展起来的。此话有道理。今天向同志们介绍我的访日观感。需要声明一点的是，我们这次接触的主要是日本上层大资本家，没有接触工人，有些情况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性。

讲四个问题：一、总的观感；二、国民经济中的积累和消费问题；三、关于农、轻、重；四、价值规律和计划性。

一、总的观感

日本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一九七五年，二十年间经济发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干部会上的讲话。

展得很快,其中最快的是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〇年这十年。过去,我们有的同志说,日本只用了十三四年的时间就实现了高度现代化。实际上,在这之前还有五十年代的准备阶段,经过五六年的准备才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六年的二十二年中增长了四点八倍,工业生产发展最快的时期每五年增长一倍。这样的快速增长时期也就是三个五年。七十年代遇到石油危机,工业速度减慢,工业生产总值大约六七年增长一倍,到一九七三年占世界第三位。据说,一九七八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一万亿美元,超过苏联,仅次于美国,占世界第二位;按人口平均每人八千多美元,同美国接近。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大致是百分之八到十,有五年达到百分之十一,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长期保持第一位。工人平均的实际收入,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六年增长二点一倍,扣除物价上涨的因素,平均每人每年增长百分之六。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工资收入的增加,国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据日本朋友说,一九五〇年前后,日本国民生活非常困难,只能顾吃,有大米饭、咸菜、大酱汤,就很不错了;当时,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今天。有位日本翻译,出生在中国,日本投降后由中国工人抚养成人,一九六八年回国。他的月工资,一九六八年是八万日元,现在是三十二万元,十年增加三倍。现在日本普通工人的家庭,一般都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有一辆汽车,百分之九十五的家庭

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唱机、吸尘器、电器炊具等耐用消费品。农民的物质生活同城市工人没有多大差别。

我们访问了一家农户，九口人，四个劳动力，有三十亩地。十五亩地种水稻，年收入一百五十万日元；十五亩地种水果和蔬菜，年收入一千万日元，两项合计一千一百五十万日元，扣除成本，一年净收入八百多万日元。据他的邻居们讲，这户的收入属于中上等。他家有三部小汽车、三辆摩托车和全套的农业机械。有个县叫茨城，那里农民的生活最差，一个劳动力年收入一百五十多万日元，合人民币一万多元。日本人讲，一个农民同一个工人比，农民的收入不如工人多，但一个农民家庭和一个工人家庭比，收入接近。原因是，农民家庭的成员可以兼营其他。当然还有工农差别，农村青年仍然不安于在农村劳动，原因是农村的文化生活不如城市。

东京有个大百货公司，经营五十多万种规格品种商品。我们北京王府井的百货大楼在全国是最大的了，才经营两万两千多种，除了绸缎、工艺品销多些外，其他的如电器等耐用消费品没法同人家比。

产品丰富了，生活改善了，对人民的精神状态也是有影响的。据我们从表面观察，日本人的精神状态是好的。尽管遇到石油危机，困难不小，从资本家到工人还是振奋精神，努力工作，使它的产品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具有很大的竞争力。新日铁公司钢的生产能力是四千万吨，遇到不景气，开工率只有百分之七十。他们提出，要在减产的情况下，降低

成本，提高质量，增加盈利。去年果然实现了这个目标。这不仅靠资本家的策划和经营，更主要的是靠工人的努力。

日本朋友说，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发展，一靠天时，二靠地利，三靠人和。我们可以同它作一些比较。

日本除北海道稍冷以外，大部分地区气候很好，温差很小，没有什么暴冷暴热；雨量也调和，没有大旱大涝。这种自然条件，有利于农、林、牧、渔的发展。像日本这样的自然条件，中国有的是。日本面积三十七万平方公里，我们一个云南省就是三十九万平方公里。还有四川、贵州的一部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江苏等省，气候都同日本差不多。

讲地利，日本最有利的条件是四面环海，便于海运，便于发展造船业。可是受面积的限制，他们不得不搞填海工程，而且工业资源少，多数靠进口。我国的海岸线也很长，资源比日本丰富得多，而且很多尚未开发利用。外国人说，中国的矿产资源还处于睡眠状态。

讲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接受教训，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实行所谓“蛋糕政策”，就是一半给资本家，一半给工人。这个政策对日本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蛋糕”做大了，阶级矛盾确实缓和了。可是，它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企业倒闭年年发生。全国五十多万户企业，每年大约倒闭百分之三。我们在日本的时候，栃木县一家商店破产，全家九口人自杀，引起舆论震动。日本去年的失业人数比前年

增加。失业后的第一年有救济,前半年由企业发百分之八十的工资,以后就靠每月四万五千日元的社会救济,勉强维持吃饭。日本工人的退休年龄是男五十五岁、女五十岁。退休后,工龄长的最多可以一次拿三十三个月的工资,以后也只靠社会救济。日本男性就业容易,女性就业难。日本妇女结婚生了孩子后,企业和公司就不欢迎了,多半辞职搞家务劳动。日本人说,他们的办法比我们的双职工办法好。我不赞成这个主张。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是日本无法根本解决的。我们还不清楚他们剥削率的情况。不过已经不像《资本论》里说的那样,只靠压榨的办法,如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缩短工人寿命的办法来进行剥削了。而是采用新的方法、新的手段来进行剥削了。

从根本制度上讲,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比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一九五六年以前,我们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也曾明显地表现和发挥出来。工农业生产发展了,工人的工资逐年有所增加,农民的生活也逐年有所改善。一九六一年我到广东农村去做调查,农民讲起一九五六年来,都是眉飞色舞。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难忘的一九五六年。这说明,我们实现了生产的增长,也实现了工资的增长,亲身经历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时,五十年代到香港去的人又向国内流,因为国内生产建设发展,就业机会多,升学容易,生活有保障。

一九五八年，头脑发热，急于求成，违背客观规律办事，发动连续三年的“大跃进”，有的人还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结果事与愿违，遭受了很大损失，经济生活遇到很大困难，全国人民过了三年苦日子。之后，经过三年调整，经济才逐步恢复过来。李先念同志说：我们解放后将近三十年，真正扎扎实实地做工作，有两段。一段是恢复时期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八年光景；第二段是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合起来是十三年。

发动“文化大革命”，加上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不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而是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有些青年人，只看到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就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生怀疑，这是片面的。我们在旧中国生活过的人，亲自经历过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日月，看到新中国一天天好起来，体验过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看到林彪、“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果。从这个比较中得出一个结论：不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由于我们工作中存在缺点和错误，没有把事情办好。再加上林彪、“四人帮”这一伙阶级敌人的破坏，使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法发挥出来。现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林彪、“四人帮”被搞掉了，只要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奋发工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可以得到恢复和大大发展。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

二、国民经济中的积累和消费问题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生产是为了使资本家获得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或者说愈来愈多的利润。在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根本矛盾的情况下,日本资产阶级采取了一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为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竞争能力而共同努力。他们在企业里把这叫做“全员自主管理”。

在日本考察期间,几乎每个人讲到他们经济高度成长的时候,都要提到池田内阁一九六〇年提出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池田接受了一位经济学家的建议。那位经济学家是总结了英国工党政府失败的教训,提出这个建议的。战后初期,英国工党提出勒紧裤带恢复经济,因而不能发动人民的积极性,计划没能实现。那位经济学家认为,不能采取英国人的办法,必须制订一个计划,并且向全国人民讲清楚,这个计划实现以后,每人的收入可以增加一倍,资本家、工人、农民、职员收入都可以增加一倍。计划能否实现,和每个人都有密切关系。它吸引了全国人民,提前完成计划。大家的收入也果然成倍增长了。这个计划的实现,对于日本以后经济的高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日本执行池田计划,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的情况,很值得我们研究。资本家让工人的实际收入增加二点一倍,他们的积累是不是因此减少了呢?日本钢铁工业的投资,一九五

〇年到一九五五年,是一千二百八十二亿日元;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〇年,是六千二百五十五亿日元,比前五年增加将近四倍;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是一万一千三百八十亿日元,比第一个五年增加约八倍;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〇年,是二万三千二百二十九亿日元,比第一个五年增加约十八倍。这里有个物价上涨的因素,但可以看出,资本家的积累,比工人工资增长的速度快得多。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资本家分红和用于自己消费的部分。事实是,资本家增加了工人的工资,自己没有亏本,反而越赚越多。

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者相互统一,任何环节受到损害,其他环节都不能协调地发展,整个生产过程就无法顺利进行。这是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阐述过的、并为实践所验证了的。马克思讲过两种消费:一是生产的消费。没有生产的消费,就没有生产。不消费原料,不转动和磨损机器,有什么生产?一是生活的消费,这也是生产。没有生活的消费,连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都无法维持,更谈不上进行生产。这个问题,多年来我们处理得不好。生活的消费,无非是吃、穿、住、行、用,还包括科学、教育、体育、卫生,以及文化娱乐等等。在生活的消费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才能一有越来越好的身体,二有越来越广博的知识,三有越来越强的工作能力,四有越来越健康聪明的后代。这些就是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它有利于物质生产的发展,有利于资金积累的增加。不按这个道理办事,人的积极性就不能充分调动起来,即使靠政治口号一时调动起来,也不会持久。看来,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后，资本家比战前聪明多了。他们在想办法使工人增加知识，增进身体健康，提高工作能力。这在西方叫“智力投资”，在日本则叫“能力开发”。他们买机器、盖厂房，也下大本钱培养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这后一种投资，得益甚大。整个国民教育、科学研究事业，都属于“智力投资”。每个公司、企业，都为此投入大量资金。过去，资本家把工人当作机器的奴隶。现在，一些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主张不要让工人当机器的奴隶，而是使工人掌握科学技术。日本人的提法是，发挥职工的主动性。他们说，一个企业，如果是由优秀的工人、优秀的技术人员、优秀的管理人员组成的“优秀的技术集体”，那么它的产品质量最高，竞争能力最强，它在市场上将是难于打败的。

资本家和封建地主不同。资本主义社会，像《共产党宣言》说的，处在恒久的动荡之中，为了生存，为了竞争，就要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否则，一旦停滞下来，企业就会亏损和倒闭。因此，资本家事实上又不得不使工人掌握越来越多的技术和科学知识。地主阶级提倡愚民政策。资产阶级提出了普及国民教育的口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当为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而发展生产。和资本主义企业相比，我们的企业，更加应当成为由优秀的工人、优秀的技术人员、优秀的管理人员所组成的，技术上更加先进的、政治上觉悟很高的生产集体。

三、关于农、轻、重

资本主义国家搞工业化，搞农业现代化，是经过不同的阶段的。现在有些现象，马克思在自己的时代没有遇到，这就是用工业的积累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我们在日本考察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使农民大量破产，脱离生产资料，变为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斯大林说，我们搞工业化，不能走资本主义这条痛苦的道路，要搞农业集体化，使农民共同富裕，农业集体化要同工业化相适应。在集体化、工业化过程中，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压榨农民的政策。不过，他还是讲，农民要为工业化提供“贡纳”。去年以前，我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斯大林这个说法上。工业化靠农民“贡纳”，而且数量很大，时间很长。最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已经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争取逐步改变农民负担过重的情况。

我前面谈到的一户日本农民，水稻亩产不过六百多斤，萝卜、白菜也并不是长得很好。他种的一种类似白兰瓜的水果，价钱很贵，他用一千五百日元一个的价钱卖给批发商，到市场上零售就是二三千日元一个。就产量来说，他的三十几亩地和北京郊区的三十几亩地不相上下。上海郊区、广东一带，也许产量还高些。他的产品，一共可以卖到一千一百

五十万日元，约合人民币十万元。他用一年的收入，就可买齐全套农业机械。可见日本农产品价格高，工业品价格低。他们通过工业的积累，采取各种办法扶助农业的发展，包括发展农业科学研究、发放农业生产资料的低利贷款、支付某些农产品的高价补助，等等。例如，日本稻谷收购价格，就比出口价格高一倍到两倍。

从日本的经验看，实现农业现代化，不一定要土地连片。他们土地改革以后，每户不准占有大量土地，一般是一二公顷，现代化搞得很好。我们一个生产队一二百亩地，或者还要多些，为什么不能实现现代化，而要搞什么“穷过渡”，非搞成大队规模不可呢？还有，日本根本不花费大量劳动力平整土地，就是在过去多少年代搞成的梯田上实行机械作业。他们全国各地都被现代化的公路联结起来，交通运输很方便，电力供应很充分，水利能充分利用。农业机械小型、灵巧，适应当地条件。我们有些农田水利建设，一年上阵多少千万人，一部分很有成效，一部分却并没有收到应有的经济效果。

日本工资增长很快。如果没有生产的发展，只是增发钞票，那是毫无益处的。他们有越来越充分的日用消费品的供应。我们有些同志担心，增加工资，没有商品供应怎么办。其实，这正可以反过来促进我们多生产消费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日本没有轻工业这个概念，只有重工业、化学工业、制造工业等这些概念。很多消费品，我们叫日用商品，在他们那里都是重工业部门生产的。按我们的分类，丰田公司属

于重工业部门。它的产品卡车用于生产,大量的小车是生活消费品,因此它主要是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

我们的重工业部门,直到现在为止,只重视生产生产资料,不注重生产消费资料。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强,职工人数多,多少年照发工资,照发管理费用,没有利用自己的条件,生产国内市场和出口需要的各种消费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去年,中央已经要这些部门用一半左右的力量生产民用产品。生产的发展,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向重工业提出了新的任务。重工业为农业、轻工业服务应当有新的内容。否则,年年增加工资,农业不能很快搞上去,轻工业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就有发生通货膨胀的危险。

斯大林主张重工业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轻工业、改造农业。按照他的说法和我们的理解,就是由重工业为轻工业提供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为农业提供现代化的生产资料。根据日本和西欧一些国家的经验,看来不能停留在这个阶段。重工业还要为轻工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原料,如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等等。重工业本身也要提供消费品、首先是耐用消费品,这是重工业包括化工、机械工业向前发展中一个很重要而大有前途的任务,是重工业内部积累的一个广阔源泉。一定要认真改变重工业各部门只重视生产资料、不注重生产消费品的做法和观点。南斯拉夫有个经验,农产品在农村就地加工,农民得到农产品的收入,也得到农产品加工的收入。因此,重工业除了要为农业提供生产资料外,还要为农村提供农产品加工工业的现代化装备。总之,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我们的很多做法和观念都有必要相应地改变。

四、价值规律和计划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为各个企业内部的有组织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现在，日本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生产组织相当严密，生产的计划性，比马克思时代前进了很多。大型垄断公司，包括许多不同类型的单位，同样能够集中管理、高度统一、严格计划。他们靠的是认识和运用价值规律。他们的计划，叫做生产推销计划，这个用语反映了计划同市场的关系。计划从订货开始，到交货完成。没有订货，就从市场预测开始。日本每个公司、每个企业，都有广泛的情报组织，可以在几分钟内了解某一产品在世界各地的价格和市场需求情况。它们根据订货、市场预测，大体确定某一产品需要生产多少，在品种、规格、质量方面达到什么要求，什么时间交货。计划下到基层，再根据基层的意见进行修订和协调。这样有下有上，然后按照合同，投入生产。在生产线上，又有月度计划、周计划、甚至每天和每小时的计划。为了均衡生产，他们要求严格执行计划，不允许完不成，也不允许超额完成；不允许停工待料，也不允许节约材料而降低质量。每个企业同协作单位的关系，也有严格规定。每个企业都有一批“推销员”，而“采购员”相对来说少得多。企业

吸收大学生做管理人员，必须先当一两年“推销员”。许多企业没有仓库，丰田公司只有一天的库存材料。这就要求必须按规定的时间把一定数量、规格的材料和零部件送到指定的生产线。日本全国去年生产钢材一亿多吨，周转部分只有六百万吨。我们自己生产的和进口的钢材加在一起，不到三千万吨，而库存积压比他们多得多。

企业内部的计划，以价值规律为依据，充分考虑到供和求、产和销的结合。在这个范围内，计划性和价值规律并不相互排斥，而是协调一致的。对他们来说，不存在所谓按价值规律办事就无法计划、要计划就不能按价值规律办事的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战后的一些年，资本主义国家大量销毁产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现在，比较准确地进行市场预测，产品一般是能够适应市场需要的。企业之间、垄断集团之间，竞争很激烈，同时也出现了各种不同形式的调节。日本有个国际贸易促进会，是中小资本家的团体。它把许多同中国有联系的中小资本家组织起来，研究怎样和中国做生意，安排生产和销售额的分配。中日建交前，日本大企业组织了日中经济协会。我们这次考察，就是他们邀请和接待的。这个组织，在调节各个垄断集团之间的关系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例如，日本有五家钢铁公司卖给我们钢材，他们共同组织代表团同我们谈判，商量每家公司承担多少，确定价格的幅度。日本还有一个经济团体联合会，是各经济团体的全国性组织。他们自

己说,这个组织相当于日本的经济内阁,在垄断集团之间进行调节,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

除了民间组织,日本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对经济进行干预,办法之一,是制定经济指导计划。池田内阁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就属于经济指导计划。战后,日本政府做过八次计划。除两次因受石油危机的影响没有完成外,其他六次都完成了。政府制定计划之前,要找垄断集团的代表和学者征求意见。国家投资主要用于公用事业,如电力、公路、铁路、水利、地下管道、填海工程、港口码头、邮电,等等。资本家盖工厂、开商店、办旅馆,按价购买地皮。地皮的售价,包括了政府投资的各项建设费用在内。我们的做法是,投资建厂,什么都得工厂自己干。由于计划不周到,常常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地下管道挖了填、填了挖,电线架了拆、拆了架。这种情况到处可以看到。

日本政府的经济指导计划,不是作为行政命令下达的。它是采取经济的手段,来保证计划的实行。手段之一,叫经济立法。要办什么,怎么办,如何奖励,如何限制,都通过经济立法做出规定。其中包括税收,该发展的就低税,该限制的就高税;税收成为调节经济生活、执行计划的重要环节。也包括银行的信贷,国家银行和私人银行在日本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日本资本家的自有资金只占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十七,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从银行借来的。换句话说,十五元到十七元的本钱,可以做一百元的生意。另有一种说法是自有资金比上述比例大,但大部分资金从银

行借来，这是确实的。他们资金周转很快，流向也快。得知某个资本家要在什么地方办什么企业，银行往往主动上门贷款。银行也是各种各样的。开发投资银行，专门支援开辟新的生产部门，利息低，还有其他优惠条件。进出口贸易银行，专门扶助进出口贸易，特别为某些需要打开销路的产品进口和出口提供优惠条件。我们的银行，等着人家来存钱，借贷的项目也很少。日本银行的利率，是定期公布的。

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只在流通领域起调节作用，在生产领域不起调节作用。他所谓流通领域，只限于消费品，生产资料不算商品。他肯定社会主义社会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这是对的。但是，这个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是不是只限于消费品，还是应当包括生产资料？价值规律是不是只在流通领域，不在生产领域起调节作用，还是在这些领域中都起调节作用？我们的企业、部门乃至国家的计划，是不是应当以价值规律作为依据，或者充分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我们的计划体制、经济体制和工作方法，应当怎样遵守价值规律来促进生产的发展？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今后在实践中进行深入的探讨。

我们这次访日所闻所见不全面也不深入。资本主义社会有它腐败的东西。我们要学习的是他们的先进经验。共产党人不怕承认自己的缺点，不怕承认别人的优点。日本的确在不少方面有比我们先进的东西。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积累的一切文化、科学、技术的知识接受过来，变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日本经济取得的成

就，我们同样可以取得，而且可以更快地取得。这次考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这一信念。

商品经济的规律和计划*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

一

批判“四人帮”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一定要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谬论,是一个涉及整个国民经济能不能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是前进还是倒退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得到了初步的澄清。

但是不是说这个重大的问题已经搞得很清楚了呢?应该说,还没有搞清楚,或者说还没有搞得很清楚,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修改了《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贯彻这两个文件,直接涉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现在提到我们面前的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国家经委企业管理研究班作的报告。

经济体制改革,也直接涉及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问题。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该发展、还是应该缩小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果在理论上不讨论清楚,三中全会的文件就很难得到正确的贯彻。比如,搞集体副业究竟叫不叫资本主义?集市贸易、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是不是资本主义尾巴?按照“四人帮”的主张,这些都应该砍掉;按照党的政策,这些都应当得到保护。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大队,一个公社,完成了国家的征购、统购、派购任务之后,通过集市贸易或其他方式出售多余产品;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分出一部分劳动力去搞多种经营,这对农业的发展有好处,还是有害处?把这种社会分工发展所要求的做法,当作所谓“弃农经商”加以批判,究竟对不对?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志写了一篇关于社队工业的情况和问题的材料,说有些同志不赞成以工养农这种提法。看来,不能笼统地反对以工养农。很多真正搞得好的农村社队,就是因为发展了工业,积累了资金,用发展工业得到的资金来武装农业,既发展了工业又促进了农业,并且增加了社员的收入,成为它们经济全面发展的一个重大的力量。这样的以工养农,应该支持。搞多种经营,自然也要涉及是发展商品经济、还是缩小商品经济的问题。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了继续研究商品生产问题的必要性。

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八年就指出,我国的商品经济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但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少,甚至比印度还落后。我国的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

上,他们基本上过着半自给经济的生活。商品经济同自然经济相比,是个很大的进步。商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在历史上曾经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然经济有着长久历史,而且至今自然经济还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里。有的同志害怕商品经济,实际上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对生产高度社会化的畏惧心理。当然,商品经济代替自然经济的时候,会出现许多新问题。但是,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不应当是限制商品经济,而应当是有助于发展商品经济。有些同志却不这样做。他们不是去解决出现的问题,从而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是想方设法去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甚至企图恢复和巩固自然经济。例如,在工业中追求“大而全”、“小而全”;在农业中不根据当地具体条件实行必要的分工,这也种一点,那也种一点,企图“万事不求人”;轻视商业的思想更为普遍。这些都同害怕商品经济的心理有关。

我们所说的商品经济,既包括生产,也包括流通。发展商品经济,既要发展商品生产,也要发展商品流通。所以,应该考虑在发展工农业的同时,相应地发展商业。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同志在批转李先念同志的一篇报告时写道:工农商并举,提得很好,一定要这样做。贬低商业,商不挂帅,工农两业都不会发展的。多年来,我们没有很好地照这个意见办事,减少商店,减少服务行业,把从事商业和服务业的人员转到国营工业、街道工业上去。我们曾经说,要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作为一个方向,这个提法是对的。问题是,

我们在提出和实行这一口号时，很少考虑生产发展以后，商品交换要相应地发展，商业服务人员要相应地增加。不少大中城市，解放初期商店很多，现在是离很远才有一个。北京的大小饭馆、饭摊，一九四九年一万多个，一九七二年减少到六百多个。现在包括商亭、流动车，增加到一千多个，也还是很不够。日本全国从业人员四千三百多万，其中从事批发、零售商业的有一千二百多万，约占四分之一。我国的国家职工超过一亿，农业劳动力近三亿，共四亿。按照去年全国财贸大会时的统计，其中外贸、城乡商业、服务行业以及金融财政各条战线的职工共一千二百多万，在四亿中只占百分之三。当然，日本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较高，商品率很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比我们高得多，商业人员占的比重是要多一点，我们不能按照和日本同样的比例安排商业职工。可是，我们少到这种程度，究竟有利于生产的发展，还是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呢？城市买东西要排队，紧张的商品就排得更长。就算一个人每天排一小时，全国要用多少时间？由于顾客云集，商业人员劳动很紧张。尤其不合理的是，我们工厂的劳动力本来就多，商业人员又转到工厂去，不仅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劳动能力，而且使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也降低了。

总之，随着生产的发展，流通也应该相应地发展。多年来，我们不大注意生产和流通的关系。价值是在生产领域中创造出来，经过流通领域才能实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常识。但是，多年以来，我们的很多同志忘记了这

一点。结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价值虽然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了，但是由于流通过程不顺畅，使很多商品的价值不能实现，这样就根本谈不上经过加速价值的实现来促进生产的发展了。这种状况，同“四人帮”散布的谬论有关。但是，由于我们受到轻商思想的影响，对商业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我们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根据财贸小组的意见，曾提出一个口号：要理直气壮地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并且写过一些论述性的文章。但是，我们文章还没有涉及几个对我国现阶段经济的发展有重大意义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一个问题是，生产资料究竟是不是商品？是纳入商品流通好，还是继续实行调拨制度好？一个问题是，价值规律究竟是在什么范围内起作用，起的是什么样的作用？一个问题是，经济计划同价值规律究竟是什么关系？

下面，就想围绕这几个问题讲一些意见。

二

马克思曾经指出，任何社会都必须根据当时的生产条件，按比例地分配社会劳动。这是存在于各种社会形态的一个普遍规律。

原始人的氏族或部落，要以一定的劳动采集植物、捕鱼、狩猎，还要以一定的劳动寻找和开辟住处、缝制衣服，

等等。如果说，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生产规模极其狭小、人们的生活非常简陋的原始社会，尚且需要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何况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生产的门类越来越多，生产的各个环节越来越复杂，也就越来越要求按一定比例来分配社会劳动了。特别是到了以大机器生产为技术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又成为社会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社会经济得以正常发展的起码条件了。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具体些说，就是把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按比例地分配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

虽然任何社会都要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但是这种分配采取什么形式，在不同的社会中却是不一样的。正如马克思一八六八年七月十一日在写给路·库格曼的信中说的：

“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1】

在原始社会，是直接按劳动分配于各个方面，劳动在其自然形态上就是社会的职能，因此劳动不需要表现为价值，

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也不需要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2】当然，由于当时的社会分工很不发达，这种直接分配社会劳动的形式也是原始的。

商品生产的出现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商品生产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产生了。但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商品生产只是作为自然经济的补充而存在的。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由于商品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只是一种从属的东西，按比例分配劳动主要不是采取价值的形式。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大为发展了，特别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普遍化了，不仅劳动产品成为商品，连劳动力也成为商品，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就只能通过价值规律来进行。在那里，一个个的资本家都是按照自己的私利来进行活动的，他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是听凭市场价格自发波动的摆布。当一种商品求过于供、它的价格高于价值的时候，资本家便扩大这种商品的生产，用于生产这种商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便增加；反之，当一种商品供过于求、它的价格低于它的价值的时候，资本家便缩小这种商品的生产，用于生产这种商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就相对减少。价值规律正是通过商品价格经常地围绕着价值上下摆动，调节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劳动在生产和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这种状况，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3】“价值规律……作为盲目的自然规律起作用，并且是在生产的各种偶然变动中，维持着生产的社

会平衡。”【4】

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由整个社会掌握了全部生产资料后，社会劳动又在新的基础上采取和以往根本不同的形式进行分配。对此，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作过许多阐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是这样说的：

“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社会也无需给产品规定价值。生产一百平方米的布，譬如说需要一千工作小时，社会就不会用间接的和无意义的方法来表现这一简单的事实，说这一百平方米的布具有一千工作小时的价值。诚然，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必须知道，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5】

恩格斯说得很清楚。到那时，可以直接计算社会的需要以及为满足这种需要而生产各种产品的劳动时间，可以直接地按比例分配劳动，而不必借助于价值或者说交换价值。当然，这时直接分配社会劳动的形式，已经不同于原始的形式，而是一种高级的形式了。

为了完整地理解恩格斯这段话，需要提一下恩格斯为这段话加的小注：“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花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个注是不是和正文不一致呢？当然不是。因为第一，在商品经济中，产品的效用和劳动花费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价值就像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说的：“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6】如果不是商品经济，劳动花费就不具有价值的形式，效用和劳动花费的关系就不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关系。第二，一个事物的“余留”，并不等于该事物的本身。那么，是不是说恩格斯加的这个注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呢？那也不是。这个注指出了尽管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价值这个范畴不再适用了，但是“对效用和劳动花费的衡量”还是必需的。

三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是通过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自发地来调节社会劳动在生产各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劳动的分配比例也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自发地形成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谈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候说：

“在支配全社会的自发的无计划的分工中间，它确立了在个别工厂里组织起来的有计划的分工；在个体生产旁边出现了社会化的生产。”

“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经表现出来，并且愈来愈走向极端。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面：每一个别生产企业中的社会化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组织性。”【7】

恩格斯这些论述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别企业的生产是有计划的，而全社会的生产是无计划的；个别企业是有组织的，而整个社会生产则是无政府的。这种有计划和无计划、有组织和无政府同时并存，它们是互相对立的，又是互相统一的。个别企业的计划性和组织性越强，整个社会生产的无计划和无政府状态就越厉害。反过来说，整个社会生产的无计划和无政府状态越厉害，个别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避免倒闭、被淘汰，就越是要加强计划性和组织性。恩格斯在这里所阐述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全社会统一的计划，整个社会生产是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商品生产所固有的价值规律，就是在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中，并且通过无政府状态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在私人

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关系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8】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全社会的生产，就是这样在价值规律的调动下自发地进行的。

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又怎么样呢？一方面，资本家事先并不了解市场的确切需要，只有从商品价格的上涨和跌落中，才能预见社会需要什么和需要多少，并且以此为依据来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他生产出来的商品，只有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换，才能证实哪些商品能卖得出去，哪些卖不出去，哪些商品能赚钱，哪些不能赚钱，甚至要赔本。就这一点来说，资本家的生产是盲目进行的。另一方面，资本家为了赚钱发财，随时都在注视着市场的变动，并且通过行情预测，对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化进行精心的估计。为了在竞争中能够吃掉别人而不被别人吃掉，他们总是想方设法改善经营管理，合理安排生产，组织劳动力，采用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就这一点来说，资本家必须而且能够加强企业的计划性和组织性，竭力使自己的经济活动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而且，经过资本主义几百年来经营的实践，资本家在使自己的经济活动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盲目性减少了，自觉性提高了。这种情况，就像恩格斯所说的：“这些规律起初连这些生产者也不知道，只是由于长期的经验才逐渐被他们揭示出

来。”【9】

四

去年，国家经委代表团到日本考察企业管理问题。这次考察，使我们进一步懂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阐明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个别工厂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对立这个原理，仍然是正确的。当然，同当时的情况相比，现在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不只是企业、公司的计划性大大加强了，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整个生产和流通中，也有了某种程度的计划性。这就需要我们研究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事实，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对上述原理进行补充和发展，使它更加丰富起来。

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他们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恩格斯在晚年已经注意到新出现的垄断组织托拉斯的情况。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进行过透彻的分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时，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列宁指出：“大企业变得十分庞大，并且根据对大量材料的精确估计，有计划地取得数千万居民所必需的全部原料的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既然运送这些原料运送到最便利的生产地点（有时彼此相距数百里数千里）是有步骤地进行的；既然从原料的依次加工一直到制成许多种成品的

各个工序是由一个中心指挥的；既然这些产品分配给数千万数万万的消费者是按照一个计划进行的……那末很明显，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生产的社会化”。【10】

从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出版到现在，已经六十多年了。世界情况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社会化生产的矛盾仍然存在，而且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组织的规模更大了，集中的程度更高了。企业内部的计划性，比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比之列宁在世时，要严密得多，达到了很高的程度。现在不只是在企业内部进行有计划生产，垄断公司的内部也是有计划地安排生产。垄断组织的规模很大，跨国公司甚至可以把若干国家某些产品的生产垄断起来。这种垄断公司内部计划的科学性、准确性都很高。

拿日本公司的计划来说吧。日本各公司的计划，叫生产推销计划。我们的计划没有推销二字。他们计划指标的第一位数是销售总额，没有产值数字。用语的不同，反映了各自的实际。他们的计划，已经把生产和销售密不可分地结合起来了。计划从订货开始，以交付订货为计划的完成；如果无法确定订货状况，就从市场预测开始，以产品能不能销售、销售能不能赚钱来检验计划。计划要下达到基层，吸收基层的意见后进行修订，再签订合同正式投产。在生产线上，又有月、周甚至每天的计划。他们的计划，在数量、质量、规格等各方面要求都很严格，不准完不成，也不准超额。这是因为，现代化大生产是一环紧扣一环的，各个环节要保持平

衡，每种零部件少了不行，多了也不需要，而且会造成资金和原材料的积压。他们的许多企业没有仓库。丰田汽车公司至多只有一天的库存材料。这就要求必须按照规定的时间，把一定数量、规格的材料和零部件，送到指定的生产线上。送晚了要罚款，送早了也不行，要交仓库占用费。日本年产钢一亿多吨，据说用于周转的钢材只有六七百万吨左右。没有相当严密的计划，这是不能设想的。

日本的企业、各垄断公司之间，存在着剧烈的竞争，但也存在着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协商和调节的关系。比如，同中国有经济联系的两个组织，一个是由中小资本家组成的国际贸易促进会，一个是由一些大垄断公司组成的日中经济协会，就共同担负着协商同中国经济往来中调节所属各企业、各公司之间关系的任务。日本还有一个经济团体联合会，是各经济团体的全国性组织。这个组织在各垄断集团之间进行调节，对全国经济发展方针的确定有重要影响，被称为日本的“经济内阁”。

日本除了民间组织之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制定经济指导计划。战后，日本政府共下达过八次经济指导计划，除两次由于“石油危机”的影响没有完成外，其余都完成了。池田内阁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他们政府的计划，都不是作为行政命令下达，而是采取经济立法等手段，来保证付诸实施。

计划性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是现代化的大生产，没有计划非乱套不可。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提

供了先进的手段,使制定和实行比较严密的计划成为可能。现在,商品投入市场以后的命运如何,不仅可以预计,而且有时可以预计得相当准确。日本一些企业的人说,他们在世界各地的情报系统,可以在五分钟内,报告某一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和需求情况。在这方面,他们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据说,一个丸红公司,在这方面花的钱,相当于通产省全年的经费。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资本家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市场情况,认识生产和流通的某些规律,根据市场的需求组织生产和流通,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从日本的情况来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只一个企业、一个公司、一个垄断集团的内部的计划相当严密和相当科学,而且力求在整个社会的生产和流通领域中,也加强计划性。在他们那里,从一定意义上说,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和计划的调节作用是可以结合起来的,按价值规律办事和计划性并不是绝然对立、互相排斥的。

从根本上说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也不能不看到,由于我们在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方面存在不少问题,生产关系的一些环节同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再加上我们的许多同志还不善于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以致我们一些企业的计划反倒不如资本主义企业。在我们这里,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国家和人民生活迫切需要的产品,有生产能力,却不能很好地安排生产,或者计划安排了,不去按计划生产;许多产品又由于货不对路,质量太差,或者流通环节

的阻滞，而被大量地积压下来。例如，我们的钢材，库存量很大，而且还在继续增加。我国钢铁企业的生产规模比日本的新日铁公司还小些。新日铁生产能力为四千多万吨，我国去年钢产量是三千多万吨。日本有个口号，叫做“用户即上帝”，目的是为了打开销路。我们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制定生产计划的时候，更应该充分考虑用户的要求。生产搞得好不好，首先要听取用户的意见，由他们进行评判。应当看到，供需脱节、产销脱节，计划不能正确反映客观规律，不懂得在实际工作中把价值规律同计划调节结合起来，这是当前我们经济工作中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五

实行全社会的统一的计划，有两个必要的条件，一个是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一个是整个生产资料为全社会所有。

目前，某些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高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在企业、公司、垄断集团的内部，甚至在整个社会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相当广泛的方面，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计划性，但这并不是说，整个社会统一的经济计划，不必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就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实现。

我们不妨重温一下恩格斯那些至今还给予我们以深刻教益的论断。他说：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

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

“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再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

“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11】

这就是说，整个社会要在自觉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统一地、有计划地进行生产，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即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没有通过无产阶级的国家来组织社会生产的实践经验。他们是在资本主义得到发展、无产阶级自觉地登上政治舞台的情况下，根据当时能够认识到的历史发展规律，预想未来的社会的。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他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制定出非常具体的实施方案，而是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一些有严格科学依据的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资本主义，是把英国作为典型的。英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农业已经资本主义

化,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同土地相分离的过程已经完成,小农经济已经被资本主义大农场所代替。他们没有或很少涉及在农民占很大比重、生产还很不发展、经济还很落后的国家中,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后究竟应当怎样发展经济的问题。

沙皇俄国是经济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小农经济占优势。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实行了一段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种政策,主要是对经济采取带有某种军事性的手段,越过市场,由国家直接地进行产品的供应和分配。在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列宁认为继续这样做不行,果断地把战时共产主义改为新经济政策。同时,也改变了那种完全“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的做法。一方面,控制国家直接计划的范围,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把什么都统起来。当时,列宁曾经在一封信中尖锐地指出:“现在对我们来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他警告说:“不要追求这种空想。”【12】苏联从实行新经济政策到列宁逝世这几年,除了“全俄电气化计划”这个远景规划以外,没有实行包括全部国民经济的综合性的计划。另一方面,改变计划管理的方法,这就是一九二三年四月召开的俄共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所说的,要“经常警觉地适应市场情况和市场关系”。这个决议明确写道:“既然我们已经转而采取市场的经济形式,国家就一定要给各个企业在市场上从事经济活动的必要自由,而不希望用行政手段来代替它”;“大部分国营工业都组织成托拉斯,即组织

成享有广泛经济自治权的联合企业，它们作为交换单位自由出现在市场上。”【13】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发展了社会主义工业，实现了农业集体化，有计划地进行了经济建设。但是，苏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至少在理论上是忽视甚至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一九五二年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有保留地肯定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这本书中，斯大林对恩格斯的说法做了补充和发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旦全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斯大林认为，恩格斯指的是这样的国家：在那里，不仅在工业，而且在农业中，资本主义和生产集中都充分发达，以致可以把全国的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应该消除商品生产。但是，斯大林所面临的苏联的情况却不同，国家已经占有了比重相当大一批生产资料，同时大量的小农经济组成为集体经济，社会上存在着国有和集体这样两种所有制。在这种情况下，国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之间，除了进行商品交换以外，不应当有其他的经济联系的形式。所以，在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要有商品生产。有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就要起作用，那么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斯大林指出，那种认为商品生产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引导到而且一定会引导到资本主义的说法，是不对的。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存在的东西。社

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是特种的商品生产。它所涉及的,基本上都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者。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是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斯大林的这个论点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斯大林又认为,除小农具以外,生产资料都不是商品;价值规律在流通领域起调节作用,在生产领域只发生影响,不能够起调节作用,起调节作用的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而计划同价值规律又是互相矛盾的。按斯大林的说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是被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一规律的作用限制着的,也是被大致反映了这个规律的要求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限制着的。现在看起来,斯大林的这些提法,值得重新研究。

长期以来,我们受到斯大林上述观点的影响。我们五十年代的计划工作,学习和接受了苏联的经验,同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革命根据地的经验,陆续补充了一些自己的做法,但是作为计划工作体制来说,基本上也还是苏联那一套。苏联的那套做法,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现在也还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抛弃。但是,我们现在要解决国民经济中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要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并且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逐步实行经济体制的全面和重大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根据实践经验,对斯大林的上述观点重新加以考虑。我们应该不应该承认生产资料同样是商品、整个社会生产都是商品生产呢?与此相关,是否要承认价值规律在整

个生产领域都起调节作用呢？如果对于这些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那么我们的计划，包括企业计划、公司计划、部门计划、地区计划、国家计划，以及年度计划、长远计划等各种各样的计划，是否要以价值规律为依据呢？这是一些涉及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的大问题。看来，有必要对比我们和苏联的经验，对比我们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对比我们自己正确的和错误的经验，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看来，整个生产领域都应该进行商品生产。这就是说，不仅集体生产单位进行商品生产，国营生产单位也进行商品生产；不仅农业、轻工业应该进行商品生产，重工业也应该进行商品生产。消费资料是商品，生产资料也是商品。因此，价值规律不仅在流通领域，而且在整个生产领域都起调节作用。我们的计划工作，应该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以价值规律的要求为依据。我们现在说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究竟按照什么经济规律办事呢？有些同志认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这个提法，应当具体化，主要是按照商品经济的规律办事，按照价值规律办事。管理体制，经济政策，计划工作，都应该按照商品经济的规律办事。计划同价值规律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可以相互协调的。我同意这个意见。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价值规律自发发生作用的结果，必然引起一部分人破产，一部分人发财。我们按照价值规律办事，会不会同样导致这种状况，像“四人帮”所说的，按照价值规律办事，一定要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呢？这个问题，斯大林已经部分地回答了。

必须看到，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规律的作用之所以导致大鱼吃小鱼的现象，因为那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是以私人劳动为基础的。我们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可以不导致阶级分化，是有客观根据的。这就是，我们的所有制是公有制，我们的劳动者在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中从事的劳动是公共的劳动。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价值规律对生产起调节作用，可以使先进企业更先进，使落后企业采取措施赶上去。如果说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可以允许竞争的话，那就是先进和落后之间的竞争。我们通常说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也是为了推动落后赶上先进，先进更加先进。先进企业、先进部门的职工，生活应该好一些；落后企业、落后部门的职工，生活难免差一些，这是正常现象。这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只会有好处，而不会有坏处。

如果说，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调节作用是通过市场自发地实现的，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就具备了一个自觉地依据价值规律进行经济活动的有利条件。刚才讲过，在资本主义的日本，不同企业、不同垄断公司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但是它们之间也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协商和协调。这种协商和协调，当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然而毕竟可以使矛盾有所缓和。这对它们的生产的发展，明显地起到了促进的作用。资本主义能够自发地适应、或者在一

定程度上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调节生产，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程度上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使其和计划很好地结合起来调节生产呢？应该说，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六

我国现在的经济是商品经济，但又是很不发展的商品经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分工越来越细，生产越来越专业化，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而在存在不同的所有制，或者各个生产单位具有不同的经济利益的条件下，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发展，必然表现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发展商品经济，就要尊重商品经济的规律，按照价值规律办事，这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前提和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考虑对国民经济的调节采取两种形式，对全社会所必需的、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和建设，实行严格的计划调节，除此之外的，就通过市场去调节。实行严格计划的部分，同样是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同样必须正确地反映和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通过市场调节的部分，也要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政策，以及采取合同制、经济立法等手段，即按照经济的办法，去加以引导，使其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实行严格计划的部分如何正确地反映和适应价值规律

的要求呢?这里涉及到计划体制和计划方法的改革问题,其中包括计划指标的问题。例如,是否需要用销售总额来衡量企业经营成果的大小,就是有必要首先解决的问题。销售额是已经实现了的价值,那些由于规格品种不对路或质量低劣,生产出来就积压或者只能削价出售的产品,等于花费的劳动全部或部分不被社会所承认。把这部分劳动消耗不计入企业的经营成果,就迫使企业经常地了解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化,了解用户的要求,以销定产,以便产品能够及时地销售出去。同时,企业还必须努力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否则自己的产品就会比别的企业的产品质次价高,难以顺利销售。

要把销售总额作为主要指标,物价部门制订价格时必须以价值为基础。列宁说:“价值是价格的规律,即价格现象的概括表现。”^{【14】}商品的价格当然不能和价值绝对一致,而是经常围绕价值这个轴心上下摆动。如果人为地使价格过远地背离其价值,就是对价值规律的破坏,就会造成有的部门产品的价格大大高于价值,有的部门产品的价格远远地低于价值,这样企业的经营成果就得不到如实的表现。这当然不利于促进企业努力改善经营管理、想方设法降低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五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根据当时的情况采取了必要的计划措施,在陈云同志主持下,统一财政,稳定物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也还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

“三大改造”到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那个时候的计划是不是包罗万象呢？没有。是不是包括了全部经济生活呢？没有。不少小的建设项目和次要产品的生产指标都未列入国家计划，而是通过市场去调节。当时，国民经济中通过计划调节的部分，同通过市场调节的部分，是同时并存的。实行这个办法，不是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壮大，而是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壮大。过去的这个成功的经验，今天是不是仍然对我们有重要的意义呢？我们是不是有必要把这一点进一步明确起来呢？应该给予肯定的回答，并且把它明确起来。

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实行计划经济。但是，我们经济计划的范围，计划的科学性，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的。经过建设，我们的生产力是逐步地提高了，不过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水平。没有充分发展的生产力，没有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化的大生产，没有普遍应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就难以在全国范围实现严密的、科学的、包揽一切的计划。我国的现状是，从生产关系方面来说，还存在着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还有少量的作为社会主义经济附庸的个体经济，一句话，还远不是整个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从生产力方面来说，工农业不仅没有实现现代化，农业还没有实现机械化，广大农村还基本上是手工劳动。科学技术的落后更是十分明显。我国幅员辽阔，交通和通讯都不很发达，现代化的计算工具很少，基本上是靠算盘。我们应当老实地承认，我们的经济，还没有进到把全社会的生产无所不包地、准确地纳入计划的阶段，还没有进到“按照全社会和

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有计划的调节”的阶段。承认这个现实，才可能清醒地判断，在我们的经济中，哪些是可以计划和必须计划的，哪些是没有必要计划、难于计划、甚至不可能计划的。

我们经济中通过计划调节的部分，计划必须严格，力求准确无误；不列入计划、不用计划调节，而通过市场调节的部分，就应当放宽一点。这两个部分应当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由计划调节的部分，在整个商品经济中间，占着决定的、主导的地位，按种类来说可能不多，但从销售额的比重来说是大量的。由市场调节的部分，作为计划部分的补充，居于次要的地位，销售额的比重不大，但商品的种类、规格会是很多很多。我们必须正视中国经济直到现在仍然保有的一个基本特点，这就是，人口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农民，他们还过着半自给的生活。国家要把他们的生活都管起来，把他们的生产和消费全部包罗在国家的计划之内，是力不胜任的。我们的城乡是个统一的经济整体，农村的经济状况不能不对城市有所反映，加上城市本身的经济生活也是错综复杂的，因此对城市的生产和生活也不能全部都由国家管起来，不能统统通过国家计划来调节，而有相当多的产品要通过市场来调节。一定要什么都用国家计划管起来，就非出毛病不可。在当前生产力不够发展的情况下，采取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这样两种相辅相成的办法，以便繁荣经济，这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的。

当然，要真正分清和合理安排计划调节的部分和市场

调节的部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里有很多问题。例如，引用外资是不是应该由计划调节呢？我们允许外国人到中国投资，或者和外资合营、合办工厂，就是要搞国家资本主义，这些都应该由计划来调节。还有，如果农村社队除了按照合同向国家出售自己的产品之外，愿意出售多余的产品，国家是应该限制，还是应该鼓励呢？如果是加以鼓励的话，是要每个社队自己到各个口岸去推销产品，还是由国家组织适当的公司，采取适当的办法，来发挥它们的这种积极性，并且加以引导呢？如此等等。除了重大的政策性的问题以外，还有具体的组织安排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处理这些问题，有一个总的原则，就是在我们这里，全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和主要的经济活动是经过计划来调节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资本主义社会是根本不同的。

七

马克思指出：“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15】

现在，我们的商品生产虽然是公有制为主要的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但是商品交换双方或者是不同的所有者，或者是具有不同的经济利益，则是毫无疑义的。既然我们的整个生产都是商品生产，那么不论是由计划调节的部分还是由市

场调节的部分，都有一个生产单位究竟有权没有权和权利多大的问题。要搞商品生产，承认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起调节作用，又不承认企业在国家计划大框框内的自主权，不承认它们各自的物质利益，就是说，不承认它们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是不合逻辑的，那就只能是口头上承认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实际上却在否定它们。这不仅不会对经济发展起到任何有益的作用，反而会阻碍甚至破坏经济的发展。在这一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

过去我们讲分权集权、“块块”“条条”的问题，始终没有越出中央和地方权力的转移和分配的范围，没有越出中央和地方在企业的隶属关系的范围，体制改来改去，没有多少效果。现在看来，经济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要保证企业的自主权和物质利益。必须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经营主体，具有自主的权力，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一种意见，主张建立企业独立的经济核算制。也有一种意见，主张企业自负盈亏。究竟采取什么办法，要从实际出发，总结我国的经验，吸取其他国家的长处，慎重考虑。但是，不管怎么样，要保证企业的自主权和独立的物质利益，使价值规律能够真正在生产中起调节作用，以利于充分发挥它们的积极性，却是在经济改革中应当十分重视的问题。

我们过去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不过是计划工作和进行经济核算的一种工具。看来，这种观点需要加以改变。价值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16】决定价值

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劳动时间不就是价值。价值是“作为社会劳动力的消耗而存在的劳动的社会性”【17】，而不是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过程的具体劳动。列宁曾经明确说过：“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特定范畴的不是劳动，而只是劳动的社会形式，劳动的社会结构，换句话说，是人们在参加社会劳动方面彼此的关系。”【18】工具是人创造的，可以用也可以不用。如果不承认价值是一种经济关系，价值规律是这种经济关系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认为价值规律不过是一种工具，那就很容易导致主观随意性，在实际工作中违背甚至否定价值规律的作用。恩格斯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19】不承认价值是一种经济关系，把价值规律看成是工具，随意侵犯甚至根本否认各生产单位的经济利益，必然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后果。多年以来，我们在经济工作中发生“一平二调”的错误，普遍存在着“吃大锅饭”的现象，以及制订价格脱离价值为基础的做法，都直接或间接地同这种观点有关。

八

我们在前进中逐步感到，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有必要进行改革。但是，改革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朝一夕间能够完成的。对于经济改革，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要根据我国和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首先是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研究我们的措施、办法，分清我们哪些东西需要继续保

持和发扬，哪些东西首先必须改，哪些东西可以缓一步改；必须改而又条件成熟、容易改的，就抓紧改，条件尚未成熟的，就积极创造条件，待条件成熟以后再改。这是当前已经提上日程的问题。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上，应当允许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和做理论工作的同志提出各种各样的方案，真正来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充分交换意见，一定会形成若干比较符合实际的、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总结了国内国外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方案。比如，基本建设的资金，是继续坚持财政拨款的形式，还是改为通过投资公司、投资银行的贷款形式；利润上缴的制度，是不是改为税收制度；工资打入成本，还是在利润里进行分配；企业自有资金是不是改为银行的定额贷款，不同性质的贷款是否应当有不同的利息；折旧基金是不是应该全部留给企业，如果提取，按什么比例提取，企业拿多少，国家拿多少。顾名思义，折旧基金本来应该是用于企业设备更新的。但是，国家拿到后，一般是把它算作积累，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结果使企业的设备难以及时更新，只好拼老设备，年年吃老本。这种做法是不是应该改变呢？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很好地加以研究。而研究都应该围绕一个中心，就是保证企业的自主权，使企业能够独立地进行经济核算。与此相关，还必须把干部、职工的物质利益同企业经营成果直接联系起来，使得干部和职工真正从自己的切身利益来关心企业的经营成果和发展前途。

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是教育人民群众认清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并且的确使人民群众能够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得到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不解决物质利益的问题，企业的自主权就没有什么意义。在这方面，世界各国已经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经验。南斯拉夫的办法是，在原定工资标准的基础上，再规定职工的最低工资标准，如果所在的企业亏损，不管干部、职工，从厂长到工人，一律按这个标准发给最低的工资；改变亏损状况后，照发原定工资，而且企业经营状况改善得越多，每个干部和工人得到的好处就越多。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也比较注意从物质利益方面调动职员和工人的积极性。现在，不少资本家为了维护剥削制度并且获得更高的利润，力图使用各种办法，把职工的利益同企业的命运联结起来。日本的企业，在赢利的情況下，除工资外，一般一年分两次红，春天一次，秋天一次。每次分红，最少增发一个月的工资，多的增发三个月的工资，加上其他一些福利措施，使得职工比较关心企业能不能盈利，能不能发展。如果半年之内，不能保证有一次分红，不能多发一个月的工资，企业就要面临倒闭。日本人把这种办法叫做全员自主管理。他们还说，这是学习了我们的工人参加管理的经验。这些国家的这些经验，曾经对于它们的生产和发展的劳

动者生活的改善,在不同程度上发挥过积极的作用,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经验,更可以结合我们的情况,适当加以改进,学习过来。

九

我们赴日访问的许多同志有一个共同感觉,从最近二十多年的情况看来,就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进行一番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远不如日本快。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酷的事实。我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比日本的私有制优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主要是表现在能够容许生产力更迅速地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但是,把这种客观可能性变为现实,要经过人们的主观努力。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加上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我们的经济发展得不好,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显示出来。

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忽视和违背价值规律。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我们一定要进这个“学校”,一定要掌握价值规律这门学问,按此办事,使我们的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中央、地方、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等各方面的利益得到协调,从而推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发展。

日本人民热爱科学,努力学习和掌握各国的先进技术,埋头苦干,有强烈的事业心。我们中华民族也是以勤劳勇敢、艰苦奋斗著称于世的。但是,近些年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我们的一些干部和工人,得过且过,不求上进,精神很不振作。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当然有其制度固有的缺陷,这是我们所应当鄙弃的。但是,它的许多优点,特别是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展经济的一些经验,毫无疑问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有的日本人说,他们的人民,是高质量的人民。难道中国人民就不是高质量的人民吗?中国人民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备受摧残,我们的国家落后了。但是,我国人民那种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和辛勤劳动的精神,仍然焕发出耀目的光彩。新中国三十年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人民的努力,面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人民的创造性、主动性、积极性是不是已经充分发挥出来了呢?我们是不是应当前进得更快一些呢?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们干得不如日本人呢?这个痛心的事实,难道不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促进我们奋起吗?我们还不应当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恢复和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学习世界各国一切先进的东西,迎头赶上吗?

我们并不气馁,并不甘拜下风。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引,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应当、也完全可以干得比资本家好。要达到以上目标,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松松垮垮,懒懒散散,是绝对不行的。我们前

进的决心要大，步子要稳。重大事情的决定要十分慎重，要充分听取群众，包括专家的意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反复考虑各种方案。不要今天刮东风，明天刮西风，扭来扭去，大起大落。我们一定要无愧于党的教导和人民的信任，不怕艰难，努力工作，和人民一道，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而奋斗。

注 释

- 【1】 马克思：《马克思致路·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368页。
- 【2】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所加的一个小注中写道：“当加利阿尼说价值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时，他还应当补充一句：这是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1页）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又说：“‘价值’概念的确是以产品的‘交换’为前提的。在共同劳动的条件下，人们在其社会生产中的关系就不表现为‘物’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Ⅲ册，第139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固然已不是被物的外壳所掩盖了，但是只要还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人们交换活动就不能不采取物的形式，这种关系就不能不表现为“物”的“价值”。
- 【3】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394页。
- 【4】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版，第995页。
- 【5】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348页。

- 【6】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版，第605页。
- 【7】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309—313页。
- 【8】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92页。
- 【9】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312页。
- 【10】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844页。
- 【11】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323、319、320页。
- 【12】 列宁：《给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版，第473页。
- 【13】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60、262页。
- 【14】 列宁：《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194页。
- 【15】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96页。
- 【16】 恩格斯1895年3月在致威纳尔·桑巴特的信中，曾经批评他对于价值概念的叙述过于空泛，并且说，应该首先从历史上给予限定，“强调它只适用于能够谈得上价值的那个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即存在有商品交换，相应地也存在有商品生产的那些社会形态。原始共产主义不知道什么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4页）
- 【17】 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版，第420页。

-
- 【18】 列宁：《社会革命党人所复活的庸俗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版，第234页。
- 【19】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537页。

社会科学院恢复学术职称 评定制度*

(一九七九年四月七日)

社会科学院的基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这就需要有一套制度来保证。有没有一套正确的政策和制度,对于人才的培养和成果的提高关系很大。全院现在要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科研方面,为了使今年的工作比往年做得更好,院党组决定恢复学术职称制度,把定职升职工作作为今年上半年十二项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做好这次定职升职工作,有下面四点要求。

第一,所长、总支书记和各所的其他领导同志应该积极负责,把定职升职工作列入重要日程,亲自过问。

院党组、院部已经决定,实习研究员评为助理研究员,由所里负责,报院政治部平衡、备案;提升研究员,搞两审制:所里初评,院里终评;提升副研究员的大部分工作,也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定职升职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

要靠所里去做。

第二，要使这次定职升职工作有利于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科研上来，使其成为促进着重点转移的一个重大措施。

要通过这次定职升职，推动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工作走上轨道，使全院同志的积极性得到提高。评定以后，科研成果要越来越多，质量要越来越好。

第三，经过这次定职升职之后，要使社会科学院的学风有很大的进步。

我们所说的学风，就是理论和实践相联系，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学风。去年五月以来，全国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对于培养马克思主义的学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经过这次定职升职，要使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在社会科学院大大前进一步，使它逐步在每个同志身上很好地树立起来。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核心。经过这次评级，要使同志们知道，只有遵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才是做学问的正路。要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科学的态度就是老老实实，不是投机取巧、飘飘浮浮。搞科学是很艰苦的事。在科学研究方面要取得成就，决不是空喊几句口号、罗列几条政治术语，写一两篇人云亦云的文章所能达到的。科学的道路崎岖不平，即使是弄清一个历史实例，也要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不要因为困难，自己就泄气；正因为困难，才应当加倍努力。只有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不畏艰难险阻的人，才能够攀登科学的顶峰。学风问题，对于科学研究的成败至关重要。

出成果、出人才，是有标准的。独立的工作能力就是一个标准。独立的工作能力应该包括好的学风。我们要提升学风好的同志，也就是提升那些实事求是、不畏艰险、经过认真探索，在学术上有新的见解和有真才实学的同志。要帮助青年同志懂得一个道理：搞学问这件事情，不用功是没有希望的。有些人很聪明，一味地出风头，不扎实，在这个问题上吃了亏。另外一些人，在一个时期里，同那些聪明人相比，显得有点笨手笨脚，可是勤勤恳恳，埋头苦干，很有恒心。“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家一个小时干成的，他干十个小时，人家用十个小时能干成的，他用一百个小时。这种人，也许开始的一二年之内不如那些聪明人，但是多年之后，倒是这种人真正能搞出东西来。有人写的东西数量不少，但都是东抄西抄、人云亦云。另一种人，多年钻研一个问题，收集这个问题的材料应有尽有。如果让我来评，我投后面这种人的票，不投前面那种人的票。

应该提倡什么学风、纠正什么学风的问题，今年上半年，很值得在全体工作人员，包括政治工作人员，图书资料、科研辅助人员，后勤工作人员中，进行一番讨论。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是这次定职升职工作所要达到的一个基本目的。

第四，处理好几个关系。

提高和普及的关系。两者要兼顾，但是社会科学院的重点应该是提高。当然，是在现有基础上的提高，不是离开现在基础的提高。

现状和历史的关系。社会科学院应该首先研究现状。我

们去年上半年以前,对现状的问题顾虑比较多一点,无非是怕触动“禁区”。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在社会科学院,情况开始有了变化。现在,全党正在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社会科学院的很多所,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直接有关,要考虑怎样作出贡献。其他一些所,比如历史所、考古所,研究对象不是现代的问题,同样要考虑怎样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四个现代化,包括文化建设,包括总结全部人类历史的经验,包括批判地吸取一切过去时代的有益成果。

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一个机关就是一个集体。到社会科学院来工作,就是承认和加入了我们的集体,就应该把集体放在第一位。我们研究人员和旧社会的自由职业者不同。我们不抹杀个人的自由,在为党、为人民的目标下,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性。有些同志专业不对口,提出在所内、院内调动工作,甚至要求调出社会科学院。我们应当尽力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有的同志对某些问题有兴趣,也有研究能力,也应当允许他进行这种研究。但是,既然在社会科学院,在某个所、某个室、某个组里,就必须首先完成集体交给的任务。个人热衷研究的题目,可以提出申请,经过讨论,纳入集体的研究计划。不能只是在这里领工资、要房子,要这要那条件,不承担集体的研究任务,不遵守集体的工作纪律,只干自己想干的事情,这个道理说不通。

为了保证大集体小自由,我们实行一个办法:就是八小时用于集体,八小时以外的时间去搞自己愿意搞的事。这个

办法，以后要尽量坚持下来。当然，我们这种精神劳动，很难按照几小时来划分和检查，但是总可以定任务、定要求、定数量、定质量。一下子完全解决得很好有困难，但是逐步积累经验，总是可以找到办法的。

集体和个人的关系问题，要及时提出来。如果各人只去干各人的，小自由变成了大自由，那么这个室、这个所、这个院，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有个别同志不太遵守工作纪律，可能与他们急于求成有点关系。他们对怎么搞研究还没有经验，在这方面需要引导，需要讲清道理。要尊重个人的小自由，不要限得太死，但必须有一个大集体的前提，要维护大集体，共同把集体的事搞好。因此，这次评定工作，要把是否在集体研究中作出了贡献，作出了多大贡献，作为第一个内容。

如果我们注意并且正确地解决了上面讲的四个问题，我们这次的定职升职工作就是有成绩的。

开展对经济体制改革 问题的调查研究*

(一九七九年八月八日)

我就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讲点意见。

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以后，按照姚依林同志的意见，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五个经济研究所和国家经济机关的研究机构，共同承担了一个任务，就是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调查研究，提供材料和意见。接受任务以后，各单位的同志都感到很高兴。因为这可以使大家有机会协助财政经济委员会做点工作，对搞经济研究工作的同志来讲也是个推动。

我觉得，不论是就掌握的材料来说，还是就研究人员的状况来说，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都还存在一些问题。

从我在社会科学院接触到的经济研究工作的情况来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央办公厅组织的经济问题调查会上的讲话。

看，深深感到我们的学风要来个改造。过去，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研究工作长期陷于停顿。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整顿，研究工作逐步开展起来。但是，由于对实际情况不熟悉，有关经济机关提供的材料也不多，写文章，讲话往往是围绕书本兜圈子，从原则到原则，从概念到概念。去年我去日本考察，回国时路过香港，征求在香港工作的同志对社会科学院所办刊物的意见。他们说，经济研究刊物的缺点是没有数字。写经济方面的文章，没有数量的分析、比较，就没有说服力，尤其是研究现实的经济问题，不接触实际材料，光靠书本，是不会有创新的见解的。

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以来，各个经济部门提供的材料比较多了，有些过去认为是机密的材料也公开了。但是，经济研究者所得到的材料，大多不是当前的，而是过去的。这些材料，主要是说明历史，对研究今天和以后的问题，还是不够的。当然，知道过去，也可以预见将来。如果根据现实情况再参照过去的材料来进行预见，岂不是更科学吗？假如社会科学院的五个经济研究所，只掌握历史材料，要提出有预见性的研究成果来，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进行经济研究工作，一定要向前看，面对今天，面向将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按照这条路走下去，经济研究工作不仅能够了解过去，也能够了解现在；不仅是大体设想未来，也有可能对今后的发展提出一些真知灼见。我去年在日本考察时，曾经把日本的经济研究工作者和我们的经济研究工作者作了一番比较。就为谁服务这一点来说，他们

的绝大多数是为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社会服务的，我们是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我们比他们高尚。但是，就服务的质量来说，我们却比他们差得很远。他们的研究工作，对于他们社会的经济生活确实是有作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一般地说，对实际工作还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日本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专家中的许多人，在社会上很有声望，在资本家面前也很有权威。资本家经常向他们请教，他们甚至可以教训资本家。我亲耳听到著名的经济学家石川馨教授向小松制作所的社长河合良一说，你开始不听我的意见，我教育你十来年，你才接受了我的意见，你的公司才达到现在这个水平。河合良一点头称是，说你的意见对，但是你说得过了点，我不到十年就接受了你的教育。

我们搞经济研究工作的同志，能够提出真知灼见的也有，但是不多。例如孙冶方同志，他提过一些重要意见，过去我们不仅不听，还对他进行了批判。现在看来，他的不少意见是对的。日本的许多地方似乎形成这样一种制度：一个大工厂或大公司，董事会在研究一两年、三五年的经济发展规划的时候，总是先提出题目，然后请经济研究单位的学者提出方案，或者请几个经济研究单位提出不同的方案，供他们选择采纳，作出决策。资本家为这些经济研究专家提供经费和各种方便。研究单位的专家可以到工厂进行调查，出国考察所需费用也由资本家负担。他们的方案被采纳并付诸实施，使企业得到发展后，资本家还会给予他们优厚报酬。日本确有那么一批有见解、有本领的经济专家。而我们的经

济研究工作者，要他们承担某一任务，提出一套方案，除少数同志以外，多数难以完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脱节。要使经济研究人员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必须加强同业务部门的密切合作，坚持走调查研究的道路。

在座的同志不少是主管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工作的，每天要处理很多事情。工作无非是两类，一是日常事务的处理，一是重大问题的决策。我觉得，属于重大问题的决策，不要在匆忙的情况下作出。过去匆忙决定重大问题，走的弯路够多了，苦头也吃得够多了。陈云同志说过，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现在，国务院各部、委除有正职外，副部长都有十来个甚至更多，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同志也不少。可否考虑，一部分同志负责处理日常工作，一部分同志专门做一点深入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这两部分同志还可以定期轮换。不调查研究，匆忙决定问题，就很难避免错误。叶剑英同志说：“不怕慢，就怕弯。”我们不能再吃匆忙决定问题的亏，一定要改弦更张。

薄一波同志讲，做理论研究工作的同志要参与实际工作，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在作出重大决定之前要进行调查研究。这个意见很重要。我认为，搞好调查研究的决定环节，是做实际工作的同志要和理论工作者结合在一起。这样，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也有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否则，单靠理论工作者搞调查研究，

是难于解决多少实际问题的。

学风的改造,按照毛主席的说法,不光是理论工作者的问题,而且是全党的问题。在今天,学风的改造问题是关系到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问题。我们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做出贡献,就一定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经过调查研究,占有丰富的材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找出事物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且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改正。坚持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可以保证我们制定出来的方针、政策和经济计划比较科学,接近实际,能够实现。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多次讲过,我们的党风、学风必须改造。回顾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同志在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今天,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仍然要靠正确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不然,还要栽跟头,还要走弯路。

前不久,中央、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各经济研究单位联合开了一次会议,这是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结合的会议。会上决定要调查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第二,经济结构的问题;第三,引进技术、设备和利用外资的问题;第四,理论和方法问题,这个问题要和前三个问题结合进行研究。

下面,我想就体制问题、结构问题、引进问题,分别谈

一些意见。

一、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

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问题很多,我想说的,主要是企业管理体制。我们的一切经济工作,都要从基层开始。真正要把经济搞好,必须依靠企业。调查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一定要从企业入手。因为劳动力在企业,技术人员在企业,多数管理干部在企业,生产资料的使用在企业,产品是企业生产的,盈利还是亏损也首先在企业反映出来。把企业内部的情况了解清楚了,把同企业有关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各个环节搞清楚了,才能了解目前企业同上面有关部门的隶属关系是合适还是不合适,也才能从中认识到什么样的管理体制能够促进企业发展生产,什么样的管理体制妨碍企业发展生产。在这样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改革方案,才能促进企业的生产水平、技术水平和水平的提高,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使国家财政、地方财政、企业收入和职工个人收入都增加。总之,企业是基础,体制改革必须以企业为中心。离开企业谈这种体制的改革、那种体制的改革,就不能达到通过体制改革推进生产发展的目的。

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我的意见,从长远来考虑,应该是:企业按专业化协作的原则,组织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公司可以是地方范围的,可以是几个地方联合的,也可以是中央和地方联合的。经济工作主要由经济组织管,中央和地方政府管税收,管计划,管政策法规,主要利用经济杠杆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来协调经济的发展。财政分中央和

地方两级。这两级财政，要在分清事权的基础上分财权，先要明确办的事，再划分收支范围。例如，公用事业的建设、学校教育、服务事业等，一般由地方管，中央不具体管。当然，实现这个目标要有个过程，要划分步骤，稳步前进。

社会科学院最近请了一位英国教授来讲学，这个人很熟悉苏联、东欧的经济情况。他知道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苏联原是一个模式，以为中国比苏联、东欧在管理上要灵活些，因为毛泽东同志讲过要独立思考，走自己的工业化道路，不能照搬照抄。但他到中国一看，说没想到中国的工业企业管得那么死。东欧一些国家现在已经改进了，中国还没有改，还是采用落后的管理方法。他回去后写文章说，中国是有希望的，但是要改革，建议中国改革工业要着重研究东欧的经验和教训。这个意见有道理。我们要了解他们的历史变化，了解他们的改革的第一步是怎么走的，怎么一步一步改革过来的，采取了哪些改革办法，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每一步改革以后又出现了什么新的问题，这些新出现的问题是怎样解决的，现在还存在什么问题，等等。这对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有参考价值的。当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经验也应该注意研究，有分析地加以吸取。

二、经济结构改革问题

这方面，也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重点还是农轻重的比例关系问题。按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已经说了多少年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

陈云同志最近谈了三个很重要的观点。根据我的记忆

和理解，向大家说一说。

第一个观点，我国人口有九亿多，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农村，必须使广大农民有吃有穿，而且一年比一年生活过得好些。在这个基础上，来安排我们的国家建设和经济生活。农民是个大头，把这个大头安排好了，中国的大局就定了；安排不好，全国不得安定。新中国建立初期，叫紧吃紧穿；现在叫有吃有穿，一年比一年好一点，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来安排当前的和长远的计划。

现在，不少同志已经认识到，过去对农业、轻工业不重视，这种状况非改变不可。但是，也有的同志说，你们这样强调农业、轻工业，就是不重视重工业，不重视钢铁工业，没有拖拉机、汽车、化肥，行吗？没有钢，农业、轻工业都上不去。针对这种不同意见的争论，陈云同志又进一步明确讲了第二个观点和第三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重工业要为农业、为轻工业服务，要把这个观点明确起来和牢固地树立起来。重工业首先要考虑如何为农业和轻工业服务。以农轻重为序，还涉及重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就是说，在重工业的建设方面，要看为农业、为轻工业服务的这部分投资有多少？在重工业生产方面，要看为农业、为轻工业提供的机械设备有多少？为轻工业提供的原材料有多少？就是在冶金工业内部，它的结构也要同农轻重的比例关系结合起来考虑，看如何安排才适当。化工部有个材料说，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七年的化工产品总产值中，为农业、轻工业服务的产值占百分之七十；化工总投

资中，用于化肥、农药、磷矿和轻工业的合成材料、染料、各种化工原料、医药、橡胶加工方面的投资，也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就产品分配来说，以一九七九年国家计划为例，计划生产的硫酸、烧碱、橡胶，用于农业、轻工业和市场供应的，占产品总量的百分之四十二。陈云同志没有讲这三个百分比是否合适，但他说，化工部这样安排生产和建设，方向、路数是对的。全国每一个经济部门都要按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自己的生产和建设，来安排自己的一切经济活动。重工业部门更要这样做，首先要根据为农业和轻工业服务这个要求来安排自身的发展。从辩证的观点看问题，为农业，为轻工业，也是为重工业。

第三个观点，在安排年度计划、五年计划的时候，农业的投资、轻工业的投资、重工业的投资各占多大的比重，要根据前面说的两个前提来定。我们说，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要把重轻农的次序倒过来，以农轻重为序，这决不是说，在考虑分配投资的时候，一定要让农业占第一位，要使农业的投资占的比重最多，轻工业的投资也要高于重工业。如果那样，可能犯大错误。实际上，如果把重工业内部为农业、为轻工业服务的这部分投资计算在内，还是重工业的投资占多数或者占相当大的多数，重工业投资的比重还是大于农业、轻工业。当然，比重大也要有合理的限度。

陈云同志的这三点意见，话虽不多，但是对于我们整个经济建设是极其重要的。

据我在日本的考察，日本的重工业，除了为农业、为轻

工业直接提供机器设备和原材料之外，同时花很大力量生产日用工业品。我们的重工业部门，也有生产消费品的，问题是没有把这个概念、这种做法明确起来。重工业部门一定要清楚地看到，不仅要生产生产资料，而且一定要尽可能地利用自己的条件，制造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日用工业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的消费品。这样，就能够满足国内人民生活 and 出口的需要，也能够开辟重工业自己内部积累资金的源泉。

三、引进技术、设备和利用外资的问题

引进技术和利用外资很有必要，但要注意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结合起来，使现有企业一步步地现代化，而不能离开现有企业一味追求盖新厂。建设一些新厂也是必要的。但是，无论如何重点必须放在现有企业的改造上。日本新日铁的八幡制铁所，一八九七年建厂，一九〇一年投产，同我国清代末年建设的汉阳铁厂时间差不多（汉阳铁厂一八九〇年建厂，一八九三年投产）。今天的八幡制铁所已经高度现代化了，它并不是新建起来的，而是逐步改造成的，现在也还在继续改造。丰田汽车公司也是这样。改造原有企业，可以节约很多投资，厂房、上下水道和交通运输等设施都可以充分利用原有的。我们看过的日本的一些企业，设备多数和我国差不多，就是关键设备先进，组成了一条一条很好的生产线，电子装置比我们普遍。日本人看了我们的工厂后说，没想到你们有这么多的好设备、好工厂，就是缺一些关键的先进设备，更主要的缺点是没有管理好。现在一讲引

进，就是想建新厂，把老厂撇在一边，这样是不行的。

日本的友好人士向我们建议，应当更多地引进“软件”，就是买专利，引进技术资料、科学管理资料和请专家。讲引进，要了解人家的情况，但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情况，真正做到知己知彼。

这次调查研究，要同经济调整工作结合起来，同“六五”计划、长远规划的制定结合起来，同改革的试点结合起来。离开这些，我们的调查研究就不可能对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要使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 全面地发展起来*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

一九七八年以来，我们比较认真地在农村工作中拨乱反正，清除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农村形势逐步好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1】的传达和贯彻，受到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热烈欢迎，农村的形势又进一步普遍好转了。事实有力地证明，这两个文件，是符合农村实际的，是顺乎民心的。今冬明春农村的中心工作是：各级党政组织和一切有关部门，都要认真检查执行这两个文件的情况，总结两年多来农村形势好转的经验；继续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已经落实的要坚

* 这是邓力群同志代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的《关于今冬明春农村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节选。

持下去，没有落实的要尽快落实；在全面发展农业生产、巩固集体经济方面，行之有效又得到干部和社员拥护的各种生产责任制和经营管理方法，都要肯定下来。

农民担心我们的政策多变。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正式通过，并公开发表。党中央制定的农村经济政策，是长期的政策。我们主要还是靠政策来调动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带领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坚定不移地把中央已经确定的政策持续地、稳定地贯彻下去。

广大农村，经过近一二年来的休养生息，集体经济有所发展，社员生活有所改善。这是影响全国局势的大好事。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要记取过去的教训，再也不要几十只手插下去，强制社队和农民办这办那，增加他们的负担。不但决不能使已经出现的好形势再受挫折，而且要采取正确的具体政策和有效的具体措施，巩固和不断发展这个好形势。

二

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农村社队以至县、省、中央，都要制定逐步实现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现代化的规划。今冬明春，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都要开始认真考虑农业全面发展、农村全面建设的问

题,都要动员社员群众民主讨论本队、本社的农业生产应当怎样全面发展,农村建设应当怎样全面安排,并着手进行初步规划。这种规划,一定要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符合社员的要求,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不能由上级硬性安排;一定要尽量发挥当地的人力、物力、地力资源,不要做当地干不了或勉强干了却使社员群众受到损失的事情;一定要把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通盘安排,不要主观随意地突出某一项,挤掉其他能够办好和群众愿意办的事情。

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破坏和影响,我国农业内部比例关系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多年来,很多地方只强调发展粮食生产,忽视发展经济作物;只抓了农业,忽视了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只在十五亿亩耕地上打主意,没有在大面积的山区、林区、牧区、草原、水面上下功夫;只搞农田基本建设,根本不考虑农业和农村的全面建设。在我们这样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解决粮食问题,如果不着眼于国内,不努力提高现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是完全错误的。我国粮食没过关,在粮食生产上多花力气,多做工作,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多年的经验说明,只抓粮食生产是很不够的,如果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草吃肉”,广泛发展多种经济,农业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有较大的改善。拘守于小生产的狭隘圈子,不打开眼界,不广开门路,不使农业生产、农村建设全面地发展起来,要使整个国民经济持久地、按比例地、高速度地发展,

是不可能的。

在考虑和研究农业的全面发展和农村的全面建设问题的时候,还必须提出我国农业现代化究竟怎么搞的问题,也就是说,是着重于搞耕作机械化,只想到增加拖拉机?还是要着重于开展农业科学、生物技术的研究和推广?这个问题,有必要在党内党外,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广泛讨论,以便找出一条适合于我国人口多、耕地少、资源丰富、地域辽阔的情况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三

发展农业生产和建设,一定要严格遵守因地制宜的原则,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

我国各地自然条件十分复杂,就是在一个县、社的范围内也有很大差异。各地要狠下苦功夫,摸清当地的天时地利,善于趋利避害,发挥所长,克服所短。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则渔。要在现有耕地中继续建设一批稳产高产农田,搞好科学种田,使粮棉油等种植业有一个大发展。要在一切荒山、荒坡和“四旁”(宅旁、路旁、河旁、池旁),在一切宜林地区,普遍植树造林,扩大覆盖面积,使林业有一个大发展。要充分利用各种适宜牲畜饲养和放牧的条件,兴修牧区水利,加强草原建设,改良性畜品种,使畜牧业有一个大发展。要积极保护和利用内陆和海洋水面,使渔业和整个水产业有一个大发展。要积极利用本地条件,

发展小水电、小火电，大力推广沼气，同时利用风力和太阳能，增加农用动力和燃料的来源。要根据不同情况，大力发展农村的陆路和水路交通运输事业。总之，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一定要尊重社员群众的意见，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适合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适合集体经营的就集体经营，在不断壮大集体经济的前提下，适合社员个人干的也要放手让社员去干。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真正做到地尽其力，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把农村的各项建设事业兴办起来，为国家创造物质财富，为集体壮大经济力量，为社员增加收入，使整个农村逐步繁荣富裕起来。

在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中要不断发现和正确指导各种各样的先进典型。在推广它们的经验时，必须积极宣传它们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实事求是的正确方法。同时要切实说明，它们是在什么条件下，办了什么事，得到了什么成果，有什么具体经验；不能只是到处推广一种经验，要别人不顾时间、地点、条件，一律照办。过去一些地方脱离当地实际，盲目蛮干，瞎指挥，“一刀切”，追求形式，强迫命令，劳民伤财，得不偿失，都是极其错误的。今后务必不要再重复这种做法。

四

继续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是今冬明春的一项很重要的

工作。在今年七月召开的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大家的讨论,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都充分肯定了农田基本建设的巨大成绩。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全国兴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建成了大批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这对于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去年粮食生产突破六千亿斤,是和多年来农田基本建设的成就分不开的。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都反复强调,必须遵守因地制宜的原则,扎扎实实地搞好农田基本建设,搞好农业的生产和建设。会议认为,要在今冬明春搞起一个社员群众普遍满意、确能增产增收的农田基本建设新高潮,一定要鼓足干劲,一定要讲究实效,一定要量力而行、适当节制,一定要同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的其他各项事业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会议按照上述精神,对以下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

(一) 要结合农业区域规划和流域规划,做出本地区的农田基本建设规划,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搞规划,要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发扬民主,同广大群众和科技人员商量,要注意技术上的可靠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规划的制订和修改,必须报请上级政府批准。规划没有制定好,决不许贸然施工。上级政府审批时,必须严格实事求是,该增的增,该减的减,该改的改,决不许以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从事。

(二) 安排今冬明春农田基本建设,必须注意到农业内部各项生产与基本建设、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要根据发展生产的需要和人力、财力、物力的可能,既要采取积极的

态度,争取多办一些事,又不要超过社队本身的实际负担能力,不要挤掉生产、生活,不要一业挤掉各业。在劳动力的安排上,首先要保证当年农副业生产和发展多种经营的需要。

(三)较大型的农田基本建设,没有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以至县与县之间的协作,是办不到的。组织协作时,必须注意政策,决不许一平二调。要充分尊重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坚决贯彻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做到民主协商、合理负担、先后受益、大体平衡。轮流受益的时间一般以不超过三年为宜。对一些多年来只出工、出钱不受益的社队,要采取记工还工或其他形式切实给予等价补偿。对于不受益的社队,特别是其中的穷队、穷社,有关部门和地方还应采取有效措施给予支持,适当照顾。凡是能由受益社队承担的工程,就不要动员非受益社队劳力组织协作。凡是可分分队施工的工程,应尽可能做到统一规划,队自为战,就近施工。

(四)水利建设要坚持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加强管理、狠抓实效的方针。在三年调整时期,要把重点放在现有工程的续建、配套、加固上,使没有配好套的工程能配套齐全,充分发挥效益,使位置重要、影响重大的危险水库处理完毕,正常运用;使在建工程尽快完成,及早发挥效益。需要新办的水利基本建设工程,一定要搞好勘探、规划、设计,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要加强技术指导 and 科学研究。要加强施工管理,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和检

查、验收制度，确保工程质量和工程安全。今后发生质量安全事故，对有关领导和技术负责人要追究责任。

（五）无论治水、造林、修路等各项农田基本建设事业，都要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坚决反对单纯追求进度，忽视质量、忽视效益的形式主义做法。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做到建一处，成一处，切不可拉长战线，打消耗战，增加群众负担。

（六）在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中，要十分注意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要保护山林果树、经济特产、牧场草原、水池鱼塘，要使农田基本建设为林、牧、副、渔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而不是相反。适宜于采取生物措施的，要大力推广生物措施治理，绿化山川，以增强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宜于开垦的土地，要继续有计划地开垦，以扩大耕地面积，发展国营农、牧事业。一些地方毁林开荒、毁草开荒、盲目围垦，破坏山林，破坏水土保持，破坏生态平衡的错误做法，要坚决加以制止。一切基本建设都要尽量少占用农田，确实需要占用农田的，除给予合理报酬外，所减少的农田，应由受益区调剂或组织开荒解决。拆迁集体和社员的房屋，要负责补偿，并在施工之前作好安排。过去移民中遗留下来的生产、生活问题，要抓紧妥善解决。

（七）集体举办的农田基本建设，主要依靠社队自力更生，国家在资金、材料、设备等方面也要积极支持。国家补助小型农田水利的资金，要拨给相应的物资器材。社队自筹资金所需的物资器材，应由各省、市、自治区列入计划，保

证供应。地方机动财力的主要部分应用于农业。国家投资举办的水利基本建设工程的民工工资补助和粮食补助标准，分别由水利部或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离队的民工按队里同等劳力记工。民工补助粮由国家解决。社、队举办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补助粮由社队自筹。社队可在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留足种子、饲料，安排好社员口粮的前提下，根据当年粮食生产情况，提留适当数量的劳动补助粮，用于离队劳力的口粮补助。

（八）县、社、大队三级要根据需要和可能条件，办好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以保证工程质量，加快工程进度。专业队人员要精干，领导班子应加强。无论是群众性的季节性施工或专业队的常年施工，都要注意劳逸结合。要搞好技术革新，发展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作业，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要注意加强专业队的机械装备，更好地发挥专业队的作用。购买设备所需资金，县专业队主要由地方财政解决，不足部分可从地方水利基本建设投资中补助；公社专业队主要由公社公共积累和社办企业利润收入中解决，确有困难的，可由小型农田水利补助费中酌量给予补助。

（九）要十分重视管好用好现有工程设施，做到确保安全，充分发挥效益，促进增产增收。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哪一级负责管理的工程，由哪一级负责建立和健全机构，包括公社水利工程在内，都不允许再有无人管理的现象。国家管理的工程，所需人员编制和劳动指标，由省、市、自治区纳入计划、统筹安排。集体管理的工程，由社队设专门机构

或专人进行管理。所有水利工程和管理单位,都应充分利用水土资源,积极开展综合经营,努力增加收入,改善职工生活。凡有条件的,要逐步实行企业管理,按制度收水费,做到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所有水利工程,均应建立与恢复技术档案,实行卡片管理制度,以利维护与使用。要教育群众保护各种工程设施,严禁在水库炸鱼,对破坏工程设施的要依法惩办。

(十)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农田基本建设的领导。农业、水利、林业、农机以及计划、物资、工交、财贸、科技、卫生等部门,要分工协作,从各方面加强支援。领导干部要深入第一线,参加劳动,与群众同甘共苦,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注 释:

- 【1】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宣布:“会议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央为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个农业文件,还印发了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

同两个“凡是”的论争^{*}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二日)

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名义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社论由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几位同志起草、定稿，经华国锋同志批准的。发表之前，两报一刊的同志一点也不知道。

社论发表以后，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许多同志说，坚持两个“凡是”，直接目的就是阻止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是阻止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我把这些反应报告给王震同志，并且请他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的第二条同两个“凡是”作对照，看他们到底在维护什么？结束语的第二条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同时指出：“有人也许以为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就是用心读熟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央办公厅干部会上的讲话。

作中的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学会及时引证这些结论和原理而以此自安，希望读熟的结论和原理能适应于任何环境，能适应于一切实际情形。但这样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完全不正确的。”结束语还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科学，是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所以它在发展进程中不能不用新的经验和新的知识来充实自己，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不因时而变，不能不由适合于新历史条件的新结论和新原理来代替。”“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完全不是说要读熟它的一切公式和结论，拘守着这些公式和结论底每一字句。为了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首先就要学会怎样把它的字句和实质区别清楚。”结束语共六条。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再三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它，他所作的整风报告，也同这六条的精神完全一致。重温这段往事，对于认清两个“凡是”的提法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很有帮助。

四月十日，小平同志在写给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和党中央的信中说到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时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高举和捍卫这面光辉伟大的旗帜，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五月三日，中央向全党转发了小平同志的信。肯定了小平同志的提法。

五月二十四日上午，王震同志和我一道去见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曾经来看过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

我翻案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广大群众在天安门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主席自己就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主席讲，一个人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都改得乱七八糟呢？就是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所以要改嘛。”毛主席曾经对邓小平同志有“三七开”的评价。小平同志讲：“毛主席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我对那两位同志说：今年四月十日我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1】

“准确的完整的”这个提法，是针对两个“凡是”的。现

在看得很清楚，正是小平同志的这个提法，开始澄清两个“凡是”在人们头脑中造成的混乱。争论是他们挑起来的。真正拥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志，当然不能对他们挑起的争论置若罔闻。“完整的准确的”提法一出来，就在党内引起了争论，给那些不同意两个“凡是”提法的同志提供了武器。这样，就在党内把两种思想路线的争论摆出来了。这场争论，越到后来，越在各个方面展开，它的性质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六月，我们给小平同志送去《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的小册子，送去关于按劳分配的文章和材料。小平同志详细地读了。后来他找我们去谈，说小册子写得好，后两部分弱一点，要修改一下。可以公开出版，展开讨论。他说，按劳分配的文章写得不好，吞吞吐吐，含糊糊糊，意思是要维护按劳分配，但是态度很不明朗。要写清楚，不劳动者不得食，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这一时期，我们看到毛著编委会办公室负责同志主持起草的一个党内文件的讨论稿。这个稿子对“四人帮”的批判，有不少是好的。第一部分专门讲了四个理论问题：关于党内走资派的问题，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关于唯生产力论的问题，关于无产阶级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问题。他们的有些论点，同当时理论界对于“四人帮”的反动理论的批判很不一致，甚至相抵触。读后给人留下一个印象，就是有的地方是搞折中主义，采取批判“四人帮”的形式来维护“文革”中的一些错误观点。

这里，不准备详细分析他们在这四个理论问题上的错误，只想指出一点，就是他们没有达到当时理论界已经达到的水平，没有反映全党同志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认识。他们不是在搞“凡是”吗？实际上，他们在批判“四人帮”时，继续维护的还是“四人帮”的基本论点。

下面，稍微详细地谈一下围绕按劳分配问题所发生的争论。

我们知道，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次指出了的。关于必须实行按劳分配这个问题，毛主席也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可是，“四人帮”却借口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集中攻击按劳分配的原则，认定它是生长资本主义的温床。

“四人帮”倒台以后，中央一再强调按劳分配问题。在我们写按劳分配的文章以前，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接见方毅、刘西尧同志时的谈话，八月八日在科教工作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九月六日接见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的谈话，十月二十九日听取煤炭工业部汇报时的谈话，十月三十一日听取空军、装甲兵汇报工作时的指示，十一月三日会见美籍教授王浩时的谈话，以及在其他场合，都讲过必须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的问题。小平同志说：“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决定建立岗位责任制。质量问题为什么这样严重，精神奖励是需要的，物质奖励也必须要。开滦煤矿自始至终有精神奖、物质奖。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要结合起来，这是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他在听取煤炭部汇报时还说，这是一个“大的决策”。李先念同志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听取煤炭部汇报时也说：“奖金不能否定。”他还专门谈到黄埔港的经验。黄埔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搞计时加奖励，后来改为计件工资。“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周总理和先念同志的支持下，他们一直坚持下来，在所有的港口中，它始终没有积压，装卸任务完成得最好。在我们起草按劳分配的文章之后，去年六七月间，还听华国锋同志说，干不干一样，干多干少一样，干好干坏一样，干轻干重一样，这四个一样不行。干多的不如干少的，干少的不如不干的，干的不如捣蛋的，非改不行。这是吃社会主义，瓦解社会主义。华国锋同志还说，经营管理好坏一个样，盈利亏损一个样，也不行。不但工人，而且干部，都要有奖有罚，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国务院政研室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我国的实际情况，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上述指示、中央政治局的决策和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写了《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文章详细叙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仅引用毛主席的有关论述就有九处。小平同志看了两遍，两次找当时国务院政研室的负责同志谈对文章的意见。他在三月二十八日说：“文章看了，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文章还曾送请先念同志审阅。先念同志也看了两遍，给予了肯定，提了意见。文章于一九七八

年五月五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

这篇在政治上、理论上和组织上都是正确的文章，竟使有的同志大为恼火。他们认为，这两篇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思想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批判“四人帮”对于毛主席的理论指示的歪曲，就是批了毛主席。上面说的两篇文章，恰恰是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捍卫了马克思、列宁、毛主席。

我们同主张两个“凡是”的同志的论争，集中到一点，就是要不要坚持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实事求是原则的问题。

政研室曾为聂荣臻同志起草了一个发言，后来整理成文章，登在《红旗》第九期上。文章说，“实事求是的作风，是毛主席在同党内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长期斗争中，特别是同王明路线的斗争中形成的，是在同各种主观主义、特别是在同王明的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对长期以来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从哲学上作了总结，科学地阐明了实事求是作风的思想理论基础。到了延安整风的时候，毛主席给中共中央党校作了‘实事求是’的光辉题词，高度概括地提出实事求是党的学风、党的作风。”“《实践论》的思想，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实践是第一性的，实际生活、现实事物是第一性的。我们的一切正确思想，归根结底，只能从实践中来，从实际经验中来，并且必须回到实践中去，通过实际经验的检验。《矛盾论》讲的是客观世界的矛盾及其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我们的思想要符合客观实际，就必须实事求是地分

析客观世界的矛盾,反映客观存在的矛盾。客观世界充满了矛盾,充满了变化,我们的思想必须如实地反映这种矛盾和变化;一切正确思想,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否则就变成形而上学。”文章指出,林彪、“四人帮”的法宝,就是拿毛主席的只言片语来吓唬人,有时也拿马恩列斯的只言片语来吓唬人。文章说,要坚持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一定要“坚决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词句当作脱离时间、地点和条件的教条。”

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大的闭幕词中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一定要言行一致,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反对华而不实和任何的虚夸,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扎扎实实,埋头苦干。”【2】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陈云同志为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写的《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的文章。陈云同志写道:“在这里,我想特别讲讲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那么,我们就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那么,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败。所以,是否坚

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文章本来是宣传口、新华社同志约陈云同志写的。写出以后,有一位审稿同志专门同华国锋同志在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一句一句地作了对照,说哪一句话华主席是这样讲的,而陈云同志是那样讲的,不行,要一致起来。陈云同志说,既然每一句话都要和华主席一样,华主席怎么讲,大家都得怎么讲,华主席没讲的,别人都不许讲,你们还约我写文章干什么?如果那样,把华主席的文章每天重登一遍不就行了嘛?!这也是对“凡是”的批评。

《光明日报》刊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原作者是南京的胡福明同志。《光明日报》的同志修改以后,还送党校的同志修改过。胡耀邦同志也修改过。文章以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于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发表。这篇文章,是在中央采纳了小平同志关于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意见以后,在聂荣臻、陈云同志关于全党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的文章发表之后,在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讨论的情况下写出来的。文章论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根本观点,也就是实践第一的观点,引用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对自己的观点和提法进行修改的事例。其中,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对《共产党宣言》进行补充、修改的情况,谈到毛主席一九五八年改正一九五五年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的一个提法的情况。这些事例说

明,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是根据实践提出并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的。一切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看了这些事例,只能增加对革命导师的尊敬。革命导师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们从自己脑子里凭空构想出了什么理论,而是从实践中总结出理论,使这些理论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进行修正、补充,得到发展。实践证明对了的就坚持,实践证明错了的就纠正。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里说:“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3】}因此,根据实践来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包括纠正已为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丝毫不会削弱革命导师的威信,相反只能更坚定人们对于他们的信任和爱戴。

五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有位同志表示,不同意军委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同志报告中的两个提法:一是报告提出“新的历史条件下”,认为这同华主席讲的是“新的发展时期”不一致;一是报告提出“要保证人民解放军的无产阶级性质”,认为这同毛主席讲的是“人民军队的革命本质”又不一致。五月三十日,小平同志找我们几个人谈话,有针对性地说:“总而言之,就是这么个意思: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

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这同这位同志提出的问题的性质是一样的，是联系着的。”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上，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的确是表了态。外面曾经流传，是社会科学院逼他们表态的。社会科学院哪里有这么大的权力呢？要他们表态的是上面某些主张“两个凡是”的同志。不过，他们要各省、市、自治区表态的结果，同他们的愿望相反，是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先念同志在国务院召开的经济工作务虚会上也说：“实践第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怎么现在有人反对呢？真奇怪。”文章发表的时候，王震同志、余秋里同志在外地，回京以后，我也听他们说，《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观点是正确的，反对它是错误的。文章发表以后，得到广大党员和广大群众的拥护，材料就更多了。事实证明，通过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我们全党、我们的理论界和全国人民的识别能力和马克思主义水平，是大大地提高了。

六月二日，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讲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实事求是。小平同志说：“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

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主席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4】

小平同志认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5】小平同志的讲话稿，事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传阅过。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李先念同志是赞同的。传阅过程中，我听先念同志讲过：小平同志的讲话很重要，完全赞成。他还专门向几位同志打招呼，小平同志的讲话，是代表中央的。

一九七八年八月，一位同志去东北，沿途发表演说，认为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是“恶毒地攻击毛主席”。还说：“我们只能宣传一个领袖，过去宣传毛主席，现在宣传华主席。”

马克思主义的导师们，包括毛主席，都没有说过领袖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无产阶级的领袖是多数，不是单数，是集体，不是一个人。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

“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6】列宁这里说的是“人们”，是“集团”。列宁认为，这是起码的常识。列宁的这一观点，曾经讲过多次。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说，我们党已经有“许多好的领袖和干部”，“但是还不够。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还要作为任务，在全党和全国发现许多新的干部和领袖。”【7】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毛主席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8】毛主席专门谈到党委书记作为“班长”同一班人的关系问题。一九五三年，由于毛主席的提议，中央正式通知，以后给中央写报告，不要写毛主席并党中央，应只写党中央，或写党中央并毛主席。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9】一九七一年八月至九月，毛主席在批评林彪一伙人的时候又说：“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的

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列宁、毛主席讲了这么多，可是为什么有的同志就不高举紧跟，不“凡是”了呢？同志们，他们不是到处“凡是”的，有利于他们的就“凡是”，不利的就不“凡是”。他们的“凡是”，是有自己的主观标准的。

小平同志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六日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10】小平同志根据我党斗争的历史，进一步具体地阐明了这一观点。他指出，林彪搞的语录本，不能系统地反映毛泽东思想。比如关于党的建设的那部分，就没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的语录。小平同志说：“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11】“我们有了过去没有的好条件，如果毛泽东同志没有说过的我们都不能干，现在就不能下这个决心。在这样的问题上，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就

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周恩来同志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如果只是毛泽东同志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12】“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什么叫高举?这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现在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是真正的高举。下这样大的决心,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离开这些,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13】

十月三日,小平同志找我们几个人谈话时说,前些日子,中央常委谈过实践标准问题和按劳分配问题,一致认为,两篇文章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好的。

我们党所坚持和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简单地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就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具体地分析自己所面对的具体问题,根据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来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实事求是,就是要详细地占有材料,从客观事物及其运动过程中认识其固有的规律,而不是从头脑中臆造出什么规律,按照客观规律来改造客观世界。但是,认识是否正确,又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不断地补充、修正、完善。

林彪和“四人帮”,是两个互相勾结又互相争权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由于在篡党夺权问题上的利益争夺,“四人帮”反对过林彪。林彪垮台以后,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批判。

林彪的政治路线，更没有、也更不可能批判林彪的思想路线。他们只能继续维护和坚持林彪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而且把它发展到极点。

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主张两个“凡是”的同志，确也履行了共产党员应该履行的职责，参加了这样一场政治斗争，就这个方面来说，他们是和“四人帮”在政治上决裂了的。但是，就思想路线来说，他们还不很清醒，这就必然使他的言论行动处于同党中央不一致的位置上。也许他会说，他这样想、这样做，是为了维护毛主席的旗帜，为了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形象。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应该说，他的愿望是善良的。但是，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在吉林汇报会上所谈的意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是真正的高举；像他们那样，只能导致损害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损害毛主席的形象。这是形式主义，是假的高举。“天安门事件”是个错案，当然必须纠正。这件事直接关系到几十万、几百万人，是全国人民都关心的。它的本质和主流，王震同志已经说得很清楚。可是，有同志就不同意平反。周总理本来也是名副其实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逝世以后，全国人民同声哀悼，文章、电影里有了“周总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提法。他不同意，群众悼念总理的诗词，也不让印刷、发表。这种做法，其结果只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损害毛主席的形象，不是很清楚的事情吗？

应当认识到，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由于他们坚持

错误的思想路线，影响很坏，错误更严重。我们应该批评这种错误，认识这种错误及其影响的严重性，打破他们所设置的禁区，呼吸呼吸来自人民群众中的新鲜空气。补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课，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只有经过这样的再学习、再教育，才能真正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真正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为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

注 释：

- 【1】 邓小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8—39页。
- 【2】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人民日报》1977年8月25日第1版。
- 【3】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60—61页。
- 【4】 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14页。
- 【5】 同上。
- 【6】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197页。
- 【7】 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第255页。
- 【8】 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第1333页。
- 【9】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

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1 版，第 820 页。

- 【10】 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2 版，第 126 页。
- 【11】 同上书，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2 版，第 127 页。
- 【12】 同上书，第 127—128 页。
- 【13】 同上书，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2 版，第 128 页。

指导拨乱反正的文件*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发表以后,党内外、国内外反映都很好。这个讲话,对于统一党内的认识,已经起了很好的作用。有不少同志说,有了这篇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解放以后的党史,很多问题都容易说明了,有利于指导当前全国的拨乱反正。

先介绍一下文件起草过程中的一些考虑。

这篇讲话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常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以胡乔木同志为主组织了一个起草小组,从六月底开始,一直到正式发表,前后是三个月的时间。要说搞了多少遍,大大小小有十八九遍,其中最重要的也有四五次。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两次,常委讨论了一次。稿子还发给中央机

* 这是邓力群同志介绍国庆三十周年讲话形成过程的一次谈话。

关、各省市自治区领导、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讨论，并且在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中间征求了意见。前前后后参加讨论的，大概有四千人。在讨论过程中提了很多问题，有很多很好的意见，也有各种不同意见。经过反复多次的斟酌、修改而后定稿。应该说，这篇讲话是一个集体的创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讨论中，大家提的意见，最主要的是，讲话不要受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的限制。

许多同志认为，十一大的报告，是在当时的情况下，针对当时的问题讲的。十一大以后，国内国际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三年来，我们党的工作，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提出和解决了很多新问题，在方针、政策以至路线上，比起十一大所讲的都前进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没有受十一大的限制，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又比三中全会前进了，这次讲话应该继续前进。只有前进，才有利于统一全党、全国的思想。不要受十一大的限制，也还有一个根本的道理：理论从实践中来，也还要回到实践中去进行检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实践发展了，理论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三年来的实践向前发展了，我们的认识当然不应该停留在原来的地步。所以，我们对于两个“凡是”的批评，不仅是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指示不应该搞本本主义，就是对于十一大的报告，对于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也不能搞本本主义。

大家还认为，这个讲话应该为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作些准备。

党内有这样一种呼声，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时说，建国三十年的历史留在以后来讲，“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问题也要等待适当的时机作出决定。这个方针是对的。可是大家都希望在开十二大的时候，对三十年的历史，对“文化大革命”这一段能作出总结。

讨论中间，讲到三十年的时候，很多同志认为，可以分成四段：第一段，就是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这八年，我们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解决了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问题，实现了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作成绩是非常明显的。尽管在一九五七年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但这只是局部性的问题，作为全局来讲，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段，就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六年。这九年就与前八年不同了，有两年困难，有三年调整，有四年恢复和发展，有个起落，经过了一次挫折，重新走向胜利。多数同志讲，这九年尽管经过一次挫折，但是从全过程来看，我们党的路线还是正确的，或者说基本上是正确的。第三段，就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林彪、“四人帮”的垮台，整整十年。这十年，是我们党的一次大挫折，空前的挫折。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使我们全党、全国遭受了建国以来历史上最大的灾难。这一点，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第四段，就是“四人帮”被粉碎到这次讲话为止。我们粉碎了林彪、“四人帮”的

帮派体系，批判了他们的极左路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分清了理论是非、路线是非、一些重要案件的是非，落实了政策，大大提高了全党干部的思想水平，并且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使我们党的工作重新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大家认为，把这三十年的路程分成四段，合乎历史，合乎实际。

邓小平同志看了大家的意见后，八月下旬找胡耀邦同志、胡乔木同志和我到他那里去谈，说讨论稿子的简报都看过了，很多意见是好的，但觉得稿子里讲理论的东西太多了，概念的东西太多了，文章沉闷，需要作大的修改。他的具体意见是：

第一部分，历史是应该做点回顾的，但三十年的成就讲得太细太具体，应该把它明确地概括成为几条，一条一段。很明确的几条，文字尽量短一点。至于更细的东西，留待将来《政府工作报告》里去讲。

第二部分，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概括成为几个特点，很好。有些东西还应该补充进去，最重要的是要从林彪、“四人帮”的事件中间得出几条基本的教训，要写得很准确，使大家看了以后，啊，就是这么回事！只要这个教训总结好了，按照这个教训来改进，我们以后的工作，包括制度，包括思想，包括理论，包括作风，就可以大大前进一步。

第三部分，写今后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的政治路线是什么，我们的思想路线是什么，我们的组织路线是什么。这样，稿子就不是小改，而是大改。

我们起草小组的同志，认真考虑了小平同志的意见，认真考虑了大家的意见。为了争取快一点搞出一个稿子来，请中央领导同志进一步发表意见，就在九月一日写了一个稿子，送给中央的同志。九月四日，小平同志又找了我们三个人去谈。他说：

架子可以了。主要问题是对毛主席怎么讲的问题。现在的稿子，对毛主席的地位，毛主席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所作的贡献，讲得太弱了。还是要讲在三十年的历史上，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取得的。我们的党、军队、人民是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在毛主席领导下建立功勋的。要讲我们有了正面经验，也有了反面经验。这正反两方面经验经过总结，教育了我们的人民，教育了我们党，说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引我们前进的思想。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党就站住了，社会主义制度也站住了。毛主席指引我们战胜重重障碍，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经过惊涛骇浪，终于使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世界上站得更高了，高高地站住了。

三十年来，我们的斗争是坚持、发扬四项基本原则同背离、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我们尽管受到这样那样的干扰、破坏，但终于克服了这些干扰、破坏，我们始终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三十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写这个报告。

小平同志说，现在要注意，有些从“左”的方面来攻击党的人，也打着维护毛主席的旗号。这是一个新动向。所以，这个稿子要批判来自“左”的以及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现在，在一部分人中确实有点思想混乱，一是来自“左”的，一是来自右的。不管是“左”的右的，多数人都是一个再教育的问题。只要工作做得好，多数人是是可以转化的。“左”的右的思想都是反对四个坚持。其中有很多人是不懂事，不懂历史，没有生活经验。对这些人要作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也要向人民讲清楚，我们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非常宏伟的。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还要经过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生活要改善，但难于很快改善，还要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要批判、克服无政府主义，批判搞动乱的那些人和他们的活动，批判某些自由化的倾向，批判迷信资本主义。要讲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政治局面，还是毛主席讲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讲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要巩固、发展这样的安定团结，不许以任何形式来搞动乱。还要提倡守纪律，自觉地遵守纪律，提倡组织性纪律性，提倡好的道德风尚，提倡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还要表扬、歌颂我国人民英勇勤劳的精神，那样一种忍受困难的精神。这种精神过去曾经受过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指导。一九六六年以前，包括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社会是有这样一种好的道德风尚的。

他还说，要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终于战胜一切困

难，粉碎了林彪、“四人帮”。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今天更是如此。只有依靠这个制度，我们才能实现在中国条件下的四个现代化。要讲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有高度的信心，不要对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动摇。这是我们的基础。依靠这个制度，建立了相当雄厚的物质基础。这是我们前进的阵地，是我们的依托、基点。这方面还要鼓舞信心。

他强调说，政治路线表达的语言，还是要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写上去。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发展水平，就是要力争上游。

小平同志说，现在很多事实说明中国还是有人才的。问题在于，什么情况下人才才能涌现出来，采取什么办法把人才培养起来。这涉及我们很多制度、方法、组织问题。要把这个内容写进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培养有专门知识的专家，形成、组织一个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队伍。

在谈话的过程中间，小平同志说，要使人看了文章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民现在是在真正搞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不是搞片言只语。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又改了一个九月十日稿。小平同志看了以后很满意，说这样讲就好了，就讲够了，讲毛主席的好处，毛主席的贡献这样讲够了。九月十二日，小平同志又找我们去谈。他说：这样很好，对这个稿子现在我只一个意见啰！下面传达小平同志意见的主要精神：

我们要民主，也要集中；要自由，也要纪律；要个人心情舒畅，也要统一意志。我们说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就是要使这两个方面都得到保证。不能只保证民主，不保证集中；只保证自由，不保证纪律；只保证个人心情舒畅，不保证统一意志。例如，法制要保证控告的民主权利，也要制裁诬告的行为，等等。

现在的情况是，既缺民主和自由，也缺集中和纪律，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更缺集中和纪律；既缺个人心情舒畅，又缺统一意志，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更缺统一意志。

有关部门，要逐步制定出版法、集会法等法律，从这样两个方面做出明确规定。不能允许极个别人利用我们的法律条文钻空子，搞动乱。

林彪、“四人帮”横行了十多年，把国内的政治局面搞乱了，把我们的社会风气搞坏了。直到现在，在一部分人中间，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还在泛滥。林彪、“四人帮”毒害了一代人。对于这一代人，特别是一些青年，有个再教育的问题。各级干部，包括老干部，也有个再教育的问题。再教育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他们尊重集中，遵守纪律，顾全大局，先公后私，并且在全国人民中逐步恢复和发扬我们曾经有过的、好的道德风尚。要讲加强纪律性、组织性，强调批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现在有的从“左”的方面，也有的从右的方面，来助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两个方面，都值得注意。要分析当前的思想状况，有针对性地讲问题。要批判那种出

于个人目的捣乱闹事的人。他们使社会不安宁，使政治局面不安定，总是想搞动乱。这种人很少。问题是要对大多数人进行教育。只要大多数人教育好了，这种人就孤立了。

进行教育和再教育，批评群众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要讲究方式。对多数人的教育工作做好了，就要坚决打击那些专门捣乱社会秩序的极少数人，坚决制止他们的各种不法行为。对于这些人，不要管他们所说的什么人权不人权。我们不能允许他们借口保护自己的什么人权，侵犯广大人民群众和国家的利益。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对于人权问题，历来有自己的看法。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有些话这次要重复地说一下，要以鲜明的态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而且努力做到逐步根绝这些东西。

在我们的干部中间，在我们的党员中间，有一部分同志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抵触、怀疑、不理解，有些人现在思想还不通。从思想根源来讲，主要是受了林彪、“四人帮”的毒害和影响。这是目前在我们思想工作中间要注意的一个大问题，我们要好好地做工作。但是，对那些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思想还仍然转不过来，仍然对党的路线表示抵制、抗拒的人，要采取组织的措施来进行解决，不能让他们占据领导岗位，妨碍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要走群众路线，去发现那些群众信得过的、联系群众好的、执行中央政策好的同志。把他们逐步地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有的提到一把手的地位。

讲到路线问题,写上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就是毛主席制订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继承,而且加了新的内容。这个写法好。

根据小平同志的上述意见,我们又作了一次修改。政治局讨论通过以后,就是九月十六日的稿子。这个稿子,在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间进行了讨论,九月二十六日政治局常委开会通过,二十七日中央全会正式通过,二十九日叶帅发表讲话。

二

序言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次恢复了党的七次代表大会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里的提法,讲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大家一致赞成。这样一个提法合乎实际,也合乎毛主席本人的思想。七大以后,全党都是这样宣传。到了八大的时候,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在党章里没有写毛泽东思想。可是,在我们的宣传工作里,在党的生活中,还仍然使用七大的提法。只是到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逐步把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一步步地拔高了。这就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一九六一年,毛主席特意提出了一个意见,说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列。这个意见其实早就有了。一九五五年知识分子会议上,有的同志提出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

主义。毛主席不同意。他说，我们是分店，总店还是马克思、列宁；马列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到了一九六一年，他又一次讲了这个问题。在报纸宣传中，毛主席具体规定了一个提法，说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个单独的可以讲，如果把马列主义合到一块儿来讲的时候，应该提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不要写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后来，林彪说什么“顶峰”呀，“最高”呀，“最活”呀等等这一套，毛主席是不高兴的。他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不是给江青有一封信吗？对“顶峰”的提法是不同意的。以后，三个副词（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毛主席亲自删掉了。还有什么第三个里程碑，毛主席一直是不高兴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活动，外事文件，以至联络部同兄弟党来往的时候，毛主席再三强调说，我们跟外国党接触的时候，只能够、而且应该坚持这样的提法：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他们那个国家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有一次给日本人的题词，也是这样写的。现在恢复这个提法，就排除了林彪、“四人帮”违反毛主席的意志，强加给毛主席的那些提法。

讲到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大家很满意这样的提法：毛泽东思想不只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这个提法，也是合乎实际的。如周总理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有很多创造，有很多贡献。在国内建设方面，包括经济建设的理论上、文化建设的理论上，周总理有很多重要的贡献。在外交上，和平共处

的五项原则，是周总理提出，得到尼赫鲁的赞成，然后报到中央，中央同意、毛主席同意。援助落后国家的八项原则，也是周总理访问非洲几个国家之后，在一边访问、一边谈论的过程中形成的。周总理在国际活动中贡献是很大的。

关于建党学说方面，毛主席为我们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他老人家都有一系列的重要论述。但是，应当承认，刘少奇同志也是有贡献的。七大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今天重新来看，对加强我们党的建设，仍然有极大的意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们在座的这一代人也受益不小。把少奇同志《论党内斗争》讲的道理，同林彪、“四人帮”搞的那一套一对照，经过实践检验，就完全证明，少奇同志那篇文章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而林彪、“四人帮”这一套是完全破坏了毛主席的党内斗争的理论、思想的。现在群众来信中间，不少人希望重新出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毛主席讲过一句很令人心情激动的话，他说，《毛泽东选集》，毛泽东的文章，都是用血写成的。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多少先烈牺牲了，包括为正确路线而奋斗牺牲的，也包括在错误路线下牺牲了的同志，他们对于写这部书都作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毛泽东思想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产生的”。可以说，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毛泽东思想都从不同的方面做出了自己杰出的贡献。所以，今后我们有一个任务，就是分别地学习、研究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怎样经过自己的努力，发挥自己的智慧，对毛泽东思想作出贡献的。这件事做好了，对于我们今后按照这样一

个集体的智慧，把我们的各项工作推向前进，是大有好处的。

序言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讲了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毛泽东同志的不朽功绩之后，提出：坚决捍卫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讨论过程中间，有的同志建议是不是把科学体系这几个字删掉。斟酌了以后，认为这几个字不能删掉，而必须维持这样一种提法。所谓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应该是始终一贯的，而且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是合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的。它包括毛主席本人的，也包括刚才所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贡献。我们在写作的过程中间，理解小平同志的意见，说我们的实践已经证明了，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已经证明了，当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搞好了。构成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只能够包括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内容，错误的东西应排除在外，包括毛主席老人家自己违背了自己原来正确的东西，都应该排除在外。所以说，这“科学体系”虽然只四个字，但有重大意义，有了它，就同两个“凡是”的主张区别开来了。

三

关于“决定国家命运的一场大决战”一节里的一些问题。

讨论过程中，彭真同志特别强调这么一个问题，说中央

给他一个任务，要他管政法工作，将来对林彪集团、“四人帮”集团要起诉，要审判。路线问题，只能在党内来解决，不能向法院起诉，法院也不能够审判。所以他说，应该在这一部分里头讲清楚，林彪、“四人帮”不简单是个路线问题，而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问题。后来他把这个意见对小平同志说了，小平同志也赞同。因此，在讲了我们和他们的斗争是激烈的、尖锐的、复杂的斗争以后，加了两句话：“这是一场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他们的问题是不能够用党内斗争的方法来解决的。国庆讲话中讲了他们的极左路线之后，说他们实行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篡党夺权、阴谋政变，企图从根本上毁灭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摧毁共产党的领导，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全国重新投入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投入血腥的恐怖之中，他们所进行的长达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而且还讲了他们反革命集团阴谋的性质。党的十一大、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明确地指出了，他们这两个集团是反革命阴谋集团。将来我们对他们起诉、审判，就是只讲他们的反革命罪行。

另外，国庆讲话里讲了极左路线的几个主要特点。原来是三条，后来小平同志讲，还应该增加一些。这些特点表现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后来又加了文化上、组织上，还加了社会风尚这么几个方面，内容更完全了。这就是：

在思想上，他们完全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认为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进行所谓的变革、改造，宣传天才决定论，借批判“唯生产力”论来否定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意义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用假社会主义冒充科学社会主义。

在政治上，他们捏造所谓“阶级关系转化”的理论，鼓吹党内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制造“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反革命公式，把我们党、政府和各级领导骨干当成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当成所谓“彻底砸烂”的对象。

在经济上，他们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所谓的阶级斗争代替生产斗争，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攻击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用反动的平均主义代替按劳分配，竭力鼓吹脱离生产发展的实际水平和客观需要的“穷过渡”，导致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大破坏。

在文化上，他们打着“文化革命”的旗号，大规模地毁灭文化。他们在文化领域实行的所谓“全面专政”，他们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倒退了许多年。

在组织上，他们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反动口号，破坏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破坏党、政府、群众团体各级机构，破坏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军政军民关

系，建立他们的帮派体系，实行以派性为标准的组织路线，挑起派性斗争来分裂党、分裂军队、分裂各族人民。

在社会上，他们竭力煽动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制造大规模武斗，严重地破坏社会政治安定，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他们公然鼓吹“有权就有一切”、“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赤裸裸地宣扬争权夺利和流氓政治等等，极大地败坏了我们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良的社会风尚。

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同毛主席的错误有本质的区别。尽管有联系，但这种联系都是由于他们歪曲、篡改、割裂、捏造的结果，跟毛主席原来的一些观点根本不同。比如说“走资派”，毛主席对这个概念没有做过科学的规定，有的时候宽，有的时候窄，这是毛主席的错误。可是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我们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还有，林彪、“四人帮”要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彻底砸烂。可是，毛主席一看到“彻底砸烂”，就批评这是错误的，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改善，不能砸烂。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把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加以区别，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

还有一点，毛主席对林彪、“四人帮”是进行了斗争的。如果没有区别，那么毛主席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就没法解释了。而且毛主席同他们的斗争，对于我们粉碎林彪、“四人帮”是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的。关于这个方面，讲话中有一段估计，说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先是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揭露和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这样讲

是合乎实际的。1970年庐山会议，毛主席不是讲嘛，庐山会议闹了一个大笑话，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很多中央委员都分不清楚。本来他主张不要设国家主席，结果很多同志一听林彪说要设国家主席，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结果一哄而起。如果不是毛主席在这个时候写了《我的一点意见》，那林彪这篇讲话传出去，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正是因为毛主席识破了林彪要设国家主席的阴谋，接着才把林彪打退了。如果这个时候毛主席不出来说话，那庐山会议开的结果是什么样呢？很难说了。所以，正是毛主席把林彪揭露了，把陈伯达揭露了，随后又对“四人帮”进行了多次的批评。当然，毛主席虽说过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但他老人家没有最后下决心。如果不靠周总理，不靠邓小平同志、华国锋同志、李先念同志、叶剑英同志，这个“四人帮”的问题很难解决。叶帅在这场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粉碎“四人帮”，不发一颗子弹，不流一滴血，大乱子没出，中乱子没出，连小乱子都没出。如果不是叶帅领导的我们全体解放军的指战员的坚决支持，这样顺利地达到目的，简直是不可能的。

林彪、“四人帮”的横行给我们的教训，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写了四条。

这四条主要教训是：

第一，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就是要解放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无产阶级取得了全国政权，特

别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生活。除非发生国外敌人的大规模入侵，决不能因为出现这样那样的干扰而离开我们的工作重心。

第二，对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的国内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必须作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科学分析，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我国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我们既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又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更不能人为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一定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决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更不能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进行党内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够长期保持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

第三，必须正确理解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尤其重要。马克思主义承认领袖人物在历史发展中有重要的以至必不可少的作用，同时认为起进步作用的领袖必须是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群众意志的执行者。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按照列宁的说法，通常不是一个人而是由若干被称为领袖的人组成的集团。各级组织都需要它们的领袖人物，这些领袖人物和他们的威信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产生的。任何领袖人物都不是神，都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都不应当加以神化。决不能贬低集体，贬低群众，任意夸大领导者个人的作用。必须在党内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充分发展民主，在各级组

织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不能少数人说了算，不能搞“一言堂”，不能容许任何个人凌驾于组织和群众之上。

第四，必须进一步健全党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全体党员和全体公民的民主权利，使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从党的领导人到每个党员，从国家领导人到每个公民，在党纪和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不受党纪约束的特殊党员和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绝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权。

讨论过程中，有的同志希望加一条，说我们在过去的十年吃亏吃在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非马克思主义。要提高马列主义的思想水平。后来考虑，这个马列主义的思想水平问题，同现在写上的这四条经验教训是不同类型的问题。这四条经验教训，只要认真学习，认真去做，可以说，每个党员甚至每个公民都是可以做到的。而对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识别能力这件事情，可是不容易。所以，这个问题不放在这里头讲，而在最后，按叶副主席的指示加了一段。

关于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讲话指出，经过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我们提高了识别是非的能力，提高了斗争的本领，是一个极其宝贵的收获。“文化大革命”锻炼了我们的人民，锻炼了我们的党员，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增强了我们的识别能力。这确实是一个很宝贵的收获。接着，按照叶帅的意见，写了革命理论的重大意义，说事实

再一次证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一旦在实际斗争中被群众所真正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我们相信，只要党和政府同亿万人民群众一道，坚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认真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创造新的经验，就一定能够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纯洁性，一定能够使社会主义制度愈来愈完善、愈来愈巩固，从而堵塞野心家、阴谋家可以用来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漏洞。叶帅的意见，要把这个问题写清楚，就是要强调理论，理论掌握了，才能说清楚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个什么样的关系。上面这段话，就是按照叶帅的指示写的。

四

“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这一节的第一段，是这样提的：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里虽没有在文字上说明这是我们的政治路线，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有一点新的内容，就是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虽然强调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作为今后的任务，不能只限于这么四个现代化。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

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一般地讲，四个现代化偏重于从生产力、科学技术方面讲问题。实际上，要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还有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改善和改革，也还要改革和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就是说，经济制度要改革和完善，政治制度也要改革和完善，而且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内容，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国庆讲话还有一个重要提法：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最近，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后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了当前的最大的政治问题。小平同志说：经济工作、经济问题，现在是最大的政治问题，说的更准确一点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国民经济被林彪、“四人帮”破坏得很厉害。现在许多社会政治方面的问题也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不仅经济本身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很多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也应该从经济上找出路。

祝愿新一代专家健康成长*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我想同大家就学习方面、研究方法以及有关的问题交换一些意见。

第一，认清形势，下定决心，钻研学问，成为专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作出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关系我们祖国命运和前途的事业。为了顺利完成这个极其伟大、极其艰巨的历史任务，我们必须有一支与之相适应的队伍。

党中央反复强调，如果不去很好地培养和组织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队伍，没有大批各个方面的合格人才，即使有了规划，有了各种法令条例，现代化还是实现不了的。当前，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人才不够，专家不够，学者不够。应该说，还不是一般的不够，而是差得太远、缺得太多。现在，研究生院有一百三十一个专业，每个专业只有几个人、十几个人。全国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加上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讲话。

高等院校的社会科学教学人员,也不过两万人的样子。这同国家的要求来比,还称不上是个队伍。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很大,大量的新专业有待开辟。从人数来说,几万人不够,上百万人也不够,应该有几百万人。例如,要有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就需要几十万律师;要搞经济建设,经济部门的分工越来越细,没有几十万经济学家、各方面的经济专家,是不可能把经济理论和经济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研究清楚的;我们要创造高度的物质文明、创造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需要很多有学问的人。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许多同志一时需要做这个工作,一时又需要做那个工作,要长期钻一门学问很困难。这样,就在党内造成一种状况:我们虽然培养了大批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他们从事政治工作、群众工作、军事工作是很有经验的,但是把他们的经验上升为系统的科学理论的专门家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学者,却是太少了。而确有学问、确有专长的人越多,我们的事业就越能顺利前进,越能克服和避免现在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弊病。这是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社会科学院十年不能正常进行研究工作。现在,院内研究人员平均年龄是四十六岁,一些老专家深深感到面临一个严重的危机,认为不切实改变研究人员老化的状况,社会科学事业就会陷入后继无人的境地。大家希望把研究生院办起来,招一批经过考试合格的青年同志,经过一段培养,成为社会科学院的新生力

量。去年招了四百多人，今年招了一百五十多人。就社会科学院的物质条件来说，招生人数已经超过了我们所能负担的程度。但是，同国家的需要相比，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差得很远很远。这就更加要求同学们十分珍惜这个时机，奋发努力，争取将来能够为国家多做一些事情。我们希望考入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同学，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根据国家的需要和自己的专长，根据自己的基础和志向，确定一个方向，从某一个方面努力钻研学问，十年八年之后成为专家。如果你们经过长期学习还是没有专长，那就同时代的需要不相符了。

在我国革命的历史上，每次大的革命运动，大的历史转折，都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作用。知识分子，首先是青年知识分子，总是成为较早觉悟的一部分人。“五四”运动以来，几代知识分子走出课堂，参加武装斗争或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是时代的需要，不这样做，就违背了历史发展向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正是这些青年，同工人、农民、士兵结合，在革命根据地、在战场上、在白区地下斗争中，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样的革命传统，现在的青年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但是，由于时代的前进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历史向知识分子提出的要求是不同的。所谓先进性，在不同的条件下应该有不同的内容。今天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应该如何继承和发扬这些革命传统呢？这就要考察今天的形势，今天的时代要求。

大家都深深感到，中国在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不算很大，可是后来，我们就越拉越远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十年动乱耽误了时间，耽误了培养人才。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得出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有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了三大改造以后，应该把主要的力量放在经济建设上。要想把经济建设搞好，就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林彪、“四人帮”培养青年，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他们实际上是在制造社会主义事业的破坏者。我们必须培养青年具有无产阶级觉悟，但这种觉悟必须落实到以全部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伟大事业上。是不是一切为了祖国的现代化，是不是真正为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应该成为我们时代一个人先进与否的根本标志。我们希望研究生院的同志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不只是眼前这样看，而且要长远地这样看。在这个问题上不下决心，眼前得不到好处，长远也得不到好处。

中国不需要空头政治家，需要的是有真才实学的专家。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把个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就是说，在我们考虑做什么事情时，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国家对我们的要求。一九七八届研究生已经开始学习专业了。每一门专业都有很多学问，可供选择的方面是很多的。选定后，就要决心干它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社会科学没有十年功夫，是走不出路子来的。

你们进入社会科学院的年岁已经大了一点，这是林彪、

“四人帮”的干扰造成的。就你们同“文革”前大学毕业生比较，文化知识、理论、文字水平可能差一些，但是你们经过了十年大动乱，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做了一段工作，这一点比刚出学校就进机关强得多。两相比较，你们要培养独立研究工作能力，用的时间也许可能比他们短一点，但没有五六年也不行，着急是没用的。希望在一两年内就写几篇文章，但那只是热热闹闹，飘飘浮浮，如此而已，没有希望。不用五六年功，不能成为专家。要安心在课堂里听讲，安心在图书馆、阅览室里读书，扎扎实实收集材料，认真研究问题，钻研专业，排除各种各样的干扰和引诱。过去说面壁十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是多次受到批评的。我看，对这种提法还是要分析。一个人不能离群索居。研究学问，要广泛吸取前代人和同时代人的成果，要了解实际情况，要总结实践经验，完全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是不行的。完全不闻窗外事不行，不专心读书、研究学问也不行。你们有些实践经验，这对于培养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立工作能力来说，是一个有利条件。利用这个条件，花上五六年时间切切实实地用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这一条，今天想这个，明天想那个，今天看到这件事热闹去凑一下，明天看到那件事能出风头也去凑一下，五心不定，六神无主，时间是很容易晃过去的。如果三十五六岁还不走上路，那就很难成为专家。

希望每个同志都不要做任何一件不利于安定团结的事。那样做，对国家、对人民、对自己都没有好处。热闹一

阵，几个月冷静不下来。不如把时间充分利用起来，读几本书，通读《资本论》。这不是要同志们埋头读书，脱离政治。问题在于，必须弄清楚什么是最大的政治。对于你们来说，不关心四个现代化，不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发努力，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的政治。你们的任务是什么？是钻研学问，成为专家。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把自己的活动和我们国家的政治紧密结合起来。

我劝同志们好好利用这三年的时间，努力学习。将来能不能成为专家，关键在于是不是在这三年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要成为有理论、有觉悟的，能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专家。

列宁指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我们年轻干部的培养和形成，通常都是按各个科学技术部门，按各个专业进行的。这是必要的、适当的。没有必要使一个医学专家同时又是一个物理学专家或植物学专家，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但是有一门科学知识却是一切科学部门中的布尔什维克都必须具备的，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社会发展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以及共产主义胜利的科学。因为，那种局限于自己的专业，譬如说局限于数学、植物学或化学，而对自己专业以外的东西一无所知的人，尽管他们自称为列宁主义者，但是

决不能认为他们就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1】

据说,研究生院有些同志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兴趣不大。这使我很奇怪。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走错门了。我们研究生院是社会科学学院领导的,我们开宗明义、毫不隐讳地宣布,社会科学学院的一切工作,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我们研究生院培养出来的人,如果不懂马克思主义,考试不能算及格,毕业论文里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也不能算毕业。在我看来,不懂马克思主义,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不可能真正掌握社会科学知识的。即使收集了一些材料,也不可能认识其中的内部联系,不可能把握事物的规律。

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使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中的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不那么相信了。粉碎林彪、“四人帮”后,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互相比较以后,一个善于总结历史规律的人应该做出这样的结论: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的事业就不可能胜利,不可能前进。

现在,我们社会中还存在各式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有封建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每个人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各种思想的包围之中。说自己的思想是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的,这种话不可信。因此,每一个革命者,都要有意识地、自觉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它灌输到自己的头脑中去,不断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果不是这样,甚至对实践已经证明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加以鄙视,认为这

才叫“解放思想”，那就不对了。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无法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背离客观规律的所谓“解放思想”，就只能“解放”到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那里去。这样的“解放”，不是前进，而是倒退。列宁早在《怎么办？》中，就阐述过这样的道理，认为否认必须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就是替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扫清道路。

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从反面提高了我们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增强了我们同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作斗争的本领，增加了我们为保卫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而斗争的能力。坏事变成了好事，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收获。我们相信，党、政府和人民一道，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创造新的经验，就一定能够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和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定能够使社会主义制度愈加完善和巩固，一定能够堵塞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漏洞。在座的同志要成为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各行各业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搞社会科学的尤其必须毫不动摇地、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头等重要的必修课。

林彪、“四人帮”破坏教育事业，重要的一条是破坏基础理论的教育。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要重视基础理论的教学，研究生院安排一年时间搞基础理论教学，是非

常必要的。今年新招的研究生，平均不到三十一岁，“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八岁，马克思主义的书恐怕读的不会太多。“文化大革命”期间受的影响，更多的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粉碎“四人帮”以后，你们在拨乱反正，批判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斗争中，理论上提高了没有，提高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有必要认真想一想，衡量一下，看看自己基础理论的底子打得扎实不扎实。如果不扎实，就应该利用在研究生院的时间好好打基础。有了理论基础，就有了锐利的武器和正确的指导方针。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全部科学文化的总结。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有划时代的作用。资产阶级学者从他们的利益出发，不断地同马克思主义进行辩论。对马克思主义这样一门科学，如果我们不认真学习，甚至对它表示轻视，这将成为你们在走向专门家的道路上的致命的障碍。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每一个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必须学习和掌握的。否则，想在某一个专业上有所前进，有所发明，有所创造，那是不能设想的。

听说上学期有些同学对学《资本论》不感兴趣。不客气地讲，这是因为还不了解《资本论》是怎么回事。列宁的《哲学笔记》中有一段话：“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

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而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向前推进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2】一个人当了社会科学的研究生,却不愿意读《资本论》,这除了说明自己幼稚无知,还能说明什么呢?有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敌人监狱里进行绝食斗争,就是因为敌人不允许他们读《资本论》。“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五七”干校时,每天晚上坚持读两小时《资本论》,每段至少读三遍。重新读了一遍《资本论》,觉得自己在世界观、方法论方面受益很大,有了提高。鲁迅讲,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以后相信一条:唯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这是世界观的根本问题。这次读《资本论》,使我比过去更清楚地了解到马克思怎样论证资产阶级的丧钟已经敲响、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样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更加坚信社会主义必胜。《资本论》是无产阶级的“圣经”,是给革命者以信心的科学,是使人看到将来的科学,是教导和鼓舞人们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科学。怎样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资本论》是一部典范著作。一个有志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人,还可以从中学得怎样用马克思的方法来收集、占有、分析、整理材料,进行论述,得出结论,在学术著作中展开严谨的、像艺术品那样的结构。我劝没有认真读过《资本论》的人补上这一门课。每天读一小时,一小时读二十页,十天二百页,一百天就能读二千页,《资本论》五六千页,一年就读完了。这是值得的。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不论哪个专业的同

学，解决世界观、方法论问题，都必须读这本书。

此外，我还建议同学们把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当作学习科学的方法论的哲学著作读一读。我读这本书收获也很大。我有一个体会：许多哲学著作，读时懂了，怎样在它指导下认识和解决问题，却又很难。《论持久战》的每篇每节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讲到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有些人不注意《论持久战》，好像它只是一本军事著作。实际上，这是一本很好的哲学著作，每一节都可以看成短篇哲学论文，逻辑的严密，论证的贯彻始终，可以同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哲学著作相媲美。我个人从这两本书里，学到了许多东西。我相信，同学们只要下功夫读几遍，肯定会学到更多的东西。

第三，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一下子想综观全局，写出宏篇大作是很困难的。开始搞研究的同志，还是先搞比较小的问题，扎扎实实地前进。要从一个个小问题开始，不要大而无当，空泛地想大题目，要积累资料，关于一个问题的材料应该做到应有尽有，不要东鳞西爪，这里摘一点，那里摘一点。不管哪个问题，你选定了以后，就要尽可能广泛地收集同这个问题有关的全部材料，这是偷懒不得的。至于那种根本不从材料出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就更不值得提倡了。

清初画家石涛有一句话：“搜尽奇峰打草稿”。这可以作为我们搜集材料的座右铭。中国有许多奇峰异岭，华山有华山的奇峰，桂林有桂林的奇峰，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要把

天下的奇峰都搜尽了，然后以这个为基础打草稿。做学问的人功夫不到这个程度，想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只能是妄想。题目大了，报刊书籍材料浩如烟海，几个月、一两年也看不完，要做到“搜尽奇峰打草稿”就很困难。题目小一点，在这个问题上占有前人的成果，研究现有的材料，日以继夜，不半途而废，就比较容易有创见。

先要有尽可能完备的材料，第二步才是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这是苦思苦想的阶段。有了材料，还要有正确的理论观点，用科学的方法把观点和材料结合起来。有的同志搜集材料很用功，但是形不成观点，不善于完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要苦思苦想，进行探索，理出个头绪来，搞成一个完善的东西，比前人有所发展。不费一番功夫，想探索出一点新的东西是很难的。

第三步是写成文章。写文章就像女同志生孩子，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不管怎样，总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没有不疼爱的。搞研究的人，写了一篇文章，那确实是很愉快的。这是辛勤劳动之后的一种享受。可是有了成果之后，千万不要认为文章总是自己的好，别人的一概不在话下。要冷静、谦虚，请大家看看，广泛征求意见，特别要请有不同意见的人看，要放一放，不要急于发表。经过反复修改，就会前进一步。

一九五一年我在新疆工作，曾经和七八个同志到南疆去，整整花了十一个月的时间，走了十二个县，进行了十二个乡的典型调查，十几个专题的调查，整理成了南疆社会调

查。调查的时候是非常繁琐的。你要对一个地方的阶级状况有所了解,就要到各家去进行细致的访问。不爱听,不耐烦,想当然,调查了一两户,就以为不过如此,不愿继续调查了,那是不行的。要把那里各个地方的情况加以比较,提出共同点是什么、不同点是什么,又要和内地农村加以比较。这就属于整理材料。我们在那个辽阔的地区进行了一次历史旅行。南疆整个来讲是封建社会,其中又分不同的时期,有封建社会初期庄园经济农奴制度的典型,也有农奴制度瓦解后半农奴制度和农奴制度残余的典型;有封建社会末期,农奴制度已经消失、劳动力的自由市场已经基本形成、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的那种典型。把这些典型一个一个地加以解剖,就等于粗略地考察了一部封建社会史。这对于我理解封建社会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如果认为走马观花、随手了解一点零零碎碎的情况就行了,就达不到这个目的,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收获。

在收集材料、整理材料、写出文章的整个过程中,要注意一点,就是排除私心杂念,排除各种犹豫动摇,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希望一篇文章就成名,不要考虑早点发,怕人家抢先了,更不要去考虑多得稿费还是少得稿费。所有这些私心杂念都会妨碍用科学的态度治学。马克思认为,钻研科学的人,要排除一切动摇和犹豫,有决心进地狱那样的精神。中国人常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搞科学确实是很艰辛的事业,怕麻烦,怕风险,就得不到虎子,纠缠于个人得失,就会妨碍自己前进。

这里顺便讲一下师生关系问题。研究学业的长进,与导师关系很大。因此,一定要尊敬导师,虚心向导师学习。“文化大革命”中,学生造教师的反,在林彪、“四人帮”煽动下,搞坏了师生关系。一些老师感到心寒,把带学生视为畏途。其结果,老师受到打击,学生也深受其害,打倒了老师,自己无非是空虚、无知、愚昧。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应当永远记取。当然,学生向老师学习,也不是变成思想懒汉,一定要独立思考,发挥创造性。每一个好导师,都是热情培养下一代,真诚希望后来居上的。一代比一代高明,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不然社会就不能前进了。老师的作用是引路,“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总之,要互相尊重,互相帮助,达到教学相长。

鲁迅曾经向青年忠告:“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有一点,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3】五年、十年八年之后,如果能看到从今天在座的同学中有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健康地成长起来,我们将是非常高兴的。

注 释

【1】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

总结报告》。《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第 1 版，第 462 页。

【2】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第 1 版，第 233—234 页。

【3】 鲁迅：《鲁迅译著书目》。《鲁迅全集》第 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第 1 版，第 185 页。

悼念田家英同志*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八日)

我们的老战友田家英同志，由于受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的诬陷和迫害，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含冤逝世。他离开我们的时候，年仅四十四岁。多年以来，对于家英同志不幸逝世的哀悼和怀念，一直深深埋在我们的心里。

田家英同志是四川省成都市人，出生在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由于贫困，曾在中药店当学徒。他在少年时代就接受了进步思想和我党地下组织的领导，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七年，不满十六岁的家英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从大后方的四川，经历了艰难险阻，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并于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在延安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中央宣传部等单位工作。从一九四八年起，担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解放后，又担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田家英同志追悼会上致的悼词。

副主任等职务。一九五六年被选为党的八大的代表；一九六四年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家英同志是一位经过长期革命锻炼，忠于党、忠于人民，有才能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做了大量的工作。

家英同志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许多年中几乎用全部精力，参加《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及毛泽东同志其他著作的编辑、注释和出版工作，为党做出了贡献。他发表的文章，绝大部分是宣传和介绍毛泽东著作的。他认真领会毛泽东思想；他为在人民群众中普及毛泽东思想，倾注了大量心血。

家英同志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抱着为广大劳动人民谋福利的崇高目的，许多次深入农村，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他即使身在城市，也时刻关心广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映了许多重要情况，提出过不少正确的、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中央有关农村政策的许多文件，如《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等等，他都参加了起草工作。

家英同志在主持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工作期间，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及时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为人民群众解决了大量的实际问题。他十分注意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使党和人民群众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支持和保护来信来访群众行使民主权利。

家英同志自小生活在社会下层，习惯于体察民间疾苦，对劳动人民具有深厚的感情。不但在战争年代和土地改革中，即使进城以后，条件变了，他仍然自觉地同劳动人民在思想感情上保持联系，保持一致。他进行农村调查，常常到最艰苦的地方，住在贫苦农民家里，细致地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和他们的要求。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为国为民，忧心如焚。当他亲眼看到一些农民生活极端困难时，常常忍不住流下眼泪，难过得吃不下饭。为了早日恢复国民经济，尽快改善群众生活，他常常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在我们党的民主生活一度受到损害时，他也不顾个人安危，真实地、负责地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映群众疾苦，指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的话。一九六五年，家英同志参加整理一个谈话记录。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反对把《海瑞罢官》一剧说成是为彭德怀同志翻案。事后不久，就被一个混进党内的坏人告发，从此对他定下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大罪。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当着党内斗争出现错误偏向的时候，在最关键的时刻，家英同志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保护同志，不惜牺牲自己，把责任全部承担下来。家英同志也犯过错误，向党组织提过错误的意见，但他绝不躲闪推诿，更不牵连别人。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之后，回过头来看家英同志的这些好品质，更加显得难能可

贵,更加使每个同他一起工作过或者受过他保护的同志,感到他的可亲可敬。

家英同志对于混进党内并身居高位的坏分子,像陈伯达、江青之流,很早就看出这伙人的恶劣品质,曾长期同他们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并被他们恨入骨髓。

家英同志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有时甚至废寝忘食,奋不顾身。一九五四年他参加我国第一个宪法的起草工作,有一段时间经常通宵不眠,累得吐血,但仍坚持不懈,直到按时完成任务。

家英同志的好学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从小主要靠勤学自修,达到了相当的文化程度。参加革命后,几十年如一日,用功读书,认真学习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并努力用马列主义原理指导自己的工作,逐步成为党的一个比较博学能文的干部。

就是这样一位从少年时代参加革命、几十年来忘我工作、为党和人民做出了一份贡献、并且具有许多共产主义优良品质的同志,就是这样一位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了十八年、忠实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却被林彪、江青、陈伯达及追随他们的居心不良的人,诬陷为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置之于死地。当我们今天悼念田家英同志的时候,想到林彪、“四人帮”一伙残害大批革命同志的罪行,怎么能不感到悲愤难平!

如同任何一个忠诚的革命者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弱点和

错误一样，家英同志当然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家英同志刚直不阿，但比较脆弱。在顺利的环境里，他往往锋芒太甚；而在受挫折的情况下，又缺乏韧性。他胸怀坦荡，但有时会犯点自由主义的毛病。家英同志虽然有这些弱点，但他勇于接受批评，当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的时候，总是力求改正，避免重犯。不管林彪、“四人帮”一伙对他怎样诬蔑，家英同志不愧是我们党的一位好党员。

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使我们党损失了一大批优秀的干部，家英同志是其中的一个。时光如矢，家英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快十四年了。作为同他一起战斗过的老战友，作为他的同志、朋友，今天大家聚集在这里悼念他，心情是十分悲痛的。他的真诚、坦率、亲切、耿直的生动形象，好像还在眼前。对于所有他的老战友来说，对于同他接触较多的同志来说，这一形象是不会消失的。

现在，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艰巨任务，摆在大家的面前。如果家英同志还在人间，他是一定会更加发奋工作，发挥他的才干和智慧，做出更多贡献的。但这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应该以共产党员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百倍努力地进行工作，以弥补家英同志和其他革命前辈、战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幸去世对党造成的沉重损失。

让我们假定家英同志还有知觉吧，让我们告诉他：家英同志，你曾经为之奋斗终生的我们的共同事业，一定会获得成功。

共产党员要学习党的纲领^{*}

(一九八〇年四月八日)

党章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法规。按照惯例,每次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要根据形势的发展、任务的变化和党的建设的需要,对党章进行必要的修改。现在看来,十一大通过的党章,无论在内容上和结构上都很不完善,有的条文仍然沿袭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提法。因此,中央决定,在召开十二大以前,需要总结我党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要求,着手制订新的党章。

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是一个非常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小平同志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六日代表党中央所做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四项基本原则中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中国是个大国,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坚强的党,要把近十亿人口组织起来,完成社会主义现

^{*} 本篇和下篇是邓力群同志在铁道部党校介绍《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的讲话。

代化建设的任务，是不可设想的。要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把党建设好。只要我们的党是一个好党，我们的党员是够标准的党员，我们党的领导是好的领导，尽管今后还会遇到很多困难，甚至会遭受挫折，我们也有充分的信心和力量战胜种种困难，实现四个现代化。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党内党外有各种各样的思想问题。其中有一点，就是部分同志对四个现代化能不能实现信心不足。党内有相当一些同志认为，如果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员还是现在这样的状况，如果党的领导不改善，四个现代化究竟能不能实现，是有问题的。中央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并决心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准备通过修改党章作出新的规定，要求全党同志按照新的党章去办，把我们党建设好。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中心环节，也可以说是个关键问题。

这个党章修改草案，不但恢复了七大和八大党章的优点，而且根据新的经验、新的情况，在内容上作了很多新的补充，新的发展。

党章修改草案有个总纲。这次的总纲同以前的写法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七大到十一大的几个党章的总纲，实际上是党章的大纲，或者说是党章的序言，有点像各章的概括说明，与各章内容区别不很大。就内容来说，其中没有提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观点，没有提到现阶段世界形势和中国形势的特点，也没有阐明党的基本性质和任务，因而很难说成是党章的总纲，每次的党章，都要求党员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但是没有规定纲领，又怎样要党员承

认呢？这次党章修改草案的总纲，突破原先的格局，改变了写法，增加了新的内容。总纲遵照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了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写了党的目标以及怎样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党不同于其他政党和团体的主要特点是什么，等等。这些内容，可以作为向党员进行党纲教育的最起码的要点，经过以后几次党的代表大会的修改、充实，可以逐步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纲领。

总纲写了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指出资本主义必然要为社会主义所代替，共产主义必然要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要经过什么道路呢？马克思认为，一定要经过一个革命转变时期，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总纲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提法。

过去我们还有一个提法，就是要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说过的。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这个提法，则是列宁、特别是斯大林后来提出来的，有它的特定的含义。

这次总纲所以不用“经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提法，而是用“经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考虑到，列宁也好，斯大林也好，讲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指俄国十月革命这种形式。斯大林过去把十月革命的意义强调到这样的程度，即一切国家都只能而且必须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途径来办事，结果在全世界范围内教条主义大为泛滥。另外，十月革命是在俄国发生的，俄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因此，俄国布尔什

维克党就被说成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当然领袖，一个中心的提法也就出来了。我们过去常说，十月革命是很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越来越证明，这种革命形式不一定是每个国家都必须采取的。十月革命的特点，是城市工人阶级首先发动起义夺取政权，然后把革命推向农村。中国革命就走着不同的道路，我们的办法是乡村包围城市，首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夺取城市。东欧一些国家，是苏联红军打到那个地方，把那个地方的侵略者和卖国者打垮了，本国革命力量在外国革命力量的帮助下，建立自己的人民革命政权。这和十月革命的形式也不同。南斯拉夫革命又有自己的独特性。至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相信终究都要走向社会主义的。但是，这些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进行革命斗争的形式，是不是同已经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一模一样呢？这还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让历史的发展来做出答案的问题。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过去是写经过无产阶级革命，现在写经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只增加了三个字，好像差别不大，实际上是考虑了上面说的那些重要因素的。

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什么叫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理论界有各种各样的看法。看法不一致的一个原因，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的认识还不那么一致。

总纲讲了，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征是，从生产资料私有制变成生产资料公有制。在讨论过程中，有的同志希望不要光

写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这么一句,要把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依附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个体经济都写上。中央考虑,这样过于具体的规定,可以放到宪法里面去写,在党章的总纲里写一句生产资料公有制就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全民所有制的问题,理论界也有争论。斯大林说过,苏联实行的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是国家所有制。我们理论界有些同志,否认我们现在的全民所有制,认为不如索性讲清楚,我们现在的全民所有制就是国家所有制。有些同志则不赞成这些意见。这个问题还需要继续探索。总纲写得太具体,不利于今后的讨论。

第二个特征是消灭剥削。这样写法有实际意义,就是允许那种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者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消灭剥削,不能允许劳动力成为商品,不能允许把货币变为资本,来获取剩余价值。这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如果说,社会主义社会不允许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个体劳动者存在,或者说允许这种个体劳动者存在的社会就不叫社会主义社会,那么我们现在很多政策就说不通。中国是一个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就业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拿城市来讲,要搞全民所有制,也要搞集体所有制,而且是不同形式的集体所有制,同时也应该允许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者存在。这样,城市就业面就扩大了。拿农村来讲,执行两个农业决议,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持续增长,大多数地区的集体经济更加巩固。另外,有些地广人稀、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很贫穷

的地区，我们多年来搞“一刀切”，把这些地区和其他地区等量齐观，看不到这些地区的特点，在这里也强调搞集体经济，一户一户相距七八里、十几里，硬要把人家组织成一个生产队。事实证明，这样做没有促进生产的发展，而是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允许这些地区采取包产到户的形式，或者有点个体农民，对于我们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会发生多大的危害呢？我看没有。只要不剥削，多种途径都可以实行，多种多样的生产责任制都可以办，这样一来就把经济搞活了。

第三个特征，是实行按劳分配。过去我们常讲“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马克思讲到“按劳分配”的时候，前面没有讲“各尽所能”。把“各尽所能”和“按劳分配”联在一起的是斯大林。总纲的写法，还是使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

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剥削、按劳分配，就应该叫作社会主义。至于具备了这三个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有一个发展过程，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无疑，作为一个处于发展中的现实社会，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不可能纯而又纯，不可能是清一色的公有制，也不可能没有任何剥削现象，但作为一种制度的本质特征，则不可能既是这个又是那个，既有这个又有那个。我们的纲领要求从本质上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线。

社会主义社会同其他社会一样，都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按照毛主席过去的提法，先是不发达的社会

主义社会,下一步就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的提法,只是一种设想,至于将来究竟是两个阶段、三个阶段还是四个阶段,要靠实践来回答。但是,不管是低级阶段也好,高级阶段也好,都必须具备上面所说的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三个本质特征。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到达了高级的或发达的阶段以后,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是就此停步了呢?当然不是。我们还要继续前进,就是向着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前进。那么,从社会主义社会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条件呢?总纲也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写了必须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政治、文化的巨大进步。这个提法包含的意思,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一九五八年八月党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

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2】}以上这两段话，还只是指出了共产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如何实现，这样的问题只能靠以后的实践来解决。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共产主义不仅要消灭剥削，而且要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是应该消灭的，但是阶级差别在很长的时期还会存在。到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一切阶级差别都要消灭，城乡差别要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也要消灭，那时才能真正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关于“各取所需”的翻译，有这么一个变化。过去是用“各取所需”的，到了一九五八年，因为要和“按劳分配”，相对称，前面叫“按劳分配”，后面改成了“按需分配”。这次又经过懂外文的同志反复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文，认为还是译成“各取所需”准确。“按需分配”这个提法，在“大跃进”的时候被曲解了。那时候把我们实行供给制的一些措施，说成这个是按需分配的因素，那个也是按需分配的因素，这就把共产主义的标准降低了。

总纲写了一段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语言也很概括。从根本上说来，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你剥削我、我剥削你了，也没有这个剥削集团和那个剥削集团之间的冲突了。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以后，这个国

家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也就可以实现了。

最近，胡乔木同志在新闻学会成立大会上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篇讲话，讲得很好。他说，我们的社会，建立在全体人民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因此我们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有共同的道德标准，有共同的领导，有共同的纪律，有共同的行动。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设想的，无法实现的。我们有些同志对社会主义制度有没有优越性产生疑问，以至个别相当负责的同志都有点气馁，不能理直气壮地来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上面说的这几个“共同”，天天都可以接触到，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不讲别的吧，我们中国这么大，地区这么辽阔，全国每年都有几亿亩土地受灾，其他地方或者平年、或者丰年，因为有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就能够对粮食实行统一调度和安排，以丰补歉，避免旧社会灾区没有粮食吃，大量逃荒、饿死的现象。我们可以举出成千成万的例子来证明，有了上面说的几个“共同”，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在很多事情上，都表现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总纲还写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充分发挥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有计划、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时期可以保持高速度，但是长远来讲，它没法保持高速度。而我们只要有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计划搞得好的，可以实现长期的高速度。我们社会里有贪污分子，有搞特殊化的人，但是

从整体来讲,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过去的十年,社会主义事业受到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不是说明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而是社会主义优越性遭到破坏,优越性没有得到发挥所造成的。我们相信,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社会主义制度总有一天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点,只要真正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著作,理解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认真地思考一下,在实践中逐步领会,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应该是坚定不移的。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动摇,那就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资格,就背弃了自己的信念,就忘记了入党宣誓时候的誓词。

总纲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强调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要在全世界逐步取得胜利。同时又指出,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道路,在各个国家不能是千篇一律的。不能强加于人。各国人民必须根据本国的特点,选择自己的道路。

总纲里有一段话,专门讲我们是经过什么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根据对于我国当前经济、政治、文化状况的分析,指出党的总任务是什么。

党章修改草案中关于总任务的提法,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的提法,有了不少的区别。准则是引用了叶剑英同志在国庆三十周年讲话里说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又加了一个注,

说将来这个总任务的表达,以十二大正式通过的为准。党章修改草案说:“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有计划、按比例,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这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内容,包括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是我们的中心任务。但是,光讲四个现代化还不够,还必须加上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有的同志讲,有高度民主,为什么不加一个高度集中呢?列宁讲过,社会主义的民主同资本主义的民主根本不同。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也就是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专政;只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才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也就是绝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这里说的是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是个国体问题。我们在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必须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互相关联的。民主集中制就国家机关来说,是基本的组织原则,这是个政体问题。还有高度文明。社会主义的高度文明,包括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包括道德品质、风俗习惯等。文学艺术也应该体现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所以,用这样一些新的提法来充实以前的提法,就更完善,也更科学一些了。

总纲中关于我们党的性质的提法,同过去也有一些不同。有两句话是过去的党章中就有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我们

一向是这样提的。这次修改去掉了“是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一句。这是斯大林的说法。他用这句话来表达共产党和群众团体、政权组织的关系，意思是说，共产党要领导政权组织和群众团体。这次去掉这句话，因为讲共产党是领导核心，就包含了共产党比工人阶级的其他组织更先进的意思。如果保留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这种说法，会造成一种印象甚至形成一种制度，共产党是凌驾于一切组织之上的，可以对一切组织发号施令。

这次修改，在总纲中加了一句话，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这句话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想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世界各族人民的利益。但是，每个国家的共产党首先要做好本国的工作，要代表本国各族人民的利益，这同维护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都讲过这样的思想。

总纲中讲到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还是一贯的提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然后，着重地讲了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和其他团体的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全党在思想上保持高度的一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党员、党的干部必须同党保持政治上的一致。你做不到这一条，就不要加入共产党。加入了共产党以后，做不到这一条，就应该退出共产党。

这次修改的总纲，对于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作了一个比较完善的表述。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经过实践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我们要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周密地调查研究现实情况，科学地解决国内和国际事务中所提出的新问题。我们不能只面对过去，要着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保持思想上的高度一致，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既要反对本本主义，又要反对修正主义。”这是准则也讲了的。

第二个特点是，党除了谋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外，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我们要永远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党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群众，都要依靠群众。这次没有用我们一向习惯的语言，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而是用另外的语言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就是“凡属群众的正确意见，就要领导他们努力实现，对群众的不正确意见，就要教育他们加以改正，既反对命令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还特别加了一句：“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允许任何党员站在群众之上。”这对于处于执政党地位的我党的每个党员，都有重要意义。

第三个特点是，党具有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保证行动的一致，保证党的决定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共产党员同党在行动上不一致，就是忘记了共产党员应该遵守的起码的纪律。党要保持思想上的一致，组织上的纯洁，把坚持在党内进行反对党、腐蚀党、危害党的分子驱逐出党，使党经常保持自己

的纯洁性和战斗力。

这三个特点，也就是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里所讲的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的标志。但是，这次又根据我们三十年来的经验，补充了新的内容。在表达的方式上也有一些变化。当然总的精神是一致的。

总纲在讲了上述三个特点以后，概括起来说了一句，就是在这三个主要特点的基础上，形成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过去我们常讲的三大作风，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现在的写法，用实事求是代替了理论联系实际，这样更容易为广大党员和干部所理解。因为一提实事求是，谁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办事情，制订政策，作自我批评，批评别人，都要实事求是。在这一点上，毛主席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把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用“实事求是”四个字加以概括。现在，“实事求是”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语言了。用群众路线代替密切联系群众，也更容易为广大党员、干部所理解。这样表达，虽然在语言上和《论联合政府》里的语言有所不同，但是主要的意思还是完全一致的。

总纲的最后，写了怎样实现党的领导的问题。这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正确；再一个是党的各级组织要善于做好组织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还有一个是每个党员都要发挥骨干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只有这三条都具备了，党的领导才能够实现。在实现党的领导中，要注意充分发挥非党组织的作用，使它们能够积极主动

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进行工作，不要对它们进行干涉。因为党员永远只占全国人口中的极少数，党还要求党员和非党员亲密合作。

马克思曾经强调，党的纲领是党的一面旗帜。我们正处于拨乱反正时期，这面旗帜是丝毫也不能模糊的。我们的共产党员心中有了这面旗帜，才能有正确的奋斗目标和政治方向，才能有真正属于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党性，提高自己的战斗力。通过学习总纲，明确党的基本纲领，这是我们学好整个党章的前提。

注 释

- 【1】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12页。
- 【2】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449—450页。

做新时期合格的共产党员

(一九八〇年四月八日)

对于这次党章修改草案的总的要求，就是要充分体现提高党员标准、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的精神。现在，我们党所处的地位和面临的任务同取得全国政权以前已经大大不同，提高党员的标准问题具有非常现实、非常重要的意义。

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掌握在我们手里，但是全国的大多数地区是国民党统治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包括在根据地入党的党员，首先都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加入共产党以后，敢不敢为革命掉脑袋。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党员，要考虑会不会被敌人抓去、被枪毙；在根据地的党员，要考虑国民党打进来了怎么办；在部队的党员，要考虑打仗的时候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还是冲锋在后、退却在前。那个时候，斗争残酷，对每个党员来说，每天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事实证明，在那样的环境下，不愿牺牲一切而又入了党的人，如果不认真改造自己，在革命斗争中是很容易被淘汰的。

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的情况就不同了，党处于执政党的

地位。这个时候入党的绝大多数同志都是好的,但也确有一些人入党动机不纯。因为这个时候入了党,可以做官,做了官可以有权,有了权可以谋取私利。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有的人一个时期也可以表现得不错。这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的党员经受了很大的考验,不少人有很痛苦的教训。这次党章的修改,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也考虑了今后我们党所承担的空前艰巨的历史任务,在党员这一章中,对党员提出了比过去更高的要求。这个精神,体现在党员这一章的每一条里。

第一条,是讲具备什么资格的人才能够加入共产党。过去的党章,都是讲“接受党的纲领和章程”。这次改成两句话:“拥护党的纲领,接受党的章程。”因为不光是一个承认的问题,而是要强调拥护党的纲领,决心为它的实现而斗争。

第二条是新增加的。这是考虑到我们党已经成为执政党,对党员的要求,不但不应当比在革命战争年代有所降低,而且必须更严格些。这一条要求党员不只要有革命觉悟,自觉遵守革命纪律,成为先锋战士,还要明确地做到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这是共产党员的世界观问题。这个要求不是口头上的宣言,而是要真正贯彻到行动中去。

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不能够形势好的时候信心就足,形势不好的时候信心就发生动摇。共产党员的品格所以可贵,固然要表现在形势好的时候干劲十足,想干得更好一

点；尤其要表现在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甚至遭到失败的时候，仍然不屈不挠地、满怀激情地、坚韧不拔地为党工作，仍然坚信共产主义事业一定胜利。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曾经遭到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这当然是很痛心的事。作为一个有坚定信念的共产党员，看到这样的破坏，应该下定决心来排除这种破坏，通过我们的奋斗和工作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重新发挥出来，而且发挥得更好。如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发挥得好你就相信，发挥得不好你就怀疑，要这样的共产党员干什么！这同在取得政权以前，形势发展了就要求入党，形势逆转了就脱党，不是同样性质的问题吗？

十年“文化大革命”，对我们共产党人是一个考验。今后，每个共产党员还要随时准备接受新的考验。我们相信，只要搞得好，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悲剧的重演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是，小的曲折，部分地区的曲折，会不会有？我看，会有。从国际范围来看，大的事变会不会出现？这也是要经常想到的。

对人民群众来说，党要关心他们，使他们的生活不断提高，今天好了，明天应该比今天更好。这就要求共产党员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必要的时候宁愿毫不犹豫的牺牲个人的一切，不能总想搞个人的东西。这句话说来容易，做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了。我们有些党员同志，在同群众相处的时候，有一种优越感，似乎他入了党，就高人一头。针对这种情况，这一条很明确地写了党员“仍然是劳动人民的普通的一员”。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要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力求作群众的榜样，受到群众的信赖，决不违反党规党法去谋求私利，谋求特权。毛主席早就讲过，糖衣炮弹随时都向我们袭击。每个党员，特别是拥有相当权力的党员干部一定要警惕这种危险，真正做到克己奉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你这个党员就不够格，就违背了我们党为绝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的宗旨。

第三条，是讲共产党员在应当遵循前面两条总的规定下，还必须履行八项义务。

党员义务中的第一项，是讲学习。这次修改，除了讲党员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外，增加了新的内容，就是还要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学习科学文化、劳动技术和业务知识。这样写，反映了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是为了使每个共产党员都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党员义务中的第二项，是讲党员要“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公私分明，克己奉公，绝对不得假公济私，损公利私，合伙营私”。

陈云同志说过，长征的时候，生活很艰苦，供给很困难，缴获一点东西，要在干部中间、包括领导干部中间进行分配。周总理办这件事办得很公平合理，谁也没有意见。他能真正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在这方面，周总理一向是全党的模范。

我听周总理讲过，我们的社会是平等的社会，领导人要

模范地遵守政纪、法纪，带头艰苦奋斗，不能够搞为自己图方便的事情。我们每个领导干部可要注意这个问题。

党员义务中的第三项，是讲党员要“百折不挠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坚决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共产党员的岗位、职业、活动方式、文化程度是不相同的，但是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党纪国法，严守党和国家的机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却是对他们的共同要求。只有每个共产党员都履行这个义务，全党才能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性，党才能成为有统一认识、统一纪律、统一行动的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

党员义务中的第四项，是讲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根据“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验，这一项加进了新的内容：“坚决根除派性，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和一切阴谋诡计。”林彪在思想上散布的毒素很多，其中有一条最坏，就是讲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丧失一切。林彪把这个思想搞得理论化了。我们的每个党员，说没有一点个人主义，纯而又纯，我看不能吹这个牛皮。但是，在过去，总觉得一个共产党员伸手要这个、要那个，不好意思，还是有点顾忌。自从林彪这个“理论”大肆宣传以后，那些污七八糟的东西，腐朽透顶的东西，灵魂肮脏的东西，就在党内合法化了，可以无所顾忌地干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使一些人学会了一套你整我、我整你的本领。我们党内确实有一些闹派性闹得很厉害的人。他们整天嘀

嘀咕咕，算计怎么把别人整倒整垮，把人家那一派压在脚底下，把自己这一派抬上去，全部心思就用到这上面。无数事实证明，搞派性，搞派别组织，搞小圈子，搞小集团活动，搞两面派，搞阴谋诡计，既不利人，也要害己。

党员义务中的第五项，是讲党员“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歪曲事实真相；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勇于支持好人好事，反对坏人坏事”。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的影响，派性至今还束缚着一些党员的头脑。这些同志在党的会议上，面对组织，面对党内同志，往往不讲真话，言行不一；而在派别内部、山头内部，则可以无话不谈，可以把党的会议上讨论的事情统统泄露出去。应当说，这种做法同共产党员的称号是绝不相容的。一切犯有这种毛病的同志，必须结合学习、讨论党章修改草案，真正增强党性，根绝派性，做到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

党员义务中的第六项，是讲党员要“密切联系群众，遇事同群众商量，维护群众的权利和利益，尊重群众的专门知识和合理化建议，虚心听取并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大家一定注意到了，同过去的党章相比，这一项加重了分量。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经常看到共产党员、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侵犯群众的利益、不尊重群众的专门知识和合理化建议、对人民群众的呼声充耳不闻的现象。有鉴于此，作这样比较详尽的规定，来要求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党的领导干部，是很有必要的。

党员义务中的第七项，是讲共产党员“在生产、工作和一切社会活动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忘我劳动，勇于革新；维护革命秩序，遵守共产主义道德，带头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我们常常说的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指这样三个方面：一是起带头作用，这是说共产党员要在生产、工作和一切社会活动中，成为群众的表率 and 学习的榜样；二是起骨干作用，这是说共产党员在一切活动中要成为广大群众的中坚和核心；三是起桥梁作用，这是说党员要及时把党的决议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并把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及时向党组织反映。我们每个党员都要时刻检查自己，看看自己是否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党员义务中的第八项，是讲在保卫祖国和保卫人民利益的斗争中，在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时刻，要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挺身而出，坚持到底。在这方面，解放军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一九七四年河南发大水，解放军去救灾，出现了许多感人的事情。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解放军也是冲锋在前，尽自己的一切抢险救灾。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们的干部、战士，特别是共产党员，表现得很好。一些干部子弟，在战斗中表现得也很英勇，可歌可泣的事很多。毛主席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作一个共产党员就要发扬这种精神。在生活中我们也常常看到相反的情况，就是共产党员中确有一些不光彩的人，办了一些不光彩的事。有的人遇到困难就往后退，需要他挺身而出的时候，他却溜掉了。最近报纸上有一个新闻，说哈尔

滨一个公司的宣传科长，还是共产党员，在公共汽车上，小偷偷了他的东西，民警抓小偷，进行生死搏斗，给他打招呼，要他来帮帮忙，他居然无动于衷，并说他不过丢了一个工作证，没有丢钱。哈尔滨市委批准开除这个党员的党籍，是完全应该的。小平同志说过，我们现在的党员，新党员中有一些不够格，有些老党员现在也不能成为群众的模范，不那么合格了。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毛病不改过来，我们的党员在群众中间就不是一个好形象。群众就会讲，这样的党员还不如我哩，何必加入这样的党。

党员不但要履行义务，也享有权利。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必须忠诚地履行党员义务，同时也必须懂得如何正确地使用党员权利，这两方面是一致的。党员权利也是八项。

党员权利第一项，是“参加党的有关会议，阅读党的有关文件，接受党的培养和训练”。有的同志不明白为什么写这样一项，觉得把这说成是党员的权利有点奇怪。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初期，下一个通知，全体共产党员就停止过党的组织生活，这还谈得上什么尊重党员的权利？关于接受党的培养和训练问题，我们也有经验教训。解放初期，我们搞了一些速成中学，学员学到初中或高中文化程度，就可以到大专学校去学习。事实证明，多数学员学得很有成绩。一九五七年以后，这样的学校停办了，这样的办法停止了。现在，我们不少老干部知识水平不高，业务能力不强。如果那样的学校、那样的办法坚持下去，情况就会比现在好得多。我们这次修改党章，在党员权利中写了这样的内容，

就是说，我们的党员有权利要求党来培养、训练；作为党的组织，要尊重党员的这个权利，创造各种条件来使党员能够受到科学、文化、理论、政治的训练。

党员权利的第二项，是党员能够“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问题的讨论”。这个内容，八大的党章是有的，后来九大、十大、十一大的党章都没有了。这次修改，基本上恢复了八大党章的写法，只是文字上有点变动。

党员权利的第三项，是党员可以“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和倡议，在工作中充分发挥首创性”。真正在工作中发挥党员、干部的首创精神，就必须纠正相当长时期以来，在部分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对上级指示照抄、照传、照转的形式主义态度；同时改变部分领导同志墨守成规的领导作风，纠正压制党员的合理的建议和倡议的做法，大力发扬党内民主。只有从这两个方面不断努力，才能使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

党员权利的第四项是，“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组织、任何党员和领导干部，向党的组织负责地揭发、检举和要求处分任何党员，要求处分、罢免或撤换违法乱纪和不称职的领导干部”。请同志们注意，这里讲的是“任何”，就是说党员有权利批评任何一位党员干部，包括中央领导同志在内。当然，这指的是负责的批评。林彪、“四人帮”那种进行诬陷的做法，是要坚决反对和防止的。

党员权利的第五项是，“党内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

决权”。党员的这个民主权利，在林彪、“四人帮”猖獗作乱的时期，受到了严重践踏。在不少地方和单位，存在着用各种形式来剥夺党员的这个民主权利的现象。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逐步健全。必须使全党同志明白，剥夺党员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的行爲，绝不能允许继续出现。

党员权利的第六项是，“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给予党纪处分或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其他同志可以为他作证和辩护。”“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捣乱和破坏，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的党组织往往根据片面的、甚至纯属捏造的材料对党员进行处分，而且在作出处分的决定以后才通知本人，本人不同意，又根本不去考虑检举材料的确凿与否，还要给你扣上“态度不好”、“翻案”一类的帽子。这次党章的修改，对党员权利做出这样明确的规定，可以保障党员本人有机会向党的组织说明事实和自己的意见，使党的组织避免根据不确切的或者不全面的反映，对党员进行处分、做出结论或鉴定性的决议。

党员权利的第七项是，“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可以向党的各级组织直至中央委员会提出自己的意见”。

党员权利的第八项是，“向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党的中央委员会提出问题、请求、声明、申诉和控告，并要求有关组织及时给以负责的答复”。这项内容，九大、十大、十一大的党章都没有。八大的党章对党员权利的规定，有这样

的内容：“向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到中央委员会提出声明、申诉和控诉。”这次修改，又增加了一些新意思，如“要求有关组织及时给以负责的答复”。这样写，是很有必要的。它可以防止有关组织对党员提出的问题、请求、声明、申诉和控告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以便于使一些问题和矛盾得到及时的合理的解决。

党章修改草案中关于党员权利的部分，是在充分考虑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员的权利遭到侵犯、甚至遭到践踏的情况下起草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在剥夺党员的权利上犯下了很严重的罪行。毛泽东同志也有过不尊重党员权利的错误。鉴于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危害，鉴于我们自己的错误，这次修改，又专门写了两款：“任何一级党的组织直至党的中央机关都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党组织的负责人或任何其他党员如果不尊重党员的这些权利，应当受到批评和教育；如果严重侵犯党员的这些权利，应当受到纪律处分。”以后，党员的正当权利受到剥夺，就可以根据党章的规定提出申诉。本来，一个同志加入共产党以后，同志之间相互信任，心情舒畅，在党内、在同志之间应当是襟怀坦白和无所顾虑的。我们很多同志，一向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对党忠诚。可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连党内生活都没有安全感了，谁知道哪天要被揪出来关牛棚啊！谁知道哪天要被抄家啊！党内生活的这种痛苦教训，我们应当永远记取。

做党中央和国务院忠实的 得力的助手*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胡乔木同志代表党组就我院的方针任务作了报告，明确地提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应该成为党和政府忠实的得力的助手。现在，我就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培养科研人才、促进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切实地为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的问题，讲一些意见。

从事科研工作的共产党员要努力 成为有党性、有学问的专家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社会科学工作者承担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现在，国际、国内出现的许多新情况，以及如何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按照客观规律建设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社会主义的问题,都要求我们从理论上做出科学的回答。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争取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许多学科中,攀登高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我院从事科研工作的共产党员,应当在自己的学科中成为有党性、有学问的专家。

这就要求从事科研工作的共产党员,能够真正领会和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某个学科或某一个方面占有大量材料,经过深入研究,取得有具体分析、有独立见解、有科学论证的研究成果。

我院是科学研究机关,不同于一般的宣传机关。不是说不应该进行必要的理论宣传,而是说主要任务是搞科学研究,以自己真知灼见的科研成果,直接或间接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在科学研究上,要成为本学科名副其实的内行、专家、学者,真正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是很不容易的。要打开浩瀚的人类知识宝库,借鉴古今中外的研究成果。这就要联系实际,了解、研究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从实际出发,积累详尽的材料,经过深思熟虑,从中找出客观存在的、而不是主观臆想的联系。这样的结论,才可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被实践证明是对的结论,就坚持;被实践证明是不对的,就改正;被实践证明是不完善的,就努力使它完善起来。这样一步步地前进,逐步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达到中国以至世界的先进水平。

真正做到这一点,必须注意改造我们的学风,不能一知半解,东听一点,西看一点,拼拼凑凑,粗制滥造;不能停止在马列主义的现成书本上,靠摘录经典作家的某些词句

演绎出一系列似乎不可动摇的结论来，并拿这些结论来剪裁社会生活；更不能看风头，赶时髦，追求个人名利。一句话，要有长期甘于“寂寞”、不怕坐冷板凳的精神准备，下苦功夫，付出艰辛的劳动。

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党员，必须认真搞好科学研究，把大家真正团结在一起，带动起来，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要谦虚谨慎，防止骄气。林彪、“四人帮”的横行，使我们耽误了整整十年时间。在社会科学院真正掌握系统的专门知识、很有见解的人，数量是不多的；多数同志是这两三年来才重新搞研究，许多学科还没有形成队伍。我们要有自知之明，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要抱老老实实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近一年多来，我院举办的和与外单位联合举办的各种类型的学科规划会、学术讨论会、交流会、座谈会不少，对活跃学术空气起了一定的有益作用。但有些会准备不充分，学术水平不高，有的甚至变成一般化的政治议论。不是说学术讨论会不能讨论政治问题，而是说应当首先在学术上有充分准备，力争有所建树。今后，这一类会，要注意提高质量，加强科学性。开会要事先报请院部领导正式批准。对参加会议的人，要有所选择，请真正有研究的人去，没有什么研究的就不要勉强去；更不要转来转去总是那么几个人去，要留下些时间给这些同志做学问。

上面讲了事情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的党员要努力做学问。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共产党员要讲党性，要又红又专。因为专不等于红。党员科学工作者根据事业的需要和自己的专长，分别从事不同学科、不同问题的研究工作，这属于正常的分工，是十分必要的，决不能强求一律。然而，对于每个共产党员，又应该提出共同的要求，不允许因为是科研人员就强调特殊而降低甚至取消统一的要求。这个要求就是，每个从事科研工作的共产党员，都应该自觉地牢记自己是有觉悟、有纪律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成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是党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战士，是为人民、为党的利益服务的。不管在科学研究上做出多么大的贡献，都要接受党的约束，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党性是无产阶级利益、革命利益的最高表现。增强党性，要解决的问题很多，结合我院实际，下面几点是必须解决的：

首先，第一位的问题是，要自觉地在政治上与党保持一致。当前，就是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政治、思想、组织路线及一系列方针政策，维护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要看到，有的同志对今天中央领导和中央路线的正确性认识不够，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上，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糊涂观念。特别在去年春节以后一段时间，一些同志对党中央提出的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不太理解，有的甚至有抵触情绪，说理论务虚会以后中央后退了，动摇了，要

“收”了，四项原则会被利用成“棍子”。中央布置我们社会科学院组织力量写文章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有的同志不愿接受任务。个别同志甚至说出很不好听的话，说什么谁先写阐述四项原则的文章谁就先要臭掉。这样一些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回顾去年那段时期，在解放思想的同时，确实存在着两种思潮，一种是“左”的，一种是右的。表现形式不同，实际上都在冲击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有的人原来就中林彪、“四人帮”的毒很深，是从“左”的方面反对四项原则的，后来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公开转到右的方面，赤裸裸地攻击四项基本原则。

四项基本原则，是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始终坚持的最基本的原则。每个党员入党时，就宣誓要终身为实现共产主义而献身。可是，当党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时候，令人惊异的是，有的同志竟认为会成为“棍子”。过去林彪、“四人帮”确实是用过“社会主义”这个大帽子来压人、整人，目前仍然有流毒。但经过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所打的“社会主义”旗号，是假社会主义、真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难道因为“四人帮”窃用过“社会主义”的旗号，我们就眼睁睁看着社会上和党内的错误思潮向社会主义冲击，而不敢鲜明地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有的同志说，在“西单墙”胡闹的是少数人，成不了大事，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要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不错，那些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所谓“民主派”、“持不同政见者”是人数不多，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们完全

可以纠合各种破坏势力,造成不小的动乱。这种情况过去就发生过,如果我们不警惕,今后还可能发生。有的同志认为,发扬民主刚开个头,提出四项原则是又要“收”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但是我们什么时候说过发扬民主就要允许反革命分子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就要允许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那些腐朽、堕落的文化泛滥的自由!怎么能说这就是“收”呢?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更健康、更广泛地发扬起来。至于有的同志认为,撰写宣传四项原则的文章,就会使自己臭了,只表明他们自己已经香臭莫辨!

院党组对于以上所说的这类问题,虽然明确表示过自己的态度,但宣传教育工作做得太少。作为教训,这个问题今天有必要严肃地提出来。我们前面的道路还长,还会遇到许多风浪。从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中学得更聪明些,是党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每个同志应有的觉悟。

第二点,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这是党得以巩固和发挥应有作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每个共产党员入党时,都表示要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如果不愿履行这项义务,那就不具备入党条件。如果只是口头承诺,却不想这样去做,严格地说,他从入党那天起,对党就是不老实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大量新党员,不熟悉党对党员的最起码的要求。一些老同志,相当时期以来,组织纪律的观念也淡薄了。近几年来,我院广大党员遵守纪律的觉悟有所提高,但是也发生了一些不应发生的问题。有

些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有明确的方针和部署，有的同志却没有严格遵守。有些问题正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讨论，在没有做出结论之前，不应超出这个范围，有些同志也不守这个规矩。去年中央召开理论务虚会，我们有些同志就违反会议规定的范围，把文件传得很宽，有的甚至把会上议论的、不宜公开宣传的意见，拿到报刊上发表。

上述问题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一些思想混乱，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我们认为，在这次全院党的代表大会上，有必要严肃地提请同志们极大地注意加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我们要重申：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员个人必须服从党的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组织必须服从上级组织，全党的各个组织必须统一服从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领导机关。对于关系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全局的重大政治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共产党员不得在报刊、广播的公开宣传中发表同中央的决定相反的言论，不得在群众中散布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相反的意见。

有些共产党员，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对立起来，似乎愈自由散漫愈好，对于党组织的管理觉得不自在，甚至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这个问题，在知识分子党员中尤为突出。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曾经讲到知识分子不是运用组织力量进行斗争的，他的武器是个人的知识、个人的能力、个人的信念，因此他作为某个整体的从属部分而服从这个整体是

很勉强的，是迫于必要而不是出于本人心意的。他认为纪律只有群众才需要去遵守，而上等人物是不必遵守的。列宁认为，对于知识分子这种往往相同的病症，是需要进行正确的诊断和医治的。列宁的这些论述，是针对旧时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在阶级性质上同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有本质的区别。但也不可否认，旧时代知识分子的那些不良的思想习惯和传统还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們。因此，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列宁的论述中取得教益。我们每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应当自觉地注意防止和克服自己身上这方面的弱点，积极地同林彪、“四人帮”散布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作斗争。

我们认为，一个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约束的共产党员，完全可以很好地发挥他们献身于党和人民的事业的积极性。党强调集中统一，要求全党同志遵守纪律，同党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同时，党又非常重视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切实保障党员的各项权利。党组织对路线、方针、政策未做决定之前，总是要充分听取各种意见，广泛地集中全党同志的智慧；做出决定以后，党员如有不同意见，仍然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可以向各级党组织直到中央作口头或书面的报告。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问题的讨论。党组织从来鼓励党员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创造性的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党章对于党员的公开言论和行动所作的纪律约束，绝不妨碍党员在内部对于关系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全局的重大问题进行研

究。但研究成果，应当提请党组织审查，由党组织决定能否公开发表和何时发表。对于确有见解的科研成果，即使同中央现行的决定很不一致，党也会给予充分的重视。因此，强调遵守纪律，并不意味着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得死死的，使人们的思想僵化起来，禁锢科学的发展。我们不赞成用不要妨碍现行政策的贯彻等为理由，限制正当的科学研究。我们过去的毛病，是一些同志对事关全局的重大课题既没有进行认真的科学研究，又不顾党的纪律和政治影响，擅自匆匆忙忙公开发表，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我们党的各项工作的成绩，我们党的事业的胜利，既不能离开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又不能离开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许许多多同志，正是在遵守纪律的前提下，极大地发挥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

第三点，要处理好科研中计划项目和非计划项目、集体研究项目和个人研究项目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也反映着个人和组织的关系。经过院部或研究所批准执行的科研计划，体现了全院或全所在一定时期所担负的任务，从事科研工作的共产党员，必须以自己的主要力量去努力完成，而不允许把主要精力用来从事与此相背离或没有关系的其他事情。院党组决定逐步健全工作制度，按照每个科研人员的专长和水平，考虑到他们的志趣，确定他们在一定时期担负的科研任务（包括数量和质量）。从事科研工作的共产党员，必须自觉地带头并尽好地完成自己担负的任务。个人的

研究项目，如果确实重要，可以经过组织批准，正式纳入规划。此外的研究项目，包括本院或院外出版社、报刊的约稿，如果侵占了八小时工作时间，必须向所、室的组织报告，无权自行决定。社会科学院是党领导的国家科学研究机关，没有必要的规章制度和纪律，就不能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在这里工作的人员，不能个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首先是共产党员，必须自觉地遵守这些制度和纪律的约束。

总之，党希望在科研第一线的共产党员，都能够成为有党性、有学问的专家。这是党的利益、革命事业的需要。社会科学院各研究单位的共产党员，都应当明确地把它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

我们着重讲了对从事科研的共产党员的要求。这些原则，对我院各个岗位上的共产党员，包括做行政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和其他工作的共产党员，都是适用的。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不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增强党性，同时努力钻研业务，使自己成为本职工作的内行、专家，出色地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任务。我们坚信，只要全体共产党员都在增强党性、掌握专业，在红和专这样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有长足的进步，社会科学院的工作就一定会有一个崭新的面貌，就一定会做出更大贡献！

培养大批科研人才是我院 党组织的重要任务

为了保证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蓬勃发展，关键在于培养人才，使人才辈出。有了人才，才能出成果。社会科学院党组织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要在动员和组织大家完成科研任务的过程中，培养出一大批有党性、有学问的专家。如果我们通过今后十年的努力，能够培养出三五百名这样的专家，就说明我院党组织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如果能培养出上千名这样的专家，就说明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近两三年来，我们已经采取各种措施进行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我们创办了研究生院，今年又在全国招考研究人员。目前，我院各个学科人才不足的状况正在逐步缓和，但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如果三五年内不能在人才问题上取得重大成果，那么繁荣社会科学事业，让社会科学更好地为四化服务，就会受到极大的妨碍。

院党组要求，全院各级党组织都要把选拔和培养人才的工作列入自己的重要议事日程，切实抓紧抓好。各研究所都要制订发现、培养、使用人才的计划。研究所的所长、副所长、研究室主任，要亲自把这件事管起来。首先是发现人才，然后在进行科研工作的过程中加以培养。研究员和副研究员都要带徒弟。这里有个思想问题要解决，就是人们往往把带徒弟看成是负担，似乎抽出一部分时间带几名徒弟，就

会妨碍自己的研究。经验证明,带好徒弟和搞好科研是完全可以一致起来的。只要把培养对象选择好,老师认真地教,学生虚心地学,教学相长,特别是要使徒弟参加到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来,那么不仅可以有更多的力量完成有关项目,而且徒弟也可以在研究过程中成长起来。我们希望,有学问的研究人员,不仅要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年轻一代,而且要帮助他们从一开始就树立严谨治学的好作风。今后,各个研究所评定研究员和副研究员的职称,除了考核本人的科研成果以外,也要把是否能积极带好徒弟作为重要考核内容之一。这要作为制度定下来。

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协助行政领导认真改革现行的人事制度和科研人员管理制度,打破“铁饭碗”,逐步实行择优和淘汰的办法。对科研人员和其他人员的工作任务,都要有数量、质量和时间的要求,按期进行检查,认真进行考核。我们应当坚持这样的规矩:只要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在学术上确有成就,符合考核标准的科研人员,该定什么职称,就定什么职称,成绩突出的就应该越级破格提拔。要打破框框,敢于拔“尖子”,对“尖子”进行重点培养,坚决克服在培养、使用、提职、提级等问题上的论资排辈、不准拔尖的保守倾向。我院去年在科研和科研辅助人员的定职升职工作中,由于严格掌握标准,认真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更加激发了科研人员的上进心,推动了他们把全部精力集中于研究工作。我们还将继续这样做下去。对于新提升的研究人员,要及时提出任务,继续进行考核,决不能评定完

了就万事大吉。如果有的科研人员提升以后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几年拿不出新的科研成果,还能不能继续保留现有的学术职称,就成为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了。对于那些基础差、研究能力不强的同志,应该创造一定的条件,规定一定的时间,让他们去进修和提高。专业基础薄弱的补专业,外语不过关的补外语。有的可以交给一定的任务,结合专业,到基层去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实践提高研究的能力和水平。如果经过几年的时间,还是不能胜任研究工作,就要考虑把他们调动到其他更适宜的工作岗位上去。

培养和造就人才,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是要善于使用人才。我们要强调指出如何调动中青年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的问题。现在,老专家和老学者传、帮、带的责任是重大的。我们应当尊重他们,关心他们,并且创造必要的条件,以便他们在有生之年把宝贵的知识传授下来。但是,许多经验,包括我们的老专家、老学者的经验证明,真正出成果,大多还是在青壮年时期。当前特别是中年人。他们年富力强,具有一定的进行研究工作的能力和经验,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发展科学事业的骨干力量。党的组织一定要对这部分同志精心地进行培养,关心他们在革命觉悟和科研业务这两个方面的成长。要大胆使用中、青年研究人员,注意给他们出题目,交任务,由有学问的专家及时给以指点。这样,经过一二年或者稍长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们就能够搞出一些有独创性的成果,能够在本学科领域中更好地找出前进的路子,更快地成长起来。有条件的

时候,还可采取集体研究的办法,由一位在某方面有专长的学者带领一批中、青年研究人员共同承担一项科研项目,通过科研实践,提高中、青年研究人员的水平。有少数科研人员,以为在社会科学院可以清闲自在,无须努力工作。党组织有责任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甚至给予必要的批评,在业务上要提出严格的要求。

科研组织、编辑、图书资料、翻译等工作,都是搞好科研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科研组织工作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这对于科研工作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翻译和图书资料工作是科研工作的基础,科研人员需要依靠做这些工作的同志来收集丰富的资料;编辑工作对科研成果的方向和质量,实际上起着把关的作用,没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广博的知识和一定的文字能力,是当不好编辑的。因此,在谈到培养和造就人才时,不只是指科研人才,同时应包括科研组织、编辑、图书资料、翻译等方面的专门人才。从事这些工作的同志,应当和科研人员一样,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编辑、图书资料等人员,经过评定职称以后,各级领导要注意使他们享受与职称相应的待遇。

我们有一部分同志,对党政、后勤工作的理解不正确,似乎这些部门的干部本质上只能是“万金油”干部。我们说,行行需要专家,行行都有“状元”。从事党政、后勤等方面工作的同志,只要热爱本职工作,钻研和精通本行业务,同样可以成为又红又专的专门家。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政治工作干部,要下决心在这方面起带头作用,努力学习马列主

义和毛泽东思想,熟悉和研究情况,认真摸索和总结本行业务的规律性。为了做好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工作人员,凡具备一定条件的,应该在本所参加某项科学研究工作。开头可以从参加积累材料入手,使自己懂得科研工作的状况和科研人员的甘苦,增加与科研人员的相互了解,以便更切实地考虑如何改进对科研人员的政治工作。应当指出,党政干部只要有一定的马列主义知识和文化水平,经过扎扎实实的努力,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某些方面钻进去、取得一定的成果,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这里,我们还想对战斗在后勤战线上的党员同志(包括从事基本建设工作的党员同志)多说几句话。后勤工作是我院各项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后勤工作做得怎么样,直接关系到出人才、出成果这个根本任务的完成。我院目前物质条件很差,实际困难很多,后勤战线的党员和职工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希望战斗在后勤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和职工进一步树立为科研服务的思想,再接再厉,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千方百计地改进和提高后勤工作的质量,尽可能为科研人员和广大职工群众解决工作上、生活上的困难,努力争取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

各级党组织应当经常教育全院的工作人员懂得,我们的社会主义科研机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的工作做出了成绩,决不单单是哪一个人、哪一个部门的功劳,而是各个部门相互配合、全院同志辛勤劳动的结果。我们的工作只

有分工的不同,没有贵贱之分。院党组希望战斗在全院各种不同岗位上的同志,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为出人才、出成果而发奋努力。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改进党的 工作的中心环节

当前,正当全院同志振奋精神向科研进军的时候,思想政治工作应该放到一个什么位置上,这是一个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

前一个时期,我院党内党外都出现过一些糊涂观念。有些同志认为,搞科研,只要能著书立说就行了,其他一切可以不去过问。个别人甚至认为,研究所只要有会计发工资就行了,党政工作统统可以取消。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有些党政工作人员也觉得,在科研机关做思想政治工作是“费力不讨好”,产生了消极情绪。院党组认为,有必要严肃地指出,这种忽视党的领导,忽视思想政治工作,不问政治的苗头,是十分危险的。林彪、“四人帮”宣传“政治可以压倒一切”,“政治可以代替一切”,其目的是为了掩盖和实行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当然是十分荒谬、十分反动的。可是,如果在批判这种反革命谬论以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走向否定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那也是非常有害的。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诫我们:“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

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同样，切合实际地、强有力地抓好思想政治工作，也是我们今天团结全党、进而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攀登思想理论高峰的中心环节。如果这项工作做不好，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是不能得到蓬勃发展的。因此，教育全院广大党员和群众自觉地维护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在党的领导下，按照共同的道德标准、共同的信念和信心，遵守共同的纪律，采取一致的行动，为着实现我们的共同理想去努力奋斗，就是我院各级党组织在新时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

我们知道，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在国内已经被消灭，或者不再存在，但是各种阶级敌人以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还将长期存在，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还需要继续肃清；在国际交往方面，我们打破了人家对我们的封锁，积极引进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广泛开展学术交流，然而资本主义世界的腐朽的、没落的、反动的意识形态，也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不良的影响。同时，经过十年的浩劫，一些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对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程度不同地产生了一种怀疑、不满、失望的情绪。所有这些，都会在社会科学院以各种形式反映出来。我们这里知识分子比较集中，对国际国内的各种思潮接触得比较多，如不注意引导，某些错误思潮就会通过少数人的自由传播，扩大市场。

要做好全院的思想工作，关键在于搞好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根据社会科学院的实际情况，我们今后应当着重

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

第一，搞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

我们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一些党员产生了优越感，以为入党就有了特殊地位，可以利用这种地位和权力谋取私利。少数党员的个人主义已经恶性膨胀到完全置党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丝毫没有共产党员的味道。搞科研的党员，有的精神境界不高，不肯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到处拉关系，找门路。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给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留下许多困难，存在着很多不能令人满意的事情，有些错误思潮还在泛滥。怎样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些困难，对于每个共产党员来说，也有个世界观的问题。各级党的组织要教育全体党员懂得，加入共产党，不是来享福的；要真正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随时准备比别人作出更大的牺牲，去为全人类谋幸福。执政党的地位，并不意味着共产党员可以比普通群众享受更多的权利，而是对共产党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平时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战时或其他紧急情况时，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在必要时，要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一个共产主义者，必须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奋斗不息的自觉战士，决不应该出现一点问题就怀疑社会主义制度。恰恰相反，愈是遇到困难，愈是受到挫折，就愈应当认识自己所肩负的使命的重大，坚信我们事业的正确性，为战胜困难、克服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做出更大的努力。

各级党组织还要教育党员以身作则，带动全院广大知识分子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我们衷心希望广大知识分子以周总理为榜样，活到老、学到老，努力结合科研实践，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求得新的进步。全院同志都要继续提高自己的觉悟，警惕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

第二，搞好形势教育。

我国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发展时期，我院党组织的经常的、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教育和组织党员以及全体职工，认真学习党中央对于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做出的决定和指示，以便认清形势，了解全局，把自己的日常工作和党的总任务紧密地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性。

形势是不断变化的，任务也是不断发展的，进行形势教育决不能一劳永逸。各级党组织必须不断地根据中央的新指示，结合社会科学院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组织大家学好，使大家的思想都跟上时代的步伐。如果只埋头局部的业务工作，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天地中，不了解形势，不了解全局，科学研究工作势必很难适应党和国家的要求。前一个时期，在我院某些科研人员当中出现的一些奇谈怪论和思想问题，也同没有正确认识当前形势有很大关系。今年以来，党中央领导同志先后做了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报告，我们进行了学习和讨论，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今后，我们应当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第三，认真学习、讨论、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

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

《准则》和《党章》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两个纲领性文件，对健全党内政治生活，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具有重要的意义。遵照党中央今年四月二日关于组织全党讨论《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的通知精神，我们除组织全院党员积极对党章修改草案提出意见外，要集中对全院党员进行一次教育。各单位的党组织，都应当对此做出认真的规划和安排。在深入领会文件精神的基础上，围绕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检查自己的工作、思想和作风。这次学习，所有的党员都要参加。各单位要把这项学习当做提高党员觉悟、整顿党的组织的一件大事抓紧抓好。

共产党员要自觉地加强党性修养，严格地按照党性原则要求自己。要把党中央一九四一年《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为这次学习的必读文件。在党性修养中，特别要提倡党员的自我教育，遇事从我做起。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能只等待组织上和别人来教育自己，首先要经常自觉检查自己的缺点，主动取得同志们的帮助。要彻底改变那种只是牢骚满腹，责怪组织，或者只表示拥护，不见于行动的不良风气。

党政领导干部和政工干部应该理直气壮地把自己肩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担当起来，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到科研和各种工作领域中去，和科研人员、广大职工交朋友，交心谈心，采取有针对性的、细致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把

全院的政治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

注 释

- 【1】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第995页。

真理的声音是窒息不了的^{*}

——驳《〈修养〉的要害是背叛 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为了给林彪、江青一伙从政治上陷害刘少奇同志制造舆论,他们的吹鼓手写了一篇《〈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在全国各报刊发表。

一九八〇年二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了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决定,全部推倒了林彪、江青一伙强加给他的叛徒、内奸、工贼等莫须有的罪名,恢复了他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名誉。接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再次重新出版,受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热诚欢迎。

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八〇年,一共经过了十三年。在人

* 本文先在《人民日报》发表,1989年收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刘少奇研究论文集》。

类历史上,这是很短暂的,就一个人的一生来说,也不是很长的岁月。如果刘少奇同志不是因为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人身迫害而不幸去世,他是能够亲眼看到自己对党、对人民的无限信任和深切的期望得到实现,能够亲眼看到党的历史上的这个最大冤案得到平反昭雪的。

十四年前,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我们党的错误,逐渐窃取党和国家的一部分重要权力,使中国的天空乌云滚滚。刘少奇同志和许多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遭到残酷迫害。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活动刚开始,就受到了老一代革命家、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千千万万的人们固然相信,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是长不了的,但当时那种苦难的日子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即使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也不可能做出准确的估计。

历史前进的步伐这样快,超过很多人的预料。时间不到五年,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它的作者打入地狱,标榜自己“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的林彪,倒真正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和卖国贼。人们开始感到,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但是,反革命势力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继承林彪衣钵的“四人帮”越来越猖狂,拼命阻挡中国历史的前进。他们的挣扎越是变本加厉,越是表明他们的本质的虚弱,表明他们被埋葬的日子不远了。历史经过一段曲折,发展得更快了。党和人民同林彪、“四人帮”这两个阴谋集团之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大决战,终于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以他们的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党和人民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不可

可逆转的伟大历史性胜利。事实又一次证明，我们的党是坚强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巩固的，任何敌人采用任何手段都绝对无法摧毁我们。战胜敌人，医治创伤，重新大踏步前进，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和我们的无产阶级性质所决定的，它具有不可移易的客观必然性。为刘少奇同志彻底平反，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于这一历史辩证法的认识，使我们对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和光明的前途更加充满信心。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部著作和它的作者一道受难，遭到恶毒的攻击、谩骂和诬陷。经过十年的浩劫，人们从切身的体验中进一步认识到它的价值和意义。它的真理性，在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的严酷斗争中，继续得到证明。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本身，也从反面，为说明这本著作对于我们党的建设的重大意义，提供了新的论据。真理的声音是窒息不了的。它随着历史的前进更加昂扬，更加激励千百万共产党员和亿万人民群众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一、共产党员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观察客观形势， 决定行动方针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第五节，概括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这些阐述是扼要的，也是正确的，既讲了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又讲了实现这个理想的途径和所依

靠的力量。这些论述，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学说是一致的。

《〈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避而不谈刘少奇同志关于实现共产主义要经过艰难曲折的过程、要依靠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论述，仅仅引用表述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一段话，紧接着把这种表述攻击为“一连串的牧师式的祈祷和祝愿”。这显然不是论战中的疏忽，不是理论上的无知，而完全是居心险恶的政治陷害。

这篇文章还说，刘少奇关于共产主义社会思想的表述，同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是一路货色。事情果真是这样吗？这样一个涉及到共产党人信仰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不能不予以澄清的。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论述空想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时，曾经明确指出：

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它看到并且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弊病，但是不能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科学的说明，只能主张简单地把它当作坏东西抛弃掉。它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是从哪里产生和怎样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是资本主义生产状况、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的产物，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它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科学地说明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及其灭亡的必然性。

空想社会主义把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看作是理性的任务，认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只是从头脑中臆想出来，其使命就是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这种新的社会制度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它愈是制定得详细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科学社会主义不再靠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过程，认为解决冲突的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空想社会主义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完全寄托于个别天才人物，认为这种人物一旦出现，人类社会就会免除迷误、痛苦和灾难。他们根本看不到无产阶级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无产阶级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和革命斗争。科学社会主义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及其发展过程，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社会主义必然要通过无产阶级和它领导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得以实现。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正如列宁指出的，发现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块主要的“基石”。

只要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和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有所了解，只要对事情的观察采取严肃郑重的

态度,就可以明白地看到,刘少奇同志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在基本原理上,同空想社会主义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任何不同的地方。

林彪、江青和他们的吹鼓手在所谓“要害”问题的文章发表以后,继续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进行全国规模的、连篇累牍的讨伐。他们政治上的目的,除了像他们所说的,要把刘少奇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以外,就是要糟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败坏社会主义的声誉,动摇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对于共产主义的信念。把这样一个最根本的理论是非搞乱了,他们就可以更加放肆地推行自己那套假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和法西斯的社会主义。由于我们的国家生产力不发达,有着封建社会的长期历史,小生产者的思想根深蒂固,以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有深厚的土壤和广泛的影响,广大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不高,全党的理论准备不够,因此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确实是很大的。在一个时期内,香的被搞臭了,臭的反而香了,以至使相当多的同志,特别是年轻一代中许多人的思想糊涂了,使得肃清流毒至今还是一个严重的任务。

林彪、江青一伙和他们的吹鼓手在围剿《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时候,制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罪名,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呢?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主题,是教育共产党员必须牢固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其中包括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

系,观察、处理和解决不同时期的革命任务和斗争形式方面的问题,要求共产党员在客观条件和斗争任务发生各种变化的时候,都能够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自己的行动。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没有出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在引用列宁的两段话时,也确实没有引其中“无产阶级专政”的词句。从当时我党所处的客观环境和斗争任务、斗争策略来说,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在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分析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问题的时候,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论断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发表于一九三九年。当时,我们党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抗日战争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目的是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抗日战争阶段,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地位,党的任务是联合除汉奸卖国贼以外的一切爱国的人民、阶级、阶层、政党、团体,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当时所面临的,根本不是提出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对争取我国伟大民主革命胜利起了重要指导作用的理论著作。这部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晚一年发表的著作,明确指出,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也不应当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严厉地驳斥了这个问题上的左倾空谈和恶意宣传。

共产党和它的党员，当然要在运动的现在想到运动的将来，当然要在民主革命中想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但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篇文章，只有先做好第一篇文章，才能做好第二篇文章。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任何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1】。如果像林彪、江青他们要求的那样，在抗日战争时期，也要不顾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党的具体任务，不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大讲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可能有抗日战争的胜利，不可能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胜利，不可能在全国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那才真正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背叛。

林彪、江青一伙的吹鼓手们在他们的文章中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几个版本，根本不谈抗日战争、不谈抗日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根本不谈解放战争、不谈解放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

事隔多年，重新发表旧作，根据实践的检验，对旧作的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是常有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总要尊重历史，不能也不应该把著作写作时期没有发生而只是在后来发生的事情，硬塞进去。怎么能违反这样一个常识，不顾历史的真实，让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三九年的著作中去

谈当时尚未来到的解放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呢？

至于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根本不谈抗日战争、不谈抗日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则完全是捏造。刘少奇同志是通过十几年来对党内生活、党员状况的观察，提出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的。这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大批新党员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当时党的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他在谈到入党的动机问题时明确指出，进步的人们因为共产党坚决抗日，能够拯救中华民族，而要求入党，这并没有错。在当时的革命运动即抗日战争中，成为一个积极的战士，是很好的。他同时又指出，一个共产党员的觉悟不应当停止在这样一个水平。他要求这些同志入党以后努力学习，使自己锻炼成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者。共产党员应该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武装自己，应该把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作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在抗日战争时期，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一致性。刘少奇同志正是这样把党的建设问题、党员的修养问题，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具体斗争密切地结合起来论述的，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密切地结合起来论述的。

在一九六二年再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刘少奇同志特意增加了比较长的篇幅，专门论述上面这些问题。他批评了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党内部分同志反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孤立起来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又批评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党内部

分同志反对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使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和尾巴的迁就主义、投降主义的倾向。他指出,这种“左”的错误和右的错误,都是在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不能坚定地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确定革命事业发展的正确道路的显著例证,都是不能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的突出表现。

他说,共产党和它的党员必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斗争条件下,正确地解决如何革命、如何斗争的问题,才能争得革命的胜利,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在进行革命斗争的时候,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的问题;谁是直接的同盟军、谁是间接的同盟军、谁是主要敌人、谁是次要敌人的问题;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同盟军,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联合次要的敌人,去打倒主要的敌人的问题;在情况发生变化,需要走迂回曲折道路的时候,及时地改变战略和策略,确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有利的方针政策等等问题,都必须运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运用共产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求得正确的解决。一方面,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在进行斗争的时候,必须同广大劳动人民建立密切的联系,同各革命阶级和革命党派建立革命联盟,领导广大劳动群众和一切同盟者同自己一道前进;必须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代表一切革命者的利益,代表本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也就是说要代表在本国人口中占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在进行革命斗

争的时候，不但要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分清界限，而且要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分清界限，也要同其他劳动群众有所区别；要在革命斗争中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受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各种影响；要在革命发展的每个阶段，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一年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说：“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2】他提醒我们，要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同时又要严肃地、坚决地执行党适应当时情况所制订的各项具体政策。既不能因为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而拒绝执行这些具体政策，其中包括保护抗日战争时期社会经济中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使其有一个适当发展的政策，也不能因为执行这些具体政策，接受由于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适当发展而带来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丧失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

这些论述，和刘少奇同志把当时的国内阶级斗争问题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斗争问题密切结合起来的论述，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论述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战略策略问题、阶级斗争问题，是把无产阶级的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的范例。不正是因为这样做了，中国无产阶级和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蓬蓬勃勃的发展吗?才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吗?如果像林彪、江青及其吹鼓手要求的那样,离开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条件,无视当时中国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性质,无视当时阶级力量组合的具体情况,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割裂开来,孤立地、抽象地谈阶级斗争,那就势必导致整个民族解放事业的毁灭,势必导致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毁灭。那才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背叛。

二、在任何情况下,共产党员都要 保持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要求共产党员在革命发展的不同时期,都积极参加当时的实际斗争,反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加深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树立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刘少奇同志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科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是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共产党员必须联系革命实践去学习它、运用它、掌握它。只有这样,才能够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和将来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才能够具备确定行动方针的能力,对革命运动的前途充满信心。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此已经做了科学的、无可怀疑的说明,国际无产阶

级的革命实践也已经提供了事实上的说明。我们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依靠，完全有信心在我们这一代完成共产主义事业中的一段大工程，同时也完全相信我们的后代能够完满地完成这个伟大事业的全部工程。

刘少奇同志还要求每个共产党员清醒地认识到，在人类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困难。强大的敌人要反对我们。剥削阶级的影响会增加我们在斗争中的负担。由于对客观情况的把握和实践经验的积累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自己在确定政策、进行斗争的时候，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这样，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就难免遇到挫折和失败。面对这种挫折和失败，是对共产主义事业丧失信心，发生动摇，还是继续坚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并且在艰苦的环境中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这是对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严峻考验。

每个共产党员在入党的时候，都曾经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把自己的整个生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能停顿脚步。

革命战争年代，在遭受敌人严重打击的情况下，我们党和它的优秀党员没有被敌人所吓倒、所征服。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踏着先烈的脚步，高举革命的旗帜，英勇顽强地坚持斗争。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在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被困难所吓倒、所征服。他们打掉牙齿连血吞，硬着头皮顶住，切实地总结经验教训，严肃地进行自我批评，咬紧牙

关，埋头苦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正是因为有了我们这样的党、这样的优秀党员，正是因为他们任何情况下都相信共产主义理想一定要实现，正义的事业一定要胜利，新生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所以在敌人认为我们就要灭亡的时候，我们却转败为胜了；在常人看来我们陷入无法克服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却熬过来了，并且打开了新的局面，重新走上顺利发展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说得好：“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根据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果然都被克服下去了。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3】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期，我们国家出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决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为着提高全党同志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克服主观主义等错误思想和不正之风，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改善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应党内很多同志的要求，《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经过修订、补充重新出版。这对于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地渡过难关，把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当前，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马

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正在全国贯彻执行。举国上下安定团结，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发扬，社会主义法制逐步健全，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地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是，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党的优良传统的作用遭到破坏，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家长作风在一些人身上有所滋长，以至许多困难还横亘在我们的面前。有些人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发生动摇的问题，又以新的形式出现了。它集中表现为不同程度地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现在二十多岁的青年，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较好发挥的时候，他们还不懂事。在他们开始懂事以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在遭受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因此，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示怀疑，未能树立起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这是可以理解的。只要共产党员真正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从各方面把工作做好，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怀疑是会逐步消除的。值得引起重视的是，我们的共产党员中，有一些同志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生了怀疑，甚至共产主义的信念也有所动摇。

形势好的时候，信心就很足，形势不好的时候，信心就发生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发挥的时候，就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受到挫折、受到破坏的时候，就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示怀疑。如果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担负一定领导职务的党的干部陷入这

样一种精神状态，那是很不好的。他应该认真考虑一下，是不是违背了自己入党时的誓言。别的同志也应该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帮助他摆脱这种精神状态。共产党员的品格之所以可贵，固然要表现在形势好的时候干劲十足，想干得更好一点；尤其要表现在，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甚至遭到失败的时候，仍然不屈不挠地、坚韧不拔地为党工作，仍然坚信共产主义事业一定胜利。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曾经遭到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这当然是很痛心的事。作为一个有坚定信念的共产党员，看到这样的破坏，不应当有别的选择，只能下定决心，排除这种破坏，通过我们的奋斗和工作，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重新发挥出来，而且发挥得更好。

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要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毫不动摇。而且，在人们中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生怀疑的时候，共产党员不仅要始终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以律己，而且要有理有据和耐心细致地进行解释、说服、教育工作。尤其是要在那些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议论、思想像恶浪一样袭来的时候，要能够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和这种思潮进行斗争，不怕骂，不怕压，不怕讥笑嘲讽。应该相信，真理属于我们，未来属于我们。在历史的进程中，经过切实有效的工作，曾经不同程度地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发生怀疑的人们，都会心悦诚服地改变不正确的观点。

近来，社会上有一些人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说什么社会主义什么都不好，资本主义什么都好。事情是不是

这样呢?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切好的经济管理办法,归根到底,都是那里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民群众的劳动结晶。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向自己的阶级兄弟和国外友人虚心学习。应该努力地学,有成效地学。科学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科学无国界。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切科学的管理方法,我们都没有理由不引进。我们不能闭关锁国,凡事都自己从头做起。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要赶上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必须把先进的科学技术“拿来”,只有真正的昏人才执拗地同这条定律作对。但是,任何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人、有正派品格的人,都应该而且能够看到资本主义毕竟还是资本主义,应该而且能够看到它的剥削本质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社会弊端。对于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应该鄙视,不应该欣赏,应该像防止病菌一样防止它的传染和毒害,不应该把它奉若神明加以皈依。任何一个有国格的中国公民,都不应该向这些丑恶的东西顶礼膜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露资本家的贪婪的本性时说:“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4】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把一切都淹

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我们的共产党员，不正是因为看透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本质，为了争取共产主义的美妙将来，才参加共产党的吗？怎么能够因为一段时期内，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比我们快一点，那里的生活比我们好一点，就丧失共产党员的自信心和自尊心，而跟在那些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的屁股后面走呢？怎么能够丝毫削弱、动摇我们同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一切丑恶现象实行彻底决裂的原则立场呢？

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呢？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根本点是什么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对此做出了无可辩驳的论证；我国几亿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的实践，也已经从各方面对此做出了明确的回答。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取得利润，至于劳动者的消费，只有在保证资本家阶级取得利润这一任务的限度内，才是它所需要的。邓小平同志今年一月十六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说：“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制度，国民总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一大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他们那里贫富悬殊很大，大多财富是在资本家手上。”【5】有个材料说，美国大大小小的企业共有一千二百九十七万八千多个，其中股票上了证券交易市场的大公司有四万多家，最大的公司只有一千五百家左右。小企业有一千万个左右，占全国厂商

的百分之九十七，但生产总值只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十。从利润看，一千五百家大公司的利润占了全部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九十。这个材料证明，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社会里有贪污分子，有搞特殊化的人。我们必须同这类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能因为他们人数极少，就忽略这种恶劣现象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就我国这两年的情况来说，农村情况明显地越来越好，八亿农民的生活不同程度地有了改善。将近一亿有工资收入的职工，其中七千万人由于提高工资级别和得到奖金，收入增加了；一千几百万人实际收入有的增加不多，有的没有增加，有的甚至降低了。党和国家正在研究、制订措施，以便有步骤地、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些都是我国社会生活中有目共睹的基本事实。我们的工资水平确实比较低。但是，职工家庭就业人数比较多，去年一年城镇就安排了七八百万人就业，基本生活资料的价格比较便宜。国家提供粮食、副食等物价补贴和房租补贴，还有劳动保护、公费医疗及社会消费和其他集体福利，等等。平均算起来，这笔钱分摊到每个职工身上，接近于他们平均工资的数目。仅粮食、副食补贴一项，每年国家支付接近于二百亿元，每年每个职工平均约二百元。所以，计算我国职工的生活水平，不能只看到工资收入多少，还要考虑到这个重要事实。

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特征，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所代替，是消灭剥削，是实行按劳分配。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根本点。在社会主义制

度下，国家、集体、个人之间也存在矛盾。由于公有制的确立，由于公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这些矛盾可以得到妥善解决。全社会的人民具有共同的利益。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共同的道德标准，共同的领导，共同的纪律，共同的行动。这是任何剥削制度所不可能具有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一个产生、发展和逐渐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些特征和根本点，使社会主义制度下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也是任何剥削制度所无可比拟的。

共产党员不仅要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在革命取得巨大胜利、自己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绩的时候，同样要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因此而自满自足、不求进步，也是共产主义信念不坚定的一种表现。刘少奇同志说，共产党员是不能有任何的自满和骄傲的。即使我们的工作获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拿它同整个共产主义事业比较起来，又到底有多大？这对于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人说来，是不值得骄傲的。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曾经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6】他又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7】事实上，我们党曾经有过由于取得巨

大胜利而发生骄傲，使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遭到挫折的教训，也有一些由于取得成绩而发生骄傲，被糖衣裹着的炮弹打中的党员。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每一项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只是为共产主义大厦增添了一砖一瓦。每一个共产党员、即使是杰出的共产党员的贡献，也只是尽了自己应尽的义务。增添了一砖一瓦，尽了自己的义务，就忘记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这也不配称为坚贞不渝的共产主义者。

总之，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不论是顺利还是挫折，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始终具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成为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作这样一个共产党员，不是很难吗？确实是很困难的。可是，我们不正是因为想到这是很难很难的，而且清醒地懂得要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具有这样的品格，必要的时候还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才决心加入共产党的吗？

三、共产党员要努力培养共产主义的 道德品质和高尚人格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用主要的篇幅论述了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修养问题，这实际上也就是在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培养共产主义道德的问题。

刘少奇同志指出，共产主义道德，不是建筑在保护个人和少数剥削者的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和广

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后解放全人类、拯救世界脱离资本主义灾难、建设幸福美丽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人类解放的利益,共产主义的利益,社会发展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是共产党员思想行动的最高原则,也是共产党员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应该遵守的共产主义道德规范。

刘少奇同志要求共产党员按照上述最高原则和道德规范,正确处理个人同党的关系、党内同志之间的关系、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以及敌我之间的关系。

就党员同党的关系来说,党员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首先想到党的整体利益,都要把党的利益摆在前面,把个人利益、个人问题摆在服从的地位,在个人利益同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能够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在必要的时候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党员除了为党的利益而奋斗这个目的以外,不应该有违反党的利益的个人地位、个人名誉、个人英雄主义以及其他个人打算等等目的。共产党员要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本领,但是不能离开党的事业的发展,去争取个人的独立发展。党员的个人利益,应该溶化在党和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和目的之中。党员不应该什么都只顾自己,到处向党提出一大堆私人要求,责备党没有抬举和奖励他,

而只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不断加深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努力前进，勇敢奋斗，对党对革命做出更多的贡献。

就党内同志之间的关系来说，共产党员都是由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亲密战友。共产党员对于自己的同志，必须怀有忠诚热爱的感情，满腔热情地帮助同志，平等相处，决不为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同志。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同别人计较待遇的优劣，而同别人比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危险时要挺身而出，在患难中要同舟共济。要为同志的成绩衷心高兴，决不想方设法把走在自己前面的人拉下来。对同志的缺点和错误诚恳地进行帮助，决不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不畏惧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也能够勇敢地、诚恳地批评别人。不在背后无原则地议论同志，说同志的坏话，也不为别的人不负责任的议论所牵动和刺激。不吹捧任何人，也鄙视别人对自己的奉承、阿谀和献媚。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对待同志最能宽大和“委曲求全”，甚至在必要时能够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而毫无“怨恨之心”，能够“以德报怨”，毫无报复之心。决不在党内拨弄是非，不用阴谋伎俩离间同志间的关系。决不蓄意制造党内矛盾，在党内搜索斗争对象，并且滥用组织手段以及党外斗争手段惩罚自己的同志。有坚定的原则立场，不在原则上作任何让步，不允许自己和别人对党的利益有任何损害。

就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来说，共产党员是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忠诚的代表者，全心全意地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在共产党员看来,为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是最不值得、最不应该的,为阶级、为民族、为人类解放而牺牲,是最值得、最应该的。他们极关心自己阶级和世界全体劳动人民的痛苦和困难的境遇,关心每一个地方劳动者的解放斗争及其胜利和失败,认为不论哪一个地方劳动者解放斗争的胜利和失败,就是他们自己的胜利和失败;认为对于任何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解放斗争,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是错误的,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是犯罪的。共产党员对人民具有伟大而忠诚的友爱、热情和同情心,具有伟大的互助精神、牢固的团结精神、真正的平等精神。他们根本反对任何人有任何特权,认为自己不应该有任何特权的思想,认为在人民内部居于特权地位,对于自己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是一种侮辱。共产党员坚信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具有伟大的创造力,能够在前进的道路上击败各种敌人,克服各种障碍,创建自己的新世界。

就敌我之间的关系来说,共产党员在对敌斗争中应该是有勇有谋的战士。他们懂得,一切剥削者和压迫者,把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剥削和压迫到不能生存的境地,使得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群众,非联合起来反抗这种剥削和压迫就不能生存和发展。剥削阶级的长期统治,在人类社会中造成了各种落后、愚昧、自私自利、尔虞我诈、互相损害、互相残杀等现象,也毒害了被剥削阶级的群众和社会中人们的思想。共产党员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锐利武器,揭露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本质,并且根据劳动人民的切身经验,

进行革命宣传,增强群众实现当前斗争纲领的决心,坚定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的信念。他们勇于斗争,善于斗争,不为任何强敌所吓倒,不受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始终保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气节。

共产党员要在处理和调整上述各种关系中,培养共产主义的高尚人格,而具备了这种高尚人格,也就能够更好地处理上述各种关系。那么,这种共产主义的高尚人格,主要是指些什么呢?

刘少奇同志告诉我们,共产党员要大公无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了追求真理,维护真理,在必要的时候牺牲自己的一切,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对人民、对同志具有很高的同情心,能够“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在党内“事无不可对人言”,不做亏心事;为了党的事业顽强奋斗,勤勤恳恳,艰苦朴素,谦虚谨慎,不居功自傲,不沽名钓誉,不盛气凌人;刻苦学习,自强不息,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有高度的自尊心、自爱心,既不同人家拉拉扯扯,也不接受人家的吹吹拍拍,既不投机取巧、见风转舵,也不固执己见、刚愎自用;等等。总之,共产党员要在自己身上培育最伟大、最高尚的美德。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还用专门的章节,列举了在处理个人同党的关系、党内同志之间的关系、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以及敌我关系问题上,违背共产主义道德规范和行为

准则的种种表现。这就是怀着各色各样的个人的目的和动机来到党内，又不接受党的教育；在处理问题时，处处表现出浓厚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思想；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小气，计较小事，不识大体；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动摇性，流氓无产者和某些破产农民的破坏性；少数同志甚至存在浓厚的剥削阶级意识；等等。少奇同志对这些错误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深刻的批判。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关于共产主义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论述，关于共产党员高尚人格的描绘，以及各种错误思想的举例，不是作者臆造出来的，而是对党内生活和党员表现进行长期观察的结果。书中所说的共产党员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应该具有的高尚人格，是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整个共产主义事业所需要的，也是我们党内许多同志多年来身体力行的。光荣牺牲的无数先烈，具备着这样的道德品质。现在还奋斗在各条战线的许多优秀共产党员，也具备着这样的道德品质。他们是全体共产党员进行共产主义道德修养的楷模。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样的楷模，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他们的高尚品德，是应该学习、也完全可以学习到的。事实上，我们有一些同志，原先曾经有过这样那样的毛病，在党的教育下，经过自己的锻炼和修养，也先后成为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

重新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理解、宣传共产主义道德，批评各种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表现，有助于形成一种党内的舆论、整个社会的舆论，使大家

都知道什么是好党员,什么是不好的党员,使大家学习有榜样,对照有镜子,都来表扬、学习和推广合乎共产主义道德的行为,批评、谴责和抵制各种背离共产主义道德的行为,在党内、在社会中提倡正气,反对邪气。这种党内的舆论、社会的舆论,反映了党和人民对共产党员行为的要求,在客观上是对共产党员的一种约束的力量。无视这种约束,就要受到舆论的谴责。它促使我们党成为一个革命的大熔炉,能够造就越来越多的目标明确、意志坚强、道德高尚的共产党员,也能够使经不起锻炼的意志薄弱、道德败坏的人们,被排除、淘汰出去。在共产党员中,不仅需要进行党纪国法的教育,而且要进一步确立共产主义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我们党主要不是靠对党员进行纪律处分,更不是靠法律制裁,而是靠共产党员道德上的榜样力量,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作风和优良传统,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和威望。这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之一。这种共产主义道德所产生的无形的、巨大的力量,在我们战胜各种强大敌人和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的斗争中,具有无法估计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利用自己窃夺的一部分权力,通过自己的宣传活动和所作所为,在道德观上,对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来了一个大颠倒,把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搞乱了,把党员同党的关系、领导同被领导的关系、党内同志之间的关系、党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人民群众内部的关系统统搞乱了。他们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和威望,丑化共产党员的形象,对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他们宣扬和实行的那一套,完全有背于共产党员的为人的道德,完全有背于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的为人的道德。肃清这种反动腐朽的道德,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好的党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四、共产党员要在实践中自觉进行 自我修养、自我教育、自我改造

刘少奇同志是唯心主义的毫不留情的批判者。他始终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上,论述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道德品质的修养问题的。

他明确指出,中国古代许多人的所谓修养,大多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他们片面夸大主观的作用,以为只要保持他们抽象的“善良之心”,就可以改变现实,改变社会和改变自己。这当然是虚妄的。他尖锐地批判了旧社会教育和学习中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理论和实际的脱离,有力地鞭挞了剥削阶级及其卫道士们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男盗女娼的行为,指出他们的目的是升官发财,用所谓“圣贤之道”去压迫被剥削者,用满口仁义道德去欺骗人民。共产党员要学习马列主义,要学习历史上一切优秀遗产,而决不能采取剥削阶级的虚伪态度。他要共产党员高度警惕旧社会的这种遗毒,保持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忠诚纯洁,不能欺骗自己,不能欺骗人民,也不能

欺骗古人。

刘少奇同志在论述共产主义道德时，引用了一些中国古代关于道德修养方面的语言。他运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这些概念进行了改造，赋予了新的含义，使它适合于人民革命利益的需要。这决不是无批判地、无原则地全盘接受，更不是林彪、“四人帮”所诬陷的什么宣扬封建主义的“孔孟之道”，而是具体地表明了对待古代文化遗产的马克思主义态度。

我们是革命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共产党员的修养，不能脱离革命的实践，不能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的、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实际革命运动。共产党员必须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必须在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在各种艰难困苦的境遇中，去锻炼自己，总结实践的经验，加强自己的修养，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一九三九年版写道，共产党员要在和反革命进行各方面的斗争中来改造自己，即是说求得自己的进步，提高自己的革命品质与技能等。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革命的修养。这种修养的目的，唯一的又是为了革命的实践，为了更有效地去指导群众的实际革命运动。一九六二年这部著作重新发表的时候，第三部分的标题改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革命实践”，更加集中地阐述了二者的关系。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六二年版的第四节，标题为“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文中指出，共产党员不但要在革命的实践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

想意识，而且要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作者一方面批评了党员中认为只要自己家庭出身好、本人成分好、革命坚决、斗争勇敢就用不着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错误，另一方面又批评了党员中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批判自己思想意识中的旧东西，而是企图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变为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甚至用自己的成见去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他明确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如果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要在一切革命斗争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也是不可能的。

总之，刘少奇同志要求我们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进行自我修养、自我教育、自我改造。我们共产党员的这种修养方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方法，它和脱离人民群众革命实践、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修养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向我们提出一个很有启发性的问题。这就是，许多共产党员在大体一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参加革命实践，接受党的教育，学习革命理论，可是结果却大不相同。由于个人主观努力的不同，有的进步很快，有的进步很慢，有的甚至落后了。其中举了一些共产党员参加某种群众革命斗争、参加万里长征的例子，也举了一些共产党员在学校受教育和训练的例子。我们每个人也经常看到很多

类似的例子。同样从逆境中走过来的共产党员，由于党性修养的不同，结果也不相同。例如，同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甚至同样被打成“走资派”，同样“关牛棚”、被批斗，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以后，精神状态却大不一样。很多老共产党员从党的利益出发，认真总结十年浩劫的经验教训，觉得年纪已经五六十岁了，为党工作的时候不多了，决心抓紧有限的岁月，更加振奋革命精神，加倍为党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来弥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使自己多年未能工作造成的损失。也有个别老共产党员，精神状态却不是这样。他们也认为自己的有生之年不多了，但他们的革命意志消沉，从个人利益出发，热衷于追求生活享受，不仅要使自己的生活上加好，而且要为子女过优裕生活做“长期打算”，甚至纵容子女为非作歹，为此而不顾党纪国法，谋取制度规定以外的私利，谋取职务权限以外的特权。

刘少奇同志在《修养》一书中指出，我们的党员由于原来的社会出身不同，所受的社会影响不同，因而就有不同的品质。他们对待革命实践各有不同的态度、立场和认识，所以在革命实践中各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当然不是说，所有这些不同，都是由于社会上对抗的阶级之间的斗争而产生的；更不是说，这些不同本身就都是阶级斗争。产生这些不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刘少奇同志是经过反复的观察，做了深入的分析，经过抽象，把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指了出来。

一个共产党员，如果头脑中有了非无产阶级思想而又不去改正，那就不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就不能有效地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经常不断的侵蚀，就不能很好地处理个人同集体的关系。相反，如果自觉地进行思想意识、道德品质的锻炼与修养，自觉地清除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那就会在反映客观世界的面目、抵制外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采取正确的态度，取得良好的结果。

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脱胎而来的。现在存在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封建主义的、小生产的思想及其影响更加根深蒂固。中国资本主义很不发展，发展起来的东西也受封建主义的影响，具有封建性。无产阶级思想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和斗争，主要是同封建主义思想、小生产的习惯势力的矛盾和斗争，会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经常地表现出来。毛泽东同志曾经引用古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话，来说明社会现象是复杂的，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事物；同样，党的队伍、党员的思想也不可能纯而又纯。由于出身、经历、社会环境的不同，由于进行思想意识修养的自觉性不同，党内同志的思想状况，每个同志个人的思想状况，也是不同的。究竟是承认还是不承认我们的共产党员中有不同思想意识、道德品质的差别，每个共产党员的头脑中有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呢？不承认是不合乎实际的。采取承认的态度不仅合

乎实际,而且完全必要。它给我们党和每个党员提出一个严重的任务,就是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努力改造主观世界。

刘少奇同志说,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意识,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克服各种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用党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一般利益和目的的思想克服个人主义的思想。如果结局不是这样的话,就是后者压倒前者,那么他就会落后,以至失去共产党员的资格。这是一种可怕的危险的结局。

共产党员要避免这种可怕的危险的结局,要在革命斗争中逐步成长起来,都离不开党的教育、同志的帮助、群众的监督。但是,这种教育、帮助和监督能否起作用,起的作用是大还是小,从根本上说还是取决于共产党员自己主观上的努力。要靠经常用自我修养、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方法,来培养自己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和高尚人格。要通过这种方法,学会用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来区别是与非、好与坏、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形成自己高尚的内在信念,形成自我克制、自我约束的能力,随时警惕和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和不良道德行为的影响。用这样的信念、这样的能力,支配自己的言论、行动,自觉调整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使自己真正成为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种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自我修养、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在我们党的生活中,

通常的说法，就是自我批评。一个共产党员，在他为党工作的一生中，是自觉地还是被迫地、是认真地还是敷衍地进行自我批评，对他共产主义道德和高尚人格的培养是关系很大的，对他为党工作有无成绩和成绩大小也是关系很大的。人总要犯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犯了错误，真正认识了，就有进步的希望，就是进步的起点；一次又一次地切实改正，人也就一步一步地前进，日益成长起来。

例如，不能否认，每个共产党员的头脑中都程度不同地会存在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自觉地检查、克服这种影响，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就会一天天有所进步。如果不仅自己不努力克服这种影响，反而用自己的言论、行动扩大这种影响，用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去影响别人，那就是很不道德的。

比如，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要经历一个从不知到知、从少知到多知的过程。如果由于不知或少知在工作中造成了损失，一个正直的、有道德的共产党员，就应该使用自我批评的方法，诚实地检查原因，深刻地总结教训，改正错误，提高认识。相反，如果由于私欲而歪曲对于事物的观察和对于真理的理解，不进行自我批评，坚持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认识，对于因此给党的事业带来的损失毫不难过，毫不痛心，这显然是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

又如，外界的影响有好有坏，好的不学习，坏的很欣赏。用这种态度来发表意见、进行活动，使别人也跟着自己学坏样子，造成不良的后果，人家提出了批评，还不进行自我批

评，当然也是不符合共产主义道德要求的。相反，诚恳地、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主动地承担责任，绝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而恰恰是共产主义高尚道德的要求。

再如，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都生活在集体之中，他的一言一行都要和集体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当个人和集体发生矛盾的时候，首先应该进行自我批评，检查是不是由于自己方面的什么原因而危害了集体的利益，而不应该一味埋怨组织、埋怨群众、埋怨别人。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老老实实接受同志的批评、群众的监督，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使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而且要做到，即使没有组织、同志和群众的监督，也能够自觉地维护党的利益。就像刘少奇同志所说的，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時候，他也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不降志辱身。他的工作经得起检查，绝不害怕别人去检查。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时时、处处、事事都有高度的自我约束力和自我克制力。“吾日三省吾身”，在这里是完全用得着的。一个没有共产主义的高尚人格和道德品质的人，要做到这一点，根本不可能。

邓小平同志在刘少奇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对少奇同志的一生做了全面的、公正的评价：“刘少奇同志言行一致。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对广大党员提出的党性锻炼的要求，自己都以身作则地实践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险的时候，

对党对人民始终保持高度的信任,说出了“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这样的至理名言,表明了他的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一个共产党员,能够得到党的信任、得到同志和人民的信任,是最大的幸福。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政治迫害和欺骗宣传,党组织、党内同志和人民对他曾经有过暂时的误会,为此他曾经忍受最大的痛苦。但是,他直到逝世为止,对党、对同志、对人民从未有过任何的怨言。

他被非法剥夺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公民应该享有的起码权利,遭受到各种污辱、打击以至人身迫害。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还是坚决维护宪法的尊严,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日夜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关心着人民的命运。他向中央提出两项要求:一、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他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去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要求共产党员能够经得起各种打击,在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指责而暂时孤立,甚至因此而牺牲生命的时候,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他默默地死去,把对共产党员的期望,变成了自己忠贞实践的诺言。

同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一样,刘少奇同志在工作中也有某些缺点和错误。对

于这些缺点和错误,他总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勇于承担责任,勇于纠正。我就直接听到他在党的会议上做过三次自我批评。他严以责己,像古人所说,君子之过,有如“日月之蚀”,能够把自己的错误公之于众。他的品格,受到了全党同志的敬仰。

刘少奇同志是一个纯洁正直、光明磊落、道德高尚的共产党员,是在党内和国内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的领导人。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不朽的事迹和光辉的形象,将永远铭刻在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文如其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是一切优秀共产党员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形成的高尚品格的结晶,也是刘少奇同志自己理想信念、道德风貌的写照。学习刘少奇同志的榜样,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从中汲取培养共产主义世界观、共产主义道德观的营养,这就是我们应该得出的结论。

注 释

- 【1】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第960—961页。
- 【2】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第751页。
- 【3】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版,第142页。
- 【4】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260页。

-
- 【5】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244页。
- 【6】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第1328页。
- 【7】 同上。

推广先进典型需要 注意的问题*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表扬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一向是我们党推进各项工作的有效方法之一。但是，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地把任何先进典型都看作是群众集体智慧和辛勤劳动的产物。历史已经证明，人为地树立先进典型，最终没有不失败的。先进典型，同其他事物一样，是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的。对于先进典型，我们应当努力从政治上、思想上给以正确的指导，尽可能使其避免失去先进性以至垮台。但是，当它们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致不再继续成为先进典型的时候，就不应当人为地去“保”，更不允许滥用职权，动用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去支撑所谓“先进典型”的门面，甚至弄虚作假，欺骗上级，欺骗舆论。那种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

* 这是邓力群同志代中央起草的《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的批语》的节选。

错误的、有害的。宣传和介绍先进典型，一定要说真话，不要讲假话。那种只让人看几个事先安排好的点，只讲甚至夸大先进一面、隐瞒落后一面的做法，是很错误的。这类误人害己的事，已经很多，今后务必要引为鉴戒。

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生产情况和耕作习惯千差万别，经济发展水平也很不相同。而且，为要全面地进行农村建设，不仅要发展农业建设，还要发展林、牧、副、渔各业，发展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以及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等等。各个地区、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要发现、培养各种各样的先进典型。某一些地区的实践证明确实是先进的、有效的经验，在其他地区推广，就不一定是或不一定完全是先进的、有效的。因此，在推广先进经验的时候，必须分析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适合于哪些条件？哪些是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哪些是不带普遍性的具体做法？绝对不能生搬硬套，强迫命令，重犯过去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不要再不分东南西北，不分自然条件和耕作习惯，用大寨这样一个典型的经验硬性指导农村所有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各项工作。同时，对先进典型也不要提不适当的、过高的要求，以免助长弄虚作假。要一分为二，经常指出不足之处，使他们不断进步。总之，要实事求是，因地、因事、因时制宜，分类指导，并且由群众当家作主做出决定。任何先进技术经验或经营管理经验，都必须同当地农民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重视经济效果，在农民自愿接受的基础上，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切不可用一阵风的运动方式一哄而起，更不得

乱扣政治帽子，采取行政压制等手段。

表扬和宣传在创造先进经验方面做出贡献的先进人物，从中发现、培养干部，也是我党推进工作的有效方法之一。劳动模范不仅是从群众中产生的优秀分子，而且由于他们往往在生产技术或生产管理方面有所革新和创造，因而也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理应得到党、群众和社会的尊敬。“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打击劳动模范的做法，已经得到纠正。但是，那种一成为劳动模范，就一定要当从下到上的各级党代表、人民代表或其他代表，一定要担任从下到上的几级党政机关或群众团体的领导职务的做法，事实证明，不仅会使一些劳动模范自己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而且会使他们陷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无法应付的会议、报告和各種政治活动中去，无法再起劳动模范的作用。这种做法，害了一批劳动模范，也给党的工作带来不应有的损失。今后，我们还应当而且需要从劳动模范中选拔优秀干部，同时也要负责地对他们进行培养和教育。但是，有必要接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培养劳动模范、培养工农干部，有一套完整的、切实可行的制度，并且坚持下去。让劳动模范担负一定的领导职务，一定要考虑到，使这种职务同他的能力、水平相适应，不要让他们担任不能胜任的领导职务，不要使他们兼职太多，脱离劳动，脱离群众，以至不能继续发挥劳动模范的应有作用。

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 必须兼顾*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下旬)

这个问题,直接牵涉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涉及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问题。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这个讨论是很有意义的。我觉得,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既要讨论生产目的,同时要讨论怎么样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如果仅仅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而不讨论清楚实现这个目的的途径,不讨论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可能和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还是不能够达到生产的目的。换句话说,如果不去研究达到这个目的的途径,不去改进我们的经济体制、管理制度,不去改进生产方法、劳动组织和技术水平,人民的需要还是不能得到更大满足的,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还是体现不出来。

* 本篇以及后面的四篇,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陈云同志经济著作讲课的五个部分。

按理说,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这本来是不成为问题的。但是,实际上,这种需要满足的程度,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的。这里,不仅有生产力水平低的限制(这当然是根本的),还有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等方面的限制。比如,我们现行经济体制中的统收统支、统购包销,使得产销脱节;产业结构上的重工业过重、农业轻工业过轻;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重积累、轻消费;等等,都妨碍了更好地去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开始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改善产业结构,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在这方面,已经收到了大家都承认的明显效果。我们应该继续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我们搞现代化建设,彻底改变目前生产力落后的状况,提高文化科学技术的水平,从根本上说来,也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

下面,讲四个问题:一、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二、扩大再生产必须在增加生产资料生产的同时,相应地增加消费资料的生产;三、要重视市场的作用;四、要重视农业。

在讲这四个问题之前,有两个前提要说一下。

第一个前提,社会主义的生产,应该是持续的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不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资本主义生产也是扩大的再生产,尽管在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是直线上升的,但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说,社会生产发

展的总趋势是扩大的再生产。那末,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同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有什么不同呢?撇开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不说,只就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主义可以做到持续的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不可能做到持续的扩大再生产。

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经常被经济危机所打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这个问题很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危机的程度和形式虽然有所变化,但经济危机或者像资产阶级所说的衰退,还是经常出现的。从社会主义的本质来说,应该是能够做到持续地扩大再生产。但是,历史经验证明,真正做到持续的扩大再生产又是很困难的。这大体上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一)外敌大举入侵;(二)特大的自然灾害;(三)工作上犯了大错误。

就上述三个原因说,第一个原因,不能由我们决定,敌人来犯,我们只好迎战。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做的工作,是要对世界形势作出一个正确的估计,并且根据这个估计采取正确的政策,包括外交政策、国防政策等等。在国内经济建设方面,也要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而相应地有所改变。如果大战即将来临,就要转入战时经济体制;如果判断失误,在和平时期搞战时经济体制,也会妨碍经济的发展。至于自然灾害,我们可以逐步增加抗御能力,但在相当一段时间、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得由老天爷来安排。因此,一定要有必要的储备。我们应该特别重视的是第三个原因,即工作上犯大的错误。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经济主要掌握在

各个资本家的手里，因此政府的领导人犯了错误对经济的影响还不会很大的话，那末在社会主义国家，就往往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全局。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经过了两次大的折腾，都是由于“左”的错误造成的。这种“左”的错误是主体的错误，也就是说全局性的、占支配地位的错误，这就不可避免地要给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危害。这样的错误应该避免，也可以避免。问题在于我们是否真正总结了经验，接受了教训。只要我们结合自己的实践来总结经验教训，今后不再犯这类大的错误，就可以持续地进行扩大再生产，经济的发展就可以比过去顺利得多。这一点，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信心。

第二个前提，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我们的扩大再生产还是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进行的扩大再生产。因此，研究扩大再生产的理论问题，就不能不联系到商品经济的规律、范畴，以及与此有关的经济手段。这个问题，我们理论界和搞实际工作的同志讨论多年了，我在党校也讲过两次，今天不多讲。斯大林一九五二年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书中所提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问题，有对的方面，也有错的方面。他的正确方面，对我们的经济工作是起了好作用的。他的不正确的方面，使我们的头脑受到了束缚。但是，应该讲，在一个时期内，他对我们实际经济工作的影响，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的。陈云同志在主持财经工作时，虽然没有正式评论过斯大林关于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不起作用、生产资料不是商品

的观点,但实际上他所做的,在很多方面都是同斯大林的理论不同的。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的社会条件和苏联的社会条件不同。建国初期,我们只没收官僚资本建立了国营经济,但是民族资本照样存在,农业、手工业个体经济也大量存在;除了在国营经济内部实行生产资料调拨这一点外,都是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当时,国家能够直接计划的范围还比较小,只有国营经济;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只能实行间接的计划;对于大量的农民个体经济,只是统购统销。这种情况和当时苏联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陈云同志最讲究实事求是,他根据中国的国情所采取的政策,必然同斯大林的理论不一样。

第一个问题: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

请同志们注意,《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的最后一篇文章《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1】}陈云同志讲的时候,我在场听着,感到他是以很沉重的心情讲这一番话的。拿我个人来讲,在建国以前,总以为革命胜利以后,事情就好办了,人民就会得到幸福。从来没有想过,革命成功以后,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搞了一个“大跃进”,使人民遭受那么大的困难。现在看得很清楚,陈云同志一九六二年说的这段话,是针对建国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说的。这期间,我们曾

经给人民带来幸福,但也确实给人民带来痛苦。犯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把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这两者的关系处理好。

陈云同志认为,解决人民生活的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不但长期计划要兼顾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年度计划也要兼顾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早在一九五六年,陈云同志在《做好商业工作》一文中就说过:“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看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平衡大体上是个比较紧张的平衡。建设也宽裕,民生也宽裕,我看比较困难。我们的耕地只有这么些,但人口多,吃的、穿的都靠它。如果不搞建设,失业半失业照旧,社会购买力很低,商品供应当然一时可以不紧张,但不搞建设更不行。”^{【2】}因为如果不搞建设,生产老是维持在原来水平,不增加生产,那就不可能增加就业,不可能改善生活。而且,由于人口的增加,甚至连原有的生活水平也维持不了,人民也会不满意。所以,不搞建设是不行的。但是,建设终究不能搞得太多,只能量力而行。中国过去工业落后,我们的同志一搞建设都想多盖工厂,一干起来,往往不大注意解决人民生活方面的问题,如农产品价格的调整,工资的增加,以及住宅、医院、学校、商店、饮食服务行业和其他市政建设等等,有的城市甚至于连蔬菜也吃不上。陈云同志却不是这样,他在一九五七年《一定要把蔬菜问题解决好》一文中就说过:“只注意建工厂,不管职工吃的,那怎么行?过去只注意厂房和机器这些东西,没有

很好地注意职工的生活需要，对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的供应抓得不紧。我看，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的供应问题，其意义决不在建设工厂之下，应该放在与建设工厂同等重要的地位。”【3】我们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是不是都有这样的认识？可能有的同志有这种认识，但是相当多的同志恐怕没有这种认识。应该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对于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处理得还是比较好的。当时，职工工资调整比较及时，生活设施的建设也比较注意，人民是满意的。例如，一九五七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百分之五十二，全民所有制单位（包括工业、基建、交通运输、农、林、水利、气象等）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二点八。即使这样，陈云同志还是及时地看出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陈云同志一贯注意人民生活问题，在遇到经济困难时，尤其注意抓好人民的生活，焦思苦虑地设法解决好这个问题。在人民生活很困难的一九六二年，他提出要给城市居民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又感到光植物蛋白不够，还要增加一些动物蛋白，供应鱼、肉。当时大中城市有六千万人口，每个人每个月有半斤鱼、半斤肉，五口之家一个月能够有五斤鱼和肉。他说：“目前，这样的问题，是国家大事。如果六千多万人身体搞得不好，我们不切实想办法解决，群众是会有意见的。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来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4】陈云同志这段话，讲得具体入微、通俗易懂，但是包含着极其深刻

的道理。

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建设，不仅符合我们革命的宗旨，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而且也是社会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正常进行的客观要求。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需要两个因素：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马克思说：“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4】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正常进行，不仅要补偿已经消耗掉了的生产资料，而且劳动者也必须吃饭、穿衣以及养儿育女等等，也就是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只有兼顾了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这两个方面，使之达到平衡，我们的扩大再生产才能够正常地、持续地进行。列宁在谈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时，指出：“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依赖’个人的消费的增长，而更多地靠生产的消费。但是如果把这种‘不依赖性’理解为生产消费完全脱离个人消费，那就错了，……不言而喻，生产消费归根到底总是同个人消费相关联的。”【5】资本主义条件下是这样。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需要，生产就更不能脱离消费，更不能为生产而生产。生产的消费如果完全脱离了个人消费，产品就无法实现。简单再生产是这样，扩大再生产也是这样。“简单再生产实质上是以消费为目的的”【6】。如果劳动者连原有的生活水平也维持不了，那实际上就是破坏了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也就失去了基础。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尽管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的平衡也是有点紧张的，但终究还是比较妥善地兼顾了两者，所

以在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还保证了年年都能够扩大再生产。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一，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八点七，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四点五，没有发生过生产下降的情况。但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由于只顾生产建设上的“大跃进”，挤掉了人民的生活，以至于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许多人得了浮肿病，人民的体质普遍下降，造成非正常的死亡，这就是说，连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也维持不了，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使急剧下降的生产得到恢复。至于人民体质的下降，不仅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人，而且影响到下一代人的身体素质。

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所依据的基本前提是下面两个原理：“第一，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产品和个别产品一样，都是由下面三个部分组成的：（1）不变资本，（2）可变资本，（3）额外价值（即剩余价值——引者注）。”“第二个原理是必须把资本主义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即用于生产消费、用于投入生产的物品的生产，这些物品不用于人的消费，而用于资本的消费；第二部类是消费品即用于个人消费的物品的生产。”【7】马克思说：社会再生产过程“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8】马克思讲的是资本主义生产，但这些原理对于社会主义是同样适用的。斯大林说得好：“虽然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主

义生产规律，但他决不认为他的再生产理论仅仅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才是有效的。恰恰相反，他显然认为他的再生产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生产也会是有效的。”【9】

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也应该把社会总产品划分为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两大部类；在价值形态上，也可以划分为 c 、 v 、 m 这三个组成部分。当然社会主义经济没有剩余价值的问题，但也有剩余劳动、剩余产品的问题。 c 是生产过程中耗费掉的机器设备、原料、材料等生产资料的价值再现； $v+m$ 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价值，其中 m 是新创造的价值中减去 v 之后的余额。 c 这个部分在计算国民收入的时候是要扣除的， $v+m$ 是每年的国民收入。 v 要用于维持劳动者原有的生活水平，保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因此，人民生活和基本建设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安排问题，既包括 v 与 m 的关系问题，又包括 m 这一部分如何划分的问题，也就是说， m 这一部分，还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于购买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一部分用于职工个人消费，其中包括新增加的职工的消费和改善原有职工的生活。要注意正确处理这几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困难。我们过去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新增加的剩余产品，也就是 m 这一部分，常常是很少用于改善原有的职工的生活。而且，由于建设规模过大，新增加职工过多，有时甚至挤了原有职工的生活。我们可以打个比方通俗地说明这一点。比方说，去年实行扩大再生产，增加了一百块钱的剩余产品。这一百块今年就有一

个怎么安排的问题。可以有两种错误的安排：一种是，全部用于人民生活的改善。这样增加新的建设就没有钱了，明年就不能再进行扩大再生产了，以后生活也不能再改善了；另一种是，全部用于经济建设。即使这一百块钱中对于购买生产资料和新增加职工的消费这两者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妥当，原有的职工的生活也得不到改善。这样搞下去，尽管工厂也可以增加，但由于原有劳动者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就会挫伤这些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长此以往，人口增加了，小孩长大了，各种各样的消耗增加了，不增加收入，实际上就是在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两种做法，都是只顾一头，而没有兼顾两个方面。正确的安排应该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国民收入增加了，就要一部分用于改善原有劳动者的生活，一部分用于新的建设。就是用于新的建设的这一部分，也不能全部用于增加生产资料，必须拿出一部分用于新增加职工的消费。新的建设内部这两者之间的比例关系，也要处理适当。我们过去之所以出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上述这些关系。

第二个问题，扩大再生产必须在增加生产资料生产的同时，相应地增加消费资料的生产。

陈云同志说，搞基本建设，增加投资，除了增加生产资料以外，还必须相应地增加粮食和其他各种生活消费品。这就是说，要扩大再生产，进行基本建设，除了要用一部分钱来增加两个部类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供应以外，必须用一部分钱来增加两个部类所需要的消费资料的供应，包括衣、

食、住、行各个方面。增加了新的工厂，增加了新的建设事业，就业人数增加了，就要给他们发工资，社会购买力就要跟着增加。要使增加了的购买力能够兑现，必须有相应的商品供应。增加了职工，增发了工资，“货币对这种劳动力来说，就成为第Ⅱ部类商品的购买手段，因此这种劳动力必须找到现成的消费资料”。【10】这就是说，新增加的劳动力会对第Ⅱ部类增加压力，要求第Ⅱ部类扩大再生产。举例来说，一百块钱的购买力，必须有一百块钱以上的商品供应。如果有一百块钱的购买力，而只有五十块钱的商品供应，货币就一定要贬值，原来一块钱能够买到的东西，现在就必须用两块钱才能买到。我们过去对这些关系考虑得不够，不知道碰了多少钉子，吃的亏实在太大了。在讨论生产目的的时候，许多同志提出，今后不能再走为生产而生产、为重工业而重工业的道路了。实际生活里有没有这个问题呢？有。严重不严重呢？严重。为什么老是只考虑钢，只考虑建设这个工厂、那个工厂，而不太考虑增加人民生活所必需的消费资料的生产 and 供应呢？为什么老犯这个毛病，十多年二十多年也改不了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懂得进行扩大再生产时，在增加生产资料的同时，必须相应地增加消费资料，不懂得这是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的客观要求和必要条件。所谓为生产而生产、为重工业而重工业，从再生产理论的角度来说，就是片面强调生产资料生产的增加，忽视消费资料生产的增加，没有使两者保持平衡。因为忽视消费资料的生产，所以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也是片面强调增加第Ⅰ部类

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忽视第Ⅱ部类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增加。

前面说过，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为第Ⅰ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为第Ⅱ部类。马克思分析了实现再生产的条件。实现简单再生产的条件是，第Ⅰ部类的可变资本加剩余价值等于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 $I(v+m) = IIc$ ；实现扩大再生产的条件是，第Ⅰ部类的可变资本加剩余价值大于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 $I(v+m) > IIc$ 。但这并不是说，实行扩大再生产光发展第Ⅰ部类就行了，第Ⅱ部类可以不相应发展，可以不同第Ⅰ部类的发展相平衡。马克思说：“就像第Ⅰ部类必须用它的剩余产品为第Ⅱ部类提供追加的不变资本一样，第Ⅱ部类也要在这个意义上为第Ⅰ部类提供追加的可变资本。”^{【11】}通俗地说，第Ⅰ部类的生产比原来的规模扩大了，要增加劳动力，要多付出可变资本，但是第Ⅰ部类生产的是各种生产资料，既不能吃又不能穿，工人得到了工资以后，就要到市场上去买吃的、买穿的，而这些东西都是第Ⅱ部类生产的。为此，就需要第Ⅱ部类有相应的发展。这就是说，第Ⅰ部类的扩大再生产必然要求第Ⅱ部类也要扩大再生产。第Ⅱ部类要扩大生产，除了增加生产资料以外，还需要增加新的职工，也要增加消费资料的供应。所以，要顺利实现扩大再生产，不能只增加生产资料的生产，不增加生活资料的生产；不能只增加第Ⅰ部类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不增加第Ⅱ部类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总之，这两个部类的生产的增长必须保持一定的比

例关系,也就是说,要使生产资料生产所创造的对消费资料的需求总额,同消费资料生产所创造的对生产资料的需求总额达到平衡。不论是简单再生产,也不论是扩大再生产,不论是第Ⅰ部类,也不论是第Ⅱ部类,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资料的数量,必须足以吸收劳动量,足以通过这个劳动量转化为产品。”【12】否则,就会造成窝工。同样,“如果现有生产资料多于可供支配的劳动,生产资料就不能被劳动充分利用,不能转化为产品”。【13】这就会造成设备闲置。总之,只有把这些比例关系安排妥当,扩大再生产才能够正常进行。

第三个问题,要重视市场的作用。

我们的社会生产过程,就整体来看,包含着直接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是这两个过程的统一。流通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媒介,没有流通过程,社会生产过程就没有结束,再生产就难以进行。可是,我们过去对流通过程的问题注意得很不够,以为生产就是一切,东西生产出来了,任务就“完成”了。至于市场的情况究竟怎么样,生产出来的东西卖得出去卖不出去,很少去考虑。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东西生产出来并且出售以后,产品价值中 c 这一部分才能得到补偿, $v+m$ 这一部分才能得到实现。至此,一个生产的过程就结束了,再开始下一个生产过程。每一个企业的资金,都要经过货币资金、生产资金和商品资金的循环,并且依一定的比例,处于这三种形态之中。这三种形态的资金,在空间上是并存的,在时间上是先后进行的,而且要及时改变原有

的形态，采取新的形态，资金的循环才能正常进行。这种循环，如果不是当作孤立的行为，而是当作周期性的过程的，就是周转。周转时间等于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和。缩短周转时间，加速资金周转，是经营决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市场问题对于社会再生产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商品的价值是在直接生产过程中产生，在流通过程中实现的。每一种商品都有实现的问题。列宁说过，“市场不过是这种分工和商品生产的表现”。【14】他把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直截了当地称为“实现论”。“实现论”不仅要研究社会产品的各个部分在价值形态上如何实现，而且要研究社会产品的各个部分在实物形态上如何实现。第Ⅰ部类内部、第Ⅱ部类内部，以及两个部类之间的交换，都必须通过市场，才能使各自的 c 、 v 、 m 的各个部分得到实现。重视市场，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重视实现。我们不能只管生产，不管实现。如果商品生产出来卖不出去，积压在仓库里，创造出来的价值和使用价值都不能够实现，就会白白地浪费物化劳动和活劳动。

我们的同志，除了搞财贸工作的以外，有多少是重视市场问题的呢？恐怕不很多。当然，这和我们的经济体制有直接的关系。按照我们的经济体制，消费品生产出来以后，即由商业部门统购包销，如果货不对路，或者生产过多，就积压在商业部门的仓库里；如果生产少了，供不应求，造成脱销，就叫买者排队等候。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由物资部门统一调拨，需要者向物资部门申请，这也常常造成货不对路，

造成积压或者脱销。这种经济体制，人为地把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割断了，造成了管生产的人可以不关心流通，管流通的人也可以不过问生产。这套体制和办法，就是受到斯大林理论的影响。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进入流通领域，要实行调拨，价值规律只在流通领域中起作用，在生产领域里不起作用，而在流通领域也只限于消费资料的产品。苏联过去的经济体制就是这样的。我们过去学习苏联，也受了斯大林的模式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还没完全改变过来。

陈云同志的工作和主张，突破了斯大林的一些框框，按照中国的实际作出决策。对于消费品的生产和供应，陈云同志就是按照价值规律办事的。陈云同志一向重视商业工作和市场的作用。他认为，市场商品供应情况是全国财政、贸易和经济建设情况的反映。如果市场商品的供应年年紧张，就不只是商业工作的问题，也不只是当年经济工作的问题，就需要重新考虑我们的建设方针是否妥当。因为商业工作、市场问题是同人民的生活密切联系的，从市场上反映出来的意见，实际上就是群众对我们的生产和整个经济工作的意见。从市场上也可以反映出，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不是在健康地发展。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消费资料是商品，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不论在流通领域还是在生产领域，价值规律都起作用。因此，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乃至整个经济工作情况，能够在市场上得到最灵敏的反映。现在不是讲市场机制吗？资产阶级学者和资本家都说，他们的生产要搞得

好,最需要的是信息,说他们的市场经济最大的优越性就是信息灵通。我们要搞好经营决策,也要很好地重视信息。而得到信息最快的一些部门,就是商业、金融和财政。事实证明,发现我们经济中的问题的,首先往往是商业部门、金融部门和财政部门。陈云同志最近说:“现在要为财贸金融系统恢复一点名誉。消息灵通、反映灵敏的是:财政、金融、商业部门。在这些部门中可以看出大局。”【15】陈云同志过去比较多的是管财贸工作,他正是从这里看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问题的。过去,人们常常把做商业工作和做财政金融工作的同志看成一种右倾保守观点的代表。这是因为要搞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高速度,而根据这些部门的信息,建设就得慢一点,指标就要低一点,这就成了所谓右倾了。以后要改变这种看法,再也不要吧商业部门、财政部门、金融部门的同志统统看成是什么保守倾向的代表,认为他们的意见都是保守意见了。实际上,他们是比较了解情况的。例如,哪种商品脱销了,哪种商品积压了,商业部门很快就知道;收多少,支多少,财政部门首先知道;存款的多了,还是取款的多了,银行首先知道。所以,财贸部门、财贸工作人员的意见不能忽视,他们的发言权应该受到尊重。

第四个问题,要重视农业。

马克思说:“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16】这是一个普遍的原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八亿农民的落后的农业大国来说,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说：“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17】

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工业的比重提高了。经过农业合作化，个体经济变成了集体经济。但是，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农业劳动大部分还是手工劳动，这种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18】他还《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19】

在农业问题上，毛泽东同志还提出，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要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系列的理论和政策，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必须继续坚持。

陈云同志是拥护和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上述关于农业

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的。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大家都照着说，甚至能背下来，但是很多人没有照着去做。而陈云同志却把它付诸实践，并且加以具体化了。陈云同志虽然不直接管农业，但是对农业问题一向非常重视，非常关心。也可以说，他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从商业、金融、财政这个角度来管了农业的。他在一九六二年曾经说过：“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到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民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20】

要保证农业能够逐年发展，要保证农民生活能够逐年有所提高；其他方面的事业，其他方面的建设，即使“牺牲”一点也是完全必要的。陈云同志一九六二年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说过：“我们现在这样大的规模，不仅在农业遇到灾荒的时候负担不了，即使在正常年景，也维持不了。”【21】当时进行经济调整，实质上是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到农业和市场上。农业问题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搞好农业是我们整个国家的根本方针，要把农业问题放在整个国家建设的头等地位，全党都要重视农业。

农业问题首先是粮食问题，也就是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产品中有一部分是生产资料，但绝大部分是生活消费品，其中有些就是直接消费品，有些经过加工后成为消费品。因此，农业基本上是属于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即属于第Ⅱ部类。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尤其如此。要安排好人民生

活，首先就要搞好农业。陈云同志讲过：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根据我的回忆，从统购统销制度实行以后，每年都要开一次全国粮食工作会议，有的时候还要开两次，夏收期间开一次，秋收以后开一次。陈云同志在这些会议上的讲话，对于当时计划的执行，对于整个经济的稳定，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很可惜，他在粮食会议的多次讲话，现在我们收集到的很少。这本文稿上只有一篇，就是《重视粮食工作》。他每年要花很多的时间来抓粮食工作。他几次说过，我们的地方党委可以叫作“粮食党委”。这就是说，地方党委每年都要用很大的力量来部署粮食工作。他这样重视粮食问题，是因为我国人口多，农业落后，吃饭问题是头等大事。我国耕地面积原有十五亿亩，平均每人一亩五分多；现在只有十三四亿亩，远低于世界平均每人四亩多的数量。印度人多地少，平均每人有耕地四亩以上。当然，我国平均每人耕地也不是最少的，日本就比我们少得多。我们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很低，现代科学技术的采用很不普遍，劳动生产率很低，能拿出来的剩余农产品很少。据统计部门测算，目前粮食分配的比例大体是：农民口粮占百分之六十；种子、饲料、集体储备和其他集体留粮占百分之二十；国家征购、议购占百分之二十。收购量中扣除返销部分，商品率约为百分之十五左右。现在粮食年产量为六千多亿斤，百分之十五的商品粮只有一千亿斤左右。八亿农民，总共拿出一千亿斤粮食，平均每人拿出一百二十斤；如果每人每天多吃三两，也就吃光了。何况，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很大，现在远没

有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陈云同志在五十年代就讲过，中国的农业，大体上是“三、四、三”，即十年中有三年丰收，四年平收，三年歉收。这就是说，还需要考虑到以丰补歉的问题。这些情况，就决定了我们的粮食只能够紧吃紧用，不能敞开吃用。即使丰年，敞开来吃也不够。所以，陈云同志说：“如果不大力地去抓分配，粮食收下来就会被吃掉很多。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把农民可以不多吃的粮食，买一点过来。实质上，这是节约使用同敞开来吃的矛盾。这就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粮食问题的症结所在。一方面，为了保证国家建设，我们要求群众不要敞开吃、敞开用。另一方面，又要保证农民大体够吃、够用，以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22】

建国以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大家都记得，一九五八年粮食确实是丰产的，但劳动力大都上山搞水利和土法炼钢，没有全部收上来，各地上报的产量也有虚假，没有那么多。当时，大家都在产量上放“卫星”，放得不亦乐乎。而柯庆施首先提出敞开肚皮吃饭，接着就是吃饭不要钱。大炼钢铁一来，“前线”就吃了“后方”的粮食。到一九五九年定粮食指标的时候，就说最高的指标可以定到一万多亿斤。后来压缩空气，压缩指标，压到七千亿斤。实际呢，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一直到去年，我们的粮食产量才有六千六百多亿斤。由于刮浮夸风，弄虚作假，结果吃了大亏。所以，到现在我们还必须抓紧粮食的生产和分配，紧吃紧用。我们的粮食情况和整个农业的情况，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有很大的改善,但是粮食还得节约使用,不能盲目乐观。我们农业状况的根本改观,决不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所能做到的。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同志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周恩来同志加了“以工业为主导”。这样的意思,虽然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他们也讲过,但在我国当时的情况下提出这个问题来,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这个问题一提出来,陈云同志觉得很好,同他过去的主张很一致。但是,他要研究怎么样加以贯彻执行,真正做到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他那时亲自到下面做调查。有一次他到河南省做调查,当时省的领导搞浮夸,说小麦产量一年就翻了一番,不仅不需要再调进粮食,还可以调出一些。陈云同志反复问他们有多少耕地,能够生产多少粮食,有多少农村人口?农村人口最低限度平均每人需要多少粮食,全年要吃掉多少,种子需要多少,饲料需要多少,这几笔加在一起,留在农村的粮食最低限度需要多少?现在全省吃商品粮的有多少人,平均每人最低限度要吃多少,共需要多少?一个是农村能够提供的粮食数字,一个是城市需要的粮食数字,把两个数字一比,就看得非常清楚,能够提供的粮食比需要的粮食差了很多。陈云同志说,我不希望你们调出粮食。你们能够征购的粮食能不能够养活现在城市人口呢?养活不了。河南的同志说,我们可以解决呀!我们城市人口的粮食还够吃呀。其实是不够吃,是靠高征购勉强维持的。本来拿不出那么多,为了使城市人口得到供应,就来了一个高征购。征购不到,又

来了一个反瞒产、反私分。说你原来报那么多，现在征购的时候为什么少了？左一个办法，右一个办法，一定要他卖出那么多粮食来。反瞒产、反私分造成的后果严重极了，因为超过了农民能够负担的程度。到了一九六〇年，就爆发了严重的“信阳事件”。为什么呢？就是高指标，高征购，反瞒产，反私分造成的恶果。经过调查，陈云同志得出一个结论，说现在我们建设规模远远超过了农民所能够负担的程度，必须下决心压缩城市人口，压缩建设规模。压缩到什么程度合适？压缩到农民所能够负担的程度。陈云同志一九六一年在《一项关系全局的重要工作》这篇讲话里，专门讲了精减职工和城市人口下乡的问题。他分析了一九六一年以前曾经发生的几次粮食紧张，都同建设规模超过了农民能够负担的程度有关。

应该十分明确，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之内，还要按照陈云同志提出的这些主张来办事。一九七九年陈云同志出来工作后，就明确指出：“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我们国家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有没有改善？有。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估计到这种情况，整个经济搞不好。”【23】陈云同志最近又指出：“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24】这说明，尽管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也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搞

农业、搞饭吃的落后状况。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既然八亿农民是个大头，我们就要想办法首先把这一头稳定下来，在稳定这个大头的基础上来考虑我们整个的经济建设。农村稳定了，全国就基本上稳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的情况大为好转，可以说把八亿农民基本上稳定下来了。现在我们每年从外国进口一千五百万吨左右粮食，也是为了稳定农业这个大局。去年全国生产的猪肉达到三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程度。原因何在呢？首先是政策对头了，农民手里的粮食多了，可以多养猪了。政策里头就包括提高收购价格和进口粮食。

我国有八亿农村人口，其中劳动力大约有三亿。他们勤劳勇敢，坚韧朴实，淳厚善良，是创造物质财富、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支伟大力量。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有各地的特点，各地有各地的优势，农、林、牧、副、渔各业都有发展的广阔天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制定了一系列适合农业生产水平 and 农民要求的正确的政策。继续落实这些政策，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专业分工，发展商品经济，真正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全面地进行农业建设和农村建设，包括房屋建筑、交通运输、商业服务、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建设，是大有可为的。我国农村是最广阔的市场，可以容纳最大量的商品，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前途无限宽广。

注 释

- 【1】 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10页。
- 【2】 陈云：《做好商业工作》。《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9页。
- 【3】 陈云：《一定要把蔬菜问题解决好》。《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4页。
- 【4】 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09—210页。
- 【5】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44页。
- 【5】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版，第33—34页。
- 【6】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457页。
- 【7】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版，第174页。
- 【8】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437—438页。
- 【9】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版，第65页。
- 【10】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582页。
- 【11】 同上书，第584页。
- 【12】 同上书，第34页。
- 【13】 同上。
- 【14】 列宁：《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91页。

- 【15】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版，第885页。
- 【16】 陈云：《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79页。
- 【17】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第1320页。
- 【18】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773页。
- 【19】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版，第360页。
- 【20】 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11页。
- 【21】 陈云：《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94页。
- 【22】 陈云：《重视粮食工作》。《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4页。
- 【23】 陈云：《坚持按比例原则调整国民经济》。《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50页。
- 【24】 陈云：《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81页。

在安排好生产的基础上 安排基本建设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下旬)

对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关系，陈云同志提出了这样一条原则：“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我们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条原则是完全正确的。

陈云同志说，原材料的供应，在宽余的时候不发生问题，在紧张的时候就必须有个分配顺序，要首先保证生活必需品生产部门最低限度的需要，其次是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剩余的部分用于基本建设。这就是说，要在保证当前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 and 生产资料的生产）正常进行的基础上，有多少剩余搞多少基建。先保证生产，后供应基建，就是为了避免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挤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生产。

按照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出发点和基础。马克思说：“简单再生产是每个规模扩大的年再生产的一部分，并且还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1】

“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是在简单再生产内部生产出来的。”【2】如果不保证当年生产的需要，简单再生产就难以维持，那就谈不上扩大再生产。企图用牺牲当年生产的办法来搞基本建设，不仅不能扩大再生产，连原有的生产规模也要遭到破坏。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按大体计算，我国工业生产总产值中，由新建企业和改建企业所生产的，约占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八十五来自原来企业，而这个时期我们的工业生产发展是相当快的。

扩大再生产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挖掘现有企业的生产潜力。挖掘潜力的途径很多，如提高职工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技术熟练程度，改善劳动组织，改进经营管理，用新的机器替换陈旧落后的机器，改进工艺流程，等等。我们很多企业的设备并不十分落后，但是产量上不去，产品质量过不了关，主要原因就是工艺水平不高，操作技术差，经营管理水平低。在这些方面都是大有潜力可挖的。通过这些方面的努力扩大了生产规模，叫内含方面的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建设新的车间或者新的工厂，即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场所的扩大。通过这种途径扩大了生产规模，叫外延方面的扩大再生产。这两种情况，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含上扩大。”【3】过去很多同志有一种误解，或者说是一种片面性，就是把安排当年生产看成是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要扩大生产规模就必须搞基本建设，进行新建或扩建。这种看法有一定的片面性。内含的

扩大再生产就不一定需要新建企业。同样地,把基本建设等同于扩大再生产,也是不对的。因为基建中间有一部分是为了补偿现有企业报废了的那部分生产能力,是为了维持在原有规模上进行再生产。例如原有企业的改建,就包含了属于简单再生产的设备的更新和固定资产的补偿。又如煤矿,有一个矿井挖了若干年之后,没有煤可挖了,就要报废。如果这个煤矿要保持原来的生产规模,就应该开新井。这是基建,但并没有扩大生产规模。除此以外,基建投资中还要有一部分用于非生产性的建设,如住宅、医院等等,这是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

陈云同志所说的“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革,后新建”这个方针的基本精神,是要充分利用已经建设起来的工厂。我们要进行现代化建设,重点究竟摆在哪里?一种意见是,完全靠或者主要靠新建工厂,从外国引进设备,买得愈多愈好,愈新愈好,在中国的土地上成批地建设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技术水平的新工厂,这才叫现代化。这实际上是想花钱买来一个现代化。一九七八年的时候,曾经在这个问题上有点不清醒,不量力,同外国订了很多合同,现在成了我们很大的负担。陈云同志认为,四个现代化的着重点不是这个。我们需要引进一部分新的设备,建设一批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技术水平的现代化的工厂。但是,重点应该把我们现有的近四十万个企业充分利用起来,发挥它们的生产能力。要通过挖潜、革新、改造,包括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主要是“软件”,也包括买一点关键性的设备,改

造现有企业。我们现有的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单位，包括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城市公用事业，固定资产有四千八百九十多亿，其中工业是三千二百四十多亿。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呀！三十多年来我们尽管走了不少弯路，但终究建立了一个比较雄厚的基础。一九七九年，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总值，包括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城市公用事业，相当于一九五二年的二十倍；如果单算工业，则相当于一九五二年的三十倍。这是我们前进的阵地，这是我们可靠的依托。我们不能看不起这个基础，一心只想着要盖新工厂。我们绝不能走这条路。要把现有的企业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通过挖潜、革新、改造，使它们改变面貌，成为先进的企业，成为现代化的企业，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来。

我访问过日本和美国一些有名的大工厂。这些厂中的大多数原来都是小工厂，是很落后的，现在成了现代化的了。他们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有没有近年来建设起来的新工厂呢？当然有。这主要是一些新兴工业部门。但大量的企业是在原有的基础上逐步改造的。他们有意把工厂最早建成的车间或者某一个部分照样保留下来，在我们参观的时候还领着我们去看，说原来他们就是这么一个摊摊，经过几十年，现在完全变了样子。这类似我们企业的厂史展览，只不过我们的只有图片，人家的却有实物。他们的这个在企业原有基础上更新、改造、发展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冶金部的周传典同志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对冶金工

业现代化的一点认识和建议》，先是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的《经济问题研究资料》上刊登，陈云同志看了以后很称赞，后来《人民日报》也转载了。文章说，他对中国冶金工业现代化的道路问题，经过曲折的摸索，最后觉悟到，主要还是要靠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他说，他对冶金工业现代化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九七五年。当时，他提出关于新厂建设和老厂改造挖潜的两点建议。这些建议基本上是对的，但有缺点。一是关于新厂建设，没有注意到采用和引进国外先进的工艺、技术和装备；一是改造老厂只讲了填平补齐，没有谈到技术改造。第二个阶段是一九七八年。当时出国考察的人很多，他把这些考察材料加以搜集研究，把冶金工业现代化概括成六个方面的标志：设备大型化，操作自动化、连续化，生产效率高，能源低消耗，钢铁质量优，环境污染少。他觉得，像这样的现代化，花钱很多，我们搞不起，想多搞很难办得到。一九七九年，他到西德、日本、美国去考察，这是第三个阶段。考察的结果，发现他原来概括的六条，只是日本的情况，西德和美国就不是这样。那里并不是什么设备都是新的，而是现代化的东西和古老的东西并存。比如铁合金厂至今仍用铅室法生产，而这种落后方法我国早就淘汰了。对于旧设备，他们只是在继续使用不合算时才改用新的，并不轻易毁掉。对于新设备、新技术的采用，完全是以能否取得更大的经济效果为标准。周传典同志经过这一番考察，对于我国冶金工业现代化问题的结论是，利用现有的钢铁企业，不用新建，通过挖潜、

革新、改造，就可以达到年产四千五百万吨钢。这个意见是很对的。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这样一个观念如果不牢牢地树立起来，一讲搞社会主义建设，就光想买这个买那个，把原有的基础丢在一边，那实现现代化就需要一个漫长过程。

陈云同志最近指出：“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现有工业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引进新技术。现有技术人员是我们知识力量的基础。我们有大专学校毕业生和自学的技术人员共几百万人，他们经过了一二十年的实际工作的锻炼。必须肯定，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技术水平，应该来之于这些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水平的技术骨干。”

这就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和出发点。我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稳步前进，也只能在这个基础上稳步前进。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可观的基础，可是能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更不要说挖潜了。由于电、煤、油不够，就是说由于能源不够，全国现有企业中百分之二三十的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这就没有必要再去建新的了。至于人才，从长远来看，是需要培养大量的新的人才的，但首先要充分发挥现有人才的作用。我们现有的知识分子，不论是老年的，还是中年的，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有真才实学的，要充分信任他们，依靠他们；要提供各种必要的条件，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即使是青年人，也有不少是有才干的，也应该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培养新的人才，也得靠现有的知识分子。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当然是必要的，但数

量毕竟有限。总之，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只有从现有的基础出发，才是稳妥可靠的。这个思想必须牢固地树立起来。

去年提出的调整方针，包括要把那些原材料供应不足、产品质量很坏、年年亏损靠国家财政贴补的企业，关停并转一批。但是，这条方针并没有很好贯彻。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只停了一千多个，同时仅县级以上的企业就增加了几千个，如果加上社队企业，数量就更多了。抽烟的人都知道，好的香烟现在在市场上买不到。是不是生产能力不够呢？不是。生产好烟的上海烟厂现在几乎要停工了，可是河南也好，山东也好，凡是产烟叶的地方，到处都在兴办烟厂，原料被用掉了，而生产出来的卷烟质量太差，好烟叶也生产不出好烟来。据统计，上海一九七七年调入烤烟一百二十九万担，去年减为九十八万担，减少百分之二十四。上海、天津的皮革厂、毛纺织厂，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这些地方制出来的皮革质量高，可是现在没有皮张供应。而牧区的小皮革厂却搞了不少，质量不过关，原料和能源消耗很高。像这样盲目地重复建设的现象，现在在全国有所发展。我们的方针是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可是，对这个方针应该有个正确的了解，而且实现这个方针也要有个过程。产烟叶的地方有烟叶，这当然是长处。可是那里烤烟的技术、配方的技术、制烟的技术水平都很低，设备也很落后，只能搞低级的烟，这是短处。上海是老工业基地，基础好，技术水平高，这是长处；短处是没有烟叶。发挥优势，彼此都要看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采取互相合作的办法，避免短处，发挥长处，这才

叫扬长避短。当然，这里有个利润分配的问题。过去这一点考虑不够，烟叶调走了，赚钱都归加工烟叶的地区和部门了；烟叶价格低，产烟叶的地方只赚卖烟叶子的钱，就觉得不合算。所以，以后怎么使得利润返还产地一部分，或者烟叶价格提高一点，通过这样的办法，保证上海的烟厂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产烟叶的地方不要再建新厂，首先满足现有企业的需要，以后烟叶的产量增加了，就可以有计划地在产烟叶的地方建设新厂。到那个时候，烟叶产区可以派人到上海学技术，或者上海派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去支援产区，把配方教给他们，把新厂办好。这才真正是扬长避短。当然，这里只是举个例子，并不是提倡大家都抽烟。

不致力于改造现有企业，把大部分钱和材料用于搞新建。其结果，不但不能扩大再生产，甚至于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我们说先生产后基建，所谓生产，就是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所谓基建，就当前来说，还不是现实的生产能力。不能对已经有的生产能力不重视，不想办法充分利用它，脑子里只想到未来的尚待形成的生产能力。有的同志说，共产党人既要看到眼前的利益，又要想到长远的利益，我们一心一意建新工厂，搞基本建设，是为了长远利益呀！这有什么不对？这些同志没有想一想，不搞好当前的生产，等于挖掉了扩大再生产的根基，以后的生产规模就无法扩大。

在搞基本建设的时候，还要考虑搞什么样的基本建设，各个部门要合乎比例，“骨头”和“肉”要互相衔接。公用

设施，比如公路、地下水道等等，这也是基本建设，都要和生产互相适应。还要考虑到，那些投资少、建设周期短、见效快、产品有竞争能力的企业的基本建设，就要先搞。那些规模太大、建设时间很长的企业，虽然需要，但要十分慎重。

马克思说：“有些事业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而另一些生产部门不仅在一年间不断地或者多次地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且也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社会公有的生产的基础上，必须确定前者按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损于后者。”【4】我们这方面的教训，一个是喜新厌旧，一个是贪大厌小，一个是崇洋贬中。搞一个工厂，都想搞一个大家伙。我们在美国访问时，看了一些小工厂，几百个人的，五六十个人的，甚至二十几个人的。人不多，技术却很高，产品质量好，能够为美国的尖端工业、包括尖端军事工业提供一个部件或一个零件。而它的这个产品，不光是在美国，而且在世界上也是很有竞争力的。我们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不考虑每个工厂的产品在整个社会生产中起的作用是大还是小，生产经营活动搞得不好还是坏，一律按照工厂的大小和人数的多少来衡量工厂的地位和等级，这怎么行！

我们搞现代化，是需要建设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的，但一定要量力而行。就是说，要充分考虑有没有那么多钱？有没有那么多原料、材料和燃料？有没有那么多运输能力？有没有那么多技术人员？决不能不顾这些，甚至于连有没有那么多资源都不很清楚，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就仓猝上马。这

样的盲目性，我们再也不能听任它发展下去了。

注 释

- 【1】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457页。
- 【2】 同上书，第560页。
- 【3】 同上书，第192页。
- 【4】 同上书，第396—397页。

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上旬)

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是陈云同志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的，并且有专门的论述。收集在《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中的这篇文章，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文章好读，只要结合我们的经验，是可以领会他的意思的。这里，我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作一点简要的解释。

陈云同志说：“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因为物资多了，增加建设是比较容易的；而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不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

这段话非常重要。我们三十年的经验，包括正面的经

验和反面的经验,反复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必须是持续的、不断的。要持续,要不断,就要使我们的经济保持稳定。而要使经济保持稳定,就必须使建设规模符合我国物力和财力的可能。我们有反面的经验,建设的规模超过了财力和物力的可能,就闹成大折腾,猛然上升,猛然下降,造成经济不稳定,带来很大的困难。保守不好,冒进也不好。陈云同志说,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这个话是一九五七年一月说的,就是在一九五六年冒进以后。当时,如果没有胆量,没有独立见解,这种话是不敢说的。本来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说总路线是照耀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离开了它就要犯“左”的或右的错误。可是后来我们并没有认真地反对过事实上确实存在的“左”的倾向,却一股劲地、不断地反对右倾保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以致造成一种空气,似乎建设规模越大越好。在建设规模是不是要和国力相适应、经济是稳定好还是不稳定好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实践,证明陈云同志的观点是正确的。

纠正冒进比纠正保守要难得多。过去我们有许多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又有了新的经验教训。打开了国际交往的局面,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正常的关系以后,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认为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我们又公布了十年规划,要搞一百二十个大项目,一九八五年要搞到六千万吨钢、八千亿斤粮食。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想同我们做生意,为他们过剩的资金在中国找出路,把他们的商品卖给我们。以前资本主

义国家封锁我们，现在要同我们进行贸易。这个条件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这个方针当然是对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规模多大才合适，整个国家建设的规模究竟应该多大，借到的钱能够用多少，我们的偿还能力有多大，还本付息会不会成为沉重的负担。一九七八年同外国签订了二十二个大项目，初步估计，把这些项目全部建成，大约需要六百亿人民币。订了合同，签订了协定，设备陆续来了，才发现我们现有的财力、物力要把这二十二个项目都马上搞起来是不可能的。从去年提出调整方针以来，这些大的项目反反复复，一会儿说要减一点，一会儿又说减了不行，一会儿说机器设备进来以后是不是放在仓库里保存起来，一会儿又说与其保存在仓库里，倒不如把它安装起来，哪怕不能开工也行。反复讨论，决定不下来。这比一九五八年上去以后退下来难得多了。一九五八年几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后来看着不行，退下来就是了。上山找不到矿石，就不去了。小高炉炼铁，柴火烧完了，树也砍光了，炼出来的不是铁，那就不再炼了。现在我们同外国人订了合同，人家按照协定准备了这个材料、那个材料，制造了这个设备、那个设备，甚至用轮船运来了，你不算数，人家就要索赔。要搞吧，还要有相应的国内配套设备和材料等等，需支付相应的人民币。而这些东西，根据我们现在的财力和物力，无论如何是配不起的。所以，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难题。本来陈云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讲，他不反对借外债，也不反对建设一些新工厂，

也不反对购买一些外国的新设备，但是必须循序渐进。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办，背了这么个将近六百亿的大包袱。最近中央已经下了决心，提出要退够。当然，退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退，进来的设备你不能不接收，接收了以后，你就不能不付款，借了债你就不能不付息，不能不还本。设备来了不安装，就得封存起来，不仅不能生产，还得支付保管和维护费用。我们应该很好接受这个大起大落的教训，今后一定要量力而行，保持经济稳定上升。

建设规模是什么意思？国力是什么意思？这两个概念，可以进行广义的解释，也可以在特定的意义上进行解释。陈云同志在讲到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时就说过，原材料分配的顺序应该是：“首先要保证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部门最低限度的需要，其次要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的需要，剩余的部分用于基本建设。先保证生产、后供应基建这种排队的必要，主要是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人民生活的需要，避免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挤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在财力物力的供应上，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必须先于基建，这是民生和建设的关系合理安排的问题。”从陈云同志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建设规模，就是基本建设规模；他所说的国力，不是指整个国民收入，而是安排好现有生产以后的剩余产品。

马克思说：“首先，年生产必须提供一切物品（使用价值）以补偿一年中所消费的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扣除这一部分以后，剩下的就是包含剩余价值的纯产品或剩余产

品。”“要积累，就必须把一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1】就是说，不能把全部产品都作为用来搞基本建设的国力，而只能是先满足现有企业正常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现有职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消费资料，剩余产品才能作为用来搞基本建设的国力。剩余产品中，还要有一部分用来满足非物质生产部门的需要，而且还要拿出一部分来改善人民的生活。扣除了这些以后，才能够用于新的建设。我们过去的搞法是，有的时候把应该用于现有企业正常生产所必需的产品挤出来搞基建，造成简单再生产的萎缩，在生产上欠了一大笔帐；有的时候是把剩余产品全部用于搞基本建设，甚至把应该用于人民生活的部分也挤出一些来加到基本建设上去，致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仅不能提高，反而比原来还要下降。多年这样搞的结果，就在人民生活上欠了一大笔帐。就拿城市职工住宅讲，城市人口增加很多，从一九五二年的七千一百多万人增加到一九七九年的一亿八千四百多万人，而住宅建设的增长比较慢，现在城市人口的平均住宅面积还低于建国初期。仅是还这一笔帐，即恢复到建国初期的水平，就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下面再说说财力的问题。陈云同志说，钞票是物资的筹码。要加印钞票，那是很容易的，票子工厂一开动机器就是多少亿。可是，钞票多了，没有相应的物资，还是买不到东西；即使能买到，过去一块钱能买到的东西，现在需要一块多钱才能买到，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所以，陈云同志再三强调，我们的基本建设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建设搞多少，不决定于钞票有多少，而决定于原材料有多少。如果没有那么多的物资，多发票子也搞不了那么多的基本建设。过去在基本建设中经常发生有钱没有物的现象，人们形容是“三八式”，就是列计划的时候，物资只给百分之八十；订货的时候，又只能订到物资计划的百分之八十；实际拿到的物资，又只有订货的百分之八十。这样几个折扣，实际拿到的东西只有一半多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只好你挤我，我挤你，采购员满天飞，结果是延长了建设周期，降低了经济效果，造成严重浪费。以后显然不能再采取这种办法。去年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同志讲，有点通货膨胀有什么了不起，也可以学习外国搞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的办法。陈云同志坚决反对用列赤字、发票子的办法来搞基本建设。他说，你们不怕通货膨胀，我给你们讲，我害怕，我害怕，我害怕。一连说了三个害怕。

讨论今年的计划时，究竟基本建设投资搞多少，国家计委的同志很费踌躇。去年的基本建设规模，中央是压下来一点，可是地方增加了一倍。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预算报告讲，一九七九年一百七十亿元赤字，一九八〇年八十亿元赤字，一九八一年还可能有。执行的结果，一九八〇年的财政赤字比预算报告里讲的还要多。一九八一年原来想把赤字控制在五十亿元，如果不加调整，还是照现在的办法搞下去，明年的赤字还要比原来的预算多得多。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必须认真对待。

陈云同志最近说，不要怕清醒的健康的调整。“可能有

些议论：‘这会耽误三几年’。不怕。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耽误了一百多年。而且这次调整不是耽误，如不调整才会造成更大的耽误。因为我们这次调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调整，我们会站稳脚跟，继续稳步前进。”【2】如果财政赤字不消灭，而且继续增长，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用多发钞票的办法，把负担转嫁到人民身上。农民也好，工人也好，这两年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确实有所改善，如果财政赤字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他们已经得到的利益就会因为我们经济建设的安排不妥当而重新丧失。这个问题到了下决心解决的时候了。小平同志完全赞成陈云同志的意见，说要退够，退得不够再退。这样才可能早一点缓过来，前进的时间可能来得早一点。这是我们六十年代那次调整的经验所证明了的。当然，这样也会带来一些困难。可是，这些困难同使人民生活得到的实惠重新丧失两相比较，同整个经济局势不稳定相比较，损失要小得多。

一九八一年基本建设投资确定为三百亿元，其中有八十多亿元是维持原有规模再生产所必需的，不能不给，否则简单再生产也不能维持了。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比如能源工业，也是需要投资的，以便为调整以后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此外，还有一些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像住房、学校、科研、城市公用事业等，也需要花一些钱。

要做到建设规模同国力相适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财力物力的估计，包括对剩余产品有多少的估计，无论如何要实事求是，有多少就如实地说多少，绝对不

能搞浮夸，绝对不能讲假话。陈云同志总结我们一九五八年以后那几年的经验教训时说，建设规模铺得这么大，就是建立在一九五八年生产粮食七千亿斤、棉花七千万担这样一个错误估计上的。当时以为粮食过了关，可以大办工业，钢产量很快可以达到五六千万吨，所以就大量招收职工。而实际情况怎么样呢？一九五七年的粮食产量是三千九百亿斤，一九六〇年降到二千八百七十亿斤；即使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同当时的建设规模也是不相适应的。

浮夸，说假话，确实是不好的。搞浮夸的人当中，也有邀功请赏以便于自己升官的，但大多数人是认识问题，没有知识。听到说钢铁可以翻一番，那还不好，翻吧！那干劲确实很大哟！我们是共产党人，总希望把建设搞得快一点、多一点。参加革命几十年，岁数也不小了，作出成绩也好向马克思交代。而没有在做决定或采取行动之前，去听听专家和技术人员的意见，看这样行不行。而广大人民群众呢，又强烈要求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大办钢铁，七千万人上山，热火朝天，但不懂得炼钢铁是件不那么简单的事情，以为多少万人一上山钢铁就搞上去了。至于在农业上，粮食本来没有那么多，本来是不够吃，农民是清清楚楚的；如果真正深入群众，到群众里头了解一下，不就很快可以发现吗？可是高高在上，不调查研究，不深入实际，不接触群众，以为就有那么多，说收不上来就是因为瞒产私分。你瞒产私分，我就来个反瞒产、反私分，挖光了农民的老底。所以，对物力的估计、财力的估计，以后再也不能搞浮夸了，再也

不能够说假话了。

陈云同志讲到建设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的时候，还说了五条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危险的制约方法。第一条，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第二条，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第三条，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第四条，基本建设规模和物力财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第五条，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经济建设不能超过农业的负担能力。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几条都是正确的，有效的。

如果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力，该怎么办呢？陈云同志说，他五十年代管计划的时候，采用的办法就是“砍”，砍到国家财力、物力特别是农业所能承担的程度才定下来，甚至要砍到“伤筋动骨”。同时要卡劳动力。国家办的企业，人进来容易，出去很困难。进来了就得发工资，供应吃、穿、用品。这就应该算一算，看市场供应怎样。如果物资不够，就不准增加人。陈云同志认为，基本建设投资和劳动力这两条管住了，计划大体上也就管住了，就不至于出乱子。

至于基本建设本身的问题，陈云同志在《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这篇文章中讲得很清楚，很透彻。这篇文章讲的道理，除个别的地方因为情况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完全适用以外，基本精神仍然是现在我们搞基本建设必须遵循的。这里，我只想谈一点，就是关于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在“大跃进”时期，曾经提出要建立独立的工

业体系。不但全国要搞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各大区要建立工业体系，各省也要建立工业体系。是三者都能搞成，还是有的能够搞成，有的就搞不成？这是基本建设的一个战略决策的问题。陈云同志认为，建立工业体系只能首先从全国范围开始，然后才是各个协作区，再后才是一些有条件的省、自治区。我们这么一个大的国家，自己没有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就不能做到自力更生，在经济上就不能独立。各协作区的工业体系，要等着全国的工业体系建立之后才能建设。至于省和自治区，陈云同志认为，在一个省、自治区以内，企图建立完整无缺、样样都有、万事不求人的独立的工业体系，是不切实际的。他讲了一个简单易懂的例子。他说，在发展农业的时候，要根据不同的土壤、气候和其他的条件，来种植不同的作物。如果违反这种因地制宜的原则，农业就不能增产，甚至遭到严重破坏。工业的发展也应该考虑到当地的资源条件。你那里有煤，才能建立煤炭工业。你那里有铜的资源，才能开采出铜来。你那里没有煤的资源，说我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硬要去开煤矿；你那里没有铜的资源，说我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硬要去搞个铜矿，这不完全是主观主义吗？各种矿产资源的形成，那是多少亿年地质变化的结果，不是想有什么就有什么。不考虑本地区的资源条件和经济特点，硬要去搞这样的工业，那样的工业，勉强办那些根本办不到的事情，那还不是浪费资金？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很多。前几年，这个省也说要搞工业省，那个省也说要搞工业省，干了不少经济上不合理的事情。一些省的同志

说,过去建立工业省那个说法不切合实际,应该放弃原来那个计划。这是完全对的。

注 释

- 【1】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636、637页。
- 【2】 陈云:《经济形势与经济教训》。《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282页。

计划工作与综合平衡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上旬)

社会主义经济要有计划,有计划就是自觉地按比例。陈云同志的这个观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说:“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1】}马克思这里讲的是社会生产发展的普遍规律,对于任何社会都是适用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揭示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指出两大部类之间、两大部类内部都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这当然是高度的理论抽象。把它运用到现实经济生活中,还需要具体化。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有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在农业内部,有种植业和林、牧、副、渔业的关系;在重工业内部,有原材料工业、加工工业和燃料动力工业的关系,等等。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之间,以及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之间,也都有一定的比例

关系。总之，整个社会经济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互相制约的比例关系。比例关系遭到破坏，生产就不能正常进行。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尽管工厂内部是有计划的，但从整个社会来说，由于私有制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存在，不可能有统一的计划来指导生产，社会生产所要求的比例性，是通过比例不断遭到破坏而实现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实现论假定生产是按比例分配的。这是资本主义的理想，但决不是资本主义的现实。”【2】“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只有经过一系列的波动才能达到；生产规模越大，它所依靠的消费者范围越广，这些波动也就越厉害。”【3】

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可以通过计划自觉地来安排比例关系。列宁说：“经常的、自觉地保持的平衡，实际上就是计划性”。【4】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说：“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这就是我们的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5】所以制定经济计划的最重要、最中心的任务，就是要把各种比例关系安排得好。

薄一波同志在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讲，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要很好地处理国民收入和积累之间的比例关系，国民收入和国家预算收入之间的比例关系，国家预算支出和基本建设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他划了个“二、三、四”的杠杠，即在今后若干年内积累部分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低于百分之二十或者略高一点，国家预算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低于百分之三十或者略高一点，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低于百分之四十或者略高一点。陈云同志表示赞成一波同志的研究，说他所提出的比例数字可能会略有出入，但寻找这些比例关系是完全必要的。陈云同志提出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其中包括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关系，民用工业和军用工业的关系，建设中“骨头”和“肉”的关系，等等。

所谓按比例，内容很多，但是对于经济工作的领导来讲，最重要的，是从综合的即全局的观点来考虑平衡问题。陈云同志过去就强调三大平衡，即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物资供需平衡。现在又提出外汇收支平衡。这样，就是四大平衡。这四大平衡，都是要达到按比例。财政不但不能打赤字，还要争取略有结余。银行信贷，存款和贷款要平衡，帐面上会有也允许有一定的差额，但是这个差额是有限度的，超过了限度就会出现非正常发行。要不然，支出的钱太多了，货币发行太多了，就有可能发生票子不能兑现的问题。李先念同志最近讲，过去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就是财政

挤银行，财政有赤字了，就向银行透支。一透支，就增发票子，这就会引起物价上涨。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我们有可能有计划地安排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但是，可能不等于现实。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规律，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规律的要求的计划。不能说，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完全反映了这个经济规律的要求。”【6】对于我们的经济计划，也应该这样说。我们过去往往不是先研究客观条件和实际的可能，而是主观地先订出几个远景指标，然后根据这个指标来安排整个经济计划。其实呢，都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的；结果当然都实现不了。这种不从实际出发制订计划的方法，是根本不对头的，陈云同志一向不赞成。

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例如年度计划）的正确方法应该是什么呢？陈云同志说：拟定明年的工业生产指标，要根据今年年底现有企业已经达到的综合设备能力（包括动力、运输等），作为编制明年计划的出发点，加上现有设备的潜力，再加上明年基本建设可靠的新增加的生产能力，加以确实计算，把计划指标放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

要使计划能够按比例，指标定得可靠，基本的方法是综合平衡。在如何搞综合平衡的问题上，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其中主要是所谓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主张要搞所谓的积极平衡,指责陈云同志是消极平衡论。其实,陈云同志并没有讲过要搞什么消极平衡。陈云同志认为,由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社会购买力的提高,人民吃穿用的需要都增加了,但农产品的增长速度比较慢,所以在国家大规模建设中,要照顾人民生活的需要,做到商品供应和物资分配这两个方面的平衡,是不容易的。我们的工作就是使这种紧张的平衡不至于破裂。实践证明,陈云同志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与此相反的主张,即所谓搞积极平衡,实际就是按长线来平衡,也就是把最高产量的某种产品作为标准,其他的都要向这个标准看齐。陈云同志不赞成这种按长线平衡的办法,主张按短线平衡。他说:“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7】在这个基础上来搞平衡,才是可靠的平衡。

搞综合平衡,要从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比如钢铁生产,不仅要计算钢铁工业部门内部的综合生产能力,而且要计算煤炭、电力、运输等部门的生产能力,这样才能定出可靠的计划指标。我们钢铁工业以往的教训,恰恰是既不认真考虑内部的综合平衡,更不认真考虑外部的综合平衡。这就不能不产生很大的盲目性。

搞综合平衡,还必须切实注意质量和品种。陈云同志对

钢铁工业部门的同志讲,以后再也不要只想到钢了,应该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全面安排。对钢铁指标,也不能只讲究数量,不讲品种,不讲质量。陈云同志说过,他不主张单纯追求数量的高指标,重要的是品种和质量。这个论点的正确性,不仅被我们的历史所证明,而且也是外国的历史所证明了的。日本一九三七年在发动侵华战争的时候,钢的年产量不到七百万吨,但它内部是平衡的,品种齐全,质量好,不仅能够造飞机,又能够造大炮,又能够造轮船,又能够造机器。德国在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九三九年,钢产量只有二千三百多万吨。苏联在开始卫国战争的一九四一年,钢产量只有一千四百多万吨。过去,冶金部门有一个论点,认为当时不能搞综合平衡,要先把数量搞上去,有了数量之后,再来搞质量,搞品种,搞平衡。陈云同志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开步走就应该搞综合平衡,应该把品种质量搞齐全。这样,我们钢铁的发展才是正常的,比只顾数量不顾质量和品种要好得多。

总起来说,搞经济工作不搞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就会乱套。全国要搞好综合平衡,一个行业、一个企业也要注意搞好内部的平衡和外部的平衡。一九五七年,我们达到了五百三十五万吨钢,如果注意综合平衡,假定每年平均增长二百万吨,到现在二十三年了,那我们今年就可以达到五千多万吨。可是,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搞综合平衡,突出钢铁的生产,结果不仅妨碍了别的部门的发展,钢铁本身也没有上去。

如前所说,再生产理论所研究的问题,也就是社会产品的实现的问题。实现的问题,也就是社会产品的各部分如何按价值形态和按实物形态补偿的问题。而这两种补偿,又要互相适应。如果哪个部分没有补偿,或两个补偿不相适应,简单再生产就不能维持,扩大再生产更不能实现。我们讲有计划地安排比例关系,实现综合平衡,都是为了使国民经济能够协调发展,社会产品的各个部分都得到实现。所以,学习陈云同志文稿,要和学习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结合起来。学懂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我们就可以看到,陈云同志关于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的论述,是马克思再生产原理的具体运用和发挥。同样地,结合我国的经济建设实践来学习马克思的理论,也可以理解得更深刻。对于做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工作的同志来说,应该认真研究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我们现在全党工作的着重点是搞经济建设,连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都不学习,怎么行啊?因为不懂得马克思再生产的理论,有些完全可以避免的错误也没有能够避免。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注 释

- 【1】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368页。
- 【2】 列宁:《再论实现问题》。《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71页。

- 【3】 列宁：《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85页。
- 【4】 列宁：《非批判的批判》。《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版，第566页。
- 【5】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版，第375页。
- 【6】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版，第6页。
- 【7】 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11页。

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上旬）

我想在这个题目下，把《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中的第一篇文章《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介绍一下，并且讲一讲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一些意见。

陈云同志这一篇文章，是一九五六年九月在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当时陈云同志讲完以后，参加会议的代表以及有些外国同志都称赞这篇讲话，认为很好。毛泽东同志也认为讲得很好。可惜的是，以后没有按陈云同志讲的这些意见去做，而是走了一条相反的路。陈云同志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指责。现在，经过了二十多年以后，我们还是要回到陈云同志当时阐述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上来。国务院在讨论体制改革问题时，就认为现在要解决的问题，陈云同志一九五六年就提出来了。应该说，这篇文章的基本精神和提出的一些原则，在我们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同二十多年以前相比，现在的情况终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我们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对于陈云同志所提出的主张，也要根据新的情况加以补充和

发展。

陈云同志在这篇讲话中，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有一段很重要的概括：“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1】

这就是陈云同志当时对于改善我们的经济体制的设想。这个设想是针对着三大改造中某些过急和一刀切的错误做法而提出来的。

按照陈云同志的设想，我们的经济并不是越“大”越“公”越好，而是要多种经营同时并存。陈云同志用“经营”这个提法，没有用“经济”的提法，据我个人的理解，他讲的意思，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多种经营形式并存。

按照陈云同志的设想，虽然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国家计划的范围扩大了，计划的程度提高了，但是计划依然不可能包罗万象，而只能是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产品和部门，这是主要的方面；其余的则是在国家所许可的范围内的自由生产。国家计划是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自由生产则是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国家的干预是不可缺少的。我们的粮食收购价高，销售价低，国家要补贴。我们的房租也很低，甚至抵不住修理费。国家各项补贴加在一起，每年财政上这方面的支出总共有二百多亿元。这合乎不合乎经济规律呢？陈云同志说：从微观经济看，这是不合理的，似乎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但我国是低工资制，如果国家不补贴，就必须大大提高工资。从现实的条件出发，究竟哪种办法好？能不能不补贴，大涨价，大加工资。他说，还是现在的国家补贴、低工资办法好。否则经济上会乱套。从最后的经济结果看来，现在的办法，小的方面不合理，但是大的方面还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我们实行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是取消国家计划，而是改善国家计划；不是撒手不管，而是不要管死。在国家计划生产为主体的条件下，存在一部分自由生产和自由销售，这种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自发性，是可以节制的，是有益的。相反，如果没有这种补充，我们的经济就会很死，像一潭死水。

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前，由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我们的经济是比较活的。按照陈云同志的设想，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应该把经济搞活。但是，后来实际上没有这么做。

我们的经济体制基本上还是斯大林的模式，管得很死。陈云同志在这篇讲话中就指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国家经济部门在过去几年中为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已经成为不必要了。”【2】这些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它从私有改造成公有，不采取这些措施实现不了。陈云同志又指出：“但是，这些措施不但在今天已经基本上不再需要，而且它们在当时也不是没有缺点的，目前如果继续采取这些措施，就必然会妨碍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3】这主要是经营规模过大，在各方面管得过死，有些必要的措施也不够完善。如果我们有经验的话，还可以搞得更好一些。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实现以后，如果继续采取这些限制措施，那就不能不限制到公有制经济的头上，必然会妨碍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情况变了，过去是必须采取的措施，现在也不能继续坚持了，要根据变化了的情况，采取新的措施。

新措施是什么呢？陈云同志提出五条：

第一，改变工商企业之间的购销关系，把商业部门对工厂所实行的加工定货的办法，改为由工厂购进原料、销售商品的办法。商业部门对工厂产品的采购，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关国计民生和规格简单的产品，如棉纱、棉布、煤炭、食糖等等，继续实行统购包销，以保证供应，稳定市场；另一种是品种繁多的日用百货，要逐步停止统购包销而改为选购。凡属选购的商品，商业部门有权优先选购；没有选

购和选剩的商品,可以由工厂自销或者委托商业部门代销。商业部门供应工厂原料的时候,不能好坏搭配,除了某些供不应求的原料可以由国家分配以外,其他原料由工厂自由选购。上级商业批发公司不准向下面派货,下级商店可以向全国任何批发机构自由选购,也可以向工厂直接选购。

第二,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产品和商业的很大一部分必须分散生产,分散经营。公私合营工厂的绝大多数是制造日用消费品的,如果把小厂都合并成为大厂,就不如小厂分散生产时那样灵活,就不能适应人民消费方面的多种多样和经常变化的需要。因此,就全国来说,大部分必须按照原来的状况或加以必要的调整后分散生产、分散经营。手工业一般地是带有分散性、地方性,绝大部分是不应该合并的。为了克服由于盲目合并、盲目地实行统一计算盈亏而来的产品单纯化、服务质量下降的缺点,必须把许多大的手工业合作社改变为小合作社,由全社统一计算盈亏改变为各合作小组或各户自负盈亏。在供销业务上,必须以基层社自购自销为主。商业方面合并过多的,也必须适当分散。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许多副业生产,也应该由社员分散经营,从而更好地适应市场的需要,增加社员的收入。总之,必须纠正只注意集中生产、集中经营,而忽视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的错误。

第三,取消市场管理办法中那些原来为了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投机活动而规定的办法。对于粮食、经济作物、重要的农副产品,仍然需要由国家统购或者委托供销合作社

统一收购。但是对于一部分农副产品，例如小土产，现在由当地供销合作社独家统一收购的，应该改为允许各地国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供销合作社一起自由收购、自由贩运，禁止互相封锁。这样，就可以使那些小土产避免由于当地供销合作社不注意收购或者收购价偏低而减产，可以使货畅其流。为了适应自由收购和自由贩运的需要，工商管理办法中已经不适用的部分，必须加以改变。

第四，必须使我们的价格政策有利于生产。陈云同志认为，不能把稳定物价简单地看成是必须“统一物价”或者“冻结物价”。他提出，在一般情况下，不要因为物价在一定范围内暂时上涨而有所恐惧。这些情况就是：（一）由于按质论价，品质优良、成本较高的产品的价格，要适当地提高。应该看到，商品的质量下降是最大的涨价。例如，本来应当使用一年的电灯泡，如果因为质量下降而只能使用三个月，实际上它的价格就涨了三倍。在某些消费品有质量下降现象的今天，提倡优质优价，实际上是降低物价。（二）消费品中的新产品，因为初制的时候成本高，只要消费者愿意购买，应该允许它在初销时期比之相同产品有一定程度的提价，等到成批生产而成本降低以后，再来根据可能情况加以降价。在现在某些消费品品种规格减少的时候，如果不采取这种政策，就不能鼓励消费品新品种的增加。（三）对于一部分小土产放松市场管理而改为自由收购、自由贩运以后，在实行的初期，收购价也会抬高，因而就不能不在城市中相应提高销价。价格的上涨，将促进小土产的增产，等到供求

平衡以后，它的价格就会回落到正常水平。因此，我们应该采取自由采购、自由贩运，而不要害怕价格一时的一定程度的上涨。如果不采取自由收购、自由贩运政策，而继续让当地供销合作社或国营商业独家收购，那么许多小土产会减产。采取上述做法，会不会使我们的物价失去控制、失去稳定呢？由于占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绝大部分的重要商品仍然由国家收购和销售，而且价格上涨的程度还是在国家的约束之下，这样就绝对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第五，对某些生产品的国家计划管理的方法，应该有适当的变更。我们的国家计划，无论长期计划或者年度计划，对于日用百货、手工业品、小土产，都只是把个别品种列入国家计划。此外，几乎全部不规定产品品种计划，这种办法是恰当的。但是，国家计划对这些产品规定了每年的产值，对日用百货的生产部门规定了降低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具体指标，以及利润上缴额，而所有这些规定的根据并不是确切的，绝大多数是估算的。由于国家计划规定了这些项目的指标，层层下达这些指标，又因为工厂的产品是由商业部门包销的，因此工厂的生产就往往只顾完成产值和利润，而对于商品是否合乎市场的需要却注意不够。我们应该把国家计划中对这些产品的各项指标只作为一种参考指标，让生产这些日用百货的工厂，可以按照市场情况，自定指标，进行生产，而不受国家参考指标的束缚，并且根据年终的实绩来缴纳应缴的利润。只要企业开支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财政制度，那么按年终实绩来缴纳利润，并不会造成

国家的损失。

用这五条措施，使经济体制变成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样一种经济体制。

如果认真读读陈云同志这篇讲话，就可以看出，从去年以来，理论界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所讨论的一些重大问题，陈云同志在这篇讲话中已经提出来了，而且提得很切实，很具体，虽然有些用语同现在有所不同。

关于体制改革的问题，除了这一篇讲话以外，文稿中还选了其他几篇有关的文章，就是《体制改革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陈云同志指出，我们的体制要实行分权，适宜于交给地方管理的厂矿，要下放给地方管理，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以内，给地方政府和厂矿企业一定程度的因地制宜的权力。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中央某些职权下放以后，平衡工作不应该削弱，而是应该大大加强。必须加强全国的平衡工作。没有全局、整体的平衡，就不是计划经济。按照陈云同志这里所讲的道理，我们在经济体制的改革中，绝不能因为分权就削弱计划指导和国家干预，放弃综合平衡。现在实行两级财政，“分灶吃饭”，实行的结果，由于没有加强全国的平衡工作，基本建设项目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核平衡，产生了一些盲目性。我们从去年起就提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中央管的基本建设确实压缩了，而地方管的基本建设不但没有压缩，而且比去年还增加了，造成很多盲目性的重

复建设。基本建设投资过多，规模过大，是造成财政赤字和物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因此，最近召开的省长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么一条，就是基本建设要坚决地退下来，绝不能用多发票子的办法来搞基本建设。没有那么大财力，靠多发票子搞基本建设，那怎么行啊？基本建设一定要退够，一定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不能让各省各专区各县想搞什么就搞什么；中央部门的项目也不能再分给各个部，要由计划委员会和基本建设委员会统一考虑。各省、市、自治区的基本建设项目，在各省、市、自治区平衡以后，要报告国家计委和建委审查，经国务院批准搞的才能搞，不批准搞的就不准搞。先念同志最近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我们的基本建设是高度集中的，到了一九六二年，我们面临困难进行调整，也是高度集中的，这次调整还得用高度集中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我们这样的国家，全部取消指令性的计划指标是不行的。这次调整，要吸取六十年代初期调整的成功经验，同时要有新的特点。这就是在加强宏观经济计划和行政干预的同时，继续发挥企业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主动性，把该搞活的事情搞活。这就是说，我们要有高度集中的部分，也要有适当灵活的部分。这两方面要结合得好，确实不容易。例如，现在一部分农副产品实行议价，这是必要的。但是议价的范围搞得太大了，有的地方不管什么东西都实行议价。这也是目前价格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后要限制议价的范围，哪些东西允许议价，哪些东西不能议价，必须派购，要有明确的规定。

陈云同志那时已经提出,要扩大企业的权力,企业的利润由国家和企业实行全额分成。合作商店、手工业合作社应该适当划小,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由全社统一计算盈亏改为各合作小组或各户自负盈亏。这些做法,都是和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我们从去年开始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过去我们讨论体制改革的时候,讨论来讨论去就是权力归中央还是归地方的问题,企业归中央管还是归地方管。结果,放了收,收了放,改来改去,实际上是中央和地方之间权力的转移,不解决根本问题。胡乔木同志提出,分权的问题最基本的是企业应该有什么权力。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按照这个精神,体制改革应从企业开始。我们现在进行体制改革,就是从企业着手的。到一九八〇年六月底,全国实行扩大自主权试点的工业企业已经有六千六百多个,这些工厂的产值占全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产值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还要继续搞下去,在若干年之内使全国的企业都要逐步地实行扩大自主权的办法。从一九七九年,财政部在广西柳州市搞了试点,一九八〇年上海、四川等地的少数企业又进行试点,就是把企业利润上缴的制度改变成为“以税代利、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办法。按照这种办法,除了按国家规定上缴各种税款和归还贷款以外,其余盈利全部归企业。企业搞得不好,没有盈利甚至亏损,国家不予补贴。实行这个办法,就把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职工个人利益更紧密

地结合起来，使每个企业和职工从自己的切身利益来关心企业的发展。当然，确定适当的税率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如果税制不完善，税率不合理，就会造成苦乐不均，影响职工的积极性，影响企业的发展。

美国和日本的企业所缴纳的各项税款占利润总额的百分之四十左右，高的达到百分之六十左右，企业叫苦，很不满意。可是仔细一看，这些企业都还是从小到大，从落后到先进，从低级到高级发展起来了。究其原因，就是在缴纳各种税收之后，毕竟还有钱，可以增加设备，进行技术革新，提高一点职工的工资，所以它能够发展。缴税多，表明企业的利润多。国家多得，企业也多。

我们过去的办法却是，全部利润都上缴，企业要发展就得伸手向财政部要；企业亏损了，反正国家补贴。比如，小化肥厂的综合能耗一般为大化肥厂的二点五倍，能源消耗悬殊。但是，小化肥厂因为国家有贴补，亏损可以伸手向国家要，因此可以在那里继续生产。这就不能鼓励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和进行技术改造。

我们在折旧基金的提取和使用方面也存在着问题。一部机器经常在磨损，过了期限就不能使用了。为了在这部机器不能使用时能够买回同样的或者更先进一点的设备，必须年年提取折旧费。过去，我们规定的折旧率太低，一般是百分之四左右，机器更新大约需要二三十年。而且，这数量不大的折旧基金，除一部分留给企业外，大部分要上缴财政，统收统支嘛。结果，企业的设备老掉牙了，想更新也更

新不了，因为没有钱，国家拿这个钱又去搞基本建设了。所以，我们的不少企业，二十多年了，面貌依然如故。这个制度不改，尽管我们有近四十万个工交企业，有几千亿固定资产，但企业没有办法发展。现在折旧率提高了，留给企业的也多了一些，这条道路我们一定要坚持走下去。

我们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并不只是把企业的权力扩大到少数人手里。所谓扩大企业自主权，归根到底，就是要把权力交给这个企业的全体职工，实行真正有权有责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企业管理的重大决策应该由职工代表大会作出，日常的指挥应该由以厂长为首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执行。

在企业改革的基础上，要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组织好专业化协作，不要每个厂都搞“大而全”、“小而全”。相近的企业可以自愿联合，从下而上组织联合公司。比如一个部件，与其我生产但是质量不好，就不如另外一个条件好的企业生产，我同他联合或签订合同，进行协作。这是完全按照经济利益组织的协作，不是用行政命令把企业硬捏在一起。这种联合公司可以是省内的，也可以是跨省的；可以是一个行业内的，也可以是跨行业的；可以是地方和地方的联合，也可以是地方和中央部门的联合；可以是国营的，也可以是国家和集体合营的。

现在，提出要把企业从部门所有和地方所有的框框中解放出来，如果企业的管理突破了部门所有、地区所有的框框，那末将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究竟怎样管企业？究竟怎

样管经济?这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这个问题现在还在讨论中。看来,中央也好,地方也好,还是要管计划。至于怎样改革计划管理的体制,还要研究。但是有一条要肯定,就是该管的必须列入计划,而且在计划中有一部分指标必须是指令性的。这种指令性的计划,原则上应限于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最重要的产品和部门。比如能源工业,大的煤矿、大的电站和大的油田,投资多,建设周期长,供应范围广,单靠一个地方往往很难搞成,这就要有全国的计划,要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主要是通过税收、信贷、价格等经济办法和经济立法,当然行政手段也是不可缺少的。

因为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企业又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难免会带来一些盲目性,这就需要制定一系列的经济立法,用立法来限制那些对经济发展不利的活动,鼓励那些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经济活动。违反了经济法规,法院就可以依法进行裁决。我们过去管经济是管政策,政策当然是需要的,今后还得抓政策。但是,我们管经济不能仅限于制定原则性的政策,还要抓经济立法,条例和法令要规定得很具体,并且切实可行。比如,经济合同应该包括哪些内容,该怎么订,怎么履行,违反了该受什么样的经济上的制裁,都要具体规定。属于经济纠纷,将来都通过这种经济立法进行解决。

必须恰当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今年考虑中央和省、市、自治区怎样分权的时候,讨论得最热闹的是哪

一部分钱应该归中央,哪一部分钱应该归地方。财政部门的同志担心,这个钱也划给省、市、自治区了,那个钱也划给省、市、自治区了,如果省、市、自治区办这件事来一个报告要中央增加补助,办那件事来一个报告请中央增加预算,那怎么办呢?看来,今后要分钱、分事、分责任,收入归了谁,有些事也归谁办。如果把钱办了别的事了,该办的事没有钱了,那是你自己犯错误,中央不再给钱,而且还要给予批评。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收入和支出必须挂钩。原则上是,既要划收入,也要划支出,“分灶吃饭”不能只分利益不分责任。你的小灶想吃好一点,就必须经营得好,使收入增加。你经营不好,就吃不好,就少吃一点。这方面我们没有经验。美国有一种所得税是统一征收的,统一征收后一部分交给联邦政府,一部分留给地方政府;有一种所得税是地方征收的,不交给联邦政府。还有一种是地方税,地方政府收了就归地方支,中央政府不管。究竟哪些事中央政府管,哪些事地方政府管,我们的经验还很不够,还需要进一步摸索。

现在我们是两级财政,有的同志提出将来是不是实行三级财政。美国是三级财政,一个联邦政府,一个州政府(相当于我们的省),一个地方政府。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照搬美国的或别的国家的办法。还有一个对落后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支援的问题。南斯拉夫采取先进地区把收入的百分之几交给联邦政府,由联邦政府补助落后地区。我们现在的办法是从中央财政中支付一部分钱,补助落后地区。这

笔钱，按照现在国家财力讲不算少，可是有的没有用好，没用到刀刃上。

银行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整个国民经济就像一部大机器，这部大机器要运转得好，就需要有润滑油。银行的作用，就像机器的润滑油，有了银行的调节，好像机器上了润滑油，就能够正常运转，效率很高。美国大陆银行的自有资金，据说不到三十亿美元，但是一年的营业额——存款、贷款等于自有资金的二三十倍。我们的银行的营业额还不到银行自有资金的十倍。这就说明我们银行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比较小。虽然有不可比的因素，统计口径也可能有所不同，但大体上总可以说明我们银行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美国银行的活动渗透到每个角落，不仅工商业和其他经济事业，而且机关、团体也渗透进去了，甚至于每个家庭的经济生活都渗透进去了。相反，有人说我们的银行就是只起了出纳的作用，离活跃整个经济生活的要求，还差得很远。这个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再讲一下调整 and 改革的关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这八个字，调整是关键。去年确定八字方针的时候，中央就是这么提的。改革要有利于调整、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的就改革。要使改革促进调整，不能使改革妨碍调整。现在中央又提出要进一步实行调整，基本建设要退够。在调整期间，凡是有利于调整的改革要坚决地干，妨碍调整的改革就推迟一点，服从于调整的目的。这样，我们下一个五年就可能搞得更快一点。小平同志讲，这个五年里头，我们在服从

于调整的大前提之下,不要着眼于增长速度,要着重把各种比例关系搞得好一点,使我们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使人民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当然,生活的改善也不可能太快,也要量入为出。在调整期间一定要争取尽快消灭财政赤字,制止通货膨胀,基本稳定物价。这样,群众每增加一块钱的收入,就不是名义上的增加,而是实实在在得到了一块钱的好处。这对于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都是十分重要的。

注 释

- 【1】 陈云:《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3页。
- 【2】 同上书,第4页。
- 【3】 同上。

开展新时期农村发展 问题的调查研究*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五日)

我讲三点意见。

第一，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中国。

在座的同志中绝大多数插过队，现在回了城，还想到农村，是令人很高兴的事。中国十亿人口，其中八亿是农民，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这是个常识，但对这种国情真正认识清楚，并且由此出发去看问题、想问题的人，还不很多。你们当过农民，现在还想把自己的学识、能力用于农村的发展，拿你们的话来说，就是为了这项事业要有一种献身精神。有了这样的认识，有了这样的觉悟，而且终年累月、切切实实地干下去，就证明大家没有辜负党的教育，在这个问题上不愧是先进分子，属于现在还不很多的人中的一部分。我们的事业非常需要有大批这样的人。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讨论会上的讲话。

我十三岁以前在农村,后来到长沙、北京读书、“一二·九”以后到了延安,和农民有点接触。日本投降后,到东北搞了三年半土改。后来到新疆,也在农村呆过一年多时间。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一年两次到农村做过调查。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又参加过两期农村“四清”。“五七”干校七年,住在农民家。我对农村有所了解,也有感情,听到有同志愿意做农村工作,就觉得和自己心心相印。你们决心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我希望你们能够说到做到。

不了解农村,就不能说了解中国;农村的事没办好,中国的事也不能说办好了。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讲到这个问题。那里头虽然是以工业产值、农业产值来讲这个问题的,但实际上也是讲农民问题和工人问题。农民多,生产力落后;工人少,但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这个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以至革命以后相当长时期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是决定我们的一切战略、策略和一切基本政策的出发点,革命时期是如此,建设时期仍然是如此。

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历史功勋。其中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确立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即代表工人阶级把中国广大农民团结起来,进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武装革命,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城市,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接着又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

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也犯过错误。这些错误，使我们没有能够取得预期的成果，走了不少弯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已经大为提高，而且正在从各方面采取措施，切实有效地纠正和避免发生过去的错误，努力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些。作为历史的教训，不仅我们这一代人，而且你们这一代人以至以后的人们，都应当记取。如果我们能使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八亿农民经济上也翻身，生活越来越好，使农村真正发展成为富裕的、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那我们整个国家的面貌就会大为改观。韩国、香港、新加坡没有八亿农民的问题，日本、西欧、美国、苏联几个国家的农民加在一起也没有八亿。我们把八亿农民的事情真正搞好了，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将有伟大的意义。为了这个事业，是值得把全部精力、全部生命贡献出去的，是值得为之牺牲一切的。

一个中国人，眼里没有八亿农民，不能不说是认识上的很大的缺陷。就青年人来说，有的在农村，总是想方设法挤到城市里；有的在城市，则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他们瞧不起农民，眼里、心里没有我们的八亿农民。而你们眼里、心里有八亿农民。尽管你们现在是小人物，没有资望，可是只要真正把自己贡献给八亿农民，那就代表了前进的力量，代表了中国前进的方向。这样的精神生活是高尚的、丰富的。

是的，我国的农民贫穷落后。毛泽东同志讲“一穷二白”，实际上主要是指八亿农民经济上贫穷、文化上落后。

可是另一方面，每一个在农村生活过而又不怀偏见和正视事实的人都会承认，我们的农民勤劳朴实、正直善良，有许多可敬可爱的优秀品质。有个电影描写一个复员军人当了队长，在工作中碰到了困难。这时接到通知，调他到县武装部工作。他犹豫时，有个女孩子很有志气地对他说：你走就走吧，可是你要想到我们这个地方再穷，也是生你养你的地方。这两句话尽管很普通，但确实是农民的语言。这个作者很懂得农民。我在“五七”干校期间，曾到西柏坡去参观过。除西柏坡稍微平坦一点，一路都是山区，荒山秃岭，无数块巴掌大小的土地，有的只能种几棵玉米。农民天天上山下山，一块一块地耕耘收获，祖祖辈辈在那种条件下劳动和生活，默默无闻、一点一滴、长年累月地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那里的土地。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一代一代，这本身就是轰轰烈烈的事业。这样的光辉业绩，就是我们的被一些人看不起的农民们干出来的。

看不起农民，眼睛里没有农民，心里没有农民，这是一些人、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的不大健康的情绪。他们既然这样看不起农民，农民也有权忘记他们、抛弃他们！历史上常有这种事情：心里记挂着农民的，为农民服务的，农民就想到他；忘记农民的，不为农民服务的，农民就抛弃他。我们的农民，正因为他们是劳动者，所以作为整体来看，他们不会失去判断谁是他们的真正朋友的能力。真正为农民尽力的，为他们的解放事业献身和作出牺牲的，包括知识分子，农民将永远记着他们。

现在有人很喜欢讲两代人的“鸿沟”。我看，两代人之间在对事物的认识上当然会有区别，但是要真正说“鸿沟”的话，实际上应当是指具有不同思想倾向的人们之间的鸿沟。年纪大小在人们之间带来的不同认识，远远不如社会立场在人们之间带来的不同认识那么严重，那么具有根本的性质。我们跟那些想不到农民、鄙视农民的人之间的鸿沟，确实是很深的。可以说，使这个鸿沟填平的唯一办法，就是他们真正同人民站到一起来。我们同你们也是两代人，恰恰在这样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上，我们之间没有鸿沟，而且心心相印。正因为立足于共同事业，所以才会有感情的交融。

第二，坚持社会主义农业和创造性地进行改革。

要使八亿农民比今天生活得更好，要做的工作很多。从大的方面说来，还是必须走他们已经选定的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你们研究中国农村的发展，我想也是社会主义道路下的农村发展问题。离开这个道路来谈农村的发展，是不会有希望的。

我想谈一点过去搞土改时看到的情况。吉林省榆树县的土地、房屋大量集中于地主，自己有几亩地的贫农很少。人数最多的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的雇农，占到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地主占那么多土地、房屋，怎么经营呢？他出租土地，要看你有没有一套车马犁耙，就是三匹马一张犁。有了这些东西，才能取得租地的资格。大量的雇农，是连这样的资格也没有的。土改后，贫雇农分到了土地和牲口，可是牲口你分一个，我分一个，他分一个。一个牲

口怎么种地？只好几户凑个互助组，自愿结合，提出了互助合作的要求。要搞生产就必须互助。后来我又到了新疆。那里大部分农牧区还处在封建社会中期，生产落后，生产关系也落后，但是土改以后农牧民也要求互助合作。所以说，搞合作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共产党强加的，而是农民自己的要求，是社会前进、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说合作化搞错了的人，相当多的是因为不懂事，没有参加土改，没有参加减租反霸，人云亦云。其中也有老干部。但是老干部中间，也有没做过多少农村工作，没较长时间到农民中去的人。说合作社搞得快了一点，工作搞得粗了一点，这是事实。但因此就全盘否定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否定搞合作化，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过去的提法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仔细推敲研究一番，就会看出这不太准确。应该说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包括多方面的内容，需要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完成的任务。按照过去那个提法，好像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这样就容易造成急性病，急于过渡嘛。现在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在这个基础上，今后还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就农村来讲，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为公有制，意义是非常伟大的。可以设想，如果土改之后，我们不搞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让私有制长期存在下去，那会怎么样呢？毛泽东同志当时就看到，农村已经发生分化，继续发

展下去,分化必然越来越重。中国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土地少人口多。土地私有制不改造,不发生分化才怪哩。我们及时地把个体农民土地的私有制改造成为农民的集体所有制,这就为农村的社会主义发展打下了基础。这恰恰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成功的经验。在具体步骤上,尽管我们也不是没有错误,但从全国范围看,足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农村有着深厚的基础和巨大的生命力,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由衷的热爱和欢迎。这难道是光靠共产党下命令能够做到的吗?

至于包产到户,这是争论多年的问题。最早是困难时期安徽提出来的,有的同志立即坚决反对。陈云同志表示,何必那么急急忙忙反对,让它实验几年再看好不好?现在来看,陈云同志这个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一九六二年邓子恢同志派人调查,凡是实行田间管理包产到户的地方,都比不实行的强得多。自留地最好,包产到户的地次之,不是自留地、又不搞包产到户的地最差。邓子恢同志说,这是合作化以来经营管理方面的一大创造。反对的人说,这不是什么经营管理问题,是方向问题。有的中央领导同志批评得更厉害,说主张分田到户的人实际是主张单干的;说最危险的是主张包产到户的,名义上在保护合作化,给人觉得他搞的是维护集体化的经营管理,因此带有很大欺骗性。现在越看越清楚,中国农村生产资料中土地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保持了土地公有制,在这个基础上搞包产到户,就找到了适合生产力性质、受到农民欢迎、又能促进农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

有制得到巩固和发展的经营管理方式。在这方面，你们已经专门做了调查，是了解不少情况的。很清楚，这种包产到户是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包产到户，尽管是大包干，也绝不是分田到户，更不是单干。

胡耀邦同志最近说，我们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从土地私有制到公有制，是一个很深刻、很伟大的变革。否定八亿农民的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行动，说得客气点是无知，说得挖苦点就是完全看不到八亿农民的行动、八亿农民的思想、八亿农民的觉悟。对广大农民的这种深刻的历史要求，必须肯定。想否定是否定不了的，只能说明自己可笑、幼稚、无知。他还说，我们进行了这种改造以后，在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方面，在解决集体经济基础上关于发展生产、组织生产、搞责任制、收益分配等一系列问题上，虽然也不断地摸索，但是长期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而且犯了很多错误。只有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才上了路。

现在，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各地农村都有很多新创造，“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样，我们的集体经济就更加巩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能更好地发挥。有人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特别是抓住包产到户大作文章。应当承认，在这点上，我们的宣传工作确实给他们留了空子，一个突出的缺点就是没有讲清楚包产到户是公有制基础上经营管理方面的创造。你讲包产到户这样好、那样好，公有制一字不提，这就容易使人

误会你是主张单干嘛。

还要看到，包产到户以后，出现了新的生产联合、专业分工。宋平同志讲，甘肃一向很穷，搞包产到户比较早，搞起来以后，自然地产生了一种生产上进行分工和联合的需要。有个生产队有台电磨，包产到户后，有人提议把电磨卖掉，每家分几个钱。一讨论，多数人不同意卖，电磨留下了。经营管理有了一点改善，挣了点钱。有人又提议把钱分掉。多数人主张再买一台电磨。增加了电磨，又需要增加几个人。这不是分化出几个劳动力去搞电磨了吗？挣的钱多了，除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也分给社员一些，使家家增加了收入。包产到户以后，羊增加了，各家自己放，很不方便。有人提出干脆把羊凑到一起，搞个劳动力专门放。这样，不是又有劳动力去干这件事了吗？地也可以由几个主要劳动力带着各家的辅助劳力种起来，其他人搞点别的副业。这说明，实行包产到户后，由于分工的要求、专业化的要求，各种新形式的联合开始产生了。你们出去调查，在这方面都会增长很多见识。包产到户存在多种多样的形式，它是不会停滞、凝固的。生产积极性发挥出来之后，生产发展之后，专业化分工和联合是必然要提出来的要求。

包产到户有两条好处：一条，这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经营管理方面的创造；另一条，它促进新的专业化分工和联合。从事实出发，把这两条讲清楚，就可以说服更多的人，打消怀疑者的顾虑，驳倒别有用心的人的攻击。同时，也只有不断地总结经验，深化我们的认识，才能使党的政策进一

步贯彻下去，真正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

这是只就包产到户一种经营管理方式而言。现在，全国各地农村在专业化分工、联产奖励、联产到劳等方面的形式是很多的。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我们搞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会错。决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有丝毫动摇。当然，极个别地区，十里、八里才有一户人家，要联也联不起来，勉强去联，实在劳民伤财，农民也不欢迎，生产也受到妨碍。这类个别地方，中央的政策允许单干。它数量很小，不会影响我们社会的性质，不会影响我们的根本方向。研究农村问题、农业发展问题，一定要坚持这样一个根本立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站稳脚跟，守住阵地，然后稳步前进。

第三，把农村发展的问题当做科学来研究。

你们提出，要使自己的工作服务于八亿农民，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个想法很好。你们拟定的题目和准备采取的步骤，我也赞成。

我想请大家回忆一下恩格斯的一段话。他曾经根据产生空想社会主义的那种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指出它的特征：“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缺点；消除这些缺点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

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空想。”【1】随着历史的前进，生产发展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发展了，社会发展的阶段本身显露出来了，事物之间的内部联系充分表现出来了，历史才给马克思、恩格斯创造了一种条件，就是不需要用臆想的联系去代替事物之间的客观联系了。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的变化相适应了，“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2】我恳切地希望，你们做研究工作，能够坚持这样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两年多的工作，过去在“左”的束缚下被压抑着的正确的东西，得到了解放；过去做错了的事情，现在总结了经验，也知道该怎么去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天天讲“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那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林彪、“四人帮”压抑真正的新生事物。这两年，真正的新生事物显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到处涌现出来。不同的经济条件，不同的气候条件，不同的土壤条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耕作习惯，不同的行业，都有各式各样的创造。所以，我们的研究工作，就是要充分地去发现广大农民、广大农村干部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创造出的大批新鲜事物，从中总结经验。书是要看的，脑子是要想的。要有思维活动；

要有抽象推理。这都没问题。但基本点一定要建立在发现事物之间的客观联系，发现有生命力的新鲜事物上。

据我知道，你们中间有几位同志过去一段时间对包产到户做了比较深入的调查。这当然好。但是，我劝你们不要只盯在这么一件事情上。一方面，这件事情还要更深入地调查研究；另一方面，一定要放开眼界，走遍全中国。当然要有分工，有侧重。要多到一些地方，普遍而深入地了解农民的生活、习惯、思想、感情、愿望。不要以为农民落后就没有创造，不要以为农民穷就安于穷。如果说只有我们这些人才有创造，八亿农民没有创造，那同空想社会主义者就有点差不多了。

外国的经验值得借鉴。毛泽东同志就提倡古今中外进行比较。对外国人的情况和观点要了解，但要从我们的实际出发，有批判地加以吸收。这虽然是老话，但真正要学会运用这个方法，确实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不是靠偷懒能够做到的。你们很勤恳，这是很好的。但也不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就能做到的，而是必须一辈子坚持下去，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下去。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了解了，什么都掌握了，一定要虚怀若谷。要坚定地相信，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永远来自人民，农业问题方面的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必然来自八亿农民。我们是要帮助农民的，我们也负有教育农民的责任，但首先要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请教。要把他们的东西加以总结提高，这里头就有我们的用武之地。要勤勤恳恳地把八亿农民创造的东西记录下来。记录

下来以后，加以整理，加以提高。发现事物的客观联系是不容易的。但只发现还不等于已经成为科学了。发现了，要成为科学，还要上升为规律。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恩格斯说得好，要善于使用概念，要善于抽象，要善于理解。比如《资本论》，马克思在伦敦博物馆看了很多很多书，其中不少白皮书之类的书。没有那些书，没有那些材料，他写不成《资本论》。可是，把那些东西堆在一起，是不是就有了《资本论》呢？那就不是《资本论》，而是白皮书的汇集而已。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希望同志们真正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确有创造，确有发明，确有概括，确有提高。

善于思维，善于科学抽象，很不容易。但是有志者事竟成。归根到底，你们是有希望的。说得再乐观一点，用不了多少年，就可以看见从你们中间出现一批全心全意为八亿农民服务的农业科学家、农业经济学家。像你们这股劲干下去，十年就可以成为有学问的人。

搞一个农业战略规划，已经提上党和国家领导的议程。究竟我们十年内农业应该如何发展？二十年后农村将会是个什么样子？要有个长期规划。这个规划一定要科学，要实际，确实能够使我们的八亿农民在几十年内为世界写下一篇光辉灿烂的历史，把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农业发展的历史载入史册。实现这一点，我们这样年纪的人也许已经看不到了，但是我们就要开始制定这样一个规划。

中国农村的情况非常复杂，地域很辽阔，各个地区不同，人口又这么多，需要大家努力去找出各种办法。你们的

调查研究,要适应这个规划制定的需要,紧紧地同规划的制定和实现配合起来。希望你们在这件事情上做出自己的努力,贡献出自己的才智。

注 释

- 【1】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版,第210页。
- 【2】 同上书,第228页。

妇联要把儿童的事情 管起来*

(一九八一年三月八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国工作着重点转移以后，我们总的任务是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就是要持续地扩大再生产。这同时也要表现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也就是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一定会愈来愈巩固，愈来愈发展。就生产力的扩大再生产来说，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一个方面是劳动力的再生产。后者不仅指现有劳动者的体力愈来愈好，智力等文明程度愈来愈高，而且包括现有劳动者的子女在体力、智力等方面都要胜过现有的一代，劳动者的整个素质要不断地提高，一代胜过一代。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全国妇联举办的报告会上的讲话节录。

据统计,我国十七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共三亿几千万人,每年新生儿一千多万人。他们都是我们劳动的后备队,是我们干部、专家的后备队。到本世纪末、下世纪初,他们都将先后成为我们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和主力。所以,关心几亿少年儿童的事情,是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也是保证我们社会生产力能够持续扩大再生产,不断补充和壮大劳动大军、干部大军、专家大军的问题。关心少年儿童,也就是关心我们民族的前途,关心国家的前途,关心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这件事情,全党要关心,国家要关心,社会各方面要关心,每个家庭都要关心。

我们很多同志在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上很用心,的确钻进去了,这是很必要的。但是相对地来讲,有些同志对于我们的少年儿童的成长,就关心得不够,甚至很不够。关心少年儿童的问题,是关心劳动者的再生产的问题,起码要同关心物质资料的再生产问题放在同等的地位。否则,你有了再好的机器,没有很好的劳动者熟练地掌握机器,效能也不能发挥。即使我们这一代办了很多的工厂,建设得很好,下一代操作不了机器,管理不好企业,不能使这些工厂很好地发挥作用,又怎么实现四个现代化呢?所以,应该把关心劳动者的再生产,包括他们子女的成长壮大,真正放在首位。这同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是相符合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是为了使将来的人能够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我们为什么革命?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几亿少年儿童的生活的改善,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比我们更好,比我们更

强。如果对几亿少年儿童的事情不关心，可以说就是忘记了我们的革命的目的。

从人类历史的长河来看，都是后来居上，一代比一代强的。在剥削制度下，劳动人民虽有这样的良好愿望，但在很多时候，这个愿望往往难以实现。搞过土改的同志都有亲身经验。土地一平分，农民的生活一改善，就自动凑钱、凑材料、找房子、请教师，办他们自己的学校，使他们的儿女能够上学。农民有句话，“再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当睁眼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劳动人民实现自己的愿望，创造了比过去不知道好多少倍的条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在各方面超过自己；都有共同的强烈的愿望，要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多关心他们的儿女，为他们儿女的抚养教育做更大的努力。这样的愿望和要求是完全合理的。

我们的党和国家一向十分关心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特别是各级妇联，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创造和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但是，终究限于人力、物力、财力，许多该做的事情没有做，许多做了的事情也做得还不够好。特别是从思想上高度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各条战线、不同岗位的同志都从自己工作这方面为少年儿童多办一点事情，认识到自己的一切工作归根到底都是为了造福于后代，还显得很不够。不少同志也关心这些事情，但是因为知识不够，又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着手，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抚养、教育孩子。

要使少年儿童健康地成长起来，除了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之外，十分需要懂得很多的学问、很多的知识。同孩子们打交道，这是一门科学。当过父母的人都有这种经验，孩子们提出的问题，有相当一些我们回答不了，或者回答出来了又不能为孩子所接受。和孩子们有关的学问是很多的，例如儿童营养、儿童卫生、儿童保障、儿童体育、儿童医疗、儿童服装、儿童玩具、儿童读物、儿童娱乐、儿童艺术、儿童科普、儿童心理、儿童生理、儿童教育等等，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有专门知识的人才和从事这项工作的专门的机构。办好这些事情，没有社会上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和互相配合，是不可能的。应该承认，这些方面的工作，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做，有的只是初具规模，有些还根本没有引起注意，有的是各干各的，没有互相配合，没有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事情要切实地办起来，要办得愈来愈好，以致于将来形成各自的专门行业或专门学科，每个行业或学科都有自己的队伍，都有自己的专家。例如，我国学龄前儿童共约一亿五千万，现在进托儿所、幼儿园的只有三千多万，四分之一多点。如果一亿儿童需要进托儿所、幼儿园的话，现在只满足了三分之一。要真正使托儿所、幼儿园的工作人员有足够的知识、足够的水平，就要有专门的学校来进行培养。保育员、幼儿教师、幼儿医生等等，将是一个很大的队伍。而培养这些人，又需要专门的人员和专门的机构。

总之，我们要从各个方面努力，使少年儿童在德育、智

育、体育、美育上都能得到全面发展，真正成为能够在将来承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样一个艰巨而光荣任务的接班人。

最近，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继承和发扬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单位，共同向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倡议，发起以“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文明礼貌运动，北京市也在开展学雷锋为人民服务日活动。这些，都对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生积极的作用。希望这个运动能够持久地发展下去，愈搞愈有经验，愈搞愈见成效。这个运动，要使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同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是互相联系的。我们要发展经济，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又必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精神文明的内容很丰富。它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原则和立场，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式关系，等等。有了这样的精神，就可以鼓励人们更好地去学习科学，更好地做好工作，更好地从事生产，更好地抵制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这样的精神文明当然不是从脑子里空想出来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基础，代表着社会前进的客观方向，代表着历史规律的必然要求。斯诺一九三六年从上海到了瓦窑堡。上海的物质文明比瓦窑堡不知道高多少倍。可是，斯诺在那个时候

看出,中国的希望不在上海,中国的希望在陕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红军、革命根据地的人民中具有高尚的精神文明。解放初期,我们的经济才刚刚开始恢复,我们的文化水平也很不高,可是那时外国人到中国来参观,许多人为我们的革命精神所感动。正是这一点,吸引了全世界一切进步的人民,给他们争取解放的斗争以鼓舞,增强了他们取得胜利的信心。

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不仅要从物质上关心少年儿童,而且要把对他们思想品德的培养教育,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极其重大的、战略性的任务。

妇联今后工作的着重点要摆在少年儿童的抚育、培养、教育上。

关心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需要党、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需要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很好地结合起来。家庭教育是很重要的。我在美国参观的时候,洛杉矶的一位汽车司机向我们介绍,说唐人街的孩子在洛杉矶的学习成绩是最好的,犯罪率是最低的。所以,洛杉矶的教育界、心理学界提出一个题目:为什么唐人街的孩子学得最好、品行最好,犯罪率最少?这成为一个专题。我想,这可能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比较重视孩子的家庭教育。这里有好的文化传统,应该继承下来、发展下去。孩子的成长,需要集体的教育,也需要个别的教育。幼儿园的集体教育是不可少的,非常重要的。可是

阿姨再多，一个阿姨也只能够管十个、八个孩子。她只能照顾共同方面的教育，而对每个孩子的个性兴趣则不可能照顾到。学校教育也是这样。一般说来，幼儿园、学校总不如家庭对孩子的个性特点了解得更清楚。为了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很好地统一起来，党、国家和社会各方面都要做很多工作。但是，由谁来承担主要责任、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组织各方面的配合呢？中央书记处已经决定，请各级妇联组织来牵这个头，并且要求各级妇联把抚育、培养、教育少年儿童作为今后工作的重点之一。这件事情同每个家庭、全中国人民都密切关系着。我相信，中央书记处这个决定肯定是大得人心的，各级妇联切实把这项工作抓起来，也是大得人心的。现在，社会上还存在重男轻女的现象。与此相联系，我们有的党组织，有的部门，还有不少的同志对妇联工作不那么重视。如果把少年儿童的工作做好了，可以大大改变妇联在全国人民中的形象，大大加强妇联工作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妇女干部在每个父母面前的地位。总之，把这件工作切实抓好了，不但不会降低妇联的威信，而且一定会大大提高妇联的威信。

妇联是妇女群众的组织，同每一个母亲可以而且应该保持最密切的联系。通过母亲来做孩子们的工作，妇联有最好的条件，而且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不是说其他人可以撒手不管，父亲要管，教师要管，青年团要管，社会各方面都要管。但是，母亲最关心孩子、最了解孩子，对孩子从小到大的饥寒冷暖、疾病健康、感情变化、性格形成、品德修

养，都了解得最敏锐、最清楚。她们如果注意自己的修养，用自己的修养来影响儿童，所起的作用也最明显。如果我们各级妇联的工作能够做到每个母亲的身上，使每个母亲都能够有抚育、培养、教育孩子的知识，随时解决她们的各种实际问题，能够动员和组织社会的各个方面，随时对每一个母亲以必要的帮助，那么我们妇联的群众基础就扩大了。妇联要反映母亲的愿望，要成为母亲的代表，要替母亲说话，向有关方面呼吁、提出要求。同时，要对那些不关心以致摧残虐待少年儿童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要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使我们的整个社会都来关心少年儿童，都来批评抵制和克服各种不重视少年儿童的现象。

把少年儿童工作作为重点以后，妇联原来的工作是否还要做呢？这个重点和其他工作是什么关系呢？刚才宋任穷同志已经传达了中央书记处关于通过六个环节做好妇联工作的意见。这就是：1. 帮助群众建立美满的家庭，正确处理婚姻问题；2. 搞好计划生育；3. 积极解决少年儿童需要的托儿所、幼儿园、儿童剧场、玩具、画报、读物、娱乐场所、医院等问题，各机关的礼堂要专门拿出时间来为儿童服务，不收费或少收费；4. 帮助每个家庭加强对子女的教育，关心和培养少年儿童工作人员；5. 加强对待业女青年的教育；6. 研究解决好女职工、女社员的劳保福利问题。妇联的工作是很多的，决不是说除了少年儿童工作外，其他的事情都不干了。而是说，该做的工作一定要继续做，比过去做得更好。但是，所有这些工作，都要围绕上面说的那个重点，

服从那个重点。

在做各项工作的时候，要坚持因地、因时、因事制宜的原则。城市和农村不一样，这个城市和那个城市不一样，这个农村和那个农村不一样，学龄前儿童和学龄儿童不一样，小学生和中学生不一样，男孩子和女孩子不一样，等等。不能再重复过去的错误，就是树立一个典型，就要全国各行各业都来照搬照套。工作要做得细致，做得具体。比如，有的地方搞儿童抚养、教育、健康的咨询站，定期到每个有孩子的家庭去访问，定期检查儿童身体，母亲发现孩子有什么病，也能够到咨询站去问问，得到指点。这样的经验很好，只要有条件的就可以办，条件具备到什么程度就办到什么程度。同时，也建议妇联同劳动部门、产业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很好地研究一下妇女劳动工时制度的问题，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使得既有利于生产、也有利于工作，又能够照顾到妇女的特点和孩子的抚育。总而言之，各方面的工作要做得细一点、切实一点、深入一点，要针对不同的情况、考虑不同的对象、根据不同的条件，使工作愈做愈好。

漫谈后勤服务工作*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日)

今天这个会是讨论后勤工作的，高登榜同志要我来讲一讲。我也当过秘书长，也管过衣食住行的事，可是经验很少，跟同志们相比，一个是少，一个是旧。如果把我过去接触到的很少的一些老情况、旧经验向同志们介绍一下，能够多少有助于同志们结合新情况来解决我们面临的新问题，那我就大喜过望了。

安心本职工作，全心全意，精益求精

《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这段话的含义很丰富。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说，共产党和其他政党根本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央办公厅召开的党委机关事务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不同的一点，就是共产党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毛泽东同志也反复讲过，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共产党和我们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为最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人民大众服务，必须有各种各样的分工。因为人民的利益是多方面的，人民大众需要共产党帮助他们做的事情也是多方面的，这就要求我们适应人民的需要，做多种多样的事。在我们队伍里，必须一部分人做这样的事，一部分人做那样的事，各种分工互相配合、互相协调起来，为人民服务的总的宗旨才能够实现得愈来愈好。办公厅的工作同其他的部门就有分工，比如跟宣传部、组织部、人民日报、团中央、妇联都是有分工的。这是就同其他中央直属单位的大分工来说的。办公厅内部又有这项工作和那项工作的分工。我们有警卫、保卫系统，有处理文件、档案、电报、收发的秘书局系统，此外还有信访局、机要局等单位，这又是一个分工。还有的专门管衣食住行的，叫后勤工作。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在为人民服务，是不是可以说，衣食住行这个工作是更直接地为为人民服务。

从建党以来，我们就有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行政事务性工作。在从事这一工作的同志中，涌现出无数的英雄模范。像毛泽东同志表扬过的张思德同志，就是这样的英雄模范。现在也是这样。做我们这项工作的同志遍布全国各地，兢兢业业，踏踏实实，默默无闻，但是像涓涓细流汇成江河一样，

为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管好衣食住行，是非常琐碎的事，是非常麻烦的事，也是非常容易引起不同意见的事。每个人都有衣食住行的问题，每个人都有生老病死的问题，何况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情况，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要求。要满足一个机关的所有同志的各种要求，确实是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正因为这样，后勤部门的工作最容易得到同志们的尊敬，同时也最容易挨骂。

陈云同志在讲到商业工作时说得好：“天天挨骂。我看，挨骂有不好的一面，但也有好的一面……商业工作有六万万万人天天看着，他们提出批评，暴露我们工作的毛病，有什么不好？”【2】又说：“一有错就有人骂，容易改正。如果人家天天喊万岁，一出错就是大错。”【3】这些话里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哲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所以，对于挨骂这件事，我看应该采取陈云同志这个态度。挨骂，表明我们服务的对象对我们提出批评，向我们提出很高的要求，促进我们多用脑筋，把工作做得更好。为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地干工作，还天天挨骂？究竟什么道理？就要分析。有些是骂得对的，有些可能毫无道理；有些问题是马上可以解决的，有些则是需要创造条件慢慢解决的。如果对批评采取正确的态度，我们就更容易长进，更容易进步。

从事后勤工作的同志，一般都有一个共同的长处，就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发扬这个长处。当然，也难免有同志产生一种心理：辛辛苦苦，经常挨骂，何必做这个工作。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我随刘少奇同志出去视察。当时许多地方办了托儿所、食堂。这些单位的有些同志就发出怨言，说：这个工作是侍候人的，经常挨骂，可难做啦；我不愿意做这个工作，我情愿去种地，再辛苦一点，也比做侍候人的工作好。少奇同志针对这样的思想讲了一篇道理，鼓励这些同志安心于做侍候人的工作。他指出，在新社会，侍候人这个用语的含义，同旧社会完全不是一回事。旧社会侍候人，是侍候老爷、地主、资本家。我们是侍候人民，也就是为人民直接服务。他说，这个工作是最光荣的工作，最崇高的工作，使人民直接得到利益的工作，因此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没有后勤工作，其他的工作就很难进行。

我们从事的是党委机关事务工作，可以设想，如果不使我们机关的所有的人员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穿得温暖一点，交通方便一点，他们在各项工作中就会感到很困难；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就会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非常有利的条件。

大家都记得，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自愿报名分管科研、教育工作。管哪一方面呢？他说，不是直接进行科学研究，也不是自己去当教员，而是为科研人员、教育工作者管后勤。他在科学大会上说，做你们的后勤部长，给你们创造条件，使你们能够更好地进行研究。我们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一位中央副主席自愿报名当后勤部长，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好好地领会一下，就可以知道我们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什么地方，就能更好地安心于目前的工作，而且想办法逐

步改进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都直接是小平同志的部下，都是他这个后勤部里的后勤兵，都应该采取他这样的态度来做好我们的工作。

这项工作的确有很多麻烦。正因为麻烦，才能更好地锻炼我们全心全意、精益求精的精神，增长做好工作的才干和本领，在为人民服务这个大的宗旨下面做出愈来愈多、愈来愈好的贡献。讲到困难，什么工作不困难？任何一项工作，哪怕最小的工作，也都有它自己很难解决的问题。真正把困难克服了，本事就加大了。不断解决困难，就不断增加本领。我们的党就是这样在不断解决困难中间不断成长起来的。

我们党里头，我们革命队伍里头，有人此山看到彼山高。让他做这个工作，他总觉得没有多少意思，认为别的工作比这高尚得很。等到给他调了，到那个地方又遇到困难了，他又觉得另外的事情更好干、更有意义。总之，调来调去，不安于位。结果，什么岗位上都没有做出成绩，哪一方面工作的本领都没有掌握，一晃就是十年、二十年、一辈子。

另外一类同志，党叫他做什么工作，他就安心地做什么工作，哪怕是一件很小的工作，他真正钻进去了，也能认识它的规律。党说现在不要你做这种工作了，需要你做一种别的工作，哪怕是非常生疏的，一点经验也没有，要他干，他又钻进去了。这样的同志，同那些不安于位、不忠于职守的同志来比，对党的贡献完全不同，他们之间本领的增长也完全不同。

我们做后勤工作的同志，第一条就要安心于自己的本

职工作，全心全意，精益求精。这里用得着毛泽东同志说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八个字是毛泽东同志写给少年儿童的，可是它的精神对于我们做每项工作的同志都完全适用。我们做后勤工作的同志，也是天天都要学，天天都要进步。不要闹情绪，不要一挨骂就发牢骚。挨了骂以后想一想，这个骂里头有没有一点道理，自己是不是有点没有做到的地方？没有做到的地方就改，就做得好一点，就进步了。一个共产党员，就是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间天天进步的。那种一听到人家骂，自己就不安心、发怨言、想溜开了的同志，哪怕让你去做你最喜欢做的工作，如果这个态度不转变，也很难有进步。

为人民服务只有分工的不同， 没有贵贱之分

我刚到社会科学院的时候，听到一些做后勤工作的同志说，要我为科研工作服务，我同意；要我为科研人员服务，不行。他们认为，说为科研工作服务，这样提出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工作的性质，听起来才比较舒服；说为科研人员服务，使人感觉后勤人员比科研人员低一等。你看，他们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我们要为他们服务，这岂不是我们矮了一截吗。这些同志也讲，有些科研人员，你给他服务，他还看不起你，说你们算老几呀，我是科研工作人员，你们是为我服务的人员，你们这些人怎么能同我们相比？在我们办公厅系

统有没有这样的议论呢？意思差不多的议论，也许会有的。

这个观点究竟对不对？我想，两方面都不对。后勤工作的人员这样看自己的工作，不对；科研人员这样看后勤工作，也不对。

第一，为人民服务有分工的不同。我们现在的分工还太粗。随着社会的发展，将来分工要愈来愈细，否则就没办法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共产党里头，在社会主义制度里头，具体的有分工，但不能说就有贵贱之分。把社会分工看成一种是高贵的，一种是低贱的，这是旧制度、剥削阶级对我们思想的影响。我们要肃清这样一种观点。在我们的社会里，在我们革命队伍中间，从事不同工作的同志都是平等的，都是互助的，在社会上的地位、党内的地位、革命队伍里的地位，都没有或贵或贱的问题。你少不了我为你服务，我也少不了你为我服务，大家彼此互相服务，共同为着一个伟大的目标。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看得比别人低一等，别人这样看，我们也应该理直气壮地批评他，反驳他。

拿文件的管理来讲。干革命的人，要求一种适当的政治待遇。我做什么样的工作，就应该看到什么样的文件，参加什么样的会，听到什么样的报告，受到什么样的训练。这种要求是合理的，这是新的党章修改草案中党员权利的第一条。要实现这个权利，就要有管文件的人把文件发给你，有负责会务的人通知你开会、组织会场，上党校就要有人给你讲课、编教材，你少了这些人对你的服务行吗？他们这些同志分工干这些工作，就是为我们政治上的提高服务，为我们

做好自己的工作服务。可是，做秘书、机要工作的同志也要有个部门给他们提供衣、食、住、用等生活方面的条件，才能保证他们把工作做好。所以，谁也少不了谁，这才成为一个集体，才成为一个社会。而我们这种互相帮助是完全平等的。

第二，说管吃喝拉撒睡的人就是低贱的，管衣食住行的人就矮人一等，这种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请同志们读一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恩格斯讲马克思是个伟大人物，他给人类历史做出了两个最大的贡献，一个是确立了唯物史观，一个是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他说：“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做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了。”【4】恩格斯在那里用很通俗的语言讲清楚了什么叫唯物史观。简单概要地说，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穿、住、行，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等活动。不解决衣食住行，谁还有心思去娱乐？肚子里头哇哇叫，你还有心思去看戏吗？你这个人文章写得很好，可是如果没有人给你安排衣食住行，你再有天才，再有灵感，文章也写不出来。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们的周恩来总理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陈嘉庚先生把总理称做中国的钢人，世界的钢人。总理为我们留下了不知多少令人感动的业绩。可是，没有总理周围的服务人员给他安排必要的吃，必要的穿，必要的住，必要的交通，能行吗？

按照唯物史观，衣食住行是从事其他活动的基础，是第一位的工作。不管是大人物、小人物，不管是领袖或普通人，

都必须首先有衣食住行。我们这些人从事的后勤工作，按照唯物史观所说的，是最基础的工作，也就是从事第一位的工作，决定人类和人类社会生存还是灭亡的工作。不管谁，少了这个都不行。人少了这个，人就要死。社会少了这个，社会就要灭亡。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任命胡乔木等三位同志主持社会科学院的工作。我们商定，到了职还不管事，先到各所、各单位做一个半月的调查。我们到一个所，参加调查会的同志有两种观点，争得一塌糊涂，你说我全部错了，我说你全部错了，我说我是全部正确，你也说你是全部正确。据说两种观点争了多年，还是水火不相容，见面都不打招呼，开座谈会的时候照样争。听完之后，胡乔木同志很感慨地说，“四人帮”粉碎一年多了，过去争了多年，现在还在争，你们想过没有，如果十年里头，农民不给你们饭吃，工人不给你们衣服穿，你们能争下去吗？你们这样争下去，心里头安稳吗？该停止争论了，该求同存异了，把大是大非搞清楚，互相之间的恩怨不要再计较了。乔木同志的这些意见是很中肯的。“文化大革命”打派仗打得厉害极了，在这一点上，应该表扬我们的商业部门，表扬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人和农民。城里打派仗，为什么能够打得下去呢？就是因为有工人、农民给他们吃的、给他们穿的。这十年，商业部门还是天天开门，任务增加了很多，人员并没有相对增加，甚至于减少了。不要以为我们搞衣食住行的同志没有权威。我们认识正确了，采取适当的办法，在社会历史上可以起巨大的作用，可以制

止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在促进安定团结方面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四项基本原则有一条，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基础的一条就是唯物史观，就是科学地认识衣食住行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认为没有衣食住行就不可能从事其他任何活动。我们的同志，的确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工作的，但有少数同志还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同唯物史观联系起来。我觉得，应该按照唯物史观正确地认识我们工作的性质，用唯物史观指导我们的行动。只要我们的工作愈做愈好，就会为从事其他工作创造更好的条件，就可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地向前发展。

任何一项革命工作都需要理论的指导。我们从事后勤工作的同志是很辛苦的，工作是很努力的，但是往往容易忽视基本理论的学习。希望同志们提高这方面的自觉性，抽点时间，或者说挤点时间，认真学习基本理论。

后勤工作学问很多，前途广阔

有人说，干这一行没有出息，没有前途。这反映了他们的短视和无知。持这种观点的人，既没有考察历史，也没有想想将来；既没有研究某一项具体的后勤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又没有考虑后勤工作同整个社会的联系。他们被眼前繁琐细小的事务迷乱了眼睛，被一些不负责任的议论和责难

压迫着头脑，于是就得出了上面说的错误结论。

我想请较早参加革命的同志回忆一下。在根据地做后勤工作的同志，现在绝大多数已经成了经济战线的骨干，很多人担负着各种经济部门的领导职务。我们党和联共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中国革命是从一块一块根据地发展起来，由小而大，最后取得全国胜利的。我们在根据地培养了一批管理经济工作的干部。那个时候一个单位只有几十个人、百把人。一九四二年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时，只有一个行政秘书，后来他担任铁路局的局长，之后又成为铁道部科研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我这里并不是说，干这一行的有前途，就是指职务可以不断上升，而是说，在中国革命的条件下，我们党培养的大量的后勤工作人员，随着革命的发展而愈来愈取得丰富的经验，愈来愈能够完成人民交给的重大任务了。比如说，延安时期的一个行政干事，终究有管衣食住行的经验，解放后让他当个厂长，首先能够把全厂职工的衣食住行管好，威信就比资本家高得多。有了这点经验，特别是由于长期受党的教育，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又能够很快地掌握业务知识，不少同志实际上已经成为本行的专家了。现在活跃在各个经济部门的相当数量的领导骨干，都是从根据地出来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先是做后勤工作的。我们自己的历史证明，干我们这一行的并不是没有出息，而是大有出息。

除了回顾历史，还要展望未来。我给同志们提供一点国外的材料。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跟我们不同，但从中可以看

出社会分工发展的趋势。这个趋势,在国内已经开始露出苗头来了,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我们也要向这个前途迈进。因而,他们的材料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外国的学者把社会的产业部门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产业,就是以农业为主,包括林业、牧业、渔业等等,有的国家把矿业也包括进来。

第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像炼钢、炼铁、炼铜、制造机器、纺纱织布、制造各种日用消费品、制造各种生产资料(拖拉机、汽车、飞机)等等,也包括建筑业(建筑工厂、桥梁、宿舍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说,这两种产业所包括的部门,进行的都是物质资料的生产。

第三产业,主要是服务业,范围相当广,包括科学教育、文化娱乐、体育卫生、公用事业、广播电视、旅游、饮食、商业、服务行业等,还包括交通运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交通运输也应该算作物质资料生产部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分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法不同。

日本。从事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的,一九五〇年占就业人员的百分之五十,一九七五年降低到百分之十二。因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现代化程度提高了,腾出一部分人从事其他行业来了。从事第二产业的,一九五〇年百分之二十二,一九七五年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五。它的汽车、电视机、钢铁发展起来了,这方面的人员就增加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事第三产业的,一九五〇年为百分之二十七,一九

七五年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二，增加得最多。

美国。一九七五年从事第一产业的占百分之三点三，一百个人中只有三个多不到四个人从事农业；从事第二产业的是百分之二十八点三；从事第三产业的是百分之六十八，三个人里头有两个人从事广义的服务行业。

英国。一九七七年从事第一产业的只有百分之一点八，因为它的农产品主要靠进口；从事第二产业的为百分之四十；从事第三产业的为百分之五十七点七。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物质资料生产的部门所能吸收的劳动力会越来越来少，从事商业、服务业等行业，为社会成员直接服务的人员会越来越多。这是社会发展的共同的、总的趋势。我们因为工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所以现在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人还占着绝大多数，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员占的比例还很小。可是，现在社会上已普遍发出了呼声，认为我们直接为人民消费服务的，直接管吃喝拉撒睡的行业和人员太少。做衣服困难，理发要排队，洗澡洗不上，饭馆太少，交通不便。这是我们大家都感觉到的。

小平同志讲了好多次，说我们路子越走越窄，要我们研究一下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和从业人员的结构。现在，我们有好多事情等着人做，好多事情需要发展，但却没有人做，而且造成一种风气，就是待业青年不愿意做服务行业的事。这与我们的工资制度也有点关系。许多经济发展较早的国家的经验证明，对人来说，第三产业比物质资料生

产是更高级的需要。而且决不能认为服务行业没有学问,不需要学问。实际上,社会愈向前发展,第三产业的科学也要愈发展。人体本身就是许多门类的科学的研究对象。例如病理学,现在我们对人所以生病的了解,确实比过去大大前进了,但我们的医生、医学科学人员、生理学家是不是把人作为科学对象,把人体的规律已经完全掌握了呢?远远不是这样,而且还落后得很。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可能发生各种毛病,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地方、不同季节容易发生的病常常不同。就我自己的狭隘经验说,年纪轻的时候,壮年的时候,不感觉医生多么需要,等到年纪稍微大一点,就不能不常常去找医生了。我觉得,我们的医学水平离掌握人体病理的规律还远得很。比方说专门研究老年人的心脏病,我看终其一生,也不能说就完全可以达到无所不知、手到病除的水平。又比如说教育,孩子出生以后,经过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成为德智体美各方面全面发展的人,这个学问我们掌握了没有?很多学问我们没有掌握。讲吃,我们现在水平还只是一天几两粮食,一个月几斤肉,一天几斤菜。营养学就是一个大学问。我可以大胆地说一句,从办公厅起,一直到各省市,我们从事这个工作的同志,在营养学方面很少有造诣高的人。生产也好,消费也好,这里头有个学问,就是能量转化。最近中央同志提出,以后我们食品的构成,指标不是多少斤粮食,多少斤肉,多少斤菜,应该是一天一个人最低限度要有多少卡路里热量。据说,过得去的卡路里是三千。要有至少三千卡

路里的热量，需要多少粮食，什么样的粮食，多少菜，多少肉，多少别的东西，又省、又营养高，又合乎中国的条件，这里面学问多了。所以，说第三产业没有学问，说这个事情没有前途，实在只证明我们无知。

我们这个行业前途很广大。马克思预言，人类社会到了共产主义，不是用一天劳动多少小时，而是用劳动时间以外闲余时间的多少，来考察社会发展的程度，考察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和社会进步的水平。到了那个时候，很多部门都自动化了，用不了几个钟头工作了，剩下的时间就是闲余的时间，就从事现在所说的第三产业。

我们这个行业里学问多得很，该办的事情、需要花毕生精力才能办好的事情多得很。现在，我们办的事情太少，我们的知识实在不够。从事我们后勤工作的同志，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用心学习，钻进去，搞个十年八年，就可以在某个问题上成为有学问的人。随着我们社会事业的发展，你就可以成为营养学家、儿童保育专家、社会活动的组织家，等等。

要想到大多数

为了改进工作，切实为我们的服务对象服好务，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想到大多数。这样，才能尽到我们的责任，避免和减少错误，促进各方面工作的正常进行。

最重要的一条，是每个行政人员的心里，要首先想到机关里的大多数，想方设法为大多数人办事。我不是说不要关

心少数领导干部，而是说不要只关心或者首先关心少数领导干部，以至忘记或忽略了大多数。一切工作，都要按制度办事。国有国法，党有党规，中央还专门制定了高级干部待遇条例。对高级干部，只要超过制度规定的，不管你是谁，我们也不给你办。党章里有一条，说我们的干部不能够谋求制度范围以外的特权，不能够谋求职权范围以外的私利。这对领导干部说来尤其重要。不能超过制度规定去照顾这个照顾那个。我们很多搞行政工作的同志，出于好心，认为领导同志年纪大一点，身体差一点，要照顾一下，这是对的。可是，有时候这种好心超出了制度，其结果就是帮倒忙。这样的事情千万不要干。对于大多数，我主张行政人员要仔细了解他们生活方面的状况和各种困难，不要等人家提出来，而是登门拜访，挨家挨户地作调查。了如指掌以后，排个队，谁最困难，谁的问题最需要帮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在制度允许的条件下，首先解决这种最困难的人的最困难的问题。

涉及到职工福利、工资提升、奖金颁发等类问题，要完全实行民主讨论、民主决定。我们书记处研究室是个成立不久的新单位，房子困难。我们就组织机关群众自己选了一个分房小组。他们到每家每户去了解住房的情况，了解清楚以后，排个队，首先解决最困难的同志。在这种问题上，行政首长千万不要批条子（高登榜插话：现在一种办法，开职工代表大会，是最好的办法）。人多的机关，可以这样。总之，要群众自己讨论，自己决定，自己分配，决定权力在他们

那里。

奖金的发放、工资的提升,我们也是交给由党委委员和职工代表组成的福利委员会去讨论。去年全国评定工资,我们定了一条,就是十三级以上的一概不提,留下名额给其他的同志。据说有些单位十五级以上的都不提。凡是领导同志、老同志带了好头的,评定工资就比较顺利。财政部允许行政经费节余可以发点奖金,每月每人五元。我们也实行十一级以上的自愿不领,由福利委员会决定分给其他困难大的同志。有的单位,领导人首先自己评上工资、拿上奖金,那等于自己动员群众来反对你自己,把矛头都集中在少数领导人身上了。有两种土政策。一种是更多地照顾领导同志,你搞的愈多,就愈降低威信。另外一种首先是首先照顾大多数,群众没有意见,我们就取得了发言权。这也是我们研究室的狭隘经验。同志们一定有很多更好的经验。但是在原则上,首先想到大多数,采取民主作风,总是要好得多。

另外,管后勤工作的同志,千万不要搞近水楼台先得月。最近,听说有个单位办了一件很不得人心的事情。上面分来了几十台低价的录音机。物资处是分管这个工作的,十几个人每人留了一台,价钱比通过正常贸易进来的少一半。结果上下哗然,议论纷纷。这种事情千万干不得。

注 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

民出版社 1966 年第 1 版，第 250 页。

- 【2】 陈云：《做好商业工作》。《陈云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33 页。
- 【3】 同上。
- 【4】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第 1 版，第 574 页。

职工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要持续地扩大再生产,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生产力的扩大再生产。

三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很值得吸取的教训,就是有的同志对劳动力的再生产,其中包括劳动者的体力的增强、智力的开发,注意得不够,甚至于很不够。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曾经在各地普遍设立工农速成中学。工农速成中学虽然主要是学政治、学文化,没有进行多少专业训练,但是对于提高我们干部、职工的业务能力,还是发挥过积极作用的。后来,从干部、职工中选送过一些同志进大学,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这项工作没有能够继续下去。“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学中吸取了一部分工农兵学员。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全国职工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这些学员，除了像张铁生这种紧跟“四人帮”的“白卷英雄”以外，绝大多数还是好的。问题是，“四人帮”一天到晚搞什么抓“走资派”，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他们即使进了大学，实际上既学不到真正的马列主义，也学不到多少专业知识。这些同志现在大多数都成了职工，知识不足的弱点已逐渐显露出来。这使职工教育的任务更加迫切。

生产力当中，劳动力是最重要的因素。机器是人制造的，由人操纵的。因此，关心劳动者的再生产，起码要和关心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放在同等地位。否则，即使有了再好的机器，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工厂建设得再多再好，也不能进行科学的管理。把关心劳动者的再生产问题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同我们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同我们进行革命的目的是符合的。我们为什么要干革命，要搞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人民及其子孙后代生活得更好；为了随着社会的前进，使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并且在各个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只注意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不注意劳动力的再生产，不注意培养一代胜过一代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作为我们多年工作中的教训，是应该永远记取的。

后来居上，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也是全体劳动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强烈要求。我们的广大工人、农民、军人、干部、知识分子，都希望而且已经在孜孜不倦地学习，以便掌握更多的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本领。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子女身体更好，受到更好的教育，在体力、智力方面都超过自己。

党中央、国务院代表群众的这种深切愿望,并且考虑到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客观要求,已经正式作出《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就是要把职工教育提上日程,并且放在重要的地位上。《决定》从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当前企业的实际情况几个方面,阐明了职工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做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规定。《决定》指出:“社会主义企业的党政领导如果只抓生产指标的制定和完成,不重视提高职工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不抓职工教育,甚至把职工教育看成是耽误生产的额外负担,那就说明这些领导人患了近视病,还不懂得什么叫做现代化建设,并且说明他们缺乏关心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思想。相反,企业党政领导人如果坚持不懈地抓住职工教育,非常关心提高职工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并且善于引导职工利用科学文化知识来促进生产的发展,那就说明这些领导人很有远见,在踏踏实实地推进现代化事业,真正重视发挥工人当家作主的作用。”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职工教育不仅在生产中,而且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央书记处讨论的时候指出,劳动创造财富,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靠勤劳勇敢的苦干精神和人民才能的充分发挥,第二才靠丰富的资源。只靠资源,是懒汉思想。可见,抓好职工教育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战略性措施。

这个《决定》在下发之前,曾经征求过不少同志的意见,

反复讨论和修改过多次。我想就进行正规培训的问题补充一点意见。职工教育的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种多样,这要结合不同地方、不同单位的具体情况而定。但是,不管哪一种形式,不管脱产不脱产,都要正规化。胡耀邦同志讲过:脱产学习的成员,领导干部也好,普通工人也好,必须按文化程度编班。这里不能够论资排辈。编班以后,要按现有程度设置课程。课程有长有短,所有参加学习的同志都必须学完。脱产学习是这样,业余学习也必须正规化,不能随随便便、马马虎虎。有人上课,有人辅导,有自修时间,都要正规化。教育部已经发布一个正式文件,规定业余学习的也可以参加考试。无论参加哪种形式的学习,学完了都要考试,达到高中毕业程度的发给高中毕业文凭,达到大学毕业程度的发给大学毕业文凭。这要作为将来安排工作、提级、调资的一个重要依据。当然,自修也好,业余学习也好,不一定同时学某一级的全部课程,可以一门一门地学。此外,像工人提拔为干部、工段长,工段长提拔为车间主任,科员提拔为科长,科长提拔为处长,要经过什么训练,都应该有严格的规定。我们刚开始还不能把什么事情都搞得很好,但是必须向着这个方向前进。

所谓正规化,我的理解就应该是这样。因为如果没有一套正规的制度,今天高兴了就来,明天不高兴就不来;或者名义上上了业余中学,实际上程度达不到。这叫做形同虚设,是不会有什效果的。

技术学习同样要正规化。前些日子有一个访日见闻影

片,选了日本的索尼电器制造公司作为典型之一。尽管现在技术已经高度自动化了,可是他们的企业吸收工人,都要先训练一年,叫做“制造者的训练”,拿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学徒工训练。一年的时间里,每门基本功都必须进行严格的正规训练。他们认为,虽然一些基本功在流水线上已经用不上,可是训练还必须进行。甚至走路,一定时间走多少,一步走多远,都进行严格训练。我们不主张把人搞成机器,但是不论从一个社会还是从一个人来说,珍惜时间,讲究效率和质量,这样的训练在各方面都是有好处的。

本来,使全体劳动者从旧的社会制度、从自然力的束缚、从落后愚昧的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是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我们就是为了这个去搞革命、搞建设并且取得伟大胜利的。可是,这些年来,由于“左”的东西的影响,表面上好像很重视对人的培养教育,其实搞了不少不见实效的事情。现在恢复和发扬过去的好传统,这个会算是一个开头。社会主义制度为我们搞好职工教育、开发智力创造了最好的条件。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些好条件,使我们的职工队伍经过不断的培训之后,成为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强有力的队伍。

青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希望^{*}

(一九八一年五月四日)

今天到会的，绝大多数是青年人。在青年人面前，我可以说是老年了。在老一辈面前，我还不能这么说。照理，这个会上，应该多请些青年同志讲话，让我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人讲话，是不大合适的。可是，我也曾经是少年和青年，曾经是共青团员，有过各种经历，包括痛苦的和幸福的经历。讲点意见，可供年轻同志们参考。

现在有人说，老一代和年轻一代中间隔着一条鸿沟，无法填平，彼此的心是不能相通的。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你们中间有共产党员，也有共青团员。我们都是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都是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前进的。理想相同，道路相同，怎么能够说心不能相通呢？昨天上午参加团中央在怀仁堂召开的座谈会，听到全国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五四青年节六十二周年报告会的讲话。

学雷锋先进青年代表的发言,我就很受启发、很受感染,觉得自己的心和他们是相通的。从全国范围来说,绝大多数老年人和绝大多数年轻人,都热切希望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两代人的心是完全相通的。当然,有极少数、没有接受社会主义的老年人,至今还顽固地想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同绝大多数年轻人的心当然不能相通,同绝大多数老年人的心也无法相通。同样,有极少数的年轻人,崇洋媚外,达到不顾国格、人格的程度。他们同绝大多数老年人的心当然不能相通,同绝大多数年轻人的心也无法相通。这里说的极少数老年人和极少数年轻人,在企图倒转中国历史车轮、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点上,真是心心相印,他们之间是没有什么鸿沟的。不是已经发现一些货真价实的老反革命分子正在为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年轻人出谋划策吗?由此可见,仅仅从年龄的划分来看问题,不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观察人们之间的关系,不通过科学地分析现存的各种社会矛盾来观察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很难得出正确结论的。鲁迅就说过,他一向相信进化论,认为青年人一概胜于老年人。但是,他一九二七年在广东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营垒的事实,看到有的年轻的共产党员英勇斗争、壮烈牺牲,有的年轻人却投靠蒋介石、贩卖革命。由于事实的教育,学习马克思主义,他终于变为共产主义者,纠正了进化论的偏颇,相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下面,分几点和志同道合的青年谈谈长期经历中一些

印象较深的感受。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中旬,我奉中央命令到当时的迪化(即现在的乌鲁木齐)同新疆省军政当局联络和平起义,住在包尔汉同志家里。二十一日晚,从收音机里听到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的开幕词。毛泽东同志说:“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听着这气势磅礴、豪迈无比的讲话,心情无比激动;想起知名和不知名、认识和不认识的许多同志,为了人民的解放、中华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流尽最后一滴血,英勇牺牲了,没有能够看到胜利,感到很难过。像我们这样参加革命、本来没有想到会很快看到革命胜利的人,居然这么快看到了革命的胜利,又感到极为幸福。因为胜利而感到骄傲,同时又不能不想到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各民族、我们的人民,过去受过多少欺凌和侮辱。

近代以来的中国,以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标志,区分为两个根本不同的时代。

一八四〇年以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勾结,把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台湾和东北三省一度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先说一下书本上的记载。辛亥革命时期的宣传家陈天

华，称清政府是“洋人的朝廷”。实际上，从清政府到北洋军阀政府、蒋介石政府，哪一个不是“洋人的朝廷”？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通过各种各样的不平等条约出卖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主权，就是他们的主要“政绩”。从鸦片战争开始，可以说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侵略过中国，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在中国反动统治者的配合下从中国人民的身上吸走大量的膏血。《中英南京条约》之后，旧中国历届政府同帝国主义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粗略统计在一千种以上。要是为此而确定国耻日，放到一年中间，平均每天差不多要有三种国耻事件。一九〇四年出版的《外交报》，大致地勾画了当时中国被瓜分、被掠夺的情况。其中列举了三十条，包括全国税务属于英国人，各地铁路、矿产分别属于俄国人、英国人、比利时人、德国人、美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天主教、耶稣教、佛教、回教的教徒，分别由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日本人、土耳其人“保护”。此外还说：凡大商家必用一外人为代表；凡达官必以一外人为奥援；各省以赔款之故，各银行以供款之故，各有抵押之件；商船铁矿之类，专属于一国名下；等等。像中国有外国驻兵、一些城市有外国租界、许多地区被划为外国人的势力范围等一些重要方面，这里还没有提到。比如赔款，一八四二、一八六〇、一八九五、一九〇一年四次战争赔款，共达关银七亿一千余万两。其中，《南京条约》的赔款，相当于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甲午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当时国库收入每年只有七千万两；庚子赔款

为四亿五千万两，三十九年付清，本息共达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按当时每个中国人负担二两多。又比如割地，一八五八年《中俄璦琿条约》，割去六十多万平方公里；一八六〇年《中俄北京条约》，割去四十万平方公里；一八九五年《中日马关条约》，割去台湾及周围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抗日战争时期，内地沿海各省、大中城市、交通要道，全部被日本侵略者所占领。抗日战争胜利到一九四九年，短短四年中间，蒋介石集团同美国签订的条约、协定，仅公开的就达四十起。其中包括出卖中国的领土权、领空权、领海权、内河航运权、铁路管理权、军权、财权、司法权、警察权、国家秘密权、工矿权、商业权、海关权、文化教育权、外交权，直到内政“最后决定权”等几乎无所不包的主权。

再说一下我自己从懂事起就受到的教育。在家庭的、学校的、社会的教育中，经常受到的就是国耻的教育。可以说每个星期中的好几天，都是大大小小的国耻日。亲属邻居经常说到入侵的洋鬼子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比牲口不如。后来进小学、中学，教历史、地理、国文的老师，几乎每天都要讲帝国主义怎么欺侮我们，这个国耻纪念日不能忘记，那个国耻纪念日不能忘记。直到现在还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教科书上画着我们的国土像一片桑叶，被帝国主义者贪婪地蚕食而变形。它们不仅一块块地吞掉我们边境的土地，而且已经深入我国的内陆，到处抢夺我们的财富。一九三一年暑假，我来到北平，正好遇到“九·一八”事变。几天功夫，东三省就被日本人占领了。我们上街游行、宣传抵制日货，

但蒋介石却顽固实行不抵抗政策。一九三三年热河省又被日本全部占领,日本飞机天天到北平上空侦察。我所在的是一所美国的教会学校,校方怕日本飞机轰炸,就在楼顶铺上美国旗。后来才知道,我们是顶着美国旗上课的,感到受了很大的侮辱。学校门口不远是一家日本随营妓院,经常可以看到外国兵去胡闹,喝醉酒打我们的拉洋车工人。再就是东交民巷,使馆门口有外国兵荷枪实弹、横眉怒目地对着中国人。现在的东单公园是当时外国人的体育场,中国人不许进入。一边有外国骑兵的跑马道。听着这些马蹄声,心都要碎了。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凡是爱国和有自尊心的中国人都是不能忍受的。本来我是一个专心读书用功的学生,从此心再也平静不下来了,开始寻求反抗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我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知道中国共产党是真诚主张抵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和人民彻底解放的政党。在党的领导下,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进行爱国活动,可是一批一批遭到蒋介石政府的逮捕、囚禁、屠杀。引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先辈,先后好几个被他们逮捕了。这才推动我决心参加党所领导的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

在座的青年同志没有经过我们祖国、我们人民受侮辱的时代,但要记住有过那样的时代,并且决心不允许它重新出现!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同帝国主义国家订立过一个不平等条约吗?没有。相反,我们坚决废除了历届反动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只在平等互

利的基础上同外国进行交往。我们也没有在外国侵略威胁下低头屈服。相反，我们的人民军队在多处战场上胜利地回击和挫败了入侵者，保卫了祖国。我们始终坚持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可分割的领土，并且为台湾回归祖国进行着坚持不懈和卓有成效的努力。

在旧中国，中国人民在国内受到侵略者和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华侨在国外受到歧视和迫害。在新中国，人民成为自己国家和命运的主人，华侨受到祖国的关怀和保护，可以扬眉吐气地说自己是中国人了。

在旧中国，国家四分五裂，政客、军阀、民族反动派各占地盘、各自为政，甚至在蒋介石集团统治的时代，国民党的政令在不少省份实际上行不通。而在新中国，五十几个民族平等相处，友爱团结，伟大祖国真正空前未有地统一起来了。

我们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围绕人民的利益组织了各种社会生活，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人民的生活逐步改善。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在中国永远地结束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据着统治地位。共产主义的道德风尚有了很大发展。社会秩序稳定。

我们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从全球的战略看问题，中国的分量是举足轻重的。我们以独立的、统一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同各国人民一道，进行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争取人类进步的伟大斗争。

我想顺便讲一点和“文化大革命”有关的问题。由于林

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但是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即使在那样一个异常艰难的时期，也努力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进行了大量有效的工作。党和政府存在着，经济在某些方面有发展。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地位，受到国际上的承认并有所提高。一九七三年，联合国三分之二以上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接着是恢复中日外交关系，基辛格、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签字。外事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

新中国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社会主义制度遭受过巨大的挫折，党的领导也出现过缺点和错误，包括严重的错误，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都已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在十亿人民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为什么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长达十年的严重的破坏活动始终不能搞垮我们，反而最后被我们所粉碎，根本原因也就在这里。

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任何帝国主义者、外国侵略者在我们头上为所欲为、横行霸道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任何外部的和内部的破坏，也不能摧垮我们。中国人屈辱求生的时代已经永远结束。中国人民已经真正做了自己创造的新社会的主人。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也是中国的前途的希望所在。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 中华民族的光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充分肯定新中国建立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还从各个方面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努力纠正过去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党的这项方针，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思想混乱，就是贬低和抹煞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不同程度地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这种思想混乱，在相当一些理论文章和文艺作品中表现出来。这主要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流毒的存在，其次也由于我们解决工作中多年积存下来的各种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所以，这种混乱思想尚有一定的市场，尤其是那些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历史、新旧社会的区别和没有受过马克思主义系统教育的青年，更加容易被它所俘虏。

目前的思想混乱，大体上有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赤裸裸地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一种是以理论研究的面貌出现，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否定我国社会主义的现实。这种情况，为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宣传工作提出了一项极其严肃而又紧迫的任务，就是针对现实中存在的各种思想问题，继续深入批判并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就是真

正科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多年来、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六十多年来、新中国建立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不断地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

我想着重谈谈后一个问题。

有的同志否定我国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根据是马克思的几句话。比如说,生产关系要同生产力的性质相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必须要冲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时才能发生。又比如说,《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指已经消灭了商品生产、消灭了货币的社会,而我们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阶段,生产力落后,所以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等等。

这里首先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们曾经批评过两个“凡是”的观点,反复地、深入地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设想,是不是也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呢?马克思主义所以伟大,所以有生命力,所以是真理,正是因为它的基本原理的正确性已经在一百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得到了证实,并且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实践已经证明,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社会主义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情形做过一些论述,其中包含着非常伟大的思想,但是怎么样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怎么样用没有剥削的制度代替剥削制度,他们从来也不认为,未来的历史一定会按照他们论述的样子一字不差地发展。实际上,他们

自己关于社会主义的说法，在不同时期，不同著作中，也不完全相同。他们从来反对人们把他们的学说当作教条，而是号召世界无产阶级在实践中为世界开发新原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来说，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但是，生产关系也罢，生产力也罢，都不是一种可以简单地、机械地规定某种数量界限的东西，不能认为只有一切条件都完全具备了，才能进行所谓纯粹的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欧洲各先进国家、产生巴黎公社的法国，资本主义制度都刚在发展，生产力的水平同今天相比是很低的，同一九四九年的中国相比也并不高。但是，他们寄希望于这些国家。当巴黎公社的斗争发生之后，他们曾经给以极其热情的鼓励和极其崇高的评价。革命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过程，它的发生还需要其他方面的条件，需要各种条件互相配合，综合地形成一种历史的情势。存在一定发展程度的大工业，存在无产阶级，在其他各种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可以进行革命呢？十月革命是这样发生的。中国革命也是这样发生的。另一方面，任何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也不能仅仅根据经济情况进行判断。经济是基础，是一个社会的性质的决定因素，但基础或决定因素并不是一个社会的全部。即使从经济方面来判断，那也应该承认一个根本的事实，就是我们的社会已经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消灭了剥削和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因而具备了社会主

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因此,虽然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还需要向更高的阶段发展,但是毫无疑问,它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决不是现在某些文章中所说的是什么“农业社会主义”。

这里有一个看待事物的基本的方法论问题。是用马克思的只言片语来裁决实践,还是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公有制的确立已经有了六十多年的历史。社会主义,这是世界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之牺牲奋斗的伟大事业,是充满英雄气概、探索精神和富有无穷创造力的历史运动,是亿万劳动人民的光辉实践,怎么能够因为马克思说过什么、没有说过什么,或者因为我们只记得这本书上说过什么,不记得甚至忘记了那本书上说过什么,就把它一笔勾销呢?姑且不从政治上提出问题,仅就方法论来说,这同我们曾经批评过的两个“凡是”,很难说有什么根本区别。

社会主义的实践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同样,马克思主义也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的实践。一百多年来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摆在面前,这是每一个郑重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承认的。恩格斯很早就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1】他后来又非常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2】不能要求马克思

为他们以后历史的发展做出各种具体的规定。马克思自己也是从来拒绝这样做的。他只指出了历史发展的基本的轮廓和方向。如果马克思主义不是随着马克思去世以后的历史的发展而从实践中不断吸取营养,丰富自己,那么它的生命力也就完结了。现在,世界的情况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已经同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很不相同了。但是,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发展着,并继续被世界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当作自己的指导思想。这不仅说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的伟大,而且说明以他命名的学说,已经由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极大地丰富和向前推进了。

各国社会主义运动都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加了自己的独特的东西。在这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没有预料到,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有着封建社会长期历史的东方大国,比他当时寄予很大希望的法国、英国、德国,更早地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成就的取得,不仅是由于我们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是由于在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党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密切结合起来。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经过实践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毛泽东思想的这样一些根本点,是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就已经形成和确立下来的。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党继续坚持和发展了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根据中

国的实际，在没有现成的理论和经验可供直接借鉴的情况下，开创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有自己民族特点、同时又具有国际意义的胜利道路。

这里，不可能全面地论证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和经验。我只想指出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的确确站住脚了，三十多年来，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客观存在。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叫嚷，美帝国主义通过侵略朝鲜扼杀我们的企图，赫鲁晓夫集团背信弃义、撕毁合同的行径，勃列日涅夫集团的挑衅和压力，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年破坏，统统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面前败下阵去。我们巍然屹立，坚不可摧。这就最有说服力地证明，不管我们有多少缺点错误，总的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成功的、胜利的。我们正在切实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吸取经验教训，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功、更大的胜利。

在马克思主义已经广泛传播、通过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得到检验和发展之后，恩格斯在晚年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我们绝对不能用空谈理论和教条主义的方式来教导一个伟大的民族。”事情正是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人，唤醒了一代又一代中国革命者，社会主义运动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方向。中国共产党早已是能够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具体分析和确定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成熟的党。中国

共产党人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提供的许多成功经验,不仅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不同,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没有提出或者不可能具体地接触到的。有的同志认为,我们曾经是一个有着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者的国度,我们是以小生产者的眼光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因而根本不可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而只能离开科学社会主义,提出和企图实现一套“农业社会主义”的幻想。这种看法或说法,同历史事实根本不符,是很不对的和很有害的。试问:“农业社会主义者”难道能够达到刚才所说的我们党这样的高度吗?当然不能。今天我们不可能来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我只是想说,对于我们党的历史,人民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不应采取政治上的轻率态度妄加否定。相反,事实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笔珍贵财富而载入史册。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工人阶级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永远和人民在一起,我们的 事业无往而不胜

中国各族人民是伟大的人民。这不仅表现在中国人民创造了使世界至今为之叹服的灿烂的古代文明,不仅表现在中国人民曾经无数次地击败压在自己头上的国内外反动统治者,尤其集中地表现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

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随后又建设起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3】永远和人民在一起,相信和依靠人民,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不息,这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唯一宗旨,也是我们党的事业蓬勃兴旺的根本保证。

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在他一生的奋斗中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活动的早期,曾经热情而周到地为新民学会的年轻战友们安排出国勤工俭学,学习马克思主义,而自己却甘愿留在国内,搞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进一步掌握中国国情。他在总结辛亥革命经验的时候,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基本教训是没有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大革命期间、大革命失败以后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同陈独秀、王明那种抛弃广大农民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教育和引导全党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的道路。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克服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胜利,也是抵制来自国外对我们党内事务的干涉的胜利。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给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以极大的支援。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但他也犯过错误,在对待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也有不对之处。毛泽东同

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初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4】又指出：“一九四九、一九五〇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5】一九四九年，当刘少奇同志访问苏联的时候，斯大林作了自我批评，并且向少奇同志说：我们曾经妨碍你们的革命，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是正确的，胜利者是不能批判的。他提议，为后来居上者干杯。

中国人民诚挚地接受苏联人民的友谊，但是对于任何“老子党”的做法、霸权主义的行径，我们都坚决地顶住了。一九五八年赫鲁晓夫到中国来，毛泽东同志驳斥了他想通过建立所谓共同舰队控制中国海军的企图，使他不得当面对认错，说这离开了共产党的原则。但随后赫鲁晓夫装腔作势，说我们触犯了他们的自尊心，粗暴地理解他们的政策。毛泽东同志指出：什么？触犯了你们的自尊心，是谁触犯了谁的自尊心？你们提这样的问题是触犯了我们的自尊心！谁粗暴？是你们派的代表，叫尤金，在北京向我们五次提出这样的问题。当时我们的了解，就是你要搞共同舰队，我们就得搞，否则就不给援助。毛泽东同志说：你们愿意帮助就帮助，不愿意帮助就算了。又说：你们坚持这样的方案，我们就不干。你们要坚持一万年，我们就一万年不干。赫鲁晓夫

进而悍然撕毁经援合同，撤退专家。然而事实证明，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算什么？我们照样卫星上天、两弹爆炸、远程火箭发射成功，不断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后来勃列日涅夫时期，他们对珍宝岛的武装进犯，支持越南在南方边界捣乱，同样被我们击溃了。毛泽东同志晚年重病在身，犯有错误，但是他对于任何涉及我们民族的独立、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的问题，却始终保持着极其清醒的头脑、坚强的意志和高度的警惕。

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从来坚定地相信中国各族人民自己的力量。中国各族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只要团结起来，振奋精神，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不拒绝学习别人的长处而又主要地依靠自己，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一切敌人都可以战胜。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曾经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很大的不幸。但是终其一生，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不愧是中华民族中的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他的伟大，正在于对中国人民的忠诚，对中国人民力量的坚信不疑，正在于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坚如钢铁的阶级的、民族的气节和革命意志。对于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我们应该引以为戒。他那种为人民的事业顽强奋斗、总不停步的精神将万古长青，值得我们学习。

永远和人民在一起，永远维护和代表人民的利益，这也是我们党反复告诫青年的。毛泽东同志的《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等方章，曾经深刻地阐述了这个道理。古往今来，一切有作为的人，其成就都是同他们在多大程度上

维护和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成正比例的。谁和人民在一起，谁就能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谁脱离和反对人民，谁就落后以至走向反动。这是一个历史的真理。现代以来，中国青年在革命运动中曾经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像以青年为主体的“五四”运动，还不是因为那时的进步青年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大批青年奔赴根据地、解放区，为民族的解放和独立英勇奋斗，千百万人光荣牺牲。他们的鲜血染红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他们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们的青年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广大人民一起，积极参加了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广场群众革命运动，青年们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英勇地走上第一线，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建立了巨大的功勋。这几年来，青年们刻苦学习、勤奋劳动、努力工作，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一批先进人物。现在青年中正在开展学习雷锋和“五讲、四美”的活动。雷锋精神就是共产主义精神。雷锋精神的核心，就是时时处处想到人民，要为人民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五讲、四美”，也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青少年中培养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一种有效途径。这项活动，有利于一代新人的成长，有助于社会的安定和现代化建设的进行，很有必要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要继续在青少年中提倡和表彰共产主义理想、道德和情操。我们的青年一代正在健康成长。年纪大一点的同志谈起来，都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后

继有人感到振奋，受到鼓舞。

我们的青年有着广阔的前途。这种前途，是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不搞现代化建设，同人民的要求、历史发展的方向相背离，个人会有什么前途呢？我衷心地希望每个青年，不管是工人、农民、士兵、干部、学生，都扎扎实实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劳动和学习，加强自己的思想品德修养，争取在不长的时间，使自己有正确的人生观、健全的体魄和某一方面的专门知识。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当然还要继续努力工作，但至多只能为祖国现代化事业的大踏步发展做一些铺设道路之类的事情了。现在是属于我们和你们的，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属于青年的。青年不仅是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而且将成为它的真正的主人。我深信，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将一定会通过我们的几亿青年的创造性劳动，取得使全世界为之共同称赞的辉煌成果！

社会各方面都来关心青年工作

我们党历来是关心青年工作的。中央专门研究了青年工作，并做出了相应的决定。领导同志就这方面的问题写文章，为青年做报告，已经成为一种很好的传统。现在，团中央的同志正在就如何针对新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做好青年工作，不断地摸索和积累经验。在这方面，我只想

讲一个问题：为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创造有利条件，这是一项全社会都应该承担的光荣职责。

青年们在各条战线逐渐成为或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生力军。其数量之多、积极性之高、能量之大，使任何地方和部门的工作都离不开他们。但是，可以反过来提出一个问题，各方面对青年和青年工作关心得怎么样、支持得怎么样呢？是不是已经很好了，再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了呢？不能这样看。

青年工作，不只是团组织的事情，也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情。单凭这些部门的同志，即使昼夜操劳，也是很难做好工作的。从这些同志来说，要真正掌握自己工作的规律，也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比如和青年交朋友，使得对方能够向你诉说心里话，就是专门的艺术。比如青年活动的组织安排，要使青年受到有益的教育，又要适合青年的特点，不是强迫、而是吸引他们来积极参加活动，也不容易。至于要研究青年心理学，研究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经历、不同性别的青年的特点，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怎样才能在这方面进步得更快些，怎样才能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就更是需要深入调查和进行理论概括的事情了。我们的国家非常需要有一批青年工作的专家。目前这方面的合格人才不是多了，而是很缺乏。做青年工作的同志有权利为了青年而向社会各方面进行呼吁，社会各方面也应该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文艺部门要为青年安排专门的节目，要提供真正有益于提高青年审美水平，有益于青年身心

健康发展的作品,其中包括深刻反映青年生活的作品。要有系统地指导青年阅读欣赏古典名著,引导他们正确区分精华和糟粕,要使文艺作品都能够有益于青年精神境界、道德品质、美学趣味的提高。理论宣传部门要运用多种形式使青年尽快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知识,要编写一批通俗的历史教材。卫生体育部门要为使中国青年成为世界各国中最健康的青年而奋斗。其他如青年的恋爱婚姻、工作安排、活动场所、住房、衣着打扮等等事情,无一不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关心、共同努力才能做好。大而至于国家的部门,小而至于生产队和街道居民委员会,都应该主动积极地为青年的成长做出贡献,都应该因为用自己的工作帮助了青年而感到光荣。

我们的国家有没有希望,我们的民族有没有希望,关键要看我们的青年有没有希望。作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我是满怀这样的希望来参加这个会,来向同志们表示对“五四”青年节六十二周年的祝贺的!

注 释

- 【1】 恩格斯:《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版,第650页。
- 【2】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311页。
- 【3】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第147页。

-
- 【4】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版，第286页。
- 【5】 同上。

中央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 指导思想*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就开始起草。起草小组于去年三月提出了初步设想，上交邓小平、胡耀邦、胡乔木同志。小平同志第一次找起草的同志谈话时，提出了起草《决议》的指导思想。从那以后一直到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的一年零三个月里，小平同志对起草的工作人员，或者在中央会议上，前后谈了十六七次话。每次谈话，耀邦同志都参加，都同意和补充发挥了小平同志的意见。在这个期间，陈云同志先后也提过四次意见，都是重要问题上的意见。小平同志这十六七次谈话或者发言中，最重要的有三次。另外，还有全会期间的一次重要谈话。

小平同志第一次谈话是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九日。他说：

* 本篇与下篇是邓力群同志向河北省直属机关干部传达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的部分内容。

中心是三个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位的问题，就是要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不仅是指今天，而且是以后，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给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必须明确地针对这种混乱思想加以澄清。国际上对这个问题很关心，左派党关心我们的态度，许多朋友也在看我们怎么说。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延安这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都已经比较完整地形成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完备。那个《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讲了一下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这一次，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执行的，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这是第一个问题，也是第一位的问题、关键性的问题。

第二，对解放后三十二年来，主要是粉碎“四人帮”以前，历史上的大事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功在什么方面，过在什么方面，是和非都要作出公正的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个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

是的分析。

第三，要对过去的事情做一个基本的总结。总结的时候，还是过去所说的，宜粗不宜细。总结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群众内的思想明确起来，认识一致起来，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就基本结束了。要力求《决议》通过以后，不要像现在这样，一有机会就面向过去，对过去的问题议论得没完没了。《决议》作了以后，就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因为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大家分歧很大，意见很多，但是要努力做到。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但是将来的议论，只是在讨论当前工作的时候，联系着谈谈过去有关的事情。《决议》要力求做好，能够使大家的认识一致，不至于在《决议》通过之后再发生大的分歧。要做到，即使谈到历史，大家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可以说了。要说，也只是对《决议》的内容、对过去经验教训，谈谈自己的体会。

小平同志说：总的说来，总的要求，或者说是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是第一条。

小平同志第二次谈话是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五日。那个时候，四千人正在讨论《决议》十月十一日的稿子，他看了讨论时出的《简报》（包括中央机关、省市机关的一部分简报），找起草的同志去谈了下面这些意见：

关于对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写

不写，怎样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找中央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把同意大利记者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从这次讨论《决议》的简报中可以看出，军队的几个组对《决议》中关于对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写法，基本上也是可以接受的。这个《决议》里头，如果不提毛泽东思想（因为讨论中间有人提出来，干脆不要提毛泽东思想了），如果对毛主席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

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子丢不得，丢掉了这面旗子，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说来，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在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使我们这样一个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而且站住了，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肯定并且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去年西单墙有人贴这样那样的大字报，中央提出四个坚持，得到绝大多数人民、干部的拥护，才把局势慢慢稳定下来。如果这次的《决议》离开四个坚持，不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是很不妥当的。那将对整个局势的稳定发生不利的影晌。

有的同志提出非常尖锐的意见，说“大跃进”、“文化大

革命”的错误比斯大林的错误严重得多,甚至比任何一个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发生的问题还严重。如果作这样的估计,那就势必得出结论,我们不如勃列日涅夫,这样问题可就大了。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同我们党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是一个全局性问题,很值得我们大家注意。对毛主席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仅是国内问题,而且是国际问题。有的同志主张,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部分根本不要。不能够不要。这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国内、国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这部分,那整个《决议》都可以不作。表述的方法,需要认真地考虑一下。但是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对我们当前和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老人家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就是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三中全会以后所坚持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基本点,还是毛主席思想中的东西。当然,我们也有发展,今后也还要发展,但是基本点还是毛主席给我们规定了的。这次《决议》稿中没有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是对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这个提法完全对。我们党在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从许多方面

来说,现在我们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还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东西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经过我们把它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么几件事。

党的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站住了脚。“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但是我们党还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以至发展到今天。这些事情,还是毛泽东思想教育出的一代人干的!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间,党不存在了。党员的组织生活确实停止了,但党在实际上还存在着。否则,怎么会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之乱,拨毛泽东同志错误言行之乱,返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总之,不把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写进《决议》,我们过去和今后要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者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犯历史的大错误。

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归结为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实际上不少问题是用个人品质解释不了的。即使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够避免错误。老人家脾气也的确大。脾气一来,感情冲动,说几句,传达下去,全党照办,

难免不出问题。还有，就是到了晚年，确实是一阵清醒，一阵糊涂，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够联贯起来呢？他批评第三次左倾错误打倒一切，还只是打倒工农以外的一切，“文化大革命”把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打倒了嘛！一九七五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同志听力还可以，还能写字，但说话已经很困难，不容易听懂，就靠身边几个人根据口型去判断。毛远新他们搞的那个“批邓”的十二条是否准确，值得怀疑。要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的领袖。这个问题一定要慎重考虑。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了，写过了，给毛泽东同志抹黑，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就会把我们党、国家的形象搞得很不好，离开历史事实。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建国以来，我们的事业都是前进的。过去是这样，更不要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这几年了。

有些同志提出，讨论稿只写九大路线的错误，没有写十大路线的错误。这个意见对，应该吸收。但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十二中全会、九大和十大不合法，就值得斟酌了。

《决议》的结构可以改，但基本的调子、基本的论断不能改。篇幅可以压缩，有些地方还要修改、补充，或者改变一种写法。

小平同志第三次讲话，是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说：这个《决议》，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要这样急于搞。不行。需要搞，因为大家都在等着，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他总是议论。议论是多方面的，而且有很多猜测。国际上也是这样，也在等。拿不出来，人家就说，你们是内部纠纷，矛盾还没有得到解决，这一派那一派，得不到一致的意见。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包括这个文件是拿得出来还是拿不出来，是早一点拿出来还是晚一点拿出来。所以，不能够再晚了，晚了不利。非洲几个国家已经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最关心毛泽东思想，反应非常强烈。不止一位非洲朋友提这个问题。

小平同志还说：尼雷尔和我谈话，因为他一向就不赞成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所以我给他解释对“文化大革命”要进行批评的时候，他能够接受。但是他说，毛泽东思想无论如何不能丢掉。津巴布韦的穆加贝说，我们“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坐牢，所以“文化大革命”怎么样他不知道，但是他讲他们那个津巴布韦搞成功，就是靠毛泽东思想，《毛选》一、二、三、四卷。他说，马恩列斯他们的书很多，可是读了以后，同他们那个地方的情况对不上号，而《毛泽东选集》的很多内容，容易懂，而且管用。他们的胜利，基本上是毛泽东思想中符合于他们那里实际的东西所引导而取得的胜利。所以他就特别关心毛泽东思想，特别关心毛主席。他们说，毛泽东思想无论如何不能丢，毛主席不但是中

国革命的领袖，也是世界革命的领袖。小平同志又说：外面宣传我们现在搞“非毛化”，我们解释说我们没有搞“非毛化”，我们准备写一个《决议》，《决议》的主要调门怎么样，他们理解，说这样好，人都死了，不要批了。

这里我顺便提一下，耀邦同志在今年“七一”讲话里头有一句话，说毛主席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听说有的同志问：过去不是讲世界领袖吗？为什么现在只讲民族英雄啦？其实，对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个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别国的影响，不要由我们中国共产党来说，要由人家来说，这正是毛主席一向主张的。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多次讲过，同志们大概也还记得，粉碎林彪以后，传达的文件中间就有毛主席关于对外关系的十几个批示，再三讲，不能够把我们的意见强加于人，对外国党、外国革命分子谈话，还是只讲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他们国家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只是讲这个，讲到这里就为止了。

小平同志指出：起草这个《决议》的时候，提出了三个基本要求。第一个要求是确立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个《决议》最主要的就是要实现这个要求。我们不是讲四个坚持吗？其中一个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决议》要体现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如果不能实现这个要求，或者实现这个要求困难重重，宁可不要写这个《决议》。第二个要求，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是非功过，不但要实事求是，而且要恰如其分。第三个要求，就是在上面讲的两条的基础上，统一全党的思

想，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决议》作了以后，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好，对于历史的问题也好，就不再纠缠了。以后就一心一意向前看，一心一意搞建设，一心一意研究、解决新问题。当然，有些同志的意见没有采纳，他们不满足，但是要完全满足也不可能。有个统一的语言，有个统一的思想，定下来了，就不再纠缠过去的问题了。这个《决议》是根据这三个要求写的，现在的稿子也是合乎这三个要求的。为了合乎这三条要求，对于三十二年的历史问题，包括“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毛主席的问题，宜粗不宜细。这个话，我们从一九七七年讲起。这个《决议》的稿子还是本着这个精神写的。有许多问题，看起来好像没有回答。实际上有些问题不宜太细了，只能够粗一点，有些问题只能够略而不提，提了倒不一定有好处，而且也不容易说清楚。现在这个《决议》稿子，合乎这个宜粗不宜细的要求。

这个文件是在讨论的基础上修改的，很多好的意见在这里面都吸收了。

小平同志说：总之，中心的问题是二个，一个是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些错误是毛主席一个人犯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也要承担一点责任，恐怕这个比较合乎实

际。另一个问题是，毛主席个人的品质问题。毛主席犯错误，也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小平同志第四次讲话，是在六中全会期间，六月二十二日常委召集各组召集人碰头会时讲的。他说：又听了好多新的意见。没有时间了，这个稿子要定下来了，有些问题可以不放到这个文件来解决。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主席的功过是非，通过这个决议，起到上一次若干历史决议那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因此，总的轮廓、基本论点和各个问题的分寸不要再大变动了。

小平同志说：这个决议写了一年多了，通过四千人的讨论，以后几十人的讨论，以后又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这次全会的讨论是第四轮了，是相当认真、严肃，也相当仔细了。核心问题是对毛主席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对“文化大革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对毛主席，确实要讲究分寸。譬如路线问题，就有个分寸问题。过去我们好多讲的“路线”，并不准确，而且用得很多很乱。（陈云同志插话：讲路线，历史上用惯了，用到谁的头上谁就不得翻身，还要上挂下联。“文化大革命”中用得更滥了。如果讲十一大是路线错误，那问题就大了，包括叶帅，包括先念同

志，包括好多人。所以，这个问题我赞成现在稿子的提法。）就是不讲这些是路线错误。因为过去我们讲路线，讲多少次路线斗争，好多已经推翻了。过去叫十次路线，两次推翻了（一次是彭德怀，一次是刘少奇）。高饶事件也不好说是是什么路线。如果说得更早，罗章龙就是搞派别斗争，就是分裂党，另立中央，说路线错误，也没有说中，他的性质比路线错误更严重一点。高饶事件也是类似那么一个性质，当然还不是另立中央。这是一个理由，就是好多评价过去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党内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角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十一大，不要谈什么路线问题；“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谈路线问题。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毛主席的错误，如果讲到路线问题，也讲不清楚。同时，我想大家都不赞成说毛主席犯了路线错误，这样说也不好。所以，我们不讲路线问题比较有利。开个先例，以后也这么办。但是，不是说路线两个字一概不能用。譬如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这样范围的问题还可以用，以后还可以用。但是，千万不要用之于党内的斗争，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总之，这次文件就保持这个限度。

以上是小平同志先后四次有关《决议》的重要讲话。

下面是陈云同志的四次重要讲话。

陈云同志第一次讲话讲到这三十二年中间的错误时说，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是全局性的、局部性的、部门性质的，都要分别不同情况，一个一个地把它敲定下来。

陈云同志第二次讲话，是讲这个《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在写法上要使大家能够从这个《决议》上看得很清楚，就需要写一下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主席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所以，建议增加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主席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说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陈云同志第三次讲话，说从遵义会议到抗战胜利，毛主席的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这一大批干部。现在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上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解决西安事变，制定抗日战争和同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包括写了许多重要的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我们党里头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写出这样好的著作。这是了不起的功绩。第三，延安整风，毛主席提倡学马列，特别是学哲学，这对于我们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第四，对实事求

是的体会是从哪里来的？陈云同志说他自己的经历，是在延安整风期间，把毛主席的主要著作、重要文电统统看了一遍，由此才深刻地领会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第五，老人家这一套是总结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的错误教训得出来的，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六，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毛主席相比，包括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都比不上毛主席。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整得那个样子，“文化大革命”中间的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毛主席，原因就在这里。老一代人拥护毛主席是真心诚意的。

陈云同志第四次讲话，是说《决议》里头要把国际上对我们的帮助写上去。我们党是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成立的。共产国际在我们党成立的初期起了好的作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还是援助了中国，最后出兵打垮关东军。这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把关东军打垮，抗日战争的胜利起码要推迟好几年，我们也进不到东北，东北也不可能首先全部解放。还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百五十六项援助，那确实是援助。所以这些问题，我们在《决议》里还应该如实地、适当地写上去。如果不写，人家就会说中国共产党在这些问题上不公正。

对小平同志的意见、陈云同志的意见，政治局的同志、政治局常委的同志、书记处的同志都一致同意。所以，我们提出的指导思想，也就是中央领导集体一致同意的指导思想。整个《决议》就是在这样一个正确指导思想下面写成的。

对于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小平同志在屡次跟我们谈话中间，都一再地进行阐述和发挥，自始至终都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各种讨论的意见提出来以后，凡是能够有利于体现这三项基本原则的一切意见，不管大小意见都接受；凡是有妨碍于体现这三项基本原则的，都不加以接受，同时进行说服教育。这三项基本原则体现在整个《决议》的结构上，体现在重大问题的判断上面，体现在一些重要的提法上，甚至于字句的斟酌上面。现在愈来愈看得清楚，如果中央领导同志不是明确地规定了这样正确的指导思想，如果不是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个指导思想，那么《决议》就很难收到现在这样的效果，很难得到这样的好评，也很难使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思想上的一致、认识上的一致，在《决议》的基础上团结一致向前看。相反，如果采取另一种指导思想，接受了那些错误的思想、意见，结果就不是消除思想混乱而会增加思想混乱，不会是加强团结而只能是妨碍团结。

应该如实地说，起草小组的工作人员，对小平同志和对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提出的指导思想，也有一个理解的过程。开始理解得很浅，后来才逐步加深；也有些问题，开始理解得不正确，到后来才逐步地正确了。我们每一次稿子拿出来以后，都送到小平同志那里，他都亲自审阅，提出哪些部分大体可以了，哪些部分要重新修改；哪些提法、哪些问题的处理是体现了三项要求的，哪些问题还没有体现这个要求。在一年多的过程中间，小平同志、耀邦同志、中央的其他同志在指导起草过程中间，要我们博采众议，不管什么大意

见、小意见，只要符合三项原则要求的，都完全接受。另一方面，也力排错议。有的意见尽管反复提出，但因为不利于体现三项基本原则，也还是没有接受。

这个《决议》起草的过程，不仅是中央和起草小组同志进行反复的研究讨论的过程，而且是在中央的集体领导下，在中央机关以至全国不同范围里进行讨论、修改、补充，充分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共同负责，集体修改，集中大家智慧，进行集体创作的过程。这个《决议》能够达到现有的水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进行了这样一个集体的创作。总之，《决议》的起草、修改和定稿，都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充分体现了在党中央领导下，党内民主生活的高度活跃。这次《决议》的起草，讲集体领导，讲民主集中制，讲民主生活的活跃，恐怕在我们党内是前所未有的。这个《决议》确实做到了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现了高度的集中。

从发表《决议》以后的影响和反映来看，就拿我个人来讲，也超乎我的预料之外，没有想到能够说服我们党内那么多人，包括在起草过程中间提不同意见的同志。这里我给同志们念一个材料，它很能说明这个《决议》说服党员、说服干部、说服人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新疆乌鲁木齐在《决议》发表以后，引起了普遍注意和强烈反映。在一些居民小院里头，也是这样一种情况。许多人都说，现在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分清楚了，理直气顺了，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了。一位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对记者说：过去毛泽东同志住

在天上，他是神，我们敬他，可是总觉得离他远。如今党中央通过的《决议》，把他的功过讲活了，就像把他从天上请到人间，和我们百姓住在一起，我们都感觉他老人家也是人，离我们近了，我们对他老人家也就更加亲了。这一段话，我看讲得很好，言语使人感到很亲切，感情很真挚，话里的寓意很深、很广，确实是表达了我们人民的心里话。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道：“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毛泽东同志对我们党和中国各族人民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在理论上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是去世了，可是他的科学著作，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将要长期起指导的作用，继续成为我国各族人民，我们党进行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

《决议》的第（28）节，就是讲毛泽东思想是在什么样的特殊条件下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概念的科学规定。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原理，

是因为它揭示了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对世界各国人民谋求解放有普遍的指导作用。但这个普遍真理的运用，还必须结合中国国情的具体分析。中国终究是这么一个大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和压迫的历史，又受到国际帝国主义一百多年的侵略和统治，在我们国内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中国的无产阶级受着三重剥削，数量虽然小，但比较集中，战斗力很强。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还有其他的各种条件。这些情况和问题，在过去马列主义的著作中，都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答案。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按毛泽东同志的说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后来，刘少奇同志在七大的报告中指出，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说共产主义中国化。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取得胜利，我们的革命也才能够取得胜利。这个问题靠搬书是不能解决的。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我们过去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大亏。照搬马恩列斯的原著，背诵马恩列斯的这个具体结论，那个具体结论，以为背诵这些结论，或者搬用苏联成功的经验，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结果完全相反。所以，《决议》里特别讲到这个问题，在本世纪的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初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普遍地出现了教条主义的倾向。我们党也在这个时期受到了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导致了一九三一年以后四年的王明左倾错误的统治，以至于革命已经走向胜利，又重新遭到失败。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就显示了毛泽东同志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也显示了他

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武器来解决中国革命复杂问题的本领。毛泽东思想，可以说，首先就是同教条主义作斗争中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这种教条主义在较长的时期内是以“左”的面目出现的。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比较，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我们党绝大多数的干部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因此才可能召开遵义会议。从此，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红军的领导地位。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还是我们同苏联有很大争论的一个问题，以至于这次《决议》发表以后，苏联的评论是跟我们相反的。我们说战胜了教条主义，遵义会议之后我们党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从此革命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苏联说，三十年代以前或者三十年代初期，我们党还是沿着马克思主义道路前进的，到了三十年代后期，也就是遵义会议以后，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派别在我们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从此以后就脱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使革命不断地犯错误。

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怪事。我们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检验已经证明了哪些是正确的东西、哪些是错误的东西，就有那么一些人死不承认。国际上有这种现象，国内有这种现象，在我们党内也有这种现象。《决议》里头写的是历史，可是这个问题上的斗争至今仍有实际意义。这方面的具体的事情，我想同志们都经历过。我们河北省是个老的根据地，很早以前就建立了党的组织，有很多老干部在，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回顾一下，就可以很深刻地

很亲切地认识到我们党同教条主义斗争的历史，更进一步地来领会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这么一个条件下，是怎样同教条主义进行艰苦的斗争，形成毛泽东思想，使我们的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

在写了毛泽东思想是在同错误倾向斗争中产生和形成的以后，《决议》又进一步指出，它在抗日战争时期全面发展并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后面这句话是有针对性的。在讨论这个《决议》的过程中，有些同志就讲，不要提毛泽东思想了，理由是毛泽东思想在争取新民主主义胜利中间确实起了伟大的作用，可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思想就再没有什么发展了，再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坚持了。这句话就是针对这样的思想写上去的。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在讲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容的时候，特别讲了一段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科学规定，这一节里头讲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同我们过去的一种说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或者相统一的思想，是一个意思。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过去我们也是经常说的，不是新的语言。这里加了一个重要的话，“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个意思的反面，就是说，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像“文化大革命”时期

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论点，不应该包括在毛泽东思想之内，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是对毛泽东同志一生进行过分析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还有一句，“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句话在叶帅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中就已经提出来了，大家对于这句话都认为表达得很好。实际上，这个意思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了，在延安的时候他就说过，你们说我写的书很好，写的文章很好，怎么是我写的呀？这是用血写成的，是我们的先烈，我们的党员，我们的人民，在长期的英勇斗争、流血牺牲的过程中间，提供了很多丰富的经验，包括正面、反面的经验凝聚而成的思想。在《七大的工作方针》里，毛泽东同志也讲到这个意思。我们过去的宣传工作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缺点，没有把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意思讲清楚，相反地只是偏重于讲了毛泽东同志个人的贡献。这一段里头，又根据六中全会的讨论，加了两句话，“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我们很多卓越的领导人都曾在不同时期，在不同方面进行了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这些总结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贡献。毛泽东同志也是集中了这些卓越领导人所总结的中国革命经验，写成了他的科学著作。

这里解释一个问题，前些日子，有一些文章论证说，既然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很多领导人又作出了贡献，那么，少奇同志的著作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周

总理的著作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这种说法,在这次起草《决议》过程中觉得不太准确。少奇同志的著作,还是少奇同志的著作,周总理的著作还是周总理的著作。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贡献,是因为他们的著作里头,这个理论那个理论,这个观点那个观点,对于毛泽东同志总结这方面的问题那方面的问题,起了很好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把他们这些东西,经过考虑,用他自己的文字集中起来,加以概括,加以表述。举个例子,如“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1】}这个意见,最早是少奇同志提出来的。毛泽东同志听了这个意见以后,认为很好,我们党内要形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整个国家也要形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后来,毛泽东同志就用自己的语言,把这段话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第一次写出来了。这个意见是少奇同志贡献,经过毛泽东同志的考虑,经过他的表达,这样就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了。像这样的例子很多。要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最主要的还应该学习阅读毛泽东同志自己的著作。

下面两节讲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容。这两节,一部分是讲他的理论贡献,一部分是讲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两节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容,作了全面的系统的论述,充分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指导作用,并且科学地阐述了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首先是关于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贡献,归纳成为六条,就是:关于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理论。这六个方面,毛泽东同志结合中国的实际,总结中国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理论是具有创造性的,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加了新的内容。经过这样一个表述,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就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括了。当然,因为文字的关系,不可能对毛泽东同志关于六个方面的内容详细地加以论述和展开,但是可以说,也应该说,关于毛泽东同志这六个方面理论的精华、最精粹的部分已经在《决议》里作出了概括,显示出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容是很丰富的。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基本理论贡献,不仅对过去,而且在今后仍然起指导作用。小平同志讲,我们今后做的事情,基本上还是毛泽东思想中间的一些最主要的东西,也是毛泽东同志为我们规定了的东西。

这六个部分的表达,确实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把林彪、江青歪曲了篡改了的东西,或者捏造的东西,都加以排除了。我们今后要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应该以《决议》里写的内容为准。六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列举了毛泽东同志对有关问题的重要著作。将来进一步学习时,起码应该学习这里提到的重要著作。还有一些著作没有列进去,有时间也应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容,同“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同志的主要左倾错误论点,应该加以区别。我们说毛泽东思想,主要应该是《决议》里规定的东西。

“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的理论，简单地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错误的，不包括在毛泽东思想范围内。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概括，全会在讨论时，大家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条本身没有什么不同意见，认为表达得好。但对这三条之前的导语提出了不同意见。我记得原来的写法大致是这样的：“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其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对这一段话，大家在讨论中认为，这可能给人一个印象，似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世界观方面，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方面的贡献只是一些方法问题。起草小组修改了多少次，改成现在的表述，大家都很满意。这段话很重要，我把它念一下：“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然后接着讲：“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们不仅表现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重要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有了这样的

表达以后,那么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尽管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占大多数,尽管我们的今后任务不同了,今天不存在民主革命时期那些问题了,可是,怎么样从《毛选》一、二、三、四卷中间来学习他解决复杂的重要的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运用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条,仍然是我们的重要课题。

毛泽东同志给我们留下的科学理论,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长期值得我们珍重、珍贵、珍惜。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需要物质生产的发展、物质产品的丰富,而且需要科学的理论作为精神武器,或者说作为精神支柱,用以教育人民、团结人民、鼓励人民。否则,这样的民族在世界上是站不住脚的。现在西方一些进步的学者在讨论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说只有物质的丰富并不等于幸福,只有物质丰富,精神生活又高尚,这样的社会才是幸福的。我们这个民族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不同时注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是不行的。毛泽东思想,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是提高我们的思想品质、道德品质、道德风尚的一种最好的教材。现在在少数人中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很值得重视!如果把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丢掉,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对于我们整个人民的精神文明、精神生活,会造成很大的损害。先进的革命的科学的的思想,可以保证人民有坚强的意志、健康的情操、高尚的品质、友好合作的关系、为事业牺

牲的精神。这样，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范围内，才能够形成统一的行动。这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毛泽东思想正是引导和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共同奋斗的思想旗帜，我们党在过去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干部，教育了广大人民。过去这样做了，使得我们的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现在和今后，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要实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同样还需要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全体干部，教育全国各族人民。我们所有的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都要继续从毛泽东思想那里吸取智慧和力量。

《决议》对我们党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反对两种错误的态度作了明确地表述。第(31)节有这么一段话：“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要反对这两种错误思想，那么怎样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呢？《决议》写得很清楚：“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

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正确评价和认识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也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党的指导思想问题，重新肯定要用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而这个毛泽东思想，是同“文化大革命”中有过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论点完全区别了的科学理论。

注 释

- 【1】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版，第456页。

问题和回答（六则）^{*}

（一九八一年七、八月）

一、为什么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历史的伟大转折

这里只讲一个问题。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第（26）节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个问题最关重要。思想路线的重申或确立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思想路线确立以后，就要对当时以至以后我们社会的情况、社会的阶级状况、社会矛盾的状况，作出合乎实际的估计。表现在《决议》中，就是这么两句话。实际上正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河北省委直属机关等单位学习《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回答问题的节选。

前毛泽东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状况、阶级矛盾状况的分析的批评，重新肯定地作出了符合实际的估计。在这个估计的基础上，确定了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确定了工作重点要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在确定每个时期的方针、政策的时候，要分析当时的社会情况，要分析当时的阶级状况和各种社会矛盾。把这些问题分析清楚了，搞正确了，才能依此作出我们的任务、方针、政策是什么的决定。讲历史的伟大转折，很重要的一点，是表现在对阶级矛盾、阶级状况和主要矛盾的看法上。这中间当然包含这么一个意思：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改正过来，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改正过来，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估计上面来。

二、关于阶级斗争、主要矛盾

前面讲了，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表现在对阶级斗争、主要矛盾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那么，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有怎样不同的发展呢？

三中全会的公报没有专门去说我们国家的阶级状况怎么样，我们国家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但是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工作着重点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停止

“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的使用，对林彪、江青不是批判他们的极右，而是批判他们的极左。表现在公报上的上述提法，或者说这些决策，实际上就包含了我们党中央在国内阶级状况以及国内主要矛盾这些问题上，同三中全会以前的估计是根本不同的。

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阶级斗争和主要矛盾时有这样两段话：“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要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我们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充分认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充分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我们必须善于正确处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继续改革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继续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反修防修。我们必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齐抓起来。”这里，请大家特别注意的，主要是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对

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几句话。

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继续进行研究。部分理论工作者在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也开始进一步探讨这样一类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比较好的见解。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讲话，在讲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也讲了阶级斗争问题、主要矛盾问题，比《三中全会公报》前进了一大步。他指出：“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他明确地提出，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已消灭了剥削条件。他还讲：“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在长时期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专政。”^{【1】}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肯定地讲了还有阶级斗争，可是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已经消灭了。小平同志讲，关于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现在还是维持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小平同志说：“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但是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2】}这就是说，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者中心任务，由于确定了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实际上已经解决了。他又讲：“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所以，要看到基本矛盾是什么，还要进一步看到每个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样才能够确定这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是什么。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八日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国内的阶级状况和主要矛盾问题的研究，就又继续前进了。这个报告，自始至终是在中央领导下，由胡乔木同志起草、修改，然后中央定稿的。这个报告与人大五届一次会议的报告内容就完全不同了。

首先请同志们注意的是，分析阶级状况和主要矛盾的时候，把台湾除外，也把香港、澳门这些地方除外，指的是大陆，是实行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地区。在大陆，已经消灭了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资本家阶级也已经不再存在。这就比小平同志讲话更具体了。那么，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报

告肯定了原来的地主、富农、资本家中间的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同志说，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是太早了？他们的理由是，说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消灭了，那么它的对立面无产阶级还有没有呢？如果说资产阶级消灭了，那么还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合适不合适呢？他们认为，说地主阶级消灭了、富农阶级消灭了，可以；但说资本家阶级消灭了，不赞成。实际上这个问题斯大林老早就解决了。俄国资产阶级消灭以后，“无产阶级”这几个字通常使用还可以，但是更确切地说，应该用工人阶级了。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不仅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而且要消灭一切阶级差别，不能够说剥削阶级、剥削制度消灭了，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要了。这只是完成了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任务的一个部分，或者说是走了一大步。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存在，还有一个消灭阶级差别的任务。在一定的意义上讲，这个任务，比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更艰巨，需要更长的时间。中央没有采纳这些同志的意见。那么，作为原来地主的对立面的农民，现在是什么样的农民呢？已经不是个体农民了，而是社会主义的农民。资本家对立面的受雇佣剥削的工人，现在已经不是出卖劳动力的工人，而是社会主义的工人、社会的领导阶级了。旧社会大部分依附于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现在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了。《决议》不仅分析了在阶级斗争情况底下剥削阶级的变化，也分析了消

灭剥削制度以后,被剥削阶级的变化及其地位的变化。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说,在各个时期,人民这个概念是各不相同的。是的,如果说三大改造以前,人民的概念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话,那么现在就已经没有什么作为阶级的小资产阶级了,工人、农民不是原来的工人、农民,也没有作为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了。现在这个时期,人民这个范畴的含义,就是《决议》所讲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这些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也包括了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其中有的现在仍然是资本家,是剥削阶级的成员,可是他拥护社会主义祖国。这种人是爱国者,也在我们人民的范围之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是我们统一战线的对象,也属于我们人民的范围。旧的剥削阶级没有了,劳动人民的地位也改变了,我们社会里头还有没有阶级敌人?这种人,大体说来,是指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各种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犯罪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这里用新剥削分子,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也是经过考虑的。资产阶级分子,按照马克思的含义,就是要剥削剩余价值,使劳动力变成商品,实行雇佣剥削。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面,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不能说没有一些偷偷地搞雇佣剥削的人,但从全国的大多数地区来讲,无论公开的或者是秘密的,比较大规模地雇佣一大批工人来搞地下工厂或企业,实行雇佣剥削,是很困难的。可是通过其他办法,例如

化公为私，走私漏税，也是剥削。这样的人是有的。从报纸上揭露的材料看，比一九五二年“五反”时的大“老虎”要多，这个“老虎”比那个时候的不知道肥多少了。最近报纸上有个材料，一个普通的营业员贪污了二十几万元。所以这里头讲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四人帮”的某些残余，没有改造好的极少数地主富农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某些残余分子，走私分子，就这么一类人吧，他们同社会主义是互相敌对的。

上面这些，都是讲大陆的情况。作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全局来讲，还不能不想到台湾、香港、澳门都还存在着剥削阶级。所以，讲到全国阶级斗争的状况的时候，不能够只是把大陆孤立起来看，应当联系着考虑到台湾、港澳。

还有，我们处在国际阶级斗争的环境之中，许多邻国跟我们发展了友好关系，但仇视社会主义中国的敌对势力仍然对我们进行各种形式的破坏活动，并在我们国内培植为他们效力的人。正因为这些国内国际因素的影响，我们对阶级斗争不可忽视，不可小看。

一九八〇年底，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新的情况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新的发挥。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出要警惕唯恐天下不乱者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如果头脑清醒，保持警惕，加上细致的工作，是不难解决的；警惕性松懈，思想麻痹，再不做工作，就很可能在某些地方出现些乱子，以至于出了以后还不容易收拾。小平同志这次讲话里列举了当时社会上各种不安定的现象，说：“对这一

切现象，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这种种情况，有的属于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有的属于林彪、‘四人帮’残余势力的反扑，有的属于唯恐天下不乱者的破坏，有的属于剥削阶级残余分子的故态复萌，有的是由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作风的严重腐蚀。按性质来说，一种是敌我矛盾，一种是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反映。这说明，阶级斗争虽然已经不是我们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但是它确实仍然存在，不可小看。如果不及时地、有区别地给以坚决处理，而听任上述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蔓延汇合起来，就会对安定团结的局面造成很大的危害。对于这种种活动的严重性，我们有些同志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因而打击不力，有时甚至放纵不管。”【3】小平同志的这段话，实际上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同志们提出来的在人民内部是不是还有阶级斗争的影响、阶级斗争的反映。据我的理解，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是肯定这一点的。与过去不同的是，不能够把人民内部的矛盾都看成阶级矛盾，都看成阶级斗争的影响。这种影响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

关于主要矛盾问题，《决议》的提法，基本精神同小平同志的提法、人大五届二次会议的提法是一致的，同党的八大一次会议的提法也是一致的。《决议》里面采用的语言比较精练，就是讲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决议》第（35）节已经说清楚了，就是第四段说的：“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为什么要写一定范围？下面解释说：“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这就是说，我们社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大部分不属于阶级斗争，这里所讲的一定范围就是这么个意思。要没有这句话，还可能改变不了过去那种阶级斗争无处不存在，无时不存在，无事不存在，处处时时事事都存在的观念。这种观念不改变，尽管说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可是给人的印象以至于在工作中还是难免要搞阶级斗争扩大化。

小平同志讲，因为有这样一种阶级斗争的情况，也因为国际、国内的影响，国内还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有的人还要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体的表现，各地方都有。有些原来的剥削阶级分子，摘了帽子后反攻倒算；有的剥削阶级残余分子，把老一套又拿出来了，例如贿赂我们的干部；走私活动前些日子在福建、广东这两省是非常厉害的。考虑到这些条件，我们不能说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了，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了。现在中央对国内阶级斗争情况的估计，就是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已经消灭了，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还剩下这样一种人、那样一种人。这个不同是非常

重要的。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能回到老路去。所以《决议》第（35）节讲到，我们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

三、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 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原来提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决议》第（26）节说，党重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第（29）节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这应该怎样理解？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请同志们重新看一看今年《光明日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四月二十一日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一篇是四月二十三日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审查批准发表的。

马克思、恩格斯讲无产阶级专政，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农民已经变成农业工人，个体农民剩下很少，工人、包括农业工人占人口绝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意味着绝大多数工人、包括农业工人掌握国家领导权。另外一种情况，如法国、德国这类国家有工人阶级，但是农民还占着相当的数量，小资产阶级还占着相当的数量。在这类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应当区别于英国那种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参加政权的阶层以至于

这个政权的组成和它的形式，都有所不同。恩格斯说：“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可以直接建立这种统治，因为那里的无产者现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数，在法国和德国可以间接建立这种统治，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不仅是无产者而且还有小农和城市小资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正处在分化为无产阶级的过渡阶段，他们的一切政治利益的实现都愈来愈依赖无产阶级，因而他们一定很快就会同意无产阶级的要求。”【4】这段话讲得很清楚，英国是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法国和德国是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就是要同农民、小生产者建立联盟，实现政治统治。因为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不理解，把两类不同类型混同起来，想当然地认为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直接统治。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还讲巴黎公社不是无产阶级的直接的政治统治，而是间接的政治统治。用他们的语言说，巴黎公社是工人政府，也是国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根据俄国的情况，找到了一个“苏维埃”的形式。

毛泽东同志根据对中国情况的科学分析，形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决议》讲，这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毛泽东同志的公式，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讲的是：“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

领。”【5】我们这个人民民主专政，是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根据我们的情况提出的。说它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讲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中间既有专政，也有民主，更容易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是讲人民民主的专政，是民主和专政的结合。今天，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专政对象的范围已经缩小，而享受人民民主权利的范围则相应地扩大了。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既完全符合我国新时期的实际情况，也完全符合今后历史发展的进程。

人民民主专政也好，无产阶级专政也好，在国际上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有的人把无产阶级专政改成无产阶级执政，他们解释说，这是一个翻译的问题，过去没翻译准确，现在看翻成执政更好。实际上这是害怕鲜明地举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至于中间是不是要经过什么过渡，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不能讳言我们的政权负有镇压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势力和敌对分子的职能。资产阶级实际上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可是他们不把实质向人民讲清楚，说什么自由、平等、博爱啊。我们共产党人像马克思说的，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直截了当地讲，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这个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不同，他们是极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专政，而我们是大多数人对极少数人的专政。因为他们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所以需要进行欺骗，使人们不容

易看到这个专政的实质；我们是大多数人对极少数人的专政，不应当、也不需要隐瞒自己的主张。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就可以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而且应当动员绝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一致地对极少数人进行专政。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同一切剥削制度根本不同。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的形式改变了，但是都是剥削。我们要消灭一切剥削、一切剥削制度，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剥削的制度，不能不遇到历史上一切旧势力的反对。没有强有力的专政，要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成长是不可能的。要实行这样有力的专政，就必须在人民内部实行高度的民主。高度民主、高度文明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在政治方面的目标，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只有有了这样的高度民主，我们才能够对极少数人实行最有力的专政，这样来保证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成长、发展，以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四、关于路线斗争、路线错误的提法

《决议》全稿未用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的提法，只在讲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用了路线。为什么这样？胡乔木同志已经作过很好的说明和解释。他说，路线一词，马恩列都少用，在他们的主要著作中未用，在其他著作中用时也未给予何种严重意义。斯大林在一九二九年《论联共党内的右倾》一文中开始把路线问题提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中国党直至共

产国际反立三路线以前，亦很少用路线一词。王明掌握了领导权以后大用，而且越来越神圣化、神秘化。实际说到底（除滥用外，而滥用是大量的），就按路线的严重意义说，至多也不过是指总的、根本性的、全局性的方针罢了。过去已用了若干年是事实，但那样用法的害处也是事实。党的历史决不能简单化为路线斗争史。路线错误、路线斗争两个词，不知害了多少同志。原来考虑在这个《决议》中最后用一次，后来大家认为最好从这次就不用，用起来要引起许多困难和纠纷。（一）哪次算路线错误，哪次不算？（二）在这些路线斗争中究竟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三）每次错误路线如何起止？（四）这次《决议》用了，以后如何停止使用？在停止使用时要不要承认这次《决议》用得不对，因而又得对《决议》加以修改？想来想去，只有就此不用是上策。

有同志提出：有正确路线为什么不提错误路线？“路线”究竟是个什么意思，提好还是不提好？我想，我们还是不从这样一些概念的解释出发，而是从《决议》对这一类问题的处理，来考虑和理解这个问题比较好。

《决议》起草中最难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分析、评价毛泽东同志。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犯了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问题上，也犯了大错误。一九五七年以后，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他的一些认识、一些提法，他的理论，一步一步升级，以至于后来导致“文化大革命”。这就产生一个很尖锐的矛盾。处理来处理去，最难办的是这个

矛盾怎么解决。这个矛盾，用一种简单的语言来说，就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跟自己打架”。又要确定他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又要批评他的错误，这个问题要处理好，实在不容易。

《决议》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陈云同志曾经讲过，党的七大的路线和方针，八大的路线和方针，都是正确的。八大以后，毛泽东同志逐步离开了七大、八大的路线、方针。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纠正他的这些错误，回到七大、八大的路线、方针上来。在起草过程中间，乔木同志提出，“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左倾路线错误。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胡耀邦同志和中央其他同志都同意这个意见。后来改变了这个说法。现在的《决议》叫做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在这样一个提法下面，“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中对毛泽东同志错误的批评是毫不含糊的，但是并没有损害毛泽东同志的形象，没有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在进行这样严肃的批评的时候，掌握了分寸。这个分寸是多方面的。首先，指出他犯了严重错误，又承认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党为人民还是作出了贡献。《决议》还指出，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对于一些具体的错误也进行了纠正。他重用林彪，最后还是识破了林彪，同周恩来等同志一道机智地粉碎了林彪反

革命集团的政变。他重用江青反革命集团，但也揭露了他们的阴谋，没有使他们篡夺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对于他犯这样错误的原因也进行了具体分析。很多同志看了《决议》以后都说，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是合情合理、实事求是的。这就证明，我们这样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广大工人、农民、干部最满意的一点，就是《决议》虽然严厉地批评了毛泽东同志，同时又充分肯定了他的功绩，因此感觉到一块石头落了地，放心了。

除了“文化大革命”，“大跃进”也是一次大错误，也带有全局性。它和“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不同呢？主要是两点。首先，时间长短不同，“文化大革命”延续了十年，“大跃进”的时间较短。北戴河会议是一九五八年的八、九月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是一九五八年的十一月开的。相隔只有三四个月的时间。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一直到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前期，正像《决议》里讲的，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的后期来了个反右倾机会主义，中断了这个进程。到一九六〇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就提出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的错误，责成周恩来同志负责起草农村工作的紧急指示，也就是农村的《十二条》。后来党中央提出八字方针，接着又搞《人民公社六十条》、《工业管理七十条》，等等。这中间也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其次，“大跃进”的错误是毛泽东同志犯的，大家也一起跟着犯，邓小平同志再三讲，大家头脑都发热，要共同负责，毛泽东同志负主要责任。

但是，这个错误也是毛泽东同志首先发现、首先纠正的，而且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这个错误的时候，在党内还处于少数地位。“文化大革命”则不是这样。它是毛泽东同志发动的，发动的时候，中央的领导同志、全党的大多数干部，正如他批评的，“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很不认真”。周恩来同志想来纠正，邓小平同志想来纠正，毛泽东同志都不许。在这以前，还有所谓“二月逆流”。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时，“四人帮”讲，九个整顿，无孔不入，点滴不漏。像《决议》指出的，毛泽东同志不能够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后来，还是靠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老革命家、全党各级干部、全国各族人民纠正了他的错误。

“大跃进”给我们经济上带来严重危害，使我们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大幅度地下降，造成的损失经过三四年的调整才恢复过来。“文化大革命”是延缓了我们的建设速度，而且有过几次起伏，可是终究在十年中间我们的经济还是有所增长。在这一点上，各级干部和全国各族人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不能不说，毛泽东同志还是接受了“大跃进”的教训。“文化大革命”十年中，讲要改变所有制，把集体所有制改变成全民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上进行这种改革、那种改革。至少我没有看到毛泽东同志有这方面的批示或者言论。可见，经过“大跃进”之后，他在这个问题上谨慎了。至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那是另一回事。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直接有关的，还有毛泽东同志在阶级斗争问题

上的观点、做法一步一步升级，以至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议》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对属于方针性、政策性的重要问题，都毫不含糊地、实事求是地、分别地进行了分析，作了论断。究竟是这样的分析论断更符合实际、对我们更有教益，还是笼统地讲他犯了左倾路线错误更符合实际、对我们更有教益呢？我认为现在这个写法，会使我们得到的教训更深切，更有利于今后避免重犯这类错误。

过去说，我们党历史上有过多次路线错误，解放前六次，解放后三次，加上林彪、江青共十一次。林彪、江青叫路线错误好，还是依法判决为反革命集团好？哪个符合实际？答案比较容易理解。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已经平反了。彭德怀同志也平反了。剩下一个高岗，他的核心问题是篡夺最高领导权。解放后五次所谓路线斗争的提法，都不符合实际。解放前的六次：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时间是三个月；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六个月；罗章龙也不能叫路线错误，他是要另立中央，分裂党；王明思想方法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内战时期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抗战初期犯投降主义错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实际上是投降主义错误。所有这些，是分别按内容、特点说清楚，具体分析得出具体结论好，还是一概叫路线错误好？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决议》的写法更合乎实际。

“文化大革命”期间，说党的历史就是两条路线斗争史，这太简单化了。如果说有路线斗争，也只是党的历史的一部

分。把全部党史等同于路线斗争史，就不能完成党史的研究任务。对党内斗争作具体论断，既能促进党史研究，也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使党史研究更加前进，对教育自己、教育后代更有意义。

过去搞了多年“路线斗争”，什么问题都要从路线上找错误，从世界观上找原因。农民把一筐粪往哪里送，是交给生产队还是送到自留地，也当成路线问题。一个司机，油门一踩，也发生路线问题。总之，很小的事都要从路线上去检查。如果说有路线错误，也在上边，中央的某一个人、某几个人提出路线，别人执行而已。过去说路线贯穿在每件事上，路线正确就一切都正确，路线错误就一切都错误，造成了党内生活的紧张状态。路线斗争伤害了多少人呀！我们应该不应该接受一点教训，改变一下方法呢？哪种方法更合乎马克思主义、更合乎实际呢？起草《决议》时，确定不再用错误路线、路线斗争这类提法。同时照顾到历史的提法，《决议》中正面用路线的有一两处，如说三中全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路线说了多少年了，一下子都不说，还不太习惯。

五、正确认识我国生产资料 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决议》说：“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

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一部分在几轮讨论中大家是一致同意的，只有极个别同志提出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同志从开国以后就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后来，对于是否应该搞三大改造，也提出了不同意见。一家大学学报去年第四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问题》。文章不但对我们的三大改造，而且对我们的社会制度、对我们的党，可以说都提出了根本否定的意见。文章中的观点，不只是作者个人的观点，而是东抄西抄，拼凑起来的，经过集中、加工、提高，确实走得远了。这篇文章集中批评毛泽东同志，说党和毛泽东同志是反对狭隘经验论，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另一方面又在偷偷地宣扬狭隘经验论和历史唯心论。文章说：“《毛泽东选集》是经过毛泽东同志和毛选出版委员会认真修订过的，狭隘经验论和历史唯心论的观点，已经不是反映一九三七年某一个领导同志的看法了，而是反映了我们党在建国以后的共同认识了。所以，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暴露出我们理论上的错误，这是十分自然的。既然如此，我们中国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斗争，或者由农业社会主义的理论来统治，在小农乌托邦幻想的形式下，使我们的国家沿着刘邦、朱元璋、洪秀全的道路向封建主义滑行。”“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在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关口，必然会在我们党内孵化出一个反科学、反民主、反进步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招牌，以农业社会主义为核心，以封建社会主义为归结的派别。”还说“现

代中国的大工业的发展一定会锻炼出同这个派别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革命战士，他们经过马克思主义的长期教育，通过对客观实际的调查研究，一定能够用科学社会主义战胜农业社会主义。”这是一些具有煽动性的语言。这里说得很清楚，不是指毛泽东同志某一段、某些问题上有错误，而是对他进行全部的评价；不是说毛泽东同志个人，而是说党成为那样一个派别；也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有什么缺点，而是说我们搞的是农业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因此，才号召人们起来战而胜之。对文章的作者，对有这样观点的同志，还是要采取帮助的态度，以理服人的态度，进行批评教育。可是，文章提出的问题，确实值得引起我们注意。

考虑到上面这种情况，《决议》必须写清楚，我们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是正确的、成功的，而且是历史的必然，是历史发展的要求。《决议》不得不为此专门增加这样的内容。

下面我就第（11）、（12）两节的内容，解释几个问题。

我们有些理论文章，包括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反复引证马恩列斯的著作，说明只有生产力高度发展才能搞社会主义，我国生产力很落后，没有条件搞社会主义，搞了，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农业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不能不回答的。

第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确说过，只有生产力高度发展，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在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的根本解决，不是可以简单地、机械地规定某种数量界

限的东西。《资本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集中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6】全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都从各个方面论证了这一点。在对革命形势的估计上，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讲，革命形势来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进行了，而都没有实现和得到证实。但是，绝不能由此否定他们理论的正确。最近有的同志查了一下，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是个什么样子呢？一八七〇年，包括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四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各国，钢产量为五十二万吨，铁一千四百万吨，石油八十万吨。我国一九五二年钢产量就达到了九十多万吨。我们一九五七年钢和石油的产量，都远远超过了一八七〇年世界的总产量，钢达到了这个总产量的十倍。列宁说，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那么，一九〇〇年世界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如何呢？美国：钢一千零二十万吨，铁一千三百八十万吨，煤二亿四千多万吨。英国：钢五百九十八万吨，铁九百一十万吨，煤二亿二千八百八十万吨。德国：钢七百三十七万吨，铁八百五十二万吨，煤一亿四千九百八十万吨。法国：钢一百九十三万多吨，铁二百七十万吨，煤三千三百四十多万吨。一九〇〇年世界钢的总产量二千八百三十万吨，铁四千一百万吨，石油二千多万吨。我国一九七八年主要产品的产量，都远远超过了列宁所说的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的每一个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引用这些数字只是想说明，单纯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产品的产量来判断该不该搞社会主义，是很不科学的。革命当然归根到底有其经济动因，但它并不是纯经济的过程。就一个国家来说，是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各个阶级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加上国际条件的作用，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所造成的一种结果。列宁讲，所谓革命形势主要是三条：一是旧的统治阶级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二是革命的阶级和团结在它周围的群众，再也不愿意被压迫、被统治下去了，非起来革命不可；三是中间的力量发生了动摇，起码对革命不是采取反对的态度，而是采取中立的甚至于同情的态度。斯大林在《列宁主义问题》中讲，为什么在俄国首先搞了二月革命，接着搞了十月革命呢？为什么俄国成了列宁主义的故乡呢？他分析了世界的各种矛盾，分析了俄国的各种矛盾，指出尽管俄国是一个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生产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比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可是由于它是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间的一个最薄弱环节，利用这一条，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我们一九四九年的胜利，当然和俄国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果，使帝国主义削弱了。从国内来说，各种条件也成熟了。所以，只记住生产力高度发展了才能搞社会主义这么一句话，对它进行孤立的、简单化的理解，根本不考虑多种因素的作用，是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的。

第二，有一种意见，说三大改造开始以后，我们把国家

工业化忘记了，只搞阶级斗争去了。这首先不合乎事实。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搞了一百五十六个大项目，成为国家建设的中心。一九五六年，陈云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首先提出，我们的建设中出现了左倾的冒进倾向。最近陈云同志讲，从一九五六年以后，我们经济建设中指导思想上的主体的错误是“左”的错误。一直到今天，我们经济工作上要改正的错误主要的还是不量力而行，搞得太多，因此要调整。这是事实。我们过去不是不搞工业，而是搞急了，不量力而行。其次，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取得国家政权之前，以及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三大改造的时期，用主要力量来抓阶级斗争并没有错，抓革命、促生产也没有错。抓三大改造，对于解放生产力，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确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在这方面的失误，是发生在三大改造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存在以后，长时期内把阶级矛盾作为社会主要矛盾。

第三，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批评了毛泽东同志的“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句话。文章说，这是“对农民阶级自发性的崇拜”，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对于农民阶级的科学分析的”。文章引列宁关于农民有二重性的论述作为根据。但是文章作者忘记了，列宁说农民有二重性，毛泽东同志说“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从不同方面提出问题的，并不是同一个命题。这篇文章的作者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我们党从大革命后期，一直

到全国解放以后，领导农民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用先进的思想来教育农民、组织农民、领导农民，使农民本身有倾向社会主义的要求。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说中国农民中蕴藏着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是完全正确的。

工农联盟的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出来的。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就说，无产阶级的革命，需要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的支持。列宁也讲过，俄国的无产阶级政权，基础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但是，应该说，在实现、巩固、发展工农联盟的理论及其实践上，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所取得的成功，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先辈，我们工农联盟的巩固程度，比苏联好得多。几十年来，中国的无产阶级同广大农民，在长期的斗争中间形成的无比巩固的工农联盟，使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解放以后，毛泽东同志以主要力量领导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这种改造，割断了城市资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系，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两个胜利，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工农联盟问题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所未有的、带有世界意义的伟大贡献。因为我们党坚定不移地依靠农民、团结农民、教育农民、领导农民，和农民建立了异常密切的联系，为实现广大农民的利益而斗争。在斗争中引导农民一道前进，广大农民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充分发挥了革命主力军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也起了伟大作用。对于亿万农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采取一笔勾销的态度，无论

如何是站不住脚的。

也是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组成了以农民为主体的、有严明纪律和严格组织、战斗力很强的革命军队。我们长期搞农村根据地,在革命斗争中从农民中培养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治文的优秀干部,一直到今天,这些干部还占我们干部队伍中的多数。我们党领导农民从事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创造了许多震惊世界的奇迹,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人物。我们的将领,我们的领导人员,我们的大批干部,我们的很多英雄模范,相当大部分是农民出身的。我们党用先进思想教育农民,领导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农民,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难道说一句他们中间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都不可以吗?直到现在,农民还在我们人口中占多数。他们相信党、拥护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继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很坚定的,农民不但过去,而且现在都有一种很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第四,《决议》在充分肯定三大改造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三大改造后期具体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现在的写法是:“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至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曾经有同志提议,是不是加上三大改造的后期我们出现了左倾错误的

萌芽。经过反复考虑，觉得这个说法不切合实际。如果加上“左倾错误的萌芽”这样的语言，反而把问题搞抽象了。

六、这次的《决议》和一九四五年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的一点比较

邓小平同志说，这次《决议》比一九四五年的《决议》写得好。两个《决议》的起草人都有乔木同志，他也说，这次的比一九四五年的好。

讨论过程中间也有同志说，现在的《决议》不如一九四五年的《决议》。乔木同志说，听了这些评论，感觉到很惭愧。他说，对于一九四五年的《决议》说得那么好，心里很不安，实际上那个《决议》有不少缺点。我重看了一九四五年的《决议》，印象也是这样。概括地说，那个《决议》的缺点是历史的论证太少，理论的论证太多。一个多，一个少，显得没有完满地体现马克思主义关于分析历史、分析问题要历史的逻辑和理论的逻辑很好统一的原则。乔木同志大体上是这个意思。开始考虑这次《决议》起草的时候，我们搞了一个提纲，送给了邓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邓小平同志说，这个提纲是写文章，是理论上的论证。你们要记住，写《决议》不是写文章，不需要多方面展开论证，而是要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判断，话不要多。不要担心，怕说这个判断根据什么呀？为什么对呀？

要论证一下。这样不好。不但提纲有这个缺点，后来的几次稿子，小平同志说缺点还是作文章，不是写决议，更不是写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四五年那个《决议》，也讲了我们党成立以来一直到抗战结束以前几个阶段：大革命阶段，十年内战阶段，也包括历史的简要的回顾。但是，大量篇幅是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进行路线的对比论证：毛泽东同志对在什么地方，左倾路线错在什么地方。这样，那个《决议》对左倾路线的批判很有说服力，可是对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阶段、十年内战阶段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的必要评价，都没有写。

乔木同志讲，就拿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来说，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陈独秀的错误严重，是在一九二七年的上半年。当时北伐军打到武汉，国民政府也从广州迁来，陈独秀在同蒋介石、汪精卫的关系上，在对待工人运动、对待农民运动上，他的错误严重发展，招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实际上，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在更早以前就有很重要的表现，照理就应该在一九四五年的《决议》里指出来。“中山舰事件”，一句话没提。“国民党整理党务案”，一句话没提。这两件事情，当时在党内都是有分歧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是主张坚决反击的。陈独秀主张退让。这是他搞投降主义的重要事实。陈独秀否定党内一些同志的正确意见，接受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结果使党政军大权完全掌握在蒋介石一个人手里。他不但是总司令，而且要管当时的国民政府。北伐军打到武汉，蒋介石不愿到武汉，想把国

民政府迁到江西去。汪精卫他们这些人，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坚持下，曾经通过了一个谴责蒋介石的文件，拒绝把武汉国民政府迁到江西。当时我们党里有些同志提出免去蒋介石的总司令的职务，可是汪精卫这些人，还有陈独秀，都没有赞成。在究竟是北伐还是东征的问题上也有分歧。结果还是搞了北伐，没搞东征。这样一些历史事件，是表现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重要历史事实，在那里都没有讲。

一九四五年《决议》着重总结十年内战的经验，对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肯定的，可是对各个根据地及其他领导同志的贡献，只在一个地方用打括号的形式说到。比起这次《决议》中的“《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就简略得多。这次写二十八年虽然只用了五千多字，但是内容很丰富。里头讲到大革命失败以后，我们转入农村，建立根据地、创建红军、实行农村包围城市，列举的根据地有十二个，军队除第一、二、四方面军以外，陕北红军、红二十五军、南方游击队都说到了。这就比前一个《决议》要全面得多。

乔木同志还说，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领导取得胜利的。一九四五年的《决议》对他们所起的重要作用就没有写上。一九四五年《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为挽救革命危局所作的卓越贡献，但是其他领导人的贡献提得很少。应当说，这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延安参加整风的同志都知道，整风期间周恩来同志是受到批评的，他在几次会上都作了自我批评，还过不了关，在七大的选举中间名次相当靠后。当时，

康生主持一次座谈党史的会，周恩来同志首先讲了大革命初期黄埔军校的斗争、“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这些事件。他本人很谦虚，说“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毛泽东同志是坚决主张反击的，没有讲到他自己也有这种意见、支持这种意见。讲完以后，康生声色俱厉地批判周恩来同志，意思说你那个时候就跟着搞右倾投降主义，第五次反“围剿”是冒险主义，长征是逃跑主义。这种批判完全不符合事实。在那种气氛下，对周恩来同志的评价不可能是公正的。一九四五年《决议》作了正确的判断。那个《决议》，对于长征过程中间怎么样扭转战局、怎么样挽救红军、愈来愈多的同志认识到真理在毛泽东同志方面等重要事件的介绍，也太简单了。所谓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就是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五年这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不管是军事、政治、文化还是其他方面的，确实愈来愈多地被更多的同志所承认，而当时影响我们同志们正确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最大障碍，就是王明的教条主义。对教条主义的危害需要彻底地揭露，需要系统地认识。用批判这样一种错误来更好地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地位，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使全党更好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使党的思想更好地统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上面，这是历史和当时的条件要求这样作的。从主要的意义上讲，一九四五年的《决议》确实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起过巨大的作用。我这里不是对两个《决议》进行全面

的比较，不是对一九四五年的《决议》进行全面的评价，只是就某一方面进行一点比较，以说明从一九四五年到现在，经过将近四十年的成长和锻炼，我们党确实更加成熟了。

同志们提到与此有关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理解犯错误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思想根源。这次《决议》没讲犯错误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影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这个《决议》同前一个《决议》很不相同的地方。前一个《决议》说，小资产阶级成分在我们党内占了很大数量，他们的摇摆性、疯狂性是左倾错误路线的阶级根源。当时把王明这些人判断为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对于批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是起了好作用的。延安整风时，多次开会批评教条主义，批评王明，也批评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同志，还有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参加那些会的同志中，受到左倾打击的，特别是对那些由于王明的错误使自己工作的根据地丧失得一干二净的，批评得可厉害了，上纲很高。有些同志就认为，这些犯错误的人不是反革命简直不可理解。毛泽东同志亲自参加了一次杨家岭中央礼堂的大会，后来在《学习和时局》的讲话中说，我参加的那个会，整个会场就要炸了，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就不得了啦。中央政治局立即开会作出决定，口头传达的是，根据政治局对这些被批评的同志历史的考察，得出一致的看法，认为这些同志有政治问题是没有根据的。当时在延安工作的同志，恐怕还记得这件事。正式发表的文章，删去了这段话。

从这个意义上讲,说王明这些人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犯的错误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两面性的错误,是有道理的,对党内是起了稳定作用的。但是,也确实有说不通的地方。像陈独秀,在毛泽东同志《七大的工作方针》中讲,他是有功劳的,将来写党史还是要写上他。他是总司令,我们是他的学生。可是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这些话表明,对陈独秀这种人的评价是个复杂的问题。

所以,所谓阶级根源的分析,过去那个《决议》说得简单了些。不是说提出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没有起好作用,而是说简单了些。

注 释

- 【1】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68、169页。
- 【2】 同上书,第182页。
- 【3】 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70页。
- 【4】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219页。
- 【5】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第1369页。
- 【6】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831—832页。

中国经济的改革和调整*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日)

中国正在进行经济改革和调整。我有机会向南斯拉夫同志报告这方面的情况，深感荣幸。

同志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经济十分落后而又遭到长期战争破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九四九年，我国钢产量只有十五万八千吨，还不到当年世界总产量的千分之一；发电量四十三亿度，只占当年世界总产量的千分之五；煤炭产量三千二百万吨，只占当年世界总产量的千分之十九；机械制造工业非常薄弱，许多重要产品，如飞机、汽车、拖拉机等都不能制造，金属切削机床的产量只有一千六百台。全国产业工人约三百万人，不到总人口的千分之六。古老的中国素称以农立国，但生产还十分落后。一九四九年粮食产量只有一亿一千三百多万吨，平均每人占有量仅二百公斤多一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极端贫困。新中国建立以前，官僚资本占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固定资

* 这是邓力群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南斯拉夫访问时所作的报告。

产的百分之八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全部没收了官僚资本，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掌握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主义的土地占有制度。与此同时，我们用三年时间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从一九五三年起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并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在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里实现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是一件极其艰巨复杂的事情。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点的形式和方法。比如，在农业改造中所采取的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这样一些循序渐进、逐步过渡的步骤；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采取多种步骤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因此，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在一九五六年就基本上实现了这个意义深远的变革。在这样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工农业生产并没有遭到破坏，而是连年增长。这就足以证明，我们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二十多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也遭受过严重的挫折。例如，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一九六六年开始的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都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危

害。尽管如此，社会主义制度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仍然是毋庸置疑的。现在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增加了二十六倍，工农业总产值增加了八倍，国民收入增加了四倍，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也有显著增长。如果不是我们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发生了几次大的失误的话，我们的经济建设本来是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人民生活也可以更好一些的。现在，可以说，经过历史的严峻考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深深地扎了根。

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经济体制已经尽善尽美、完满无缺了。事情远不是这样。我们所以要进行经济改革，正是清醒地看到现行经济体制的弊病。

我国的经济体制，基本上是建国初期学习苏联的模式，同时加进了一些革命战争年代所实行的供给制的东西。这种经济体制，在当时，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就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弊病。对于这一点，我们党早有觉察。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的著名报告中，就提出要研究和处理好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明确指出：“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1】}同年九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同志也谈到：“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国家经济部门在过去几年中为限制资本主义工商

业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已经成为不必要的了。”【2】他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3】为了建立这样一种适合中国情况的经济体制，我们也进行过探索，作过一些改革。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正确的意见没有实现，后来的一些改革不仅没有突破原来经济体制的框框，从根本上消除它的弊病，反而在不少方面使得经济体制的弊病愈益严重起来。

我们过去经济体制的弊病，最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权力过于集中。在过去的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工业企业，特别是占工业总产值百分之八十一（一九七九年）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诸方面都缺乏应有的权力，而由各级行政机构靠国家的行政系统、行政手

段直接指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完全按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生产资料和成品由政府统配统包，财务由政府统收统支，使企业实际上成了行政机构的附属物。这样，就使直接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处于被动状态，生产经营成果同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利益失去了直接关系，严重地束缚了企业领导者和职工群众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也助长了行政机构在经济领导工作中的主观随意性和官僚主义作风。不能设想，有任何一个行政机构能够成功地把我国这样复杂和千变万化的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从生产到流通、分配、消费，都完全地直接地管起来。毫无疑问，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原则。但是，正如实践所表明的，公有化的形式和程度，必须同生产力的状况相适应，不能不顾生产力性质的要求，认为公有化的程度越高，经营的规模越大，行政部门管得越多，就越好。企业是社会经济的基层单位，应该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和利益，在生产计划、经营管理、产品销售、资金使用和劳动调配等方面，都不能没有一定的自主权。企业之间只能作为独立的经营者发生关系，相互取得对方的产品必须实行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现阶段，不是要限制和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而是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消费资料是商品，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价值规律不仅在流通领域起作用，而且在生产领域也起作用。社会生产过程是直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把二者割裂开来，再生产就难以进行。应该坦率地说，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受了斯大林关于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价值规律

在生产领域不起调节作用观点的影响，人为地把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割裂开来，生产单位往往不大考虑自己的产品是否适合用户的需要，销售单位也往往不大考虑生产和消费的结合，以致产生这样一种很不正常的状况：一方面，一些产品长期供不应求；一方面，一些产品大量积压。这就不能不造成严重的浪费。当然，我们也不是原封不动地按照斯大林的主张办的。例如，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除小农具以外）不能卖给集体农庄，而我们从来就没有这样做。

一是平均主义。按照我们的形象说法，就是“吃大锅饭”。对于不同的企业，不论是经营得好还是经营得不好，不论是盈利多还是盈利少，甚至不论是盈利还是亏损，它们的职工的报酬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在企业内部，劳动者的报酬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按照付出的劳动的多少，就是说，不是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这种近乎平均主义的做法，同革命战争年代所实行的供给制有着某些关系。我们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人民军队和其他职业革命者的队伍中间，一直是实行大体平均的供给制。这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基本上保证了人们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对于加强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革命战争结束以后，客观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却没有能够比较彻底地改变这种做法，反而在经济管理中沿袭了一些已经变得不适用的东西。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劳动还没有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是谋生的手段。搞

平均主义，干好干坏一个样，甚至干和不干一个样，必然严重地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阻碍生产的发展。

社会主义并不是某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而是亿万人民群众的生气勃勃的创造，因而必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如果思想僵化，不倾听实践的呼声，一切从书本出发，或者从以往的经验出发，它的生机也就停止了。一九七八年下半年，我们在全国内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同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号召全党同志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重申和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并且指出了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重大比例失调的状况，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混乱现象，以及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全会还明确地提出了实行经济改革的任务。中国两年多来的经济改革和调整，就是在这次会议精神指导下进行的。

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经济改革实际上是从农业开始的。过去的缺点，是没有根据各地的不同条件规定不同程度的公有制形式，而是在全国普遍地推行一种公有制的形式；对于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国家从上而下的行政干预过多，管得过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针对农业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对我国农村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改

革，作出了一系列原则的规定。这主要是：尊重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实行按劳分配，克服平均主义；恢复和保护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因地制宜地改革耕作制度和多种经营；等等。尔后，又在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发展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如：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即生产队按照专业分工组织劳动，农活分别不同情况承包到作业组、农户或劳动者个人，根据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的责任制，即生产队把一定数量的土地作为田间管理责任区，承包给劳动者，生产队统一耕种，统一提供生产费用，统一核定产量，根据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即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把农活承包给农户，根据产量计算劳动报酬，超产奖励。所有这些，都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一九七九年比一九七八年，农业生产总值增长了百分之八点六，粮食增产二千七百三十七万吨。一九八〇年，尽管遭受了几十年少有的南涝北旱的自然灾害，粮食产量比上年有所减少，但仍比丰收的一九七八年增产一千三百多万吨，是建国以来仅次于一九七九年的第二个大丰收年；棉花产量达到二百七十万吨以上，比一九七九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三；油料增长百分之十九，糖料增长百分之十八，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农业总产值一九八〇年比一九七九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七。由于农业生产的增长和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使得国内市场上直接或间接与农业

有关的消费品的供应状况大为好转，也比较多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整个农村经济开始活跃起来了。我们说，现在我国经济形势好，首先就表现在农村经济形势上。

工业体制的改革也在进行探索。这方面的改革是围绕着扩大企业自主权展开的。为了使改革稳步前进，不致引起经济生活的紊乱，我们先在一部分企业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一九八〇年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的工业企业，全国共有六千多个，尽管只占预算内的工业企业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其产值却占百分之六十，利润占百分之七十。扩大自主权的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制度，企业分得的利润用作生产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和职工奖金，开始改变了过去那种盈利全部上交给国家，企业开支完全由国家统一拨给，发生亏损则由国家补贴的办法，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果同自身的经济利益开始结合起来了。这对于调动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增强经营观念、市场观念、服务观念和竞争观念，起了很大作用。试点企业的产量、产值和上交利润的增长幅度，一般都超过试验前的水平，也高于尚未实行这种办法的同行业其他企业的水平，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的收入都有所增加，三者的利益得到了更好的结合。

为了探索进一步改革的道路，我们还在少数企业和个别城市进行“以税代利、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试验。这些企业，在按照国家法令上交各项税款和归还贷款后，所得收入可以自行支配。盈利多，企业所得就多；发生亏损，由企业负责，国家不予补贴。从初步试验的结果来看，效果比

上述扩大企业自主权的企业更为明显。

企业内部的管理体制,也在着手进行改革。将要普遍地恢复和建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制度。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有权对本单位范围内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作出决定;有权向上级建议罢免本单位的不称职的行政领导人员,并且可以逐步选举适当范围的领导人员。劳动者当家做主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我们讲扩大企业自主权,也是要使企业的全体职工有权管理企业,而不是把权力只扩大给企业的少数领导人。更广泛地说,劳动者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能只是在某些人的管理下享有教育权、劳动权、休息权等等,而应该享有管理企业和管理国家的权利。这是劳动者的根本权利。

此外,在财政、金融、计划、物资、物价、劳动等方面,也都在深入进行调查研究,着手制定改革方案。有的已开始在一定的范围内试行,比如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企业流动资金由无息使用改为有息贷款,等等。

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我们坚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适当发展个体经济。一九六二年,我国城镇还有个体劳动者二百多万人,一九七八年只剩下十五万人。经过近两年的恢复和发展,一九八〇年底达到八十一万多人。这种个体经济得到更多一些的发展,让它们从事手工业生产和修理行业,以及零售商业、饮食服务行业,可以弥补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不足,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就业,也有利于各种经济成分之间开展竞争。在公有制经济中,我们

强调多发展一些集体所有制经济，改变过去对它所采取的限制的做法。这些做法，对于我们不仅无害，而且是有益的。

在改进经济计划的管理方面，扩大自主权的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之后，有权根据市场需要自产自销。不仅是消费资料，一部分生产资料也作为商品进入市场。这样，就比过去密切了产需之间的联系，加速了商品流通，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使整个国民经济开始活了起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规定：“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我们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没有统一的计划指导是不行的。但是，企图把什么都无所不包地纳入直接的计划，同样是不行的。我们设想，今后对于全社会所必需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那一部分最重要的产品，仍然实行计划生产和分配，除此以外的，就通过市场去调节。实行严格计划的部分，同样必须正确地反映价值规律的要求；通过市场调节的部分，也必须在计划的指导下，使其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根据一九八〇年的统计，市场调节的部分，在工业生产领域中约占五分之一，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约占四分之一，在农副产品收购中约占三分之一。

总起来说，通过改革，要逐步做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把企业从国家行政机关的附属物，改变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有些企业则要实行自负盈亏；在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适当发展个体经济；在以计划调节为主的条件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把依靠行政组织和行政办法管

理经济,改变为主要依靠经济组织、经济手段和经济立法来管理经济;按照经济合理的原则,实行专业化协作,组织经济联合、经济中心和同业公司,改变地方和部门在不同程度上自成体系的状况。实行这些改革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更紧密地把经济责任和经济利益结合起来,使工商企业、农村生产队和劳动者个人普遍地获得搞好生产和经营管理的内在动力,使经济体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我们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在国民经济比例存在着严重失调的状况下进行的。长时期以来,由于我们在经济工作中犯有贪多求快的错误,破坏了国民经济正常的比例关系,出现了多方面的不平衡。主要是:在分配结构方面,国民收入用于积累的部分过多,用于消费的部分过少,妨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在产业结构方面,重工业过分突出,农业轻工业相对落后;在重工业内部,燃料、动力工业并没有走在加工工业的前边,交通运输也很落后。面对这种状况,目前经济体制的改革,必须与国民经济的调整同时进行,并且以调整为主。否则,不仅改革无法顺利进行,还会引起社会经济生活的混乱。因此,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并且促进调整。我们党正是这样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的。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需要进行改革,也明确指出经济结构中存在着的问题,随后就确定了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一九七九和一九八〇两年,我们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

列调整的措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由于我们用比较多的力量增加消费支出,一九八〇年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已经由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五提高为百分之六十七点六;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相应地由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五下降为百分之三十二点四。今后几年还将进一步降低积累所占的比重,提高消费所占的比重。为了逐步提高国民收入中消费所占的比重,我们花很大的力量调整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的比例关系,大力发展生活消费品的生产。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七上升到一九八〇年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九。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使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之间的联系,比过去好得多了。这说明,我国的经济正在逐步走上协调的、健康发展的轨道。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国经济中还存在一些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大量财政赤字和商品价格上涨。一九七九年财政赤字一百七十亿元,一九八〇年仍有一百二十一亿元。一九八〇年零售物价较上年上涨大约百分之六,其中国营商业的副食品价格上涨百分之十三点八。连续两年出现这么大的财政赤字,直接的原因是,在提高城乡人民的消费水平以后,基本建设开支没有相应地减下来,各项行政费用,包括国防费和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经费,不但没有减少,反而继续增加,以致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开支和各项消费开支的总和超过了财政收入。

增加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消费性支出,是完全必要的。

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农民仅出售农副产品即增加收入二百五十八亿元。一九八〇年同一九七七年相比：全国城镇增加就业人员二千三百多万人；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百分之三十三，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为百分之二十一；三年内全民所有制单位新建职工住宅竣工面积达一亿八千多万平方米。大幅度地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增加职工工资和恢复奖金制度，尽管步子稍微快了一点，但总的说来，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这样做，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这个本质的规定。问题是，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这一部分开支大幅度增加了，另外的一些开支，特别是基本建设开支没有相应地减下来，引起财政收支的不平衡。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所确定的超过国力的大规模引进，更加剧了这种不平衡。

去年年底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经验教训，全面地估量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在充分肯定两年来所取得成就的同时，决定进一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一九八一年，要争取做到基本上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和信贷收支平衡，停止财政性货币发行，把市场物价基本稳定下来。为此，我们正在进一步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减少国防费和各项事业费、行政管理费，大力节约能源，整顿和改组现有企业，认真抓好农业和工业生产，并且尽最大的努力继续安排好人民生活。

为了保证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避免发生混乱，我们在充分发挥地方和企业主动精神的同时，强调加强集中

统一。我们历来的经验证明，在遇到困难特别是全局性困难的时候，加强集中统一，才能协调各个方面的关系，使有限的财力物力得到合理的使用，变被动为主动。当然，现在强调集中统一，并不是要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要集中统一的，只是下述一些方面：经济改革和经济调整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措施，基本建设投资，财政税收制度和重大的财政措施，信贷管理制度和现金管理制度，重要物资的调拨计划，物价的管理，外贸和外汇的管理，等等。我们的经济一方面要具有计划性，防止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又要具有灵活性，防止死板和僵化。我们正为此而努力。

社会主义不能按照固定的千篇一律的模式建立。各国人民只能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选择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于南共联盟和南斯拉夫人民在根据本国条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所进行的创造，给予高度的评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虚心地学习其他国家人民、包括南斯拉夫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所提供的宝贵经验。然而，我们毕竟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因此，我们必须从现在中国有十亿人口，其中八亿是农民，经济还落后这样一种基本情况出发，选择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公有制，但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还很不完善。经过三十年来的建设，我国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但在不少部门，特别是在农业生产中，全国绝大部分地区还基本上是手工劳动，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高。拿粮食来说，商品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

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协作也不够发达。我们所进行的经济体制的改革要适合这种情况，经济结构的调整也要适合这种情况。我们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探索。初步的实践证明，这种探索的方向是正确的，步骤是稳妥的，效果也是好的。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成熟的经验。今后，我们将按照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继续在探索中前进。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相信，经过这样的努力，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能够比以往更顺利地向前发展的。我们对前途充满着信心。

注 释

- 【1】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版，第273页。
- 【2】 陈云：《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页。
- 【3】 同上书，第13页。

正确对待大庆的基本经验^{*}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大庆石油职工，在六十年代初，面对霸权主义的封锁，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下定为祖国争光、为人民争气的决心，发愤图强，靠《矛盾论》、《实践论》“两论”起家，建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油田，结束了中国依赖“洋油”的时代；七十年代初，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严重破坏期间，他们坚强勇敢，排除干扰，大幅度提高原油产量，对国民经济在大动乱中仍能取得进展起了重要作用；粉碎“四人帮”以来，在老油区产量连年递减的情况下，他们千方百计实现了稳产高产，保持了年产原油五千万吨的水平，继续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大庆石油职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实践，大庆油田不断前进和发展的历史，大庆广大干部和群众创造的一套我国自己建设和管理现代化企业的经验，表明大庆

^{*} 这是邓力群同志代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工业学大庆问题的报告》的通知的节录。

不愧为我国工交战线的先进典型，大庆职工不愧为我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

应该指出，过去在长期“左”的思想影响下，把大庆的一切经验几乎都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联系起来，去总结、拔高，总结一次，拔高一次，直至把有些经验绝对化、模式化，在宣传和推广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造成的。在指出这些问题的同时，必须肯定，大庆的许多宝贵经验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全国工交战线的领导干部和广大职工，都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学习和发展包括大庆在内的一切先进典型的好经验，以改进领导作风，建设职工队伍，加强企业管理，推进四化建设。大庆和整个石油战线的领导干部和广大职工，要继承优良传统，发扬革命精神，谦虚谨慎，坚持“两分法”前进。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他们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组织纪律性，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特别能战斗。毛泽东同志还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战争年代是这样，建设时期也是这样。大庆石油职工所以能够创造出那样的英雄业绩，为国家做出那么大的贡献，最重要的就在于他们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和优良品质，就在于他们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有不怕困难、勇挑重担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有高度的国家主人翁责任感。他们的这种革命精神，充分体现了我国工人阶级的本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新时期应该进一步发扬光大。

精神和物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在肃清“左”的思想影响中，批判“精神万能”的错误观点是完全必要的，但决不能因此否定革命精神对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动作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在大体相同的物质条件下，由于人们精神面貌的不同，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目前，在调整国民经济中，有些领导干部消极畏难，怨天尤人，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种精神状态必须坚决地、迅速地加以改变。气可鼓不可泄。我们反对无视客观条件制订超越实际可能的高指标，勉强去办那些经过努力还办不到的事情。但是，我们一定要把科学态度和革命精神结合起来，鼓足干劲，知难而进，积极去办好那些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情，使国民经济在调整中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使各项经济建设事业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建设一支为“四化”英勇奋斗的、思想先进、技术熟练、纪律严明、团结协作的职工队伍，是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迫切要求。在向现代化进军中，我国广大职工肩负着历史重任，当前正在努力克服困难，积极发展生产，为国家多做贡献。但也必须看到，由于职工队伍的不断扩大，大量新的人员把小生产、小市民的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气带到了工人阶级内部。由于十年内乱期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由于剥削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加上我们放松了对职工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培养

训练工作,以致在各个地方和工交企业的一些干部、党团员和职工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思想涣散、纪律松弛、工作马虎、损公利己等消极现象。一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等不正之风,又助长了这种消极现象的蔓延,影响了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对于上述问题,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工交企业中的党组织,必须高度重视,认真解决。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坚持思想领先的原则,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特别要加强对青年职工的教育和帮助。要教育职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正确认识 and 对待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关系,引导职工自觉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坚决批判和纠正有些企业和单位的领导干部迁就少数人的落后意识,迎合他们的不正当要求,用各种办法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的错误倾向。要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老工人、老模范的骨干作用,坚持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坚持开展比学赶帮超的群众活动,坚持做好职工教育培训工作,不断提高职工的思想政治觉悟和文化技术水平。要坚决克服思想政治工作涣散无力的状态,积极支持和帮助企业行政加强企业管理,做到敢抓敢管,赏罚分明,对好人好事要及时表扬,对各种不良倾向要敢于批评,对一切违法乱纪行为要严肃处理。

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 基本原理必须坚持*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正确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顺利地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越来越多的同志自觉地学习或重新学习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为了配合学习，一九八〇年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组织几位经济理论工作者编了《学习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论》一书，节录了《资本论》第二卷的主要内容。当然，按照经济工作实践的要求，各级做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只读节录本还不够，最好是读《资本论》第二卷，从头到尾读，而且力求联系实际加以运用。所以要这样做，理由很简单，过去我们在经济工作中犯过很多错误，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缺乏了解。一年多来，认真学习了再生产理论的绝大多数同志，都认为对提高自己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很大帮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国企业管理学会上的讲话。

助,认为继续组织这方面的学习很有必要。但是,也有极少数同志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某些基本原理表示怀疑甚至反对。我想,这方面的问题,也需要通过学习和讨论加以解决。

社会生产是由众多的方面构成的。马克思按照产品使用价值的不同,把社会总产品划分为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从而把社会生产划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 and 消费资料的生产两大部类。这两个部类的划分,是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重要前提。这是因为,要使生产的更新成为可能,就得既有生产资料又有消费资料,而且二者之间还应该保持必要的比例。只有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两个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才能获得为再生产所必需的消费品,资本家才能获得为再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才能得以进行。因此,社会再生产运动的规律,也就是生产这两种产品的两大部类之间的必然联系。鉴于我们面临着国民经济调整的紧迫任务和筹划今后的发展,这里着重讲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甲、两大部类相互协调是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的基本条件

马克思依据他的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前提,首先而且着重分析了简单再生产实现的条件。这就是,第Ⅰ部类的可变资本加剩余价值等于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用公式表示就

是 $I(v+m) = IIc$ 。 $I(v+m) = IIc$ ，这是简单再生产运动的客观规律，它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再生产。研究我国的社会再生产，也应该把社会总产品划分为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两大部类；在价值上，划分为 c 、 v 、 m 三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经济没有剩余价值的问题，但是还有剩余劳动、剩余产品的问题。 c 是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机器设备、原料、材料等生产资料的价值的再现； $v+m$ 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价值。 v 要用于维持劳动者原有的生活，保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 m 要有一部分作为积累，而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全部用于消费。在后一种情况下，两大部类之间经过交换使产品的各个部分都能实现，最基本的条件就是 $I(v+m) = IIc$ 。 $I(v+m)$ 如果小于 IIc ，第 II 部类已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就会有一部分得不到补偿； $I(v+m)$ 如果大于 IIc ，第 I 部类产品的一部分就会销不出去，实现不了。

当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基本上都不是年复一年地在原有的基础上重复，都是以扩大再生产为特征的。扩大再生产实现的条件是第 I 部类的可变资本加剩余价值大于第 II 部类的不变资本，用公式表示就是 $I(v+m) > IIc$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进行积累。就像马克思所讲的：“在以资本的增加为基础的生产中， $I(v+m)$ 必须 = IIc 加上再并入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产品，加上第 II 部类扩大生产所必需的不变资本的追加部分；而第 II 部类扩大生产的最低限度，就是第 I 部类本身进行实际

积累，即实际扩大生产所不可缺少的最低限度。”【1】但是，决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认为第Ⅰ部类的 $v+m$ 可以比第Ⅰ部类的 c 任意扩大，大到两大部类可以失去平衡，可以不相协调。实际上，第Ⅰ部类的积累不仅受它本身，而且受第Ⅱ部类积累能力的制约，因为生产消费归根到底总是同个人消费相关联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是不能脱离消费资料的生产而孤立发展的。为了扩大再生产，当然要追加生产资料，但同时还必须追加消费资料。因此马克思说：“就像第Ⅰ部类必须用它的剩余产品为第Ⅱ部类提供追加的不变资本一样，第Ⅱ部类也要在这个意义上为第Ⅰ部类提供追加的可变资本。”【2】马克思在谈到第Ⅰ部类部分剩余价值并入第Ⅱ部类不变资本，同时要求第Ⅱ部类的可变资本相应增加时又说：这种增加“是以第Ⅱ部类的再生产已经具有进一步资本化的趋势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第Ⅱ部类再生产包含着由必要生活资料构成的那部分剩余产品的增加为前提的。”【3】总之，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两大部类是互相提出追加的需要，互相提供满足追加需要的产品，互为市场，互为条件，互相制约的。这就告诉我们，在经济建设中，一定要使消费资料的生产随着生产资料生产的增加而相适应地增加，决不能只增加生产资料的生产而不增加消费资料的生产。过去，我们的毛病就出在不懂得这一点，一度走上了重工业片面发展，钢铁工业孤军突出、一切为钢铁让路的道路，造成了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大大降低了生产和建设的经济效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贯彻执行党中央确定的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特别是一九八〇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以后，贯彻这个方针的自觉性进一步提高。经过几年的努力，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确有改善，而且有的有了显著改善。首先，农民的积极性更大地发挥出来了。整个农村的经济形势超过预想，即使是灾区的形势也比预想的好得多。农业的发展，使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现在，中央正在研究农村还存在哪些问题，准备继续解决，以推动农业进一步发展。

工业内部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也越来越趋于协调。重工业产品，有些是要自用的，如煤炭用于发电，机器用于生产机器。但是，即使是这一部分生产资料的生产，最终也要受消费资料生产的制约，因为归根到底是消费资料的生产需要更多的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的生产是为适应这个需要才发展起来的，而且要这样发展下去。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生产资料的制造不是为了生产资料本身，而是由于制造消费品的工业部门对生产资料的需要日益增加。”【4】所以，我们的重工业部门一定要明确，生产出的产品，虽然有一部分是为满足自身的需要，但是归根到底是要为农业、轻工业服务，为它们提供原料、材料和越来越先进的机器设备。这样，重工业的发展方向就正确了。可是，过去我们却不是这样干的。是不是搞重工业的同志不想为轻工业服务呢？也不能这么说。想是想了，不过是这样想的：等我发展起来，力量大了，再来好好帮助你。这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

但是不够全面。全面地看问题,就应该说,重工业既要在发展起来以后更好地为轻工业服务,更要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常为轻工业服务。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生产资料生产要在两大部类协调发展才能发展起来,而不能孤立地发展;按比例是讲每个生产周期都要按比例,而不能这个时期片面发展这个部类,那个时期片面发展那个部类,两个时期合起来按比例。这样做,实际上是不要按比例。这条路再也不能走了。轻工业没有重工业及时地帮助它改善机器设备、没有重工业向它提供足够的原料,国家的投资也很少,甚至自己所需要的设备还要自己去制造,结果使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大大低于重工业,轻工业提供的消费品大大低于社会的购买力,以至于轻工业产品几十年一贯制。两年多来,在调整中,着重发展消费品生产,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从一九七九年开始,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就高于重工业,一九八〇年和一九八一年又继续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

应该说,我们是有条件自觉地保证社会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企业为众多的资本家所有,于是全部生产的联系,就只能是“作为盲目的规律强加于生产当事人,而不是作为由他们的集体的理性所把握、从而受他们支配的规律来使生产过程服从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5】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使人们有了自觉地安排自己的经济生活的可能,只要我们深入地认识客观经济规律,并据此去进行经济活动,就能够保证我们的社会生产协调地向前发展。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

越性。过去，我们的社会生产所以不止一次地发生比例失调，都是违背了两大部类必须协调发展的客观规律。究其原因固然很多，诸如认识客观规律不那么容易，在目前生产力水平和所有制的状况下，还不能把所有的企业和全部产品都用计划管起来，等等。但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原因是，没有处理好比例和速度的关系。过去我们有这样一种看法：似乎比例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速度。现在看来，这正好是颠倒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打个比方来说吧，有两条正常的腿才能跑得起来，跑得快；如果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怎么跑？硬要跑，非跌交子不可。一九五八年我们搞以钢铁为中心的高指标，几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结果是造成国民经济的比例严重失调。从当年看，增长速度似乎很快，工农业总产值从上年的百分之七点九，一下子上升为百分之三十二点二。这当然是不能持久了。到了一九六一年，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就急剧下降，比上年负百分之三十点九，一九六二年又比上年负百分之十点一，直至一九六三年才开始回升。这就表明，不按比例，是不会有高速度的。陈云同志说，快慢的问题，实际上是国民经济的比例问题；按比例发展，才可能有较快的速度。

我们为什么要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呢？调整的目的，就是把国民经济搞得比较合比例，然后比较按比例地前进。人们都看得很清楚，当前我们的经济形势是好的。这种好形势的出现，离开调整是无法说明的。不调整，就不会有农业和轻工业的迅速发展，市场供应就不会这么丰富，潜在的危险

就消除不了。有的同志在强调重工业要有一定的发展速度时说,只有在经济发展有一定的速度的情况下,才能为调整经济结构和比例关系提供有利条件。这种说法是不完全的。一九八一年重工业的产值,预计要比一九八〇年下降百分之五左右。下降的原因是什么呢?据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的分析,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批重工业企业停止了能源消耗很高、积压严重的长线产品的生产,腾出能源用来保证轻工业生产的需要,这是必要的、合理的;有相当一批重工业企业,过去长期主要为基本建设服务,今年由于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设备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订货相应减少,以致生产下降,这在重工业内部调整服务方向和产品结构的过程中是难免的。还有一种情况,由于有些同志对于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和产品结构的必要性认识不足,行动迟缓,应该早转产的转晚了,造成了一些重工业产品的积压,经济效益下降。这种倾向正在纠正。实际上,从一九八一年下半年以来,重工业在改变服务方向、压缩长线产品、增加人民生活急需的产品和出口产品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并已初步见效,重工业生产从第四季度起已开始回升。

保证社会生产协调地向前发展,还有一条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要正确处理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公有制的建立,使人们有可能把自己的经济关系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按照社会统一的计划自觉地进行经济活动。但是,在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和所有制状况下,还只能

把生产和流通的主要部分纳入国家计划，而不能把全部生产和流通都由国家计划统起来。

一九七九年四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在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中，可以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以计划调节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这个问题，实际上在这以前已经酝酿了相当一段时间。参加酝酿和讨论的同志，都同意这个原则性的意见。同年三月十二日，我在国家经委举办的企业管理研究班第一期的讲话中，针对我们过去权力过于集中，计划统得过多、过死的缺点，根据中央工作会议前议论的这个原则，讲到对国民经济的调节可以采取两种形式：对社会所必需的、关系国计民生的这一部分生产和建设，实行严格的计划调节，除此之外的，就通过市场去调节。八月二十七日，我在研究班第三期的讲话中，又讲到，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提法是新的，但这方面的做法，对于做经济工作时间较长的同志，并不生疏。在陈云同志主持全国经济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在这次讲话中，我建议大家重新认真学习陈云同志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特别是学习陈云同志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著名设想，其中就包括“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我还讲到，我们的经济工作搞来搞去，现在看来，还得回到陈云同志多年前讲过的这条路上去。

两次讲话，还从不同的侧面讲到，既然我们的整个生产

都是商品生产，那末不论是由计划调节的部分还是由市场调节的部分，都有一个生产单位究竟有权没有权和权利多大的问题。要搞商品生产，承认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起调节作用，就要承认企业在国家计划大框框内的不同程度的自主权，承认它们各自的不同程度的物质利益，就是说，承认它们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遵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农村实行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城市的一批企业中实行扩大自主权的试点，并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适当发展个体经济；在财政制度等方面也进行了初步的改革。所有这些，对于我国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显著的作用。在这段时间，既创造了好的经验，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认真地加以解决，而且提供了更科学地解决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问题的条件。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作出了重大决策：政治上实现进一步的安定，经济上实行进一步的调整。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经验。讨论中，对于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问题，陈云同志提议，把稿子中的有关提法修改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他还向起草的同志说，我们的经济要搞活，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能把计划经济灵活掉。陈云同志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以及在今年春节期间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一再强调，

工业生产、农业生产都要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基本原则，建设和生活、积累和消费都要按计划进行。事实已经证明，经过中央领导同志一致同意的陈云同志的建议和意见，比起一九七九年以来的提法，更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更有利于保证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决议》确定的这个重大原则作了很好的发挥，把企业和产品分为四种类型，并提出四种不同的管理方法。一类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骨干企业和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产品，这要按照国家的指令性计划生产；一类是分散在许多小企业和个体劳动者中生产的品种繁多的小商品，这适于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生产。介于这两类之间，还有两类产品和企业，一类要大部分按国家计划生产，小部分由企业自行组织生产；一类大部分由企业按照市场变化组织生产，小部分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这里所说的产品，不仅包括工业产品，也包括农产品。农产品也必须以计划生产为主，以自由生产为辅。当然，这里所提出的这些规定，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也还需要加以具体化，例如什么样的企业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骨干企业；哪些产品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产品，哪些产品是小商品；怎样使按照市场变化进行的生产不超过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等等。

《政府工作报告》中还说，这样一种管理体制“既不同于过去我们那种统得过死的体制，更不同于资本主义那样

的市场经济。它可以把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企业的积极性结合起来,真正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提高经济效益,按照社会需要组织和发展生产”。过去,我们企图把什么都用国家计划统起来,结果是,一方面管不了的硬去管,使计划失去科学性,曾经把经济搞得很死;另一方面该严格管起来的反而没有管好,致使国民经济常处于半无计划状态。这种毛病必须在体制改革中加以克服。

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还必须加强计划的科学性。社会主义经济可能有计划发展,也必须有计划发展。但是,这只有通过国家所制定的符合客观规律要求的计划才能实现。这样,把国家计划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就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我们过去的计划怎么样?不能说完全不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也不能说完全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实际上,在不少的时候,是很不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的。计划的科学性不强,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乃至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就不大可能很协调,经济的发展就不大可能很顺利;严重了甚至会由于无法执行而形同虚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同整个国民经济一样,计划工作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大为发扬,计划工作的方法也有很大的改进。

乙、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 扩大再生产的普遍规律

前边说过，在调整时期，重工业增长得慢一些，甚至一时没有增长，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能不能够由此得出结论说，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应该永远低于轻工业，重工业的产值所占的比重应该永远小于轻工业，并且把这作为方针，规定在长期计划中呢？有些同志是持这种观点的。我认为这种观点不能接受，接受了就要犯大错误。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没有把临时性的措施和长期的方针区别开来，不懂得在调整时期总的来说是属于长线的重工业要发展得慢一些，属于短线的轻工业要发展得快一些，特别是能源只有这么多，不尽可能地照顾生产短线产品的工业部门，就不能贯彻调整的方针。可是，在制定长远规划时，我们还是要坚持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原理。放弃这个原理，使重工业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就会使我们的轻工业和农业乃至重工业本身（特别是运输业和能源工业），由于缺少愈来愈完善的技术装备而停滞下来，就会使我们总是处于原材料和能源供应紧张的困境，从而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所以，决不能把目前重工业比重的暂时降低，看成是通常也应该这样。从长远来讲，还是要把重工业的比重逐步提高到适当的程度。而且就在调整时期，基本建设的安排，一直还是把能源和交通运输作为重点。这是扩大再生产能够顺利

进行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特别是在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工业化过程中，更是这样。

前不久，理论界有个别同志正式提出要把我们的社会建成一个“轻型结构的工业化社会”。这个提法，在研究问题时探讨一下是可以的，而要作为方针加以肯定，就很值得斟酌了。我们是要大力发展日用消费品、尤其是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不断增加这些产品的供应。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能源、新型的材料和现代化的技术设备，就不可能生产出广大群众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消费品。进行现代化建设，是离不开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的。我们要抓轻工业，这没有问题，现在抓得还不够，还要大发展。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得更远一些。学经济原理，学大政方针，意义也就在这里。我们还是要坚持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原理，换句话说，重工业还是要优先增长的。毛泽东同志过去一直在讲重工业是经济建设的中心，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也并不是否定以重工业为中心。这里，最根本的是要明确重工业的服务方向。一九七九年，陈云同志针对冶金部门在产量、质量等方面存在的盲目性，提出冶金工业要改变服务方向。他举例说，现在农村木材不够，农民盖房子有困难，冶金部门就可以搞些金属构件，供应农村。这不仅适用于冶金部门，所有的重工业部门都应该端正自己的服务方向，时刻想到农业、轻工业发展的需要，想到人民生活的需要，为农业服务，为轻工业服务，为市场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同时，要想到国防的需要。此外，还要注意国际市场的需求，

以扩大出口,帮助国内经济的发展。过去,我们对外出口粗加工产品多,如钨矿砂;出口精加工产品少,甚至还要进口不少的精加工品,如钨丝,这样损失太大。当前,重工业面临一个调整服务方向的任务,要从农业、轻工业、市场、人民生活以及出口的需要来考虑搞什么。同时,要适应服务方向的调整,合理改变重工业的内部结构,或者说内部比例关系。经过三十年的建设,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有四千一百多亿元工业固定资产、近四十万个工交企业这样相当可观的基础了。现在,要对这些现代化建设已有的基础进行有步骤的技术改造,这是一项非常迫切也是极为重要的任务。不逐步进行技术改造,过若干年以后这些企业的设备就将更加落后,那就谈不上实现现代化。如果把重工业的服务方向搞正确,按这个方向去安排计划,实行改组,那末重工业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它的产值可以提高,比重可以增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会显得更为重要。

我们提出,现在以及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工业方面,都要把发展消费品生产放在重要地位。能源和物资供应,投资和贷款的分配,科学技术力量的安排和科研课题的选定,以及国外技术和设备的引进,都应该首先保证工业消费品生产发展的需要。这是不是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增长相矛盾呢?只要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端正了服务方向,并不矛盾。因为消费品生产的发展离不开生产资料的供应;反过来说,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增长了,才有可能及时而且充分地满足消费资料生产部门对于机器设备和新兴工业原料

的需要。

有些同志从方针政策的角度来否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原理,有些则从理论上加以否定。从理论上加以否定的论点,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说这个原理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一条是说它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起作用,而不是普遍规律。

值得提出讨论的说法,主要有如下一些。

第一,认为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不是马克思的观点,说马克思并不认为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事实如何呢?马克思确实没有作过这样的概括,作出这样概括的是列宁。但是,列宁完全是根据马克思的意思进行概括的。列宁在阐述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实现的条件时,把技术进步纳入公式,运用图表详加分析,然后得出结论说:“这样我们看到,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即使没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做的研究,根据不变资本有比可变资本增长得更快的趋势的规律也能得出上面的结论,因为所谓生产资料增长最快,不过是把这个规律运用于社会总生产时的另一种说法而已。”【6】技术进步,用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就表现为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更快。这样,判断列宁把技术进步(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更快)纳入分析对不对,就要看“纳入”的是不是马克思的观点。读过《资本论》第一卷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在“资

本的积累过程”一篇里,详细地论证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进步,表现在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之比逐渐缩小上。其实,这样的意思,马克思在许多场合都讲过。例如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投在机器和原料上的资本部分在增加,花在工资上的资本部分在减少,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7】这些都证明,说列宁概括的不是马克思的观点,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第二,认为技术进步也可以通过节约生产资料来取得,在这种条件下,技术进步就不表现在 $\frac{v}{c}$ 的逐渐缩小上,并且认为这是超出马克思和列宁的分析的。其实,马克思和列宁在分析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时,从来没有把用更先进更完善的技术装备代替较落后的技术装备这个因素置于自己的考虑之外。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中,分析简单再生产时阐述了两个部类固定资本的补偿,既包括价值的补偿也包括实物的补偿,而且二者要相一致;在分析扩大再生产时,又阐述了不变资本的追加。补偿也好,追加也好,都像他在前一篇所说的:“劳动资料大部分都因为产业进步而不断革新。因此,它们不是以原来的形式,而是以革新的形式进行补偿。”【8】正因为这样,他才把扩大再生产分为在外延上扩大和在内涵上扩大这两种形式。所谓在内涵上扩大,就是提高生产资料的效率。

当然,问题主要还不在于马克思和列宁是怎么看的,而在于他们的这种看法是否已经过时。

是的,本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进步越来越更多地通过生产资料的节约来取得，因而资本有机构成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例如，美国加工工业中工资占资本的百分比：一九〇九年为四点一二，一九一九年为三点二六，一九二九年为三点六七，一九三七年为三点五一，一九四八年为二点四九，一九五三年为二点三六，一九六八年为二点四五。

这是不是说马克思关于随着技术进步 $\frac{v}{c}$ 逐渐缩小，从而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原理已经失效了呢？应该承认，在所谓节约生产资料消耗的技术进步的条件下，这个过程不像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条件下那样明显了，但是仍然在进行着。让我们作些简单的分析吧。这些年来，资本主义工业中生产资料消耗的节约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原料和材料的消耗降低了，这主要是由于新的原材料的发现以及设备和工艺的改进；固定资本中的所谓消极部分，即建筑物和工程等的费用减少了。这里边有很多因素是短时间的，是不能永远起作用的。至于固定资本中的所谓积极部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即机器设备的比重却是在增加。以美国的主要物质生产部门为例，工资占这部分资本的百分比：一九二九年为一点零六，一九三七年为一点一，一九四〇年为一点一二，一九五〇年为一点零七，一九五八年为一点二七，一九六八年为一点二七。马克思在论证“在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的进程中资本可变部分相对减少”时，这样说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旧资本总有一天也要从头到尾地更新，要脱皮，并且同样会以技术

上更加完善的形式再生出来,在这种形式下,用较少量的劳动就足以推动较多量的机器和原料。”【9】近几十年来的事实,是推翻了马克思的这一论断,还是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这一论断呢?显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第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起作用的条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作为一种规律是不存在的。对此究竟怎么看?固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和消费具有尖锐的矛盾,在那里,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换句话说,新形成的资本越来越多地转入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直至造成两大部类的比例失调。这已经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机器劳动的代替手工劳动根本不‘荒谬’,相反地,这正表现了人类技术的整个进步作用。”【10】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根据马克思手稿的材料改写的一段话中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在于:活劳动的份额减少,过去劳动的份额增加,但结果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总量减少;因而,所减少的活劳动要大于所增加的去劳动。”但是,“对资本来说,劳动生产力提高的规律不是无条件适用的。对资本来说,不是在活劳动一般地得到节约的时候,而是只有在活劳动中节约下来的有酬部分大于过去劳动的追加部分的时候,这种生产力才提高了”。【11】这里区别得十分清楚:活劳动的份额减少,过去劳动的份额增加,从而生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总量减少,这是适用于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的普遍规律;而资本主义的特点,则是资本所追求的不是一

般地节约活劳动,而是节约活劳动中的有酬部分。正因为这样,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就必然和消费资料生产落后于生产资料生产联系在一起。但是,生产资料的生产是不能长期和过分同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相脱离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要经过波动乃至危机来恢复失去的平衡。

社会主义生产,从根本上说来,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劳动者的需要;不是盲目发展,而是有计划地进行。我们完全有可能自觉地按照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保证两大部类所需要的生产资料能够及时获得,以便顺利地进行扩大再生产;同时自觉地按照两大部类协调发展的规律,保证消费资料生产同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相适应,并对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发挥促进的作用。那种把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和社会主义生产有计划地按比例发展,同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对立起来,认为肯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就必然发生两大部类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必然使生产违背满足劳动者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看法,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是相对过剩人口即庞大失业队伍的形成。这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结果,而且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我们也要不断地用更先进的设备代替落后的设备,这就需要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增长,否则就无法实现现代化。但是,实行的范围和步骤,就充分考虑到了劳动者的就业。我们国家人口多,底子薄,

就业是个很大的问题。我国现代化所以不能很快实现,手工劳动和半机械化生产所以在长时间内同机械化、自动化生产同时并存,不仅是因为一下子积累不了那么多的资金,也还因为这样才能容纳较多的人就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几年时间内,我们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安排了两千六百多万人就业。资本家会这样干吗?他们的办法是人越少越好,决不会这样干的。我们这样做,不只是从经济上考虑,而且也是从政治上考虑,因为用这种办法换来了社会的安定团结,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条件。既要实现现代化,又要安排人员就业,就必须妥善地解决就业人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矛盾。

过去我们的国民经济,的确不止一次地出现过比例失调的现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人们越来越看得清楚,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方针造成的。“左”的指导方针,包括盲目地追求高指标,也包括片面地理解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搞钢铁孤军突出,结果导致两大部类比例失调。对原理的不正确理解和原理本身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我们过去在这方面出毛病,并不是由于坚持了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增长的原理,刚好相反,是违背了这项原理。因为正确地运用这项原理,就要求坚持两大部类相协调。

有的同志不作这种区分,把出现比例失调,归之于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原理,甚至说,硬要说它是个规律的话,只能是破坏综合平衡的规律、破坏国民经济的规律。有

的还说,如果工业化从轻工业开始,那末我国的资金积累就要多得多,经济发展就可能避免大起大落。这就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到底对不对?尽人皆知,旧中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抗战前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约占百分之十多一点,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仅占百分之二十三。一九四九年钢产量只有十五万八千吨,机器制造厂多数是些只能从事修理的小厂。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建设如果不以重工业为中心,就无法以较先进的技术来武装轻工业和农业,就无法实现工业化。正是由于我们党执行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正确方针,才迅速地建立起自己的新式机床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等新兴的工业部门,显著地改变了我国工业落后的面貌,并为以后国民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在保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同时,也做到了使农业和轻工业相适应地发展。这五年,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百分之十点九,其中重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百分之二十五点四,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百分之四点五,轻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百分之十二点九。事实已经证明,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执行的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方针,是正确的。今天我们需要改正的,是对这个方针的片面理解,而决不是要把这个方针抛弃。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适

用于一切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还是只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起作用的问题。

首先，按照有的同志的说法，看一看“经济生活的实际”。谁也不否认，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头几十年，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是生产资料生产占优先地位的，只是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十年，甲类和乙类才大体上平行发展，有时甚至乙类的发展速度超过甲类。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后一种情况远比前一种情况为短。而对于后一种情况，也还要具体分析。如果把生产资料生产中最重要部门机器制造业单独抽出来，用它和轻工业（纺织、缝纫和制鞋、食品等工业）加以比较，那就可以看出，前者的增长速度还是高于后者的。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四年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部门年平均增长速度为百分之五，其中机器制造业为百分之五点六，轻工业为百分之三点八；机器制造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一九五五年为百分之三十一一点三，一九七四年提高到百分之三十六点二，而轻工业则由一九五五年的百分之三十一一点五下降为一九七四年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七。美国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七五年间，国民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百分之三点二，整个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百分之三点六，而一般机械行业为百分之五，电工电子机械行业为百分之五点二，精密机械行业为百分之六点七，只是运输机械行业低于整个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百分之三点五。日本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七四年国民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百

分之九,整个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百分之十三点七,而机械制造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则高达百分之十九点一。其他如西德、英国、法国等国机械工业的增长速度,也都不同程度地超过了整个工业和国民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这表明,还不能笼而统之地否定近几十年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占优先地位。当然,机器制造业所生产的不都是机器设备,它还生产一部分日用消费品。不过,就是考虑到这个因素,也不能改变上述判断。因为:第一,机器制造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机器设备,而不是日用消费品;第二,归于轻工业中的纺织工业,也生产一部分用于生产消费的产品。有的同志根据美国《基本经济统计手册》一九八一年七月号的材料,按市场最终产品,计算了美国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八〇年工业中消费品和设备的增长速度,结果是:消费品增长了三点四一倍,而设备则增长了四点八九倍。这个材料很有说服力。

其次,即使不作上述具体分析,也还有一个如何看待经济规律和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的问题。马克思在谈到“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时说过:“必然有某些起反作用的影响在发生作用,来阻挠和抵销这个一般规律的作用,使它只有趋势的性质,因此,我们也就把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叫作趋向下降。”【12】列宁在分析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农业有机构成提高的总趋势时也说过:“我们强调‘总的’一词,因为无论马克思或他的学生,始终只认为这个规律是资本主义总趋势的规律,而决不是一切个别情况的规律。”【13】任何经济规律(其实不止是经济规律)都不是孤立存在,都不会

不遇到起相反作用的因素的阻挠和抵制,因此都只能是“总趋势的规律”,而决不可能是“经济生活实际”同经济规律毫不偏离、始终一致。拿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来说吧,近几十年来,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它的作用就受到许多因素的阻挠和抵制。前面讲资本有机构成变化时所提到的一些,都属于这种因素。其实,这类因素还有很多,如生产资料的贬值,职工名义工资的增加,以及服务行业的发展等等。服务行业的发展,一方面增加对于消费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对于生产资料的需求则不大,这在两大部类增长的比例上,不能不有所反映。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战后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矿产原料和燃料生产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整个工业的增长速度。为什么能存在这样的状况呢?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对这方面产品进口的依赖程度加深了。据统计,美国能源生产量,以标准燃料计,一九五〇年为十一亿六千五百零六万吨,消费量为十一亿三千九百八十八万吨,生产量超过消费量;到一九五八年,消费量开始超过生产量。一九七五年消费量为二十三亿四千九百五十五万吨,而生产量只为二十亿零三千六百六十七万吨,相差三亿一千二百八十八万吨。英国一九五〇年生产标准燃料二万一千九百八十八万吨,消费量二万二千一百零三万吨,相差不算太大;到一九七五年消费量增加为二亿九千五百三十三万吨,而生产量却下降为一亿八千三百九十九万吨,相差一亿一千一百三十四万吨。下面的材料足以说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进口矿产

原料和燃料的依赖程度。

一九七五年几种产品的进口量占国内供应量的百分比

	美国	英国	法国	西德	日本(1976年)
原油	33.1	99.4	98.9	94.2	99.7
煤炭		3.9	40.9	3.3	76.6
铁矿砂	29.0	28.1	77.9	93.0	99.6

原料和燃料在生产资料中占很大的比重，这部分生产资料不在国内生产，在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上，不能不有所反映。

社会的经济生活总是同政治生活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影响经济规律起作用的不仅有经济因素，而且有国内外的政治因素。这在考察经济规律的作用时也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点，这里不多谈了。

同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起相反作用的因素，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也肯定是有的。举个例子来说吧。尽管社会主义经济从根本上说来是有计划发展的，不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尤其是经济指导方针上不适当、片面地强调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也会发生消费资料生产和生产资料生产的比例严重失调的现象。这时，就需要而且有可能主动地进行调整，适当放慢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大大加快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所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生产也不可能是一直优先增长的。

对于阻挠和抵制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起作用

的因素，很多人都列举过、分析过，我们对于这种情况应该加以重视，但是决不能由此而否认经济规律的存在。如果采取这种以枝节的、局部的现象去代替本质分析的方法，恐怕对任何经济规律都可以找到种种借口去加以否定了。

注 释

- 【1】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585页。
- 【2】 同上书，第584页。
- 【3】 同上书，第586页。
- 【4】 列宁：《答普·涅日达诺先生》。《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143页。
- 【5】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版，第286页。
- 【6】 列宁：《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71页。
- 【7】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版，第402页。
- 【8】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版，第190—191页。
- 【9】 同上书，第689页。
- 【10】 列宁：《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第88页。
- 【11】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版，第290、292页。
- 【12】 同上书，第258页。

- 【13】 列宁：《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93页。

逝者和生者的欣慰

——记《刘少奇选集》(上卷)的
编辑出版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五日)

面前是刚刚出版的《刘少奇选集》(上卷)。一页一页地读下去,少奇同志那严肃恳切的神情,略带湖南口音的、缓慢而清晰的话语,与编辑这本书有关的往事,一一涌在了眼前。

那是一九六〇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编定以后,毛泽东同志建议编辑出版少奇同志的选集。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提出这个问题,少奇同志总是表示,党的领导人中间,除《毛泽东选集》之外,不要再编个人的选集了,可以考虑编辑出版中共中央文集,其中收中央可以公开发表的文件,也收毛泽东同志之外其他领导人的一些讲话、文章,比如恩来等同志的一些讲话、文章。此事延宕多年,终未实现。毛泽东同志再次建议编辑出版少奇同志选集之后,这年冬天,中央书记处采纳这一建议并为此专门作了决定。少奇同志

尊重党中央的决定，表示同意了。

第一件工作，是从少奇同志文稿档案大约三百万字中，选出一个可用文稿的目录。卷帙浩繁，年代久远，稽考当时背景已属不易，适应当前情况更费斟酌，但终于有了一个选目，而少奇同志却离京南下，第二次往湖南调查去了。编辑小组几个人专门到长沙向他汇报。他耐心听取编辑小组的意见，提出还可以删去一些什么篇目、增加一些什么篇目，反复表示：现在党、国家和人民正处在困难时期，工作这么紧张，自己的思想和精力不能不集中于研究当前情况和解决当前问题，实在没有心情回过头去看多少年前的文章，不过既然中央已经作了决定，工作照常进行就是了。

一九六一年五、六月间，少奇同志从长沙回到北京，编辑小组同志第二次向他汇报。汇报中说到，现在看来，有些文章中的个别提法需要作必要的修改。比如一九四三年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提出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是很重要的，但是又把陈独秀、彭述之和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把李立三路线，把内战时期的几次左倾错误，统统概括为中国的孟什维主义。孟什维主义用于陈独秀是可以的，用于内战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用于王明，就同一九四五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王明犯教条主义错误的提法不一致了。少奇同志说，看来的确需要修改，索性题目也改成《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至于文章的内容，除了上边说到的，恐怕还有些地方需要作相应的修改。编辑小组同

志又提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理论修养的部分讲得不够充实,是不是需要作点补充。少奇同志也同意了。他还指出,对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好学生这个提法,也要进行恰当的修改。

在谈话中,少奇同志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过去公开发表的一些东西,经过这么多年了,现在党内外、国内外人们还记得起、愿意看、能看得下去,觉得对自己还有帮助的,主要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什么呢?想来想去,可能是因为党的建设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着重是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很少从党员应该怎样加强自身的思想意识修养、理论修养和党性锻炼,确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以有效地贯彻执行路线、方针、政策的角度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一贯重视制定各个时期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又重视党性修养方面的问题,而且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在根据多年对党内生活的观察、对党员种种表现的观察的基础上作出的总结。

编辑小组遵照少奇同志意见继续工作的期间,他又到东北林区调查了一次。从林区回来,由于旅途劳顿,中央批准他到广东短期休息。编辑小组希望利用他休息的时间,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对文稿进行一次系统修改,也得到了他的同意。此时,正值中央要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编辑小组来到广东,他却已经匆匆返回北京,把全部

精力投入到会议的准备工作中去。这样，编辑小组就在广州花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初步完成《刘少奇选集》（上卷）的校正、修改、补充工作。

党内外同志得知中央决定编辑出版少奇同志选集的消息，都很高兴。七千人大会期间，很多同志指出，“大跃进”中有的党员犯错误，在党和群众关系的问题上出乱子，基本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党性，放松了思想意识的修养和理论修养。考虑到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加强党员的党性锻炼，培养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仍然极其重要。因此建议，如果选集不能很快出版，请少奇同志先把有关党员修养、党性锻炼方面的讲话、文章一篇篇审定，公开发表、出版，配合大会精神的传达和贯彻。少奇同志听到与会同志的强烈反应，同意陆续出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和《论党》。他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三九年初次发表的时候，限于当时的条件，没有引证毛泽东同志关于党员修养、党性锻炼方面的意见。而我们党在这方面的经验，首先是由毛泽东同志很好地总结了的。这次，他要编辑小组一定充分引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稿子，少奇同志看了多次，对编辑小组作了补充的理论修养部分不大满意，觉得只引用了列宁的话和外国党的经验，没有阐述我们党怎样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创造的许多新鲜经验。他自己动笔写了书面要点，把编辑小组的同志找去，由他口授，笔录了一大段话。

这段话经过整理，又由他反复修改，写入现在稿子的第四节，就是新版单行本第24页第16行到第28页第4行的四个自然段。少奇同志结合我党斗争的历史和党内一些同志的具体情况，深刻地、循循善诱地阐述了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极端重要性。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如果我们不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在革命斗争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就有迷失方向、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甚至可能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成为各种机会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和应声虫。”“革命坚决、斗争勇敢，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宝贵品质。共产党员有了这样的品质，还必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斗争条件下，正确地解决如何革命、如何斗争的问题，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如果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武器，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高度修养，要在革命斗争的一切重要问题上，站稳无产阶级的正确立场；要在情况复杂和变化剧烈的环境下，在需要走迂回曲折道路的时候，都能够确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有利的方针政策，都能够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是根本无法做到的。”他分析了当时党内对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左”的或右的两种错误态度，认为都是在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不能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辨别革命事业发展的正确道路的显著

例证。

少奇同志对全文进行过三次修改，然后交代编辑小组把稿子报送中央书记处审查批准。书记处同志同意后，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

这年秋天，中央召开了北戴河会议，接着是八届十中全会。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党中央当时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断，作为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少奇同志也是有责任的。但是有一个历史事实却应该为后人所知道，就是党内一些同志，包括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的少奇同志，不隐讳地表示了一种忧虑：现在提出阶级斗争，经济调整怎么办？阶级斗争和经济调整怎样相结合？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大家都去搞阶级斗争，经济调整的工作没人做了？毛泽东同志在十中全会结束时的讲话，考虑和接受了这些意见，表示全会重提阶级斗争，讨论阶级斗争，批评阶级斗争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观点、右的倾向，可是这个问题在全会上讨论就行了，不要向下传达。要接受一九五九年的教训。一九五九年在中央全会上批评彭德怀同志，如果不往下传达，层层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就不会中断纠“左”的过程。所以，这次全会讨论了就行了，回去不要层层向下传达，以免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经济调整工作照原来计划进行。

七千人大会以后，少奇同志和恩来同志、陈云同志、小平同志一直在主持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这一方

针的贯彻，使我国国民经济逐步开始好转。到一九六五年，调整任务基本完成，国民经济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在此期间，少奇同志曾提出不少切中时弊、具有远见、经受住了实践检验的重要意见。与此同时，少奇同志还参加了农村四清的指导。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他比毛泽东同志的估计还要严重。毛泽东同志批评过他，他接受了批评。但是在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问题上，他没有随声附和，表示了明显的保留态度。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重新发表后，编辑小组同志把其他稿子陆续整理出来请他审阅，他总是说，放下吧，有空一定看。一篇、两篇、三篇，都是如此。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选集编辑出版工作非但不可能继续进行下去，反而成为林彪、江青强加的一条罪状了。如果不是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没有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少奇同志平反和重新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的决定，历史的真相岂不是要继续受到蒙蔽么？

现在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情况和过去已经大不相同。对于历史问题的认识比当时更加科学和完善，然而作者却不幸去世。再也不可能亲自对文稿进行修改和审定了。少奇同志历来处事严谨，一丝不苟，倘若在世，一定会充分考虑历史的进程，对已经为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不完善的地方进行修改、补充，选集的理论水平、思想水平以至结构、文字，将无疑比现在的本子更好些。这次重编，为节约篇幅，

去掉了内容大部分重复的几篇，考虑到《论党》已经出版单行本，只节选了其中三个部分；增选了一些电报，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重要电报；凡少奇同志生前发表过或已有手稿的，均保持原貌，只做少量文句和史实的校正。这样，像《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只在题解中说明孟什维主义系泛指“左”右倾机会主义，题目和行文就不再改动了。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由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同志的勤奋扎实的工作，这本书还是集中了少奇同志建国前最好的讲话、文章，确切地反映了他对党、对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贡献。尤其是在党的建设、白区工作、工人运动等问题上，他的理论和实践都有很多创见。《刘少奇选集》（上卷）记录了建国前党和人民英勇斗争的历史，总结了党的丰富斗争经验。今天看来尽管个别地方有些不足，但是，总的说来，无损于作者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光辉业绩。它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者、每一个正直的人，都可以从中获得精神的营养。

从一九六〇年开始着手编辑，到一九八二年正式出版《刘少奇选集》（上卷），经过了二十二年。其间变故迭起，曲曲折折，文稿和它的作者以及参加编辑小组的人，都经历了一次一次的考验。编辑小组的成员中，负责白区工作、国际问题文稿的姚溱同志，负责全书注释工作的王宗一同志，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而死，

使我们在事成之日的今天，每一念及，悲痛不能自禁。至于当时在理论上、政治上骗取了少奇同志信任并被委以主持选集编辑工作重任的人，则已经露出了原形，走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人们对于少奇同志，对于收进本书的文稿，经历了一个认识、再认识的过程。少奇同志及其在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的贡献，也经历了一个得到爱戴、尊敬和承认，受污辱和受批判，终于又得到爱戴、尊敬和承认的过程。历史无情，好事多磨，二十二年的风风雨雨，党和人民取得了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方面工作的深刻变化和伟大成果，不也凝结着少奇同志的心愿，融入了少奇同志的心血吗？这本书终于能够完成编辑工作并正式出版，是对于逝者的安慰；它的留存，又表明少奇同志仍然活在我们心中，这就尤其使生者感到欣慰了。

少奇同志说得好：“我们的党员，不但要在艰苦的、困难的以至失败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而且要在顺利的、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1】“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首先想到党的整体利益，都要把党的利益摆在前面，把个人问题、个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2】“他也可能有最大的革命勇敢。因为他没有任何私心，所以他无所畏惧。他没有做过‘亏心事’，他的错误缺点能够自己公开，勇敢改正，有如‘日月之食’。他理直气壮，永远不怕真理，勇敢地拥护真理，把真理告诉别人，为真理而战斗。即使他这样做暂时于他不利，为了拥护真理而要受到各种

打击,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指责而使他暂时孤立(光荣的孤立),甚至因此而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3】他这样要求和教育党内的同志,自己也身体力行,成为我们学习的表率。即使是功勋卓著,居于领导地位,已经年过花甲,想的仍然是党的当前工作、人民面临的迫切问题,而不是整理个人的文集。他不耻于作恳切的自我批评,随时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在蒙受历史上罕见的、长期的委屈和遭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也决不沉迷于个人的恩怨,决不放弃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初衷。他不是专门著书立说、咬文嚼字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战斗的、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自己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我们有一些同志可以讲、可以写成套的大话和原则,要人家这样做、那样做,但是却不大想自己是不是也准备做,是不是能做得好,不大想若干年后如果有人拿自己的话和自己的行动比较,将何言以对。鲁迅先生曾经批评有的读书人往往只讲空话以自示其不凡,虽有“高论”,能说不能行,一下子就消灭,而问题却依然如故,“我想,大话不宜讲得太早,否则,倘有记性,将来想到时会脸红”。【4】少奇同志和这种人相反。他的一生,他的每一言行,都经得起最严格的检查。他无需愧对党和人民,无需愧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写下的每一行字。

高风亮节,长存人间。经过半个多世纪艰难复杂斗争的严峻考验,少奇同志在政治上、理论上的贡献,已经为人们所公认;作为我们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

已经在历史上的的确确地站住了。他和他的著作，将永远激励我们奋进。我们要学习少奇同志的文章，尤其要学习他的为人，学习他的共产主义思想、品质，以此表示对他的最珍贵的纪念。

注 释

- 【1】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101—102页。
- 【2】 同上书，第130页。
- 【3】 同上书，第132页。
- 【4】 鲁迅：《导师》。《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关于加速开发利用 云南磷矿资源的建议*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第一书记座谈会结束以后,我到云南转了二十多天,对云南的磷矿资源和开发利用情况作了一些了解,并看了昆阳磷矿。回京后,又向有关部门了解了全国化肥的生产、进口和施用情况,考虑了今后磷肥的发展问题。简报如下,供参考。

一、氮、磷比例严重失调, 影响施肥效果

我国化肥工业的发展是很快的。一九八〇年比一九七〇年,农用化肥的产量增长了四倍,特别是一九七七年以来的三年中,平均每年增加近八百万吨。但主要是氮肥,占百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云南调查后写给中央的一份报告,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陈云同志批示“应该有步骤认真实施”。

分之八十以上。进口化肥的数量也逐年增加,近几年平均每年增加近百万吨,也主要是氮肥,有些年份占百分之九十左右。由于国内生产和进口的主要是氮肥,氮、磷肥的比例由六十年代以前的一比零点六到一比零点七下降为一比零点二。一九八一年,全国预计生产化肥六千零六十二万吨,其中磷肥一千三百五十四万吨,仅占百分之二十二;进口一千零二十万吨,其中磷肥二百七十七万吨,仅占百分之二十七。氮、磷比例略有改善,也仅为一比零点二三。

现在,全国按耕地面积平均的化肥施用量,每亩为八十斤,但地区间很不平衡,上海高达四百斤,浙江二百多斤,福建、北京、江苏近二百斤,广东、湖南、山东、辽宁一百斤以上,四川、江西、湖北、天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省区都在平均水平以下,西藏、内蒙不到十斤。施肥水平高的地区,磷肥占比重都比较小,上海只占百分之十五,浙江只占百分之二十点七。据测算,全国有十亿亩耕地缺磷,其中五亿亩严重缺磷。

氮肥是速效肥,有助于作物的前期生长。磷肥的作用比较持久,可使作物的颗粒饱满。一般地说,缺磷土壤在施用氮肥的基础上,增施一斤磷肥可增产粮食二到三斤,严重缺磷土壤则可增产五到六斤。据一些地区施肥的情况来看,开始施用氮肥,增产效果显著;过多地施用氮肥,没有一定数量的磷肥相配合,增产效果就差,而且影响作物的质量,还会造成土质板结,加大生产成本。据云南、广东、浙江等地典型试验,合理施用氮、磷、钾肥,比单施氮肥增产百分之

二十。江苏吴县的八个公社，在缺磷的稻田中进行氮肥不同的施用量试验，每亩施肥一百斤的水稻产量，比施肥八十、六十斤的还低。辽宁在二百三十万亩耕地上按土壤需要的氮、磷比施肥，每斤化肥增产粮食四到六斤，每百斤粮食的化肥成本由过去的五元降至二元左右。以上海粮食增产效果为例，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〇年间，每亩耕地化肥施用量保持在一百四十斤左右，五年只增加了零点三斤，而粮食产量增长了百分之七点四；近十年中，化肥施用量增长了一点七五倍，而粮食产量仅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九点六。浙江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前五年化肥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六，粮食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七；近十年，化肥增长一点八倍，粮食仅增长百分之三十三点三。由此可见，施肥水平高的地区，不宜再增加或过多增加氮肥的施用量，而应增施磷肥，或改施复合肥。

农业部门要求到一九八五年把氮、磷肥的比例调整到一比零点五。这个要求是合理的。

二、我国有条件解决磷肥问题

我国磷矿资源丰富，已探明储量一百零三点八亿吨，折五氧化二磷十六点四亿吨，居世界第四位。分布较广，除青海、西藏、上海、北京，天津外，其他省区都有。主要矿区集中在云、贵、川、鄂、湘五省，储量为七十四点三亿吨，占全国总量的百分之七十一一点六，而且品位较高，按五氧化

二磷的含量计算约占全国的百分之九十左右。这五省有储量在一亿吨以上的十大磷矿,即:云南的昆明——海口、华宁,贵州的开阳——瓮安、新华,四川的什邡——清坪、马边、雷波,湖北的荆襄、宜昌,湖南的石门。这十大矿区,有的已经大规模开采,有的正在土法开采。按储量计算,十大矿区的建设规模,可以达到年产三千二百万吨原矿的能力。

这么丰富的矿产资源,是自力更生解决磷肥的根本条件。在云、贵、川、鄂、湘磷矿集中的省区,或者有丰富的水力资源,或者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建设电的条件也是好的。只要国家在今后一个时期把化肥工业的发展重点转到磷肥上来,集中必要的资金和力量开发磷矿、硫铁矿,建设磷肥厂,相应地安排电站、铁路和其他配套的建设,磷肥的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就资金来说,近几年国家用于化肥建设的投资每年只有三到四亿元,是很有限的。而为了增加化肥的施用量,进口化肥的数量却大量增加,不但国家有计划地进、各地区也进,每年约需支出外汇十四亿美元。国家经营进口化肥亏损,每年又要支出价格补贴近二十亿元人民币。如果适当减少化肥的进口,挤一部分钱出来,同时把相应减少的价格补贴也拿出来,用于发展国内磷肥工业,那就解决很大问题。这有个国家统筹考虑,权衡利弊得失,怎么下决心的问题。

据化工部测算,到一九九〇年把氮磷比调整到一比零点三五,包括磷、硫两矿的采选及磷肥加工厂的建设,约需投资五十亿元,平均一年要五亿元。鉴于资金来源不能解

决，他们设想减少氮肥的进口，腾出钱来进口磷酸，自己建厂加工磷铵（复合肥料）。我和一些同志交换意见，认为这是权宜之计，不如宁肯近几年内减少氮肥的进口，腾出钱把自己磷肥工业搞起来，求得一劳永逸。

三、建议集中力量开发和利用云南的磷矿资源

云南的磷矿资源储量居全国首位，已探明十二点一亿吨，据地质部门预测，远景储量可达二百亿吨，滇池周围有四十六亿吨。已探明的储量中，富矿（五氧化二磷含量在百分之三十以上）有二点二亿吨，占全国富矿总量六点一亿吨的百分之三十六。矿体埋藏浅，大部分可以露天开采，每采一吨原矿只需剥离土石方零点五到二立方米。

这种矿体特点，给开发利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根据现有矿山的经验，得出如下数据：

- (1) 建设速度快，一个年产三十万吨的矿，一到二年即可建成；
- (2) 投资省，每吨原矿开采能力只需五十到七十元；
- (3) 生产成本低，大型矿（昆阳磷矿）十二元一吨，中小矿五到六元一吨。

云南目前已有二十二个磷矿开采企业，年采矿能力三百万吨，一九八一年完成三百一十五万吨，占全国产量一千零七十五万吨的百分之二十九；磷肥生产企业二十一个，已

形成年产磷肥八十八点五万吨的能力，一九八一年完成八十二万吨，占全国产量一千三百五十四万吨的百分之六。云南所产的矿石，主要依靠成昆、贵昆两条铁路外运出省，远销到除上海、两湖、内蒙外的二十四个省、市、区。一九八一年外运出省矿石完成二百三十二万吨，占铁路出省货运总量四百五十五万吨的百分之五十一，其中成昆线占百分之六十二，贵昆线占百分之三十八。化工部要求一九八二年云南外运磷矿三百一十万吨，由于铁路运输通不过，省里估计只能完成二百四十万吨。云南所产的磷肥，大部分省内自销。一九八二年，仅山东、河南、浙江、安徽、广西等省区，就要求云南供应磷肥一百四十万吨，也由于铁路通不过，估计只能供应三十一万吨。

安平生同志在去年底第一书记座谈会的发言中曾提出，改造贵昆铁路，实现电气化，对成昆铁路填平补齐，只需四点五亿元投资，即可每年多运出磷矿石七百五十万吨，使一些省市区现有的磷肥厂吃饱，增产磷肥，以减少磷肥和磷矿石的进口（一九八一年全国共进口磷肥二百七十七万吨、磷矿石三十九点四万吨）。这项提议，已经得到有关部门的赞同。贵昆线电气化工程的初步设计，国家计委已审定，分两段建设，“六五”期间建成贵阳至水城西段，水城至昆明段要到“六五”以后才能建成。成昆线的填平补齐，有关部门也在研究。问题是，这两条铁路改造后所增加的运力，将主要是煤。西南能源联合开发总公司计划开发西南煤炭四百万吨，规划贵昆线电气化增加的运力全部外运煤炭。

因此，不仅不能增加磷矿外运量，甚至还将挤占云、贵两省现有磷矿的运量。

云南省计委和化工厅的同志认为，除了加快贵昆、成昆两铁路的改造，力争多运一些矿石出省外，还应考虑在省内发展磷加工企业，就地消费资源，外运成品，以减少运量的问题。他们提出了在省内磷、电结合，加工重过磷酸钙的方案。这个方案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步，在云南磷肥厂扩建一套年产六万吨黄磷、加工成四十万吨重钙的大型高浓度装置，每年可为国家多提供一百万吨标准磷肥。从现在着手，一九八六年前建成（所需投资，云南省估计要二点四亿元，有关部门估计要四点四亿元）。相应地，“六五”期间新增发电装机四十五万千瓦，争取一九八八年把在建的鲁布格水电站（六十万千瓦）建成投产。

第二步，建设滇西云县的漫湾水电站，装机一百万千瓦，同时相应建设年产三十万吨黄磷、加工成二百万吨重钙的磷肥企业，共需投资二十二点三亿元。这一步实现后，每年可多为国家提供标准磷肥五百万吨，可以解决全国磷肥缺额一千五百万吨的三分之一。

为了适应上述两步设想，以及适应云南煤炭、有色金属、糖、烟、木材等物资外运的需要，还要建设昆明——南宁——防城的铁路，全线长八百公里。这条铁路修成后，可以沟通滇、桂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密切西南、中南地区的经济协作。

我认为，云南同志提出的方案，是从全局出发的。贵昆、成昆两条铁路的改造，要抓紧，在货运上要煤炭、磷矿石统筹安排。但是，运矿石出省，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石头，浪费运力，增加生产成本，很不经济。因此，应该考虑磷、电结合，就地加工，外运磷肥和其他磷制品的方案。当然，实现这个方案，花钱较多，牵涉到很多方面，不是三五年能够办到的。云南同志提出分两步走，也正是从这点考虑。国内自力更生解决磷肥，是个方向。为此，建议请国家计委、化工部、铁道部、电力部、煤炭部考虑云南同志提出的意见，并帮助云南搞一个开发利用磷矿的规划，分步实施。

封面
目录
正文